

三联
耳关

生活

®

2016.12.5
2016年第49期
www.lifeweek.com.cn

周刊

最漫长的告别
卡斯特罗
革命的活化石

915



9 771005 360000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 ISSN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 82-20 定价: ¥15元



《新闻周刊》(美国) 2016.12.2

民粹主义的反抗

欧洲大陆的民粹主义之风已自舞台边缘吹向中心。法国国民阵线主席玛丽娜·勒庞虽然在此次总统大选中胜算不大,但其影响力和前景已不容小觑。而在德国、奥地利、荷兰、意大利、波兰和匈牙利等国,中右派和极右派政党同样比以往活跃,他们反对移民,倾向民族主义,在滞缓的经济形势下主张保护主义,并对欧盟的改革有所诉求。



2 《外交世界》(法国) 2016.11

阿勒颇的进退,俄罗斯的选择

随着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战事的不断推进,似乎对“伊斯兰国”的军事打击即将进入收官阶段,身处两国的外国势力也在不断增长,为日后占领地盘。美国很担心对伊拉克摩苏尔的进攻会增强土耳其、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在此地的壮大。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在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范围。各国军队的“合法性”再次成为争论焦点,新一轮的外交风暴再次展开。



4 《新科学家》(英国) 2016.11.19

欢迎来到 2076 年

上周,《新科学家》杂志迎来 60 岁生日。在过去 60 年中,杂志走在技术变革的前沿,见证着互联网、基因工程以及全球气候变暖等重要问题的出现与变化。未来 60 年,人工智能无疑是最重要的科技方向,“指数论”(exponentialism)也成为某些领域重视的概念。这个老牌科学杂志对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抱有比较乐观的态度,迎接下一个 60 年,直到 2076 年。



1 《旁观者》(英国) 2016.11.26

一手好牌

英国的经济在恢复,失业率已降至 11 年来的最低点,苏格兰独立公投难有进展,脱欧公投的震荡似乎日渐平复。进行中的法国大选、即将到来的意大利宪法改革公投等事件却都在加大欧元区破裂的风险。特朗普的获胜及其对俄罗斯与欧洲事务的态度,让英国对欧洲大陆的意义更显重要。英国在将于明年启动的脱欧谈判中会更有主动权。

3 《经济学人》(英国) 2016.11.26

离开美国后的全球气候问题

特朗普在竞选时就声称要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那么,如果美国真的退出,会对控制全球气候变暖产生多大影响呢?答案是影响并不大。当下全球各国都在积极应对这个问题,科技进步带来的能耗提升、以中国为代表诸多国家对新能源的拥抱、石油市场的最新发展,这样的局面意味着即使没有美国,对抗气候变化依然不是问题。



P32 封面故事

最漫长的告别

卡斯特罗：革命的活化石

- 36 菲德尔·卡斯特罗：革命者的五重面相
- 52 拉美左派的生与“死”
- 66 90岁的卡斯特罗与39岁的格瓦拉
- 76 卡斯特罗最后的书友会
- 80 逝去的卡斯特罗和那些古巴生活
- 86 菲德尔·卡斯特罗谢幕，古巴将向何处去
- 90 海明威，古巴，以及卡斯特罗
- 96 暗杀卡斯特罗的那些闹剧
- 100 为父亲的摄影
- 104 抽一支无产阶级的雪茄



P108 郭川：成为船长

社会

| | |
|-------------------|-----|
| 人物：郭川：成为船长 | 108 |
| 调查：冒牌高校教授，正版绝命毒师 | 118 |
| 专访：中国距离建立空间站还有多远？ | 124 |

经济

| | |
|------------------|-----|
| 市场分析：深港通来了 | 106 |
| 商业：这一年奔驰做了哪些正确的事 | 130 |
| 商业：紧凑型宝马驶入蓝海 | 132 |

文化

| | |
|-------------------------------|-----|
| 音乐：马林斯基的中国月 | 136 |
| 电影：《神奇动物在哪里》：重回 J. K. 罗琳的魔法世界 | 142 |
| 时尚：衣裳的归途与未来 | 148 |
| 思想：批判理论的悖论 | 154 |
| 书评：何为更好的社会 | 156 |

| | |
|------------------|-----|
| 书与人：什么样的童书才是好的童书 | 158 |
|------------------|-----|

专栏

| | |
|---------------------------------|-----|
| 邢海洋：人民币贬值后的购买力 | 18 |
| 张斌：五年之壮志未酬 | 152 |
| 宋晓军：洛克希德·马丁的“亚太再平衡” | 153 |
| 朱伟：陈村：那就和自己好好玩一场 ⁽³⁾ | 166 |

| | | | |
|---------|----|------|-----|
| 环球要刊速览 | 4 | 声音 | 23 |
| 读者来信 | 10 | 生活圆桌 | 24 |
| 天下 | 12 | 好东西 | 28 |
| 理财与消费 | 20 | 个人问题 | 168 |
| 好消息·坏消息 | 22 | | |

2016年第49期，总第915期，2016年12月5日出版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刊文字及图片。
本刊保留一切法律追究权利。



www.lifeweek.com.cn

主管 / 主办 Published by

主管：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出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总编辑 Publisher

路英勇 Lu Yingyong

副总编辑 Deputy Publisher

常绍民 Chang Shaomin

名誉主编 Honorary Editor-in-chief

朱伟 Zhu Wei

主编 Editor-in-chief

李鸿谷 Li Honggu

副主编 Deputy Editor-in-chief

李菁 Li Jing 李伟 Li Wei

主编助理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吴琪 Wu Qi 曾焱 Zeng Yan

采编中心 Editorial Center

资深主笔 Senior Editor

邢海洋 Xing Haiyang 王小峰 Wang Xiaofeng 谢九 Xie Jiu

袁越 Yuan Yue 陈晓 Chen Xiao 王星 Wang Xing

主笔 Editor

李三 Li San 鲁伊 Lu Yi 钟和晏 Zhong Heyan

薛巍 Xue Wei 陈赛 Chen Sai 葛维樱 Ge Weiyang

贾冬婷 Jia Dongting 蒲实 Pu Shi 徐菁菁 Xu Jingjing

杨璐 Yang Lu

主任记者 Senior Reporter

李翊 Li Yi 李晶晶 Li Jingjing 蔡小川 Cai Xiaochuan

曹玲 Cao Ling 何潇 He Xiao 黑麦 Hei Mai

程磊 Cheng Lei 石鸣 Shi Ming 丘濂 Qiu Lian

吴丽玮 Wu Liwei 俞力莎 Yu Lisha 王丹阳 Wang Danyang

记者 Reporter

邱杨 Qiu Yang 付晓英 Fu Xiaoying 孙若茜 Sun Ruoxi

杨聃 Yang Dan 张若凡 Zhang Ruofan 刘敏 Liu Min

张月寒 Zhang Yuehan 张星云 Zhang Xingyun 艾江涛 Ai Jiangtao

宋诗婷 Song Shiting

特邀撰稿人 Overseas Feature Writer

赵潇 Zhao Xiao 苗千 Miao Qian

摄影记者 Photographer

于楚众 Yu Chuzhong 黄宇 Huang Yu 张雷 Zhang Lei

视觉设计中心 Vision Design Center

视觉总监 Visual Director

邹俊武 Zou Junwu

执行图片总监 Executive Photo Director

陈晓玲 Chen Xiaoling

设计总监 Design Director

王小菲 Wang Xiaofei

美术编辑 Art Editor

黄罡 Huang Gang 刘畅 Liu Chang

插图 Illustration Editor

张曦 Zhang Xi

图片编辑 Photo Editor

覃柳 Qin Liu 陈喆 Chen Zhe 韩雅丽 Han Yali

编务总监 Coordination Director

程昆 Cheng Kun

发行中心 Circulation Center

执行总监 Executive Director

雍江 Yong Jiang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周旭 Zhou Xu

区域经理 Regional Manager

杨雪梅 Yang Xuemei 潘海艳 Pan Haiyan

发行助理 Circulation Assistant

李卫红 Li Weihong 刘琳瑶 Liu Linyao

发行财务 Financial Executive

王霄 Wang Xiao

发行物流 Issue Logistics

王荻 Wang di

发行库管 Release Library

姚贺梅 Yao Hemei

读者服务经理 Reader Service Manager

朱静 Zhu Jing

读者服务助理 Reader Service Assistant

金宇迪 Jin Yudi

市场发展中心 Marketing Development Center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钦征 Qin Zheng 傅东方 Fu Dongfang

新媒体事业部 New Media Development

总监 Director

钦征 Qin Zheng

内容编辑 Editor

薛凡 Xue Peng 刘彭媛 Liu Pengyuan 徐睿洽 Xu Ruihan 刘凌 Liu Ling

美术设计 Artistic Design

张莉 Zhang Li

技术支持 Technology Department

刘国强 Liu Guoqiang

手机产品 MB Product

辛军 Xin Jun

平板产品 Tablet Product

连子君 Lian Zijun

活动事业部 Event Department

总监 Director

傅东方 Fu Dongfang

运营 Operational Manager

罗启宏 Luo Qihong 邢宇 Xing Yu

产品经理 Product Manager

殷佳婷 Yin Jiating

文案 Official Documents and Letters

孙名梓 Sun Mingzi

活动专员 Event Executive

周宇飞 Zhou Yufei

视频事业部 Video Department

李倩 Li Qian 吴冰川 Wu Bingchuan 孙明楷 Sun Mingkai

节气刊事业部 Solar Term Department

执行总监 Executive Director

王晶 Wang Jing

设计 Design

袁媛 Yuan Yuan

创新产品中心 Innovative Products Center

松果事业部 Songguo Department

总监 Director

魏一平 Wei Yiping

运营部 Operational Manager

宋洋 Song Yang 李骁楠 Li Xiaonan 赵夫宏 Zhao Fuhong 孙正之 Sun Zhengzhi

张倩娜 Zhang Qianna 周扬 Zhou Yang 陆汉夫 Lu HanFu 牛家欢 Niu Jiahuan 陈璐 Chen Lu

市场部 Marketing Department

夏青 Xia Qing 李璐 Li Lu 尤帆 You Fan 奚牧凉 Xi Muliang 李加贝 Li Jiabei

陈陌阳 Chen Moyang 韩蕾 Han Lei

行政 Administration

叶秋菊 Ye Qiuju

行政管理中心 Administration Center

行政主任 Office Manager

高媛 Gao Yuan

行政助理 Assistant

刘蓓 Liu Bei 吴泓林 Wu Honglin

财务总监 Financial Director

郝大超 Hao Dachao

财务主任 Financial Controller

陈晓华 Chen Xiaohua

出纳 Accountant

张宇 Zhang Yu 李明洋 Li Mingyang

法律顾问 Legal Counsel

金桥律师事务所 马眉 Ma Mei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采编中心热线电话：

(010)84681030 84681029 (传真)

E-mail: letter@lifeweek.com.cn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84050425/51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印刷：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10) 59011318

物流总代理：北京双禾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010) 61256299

广告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 0063 号

期刊登记证号：ISSN 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 Price：¥15.00 \$8.00 港币 20.00

本刊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

法国航空公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机上阅读刊物

如何购买 《三联生活周刊》

读者朋友，购买本刊请登录官网商城
shop.lifeweek.com.cn

或到当地邮局办理，本刊代号：82-20

也可直接向本刊读者服务部咨询

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另外，本刊在下列城市经销商的联系电话：

上海：上海汇敦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021) 63769858

成都：四川尚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028) 86667805

重庆：重庆弘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3) 86359776

南京：南京星与火文化有限公司 (025) 83327129

杭州：杭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 (0571) 88256120

广州：南方都市报广州发行部 (020) 87376490

武汉：武汉春秋书店 (027) 85493562

西安：陕西五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29) 82100585

昆明：昆明尚云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71) 64122816

沈阳：大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4) 23934765

哈尔滨：志诚远大书刊公司 (0451) 88341879

青岛：盛世飞龙图书有限公司 (0532) 83840608

济南：山东前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531) 82903395

长春：吉林九歌图书有限公司 (0431) 82752206

大连：大连渤海书店 (0411) 84609410

南昌：江西省邮政报刊零售公司 (0791) 88820509

太原：山西森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351) 7065397

贵阳：贵阳尚和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51) 5661974

兰州：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0931) 8521090

郑州：河南大河书局有限公司 (0371) 67647337

天津：天津天智书店 (022) 23683854

河北：石家庄远大书店 (0311) 83993043

安徽：合肥皖新书店 (0551) 64252409

新疆：乌鲁木齐市纵横文科书刊有限公司 (0991) 5582981

内蒙古：呼和浩特融联书店 (0471) 6263358

深圳：深圳市新宏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755) 22203426

长沙：湖南国闻书局书报刊配送有限公司 (0731) 82253036

本期广告目录

封二~扉1 · 波音

2~3 · 正谷

5 · 唯他可可

19 · 吉林敖东

35 · 野生救援

65 · WWF

79 · 周刊征订

95 · 周刊20年

99 · 周刊松果广告

134~135 · 一汽大众软文

147 · 书店广告

封三 · 力度形象

封底 360 手机卫士



拍摄二维码直接
下载客户端



新浪微博 @ 三联生活
周刊或扫描二维码



微信搜索 Lifeweek
或扫描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下载
松果 APP

手机报订阅：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8000，电信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9000。包月 8 元，周一至周五每日一期。

网络支持



新浪网官方微博：http://weibo.com/lifeweek

腾讯网官方 QQ:800033183

力度国际文化传媒集团

《三联生活周刊》
全媒体广告独家代理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9号

齐家园外交公寓7-5-13

邮编：100600

电话：+86 10 85325466

传真：+86 10 85324800

电邮：vtpower@vtpower.com.cn

网址：www.vtpower.com.cn

Vtpower
VITALPOWER MEDIA
力度国际文化传媒集团



中产的财务自由之路

每一次资本市场的波动，也意味着一次财务自由的可能性——这话着实撩人。我想每个人都希望能抓住这个机会，但财富机会不会属于每个人。在以资产多寡定阶层的当今中国，资本的保值升值当然是要务。其实，资本市场并没有特定中产阶层人士的机会，它不断波动起伏，不断为一些人聚集财富也使另一些人的财富被吞噬，看似总有机会，但实际上陷阱和灾难也相伴相随。对个体而言，不能寄望于“如果我能早日获利回吐”“如果我能赶上楼市高烧时出让”“如果我能赶上一个绩优的基金”——那只是少数精明人或者幸运者的机会，对普通人没有意义。这组文章的价值在于，通过分析欧美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在最近几十年越来越大的原因，揭示出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资本收入相对劳动收入增长过快——而这，正是中国今天应该注意避免的问题。

上海 黄集贤

社区的万能章

在社区工作过的人都知道，每天有多少奇葩证明等着盖章，形式多样，内容五花八门，从证明“我妈是我妈”到证明“我是我”。许多时候，社区根本无从掌握情况，更没法调查真实性，这些让人犯难的证明，盖章是对社会不负责任，不盖章又会被扣上“不作为”的大帽子。

前几天有位老人风风火火地冲进社区，拿着情况说明来盖章，上边写着：“我在小区门口摔倒，身体多处受伤，生活无法自理。”社区工作人员很为难，你摔倒的地方没有监控器，又没有医院开具的诊断书，所有情况都云里雾里，这个章真的不能盖。老人家叫嚷了半天后愤愤离去，临走时还反复强调自己的儿子和女婿在某政府机关工作。与这类“摔倒证明”相似的还有：“我买了电动车”“本人没有其他收入来源”“老公喝醉经常打我”“我没有在晚上唱歌扰民”……总之，稀奇古怪的证明越来越多，只有想不到，没有见不到。

在不可能确定真实情况的前提下，章能不能盖，事能不能办？有些证明牵扯复杂的家庭关系，比如《亲属关系证明》，因为涉及财产继承、房屋买卖，很容易产生事后纠纷，相关单位为了推卸法律责任，规避可能产生的风险，往往要社区在文书上盖章确认，所以经常看到居民们三人一队、五人一组，手持“我是家里唯一的孩子”“我爷爷没有二婚”“我爸爸没有私生子”之类的证明，要求社区马上签字盖章，晚了就要找领导。另一种情况纯粹就是折腾老百姓和为难社区。前不久有个女孩要做手术，要求她到社区盖章证明“我是自愿做手术的”，大家都很费解，社区的这个章有何意义，难道没有社区公章，手术就不给做了？就在昨天，还有位老

大爷到社区，要证明“自己的爷爷已经去世了”，工作人员算了一下，老人爷爷去世时，还是北洋政府时期，即使到历史档案馆也无法查证啊。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小微企业如雨后春笋，生机勃勃，可社区又莫名其妙地多了好几种“奇葩证明”。居民郑先生要在小区内开一间棋牌社，有关部门要他先出具“不扰民证明”，对尚未发生的事社区就要未卜先知，社区工作人员哭笑不得。这还没完，租金、购置设备、装修都需要一笔钱，郑先生准备申请贷款，又需要社区提供“人品证明”来确认他信用良好，品质优秀。

近几年，国家反复强调给基层减负，让社区居委会真正造福一方百姓，改革工作做了不少，创新方式层出不穷，取得的成绩年年有、月月报。在我看来给社区减负，关键是做好简政放权，不能只做加法，更要会算减法，政府应尽快出台一张明确、清晰的“盖章清单”，让各级部门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才能从源头上取消社区的“万能章”。

一读者

精准扶贫之困

前一阵，我回甘肃秦安农村老家，发现村里又多出两户砖房人家。十几年前我们村全是土坯房，这几年花椒丰收农民攒了些钱，就翻建砖房。新修的砖房贴了瓷砖，看着漂亮，而土坯房人家多是五六十年前的老房子，低矮、灰暗，甚至摇摇欲坠，看着是危房样儿。

你可能说，土坯房人家一定是没钱人家，需要重点帮扶。其实，真相并非如此。就拿我哥哥和弟弟说吧。哥哥是乡中心小学的老师，女儿也挣钱，家里的花椒树多；弟

弟是老实巴交的农民，闲时到县城的工地上干活，有时找不到活就闲在家，家里的花椒树少，论年收入哥哥家要比弟弟家多出好多。但奇葩的是，哥哥家还是老土坯房，弟弟家则是体面的砖房，如果单看住房和庭院，弟弟比哥哥家富裕。其实，哥哥有足够的钱翻建砖房，可他不甘心。这几年一直想着在县城买楼房，但又怕不值当，就一直犹豫着，凑合着住老土坯房。弟弟呢，赶上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国家补助农村翻建砖房，当时大地震波及甘肃天水秦安，弟弟的土坯房震危了，国家补助2万元，弟弟又添3万多元在正北建了一排砖房，再过两年将东边的土坯房翻建成砖房。因为建砖房，弟弟还借过债。

我们硬湾村共有70户人家，那些还住着老土坯房的30多户人家，多数是有足够的钱却不翻建砖房的。他们中有些准备在县城省城买房，有些在县城省城已经有房，他们觉得在山沟里修砖房是一种浪费，太没前瞻性了。还有几户人家，在城里工作和做生意，山村里的土坯房也就春节住几天，利用率不高，他们更不愿翻建成砖房。

住着破烂土坯房未必是穷，住着漂亮砖房未必是富。最接近的真相是：那些自认为没本事的人，觉得城里不易混的人，就老老实实在村里翻建砖房，他们是乡村的根；那些在城市混得好的人，

或有信心在城市扎根的人，农村的土坯房就像是过了河的船，随时准备弃之。我们村有一半人家捏着钱不盖砖房，我的担忧是，未来几年乡村将“折半”地衰减。

现在国家强调精准扶贫，不少地方政府又是“唯住房论”，一些干部平时不下乡，偶尔下乡进村很容易拿住房判断贫富，这在我们农村老家是不恰当的。扶贫要精准，事先要甄别“假穷”“假富”；还有，扶贫应该给那些真正愿意在农村扎根的人家，包括有漂亮砖房的“假富”人家。

北京 李成义

清退乱象

我这里是一个地级市的市辖区，上面“公车改革”一声令下，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无不闻风而动。随着公车或拍卖或封存，或转为他用，公车费用立竿见影般地大幅度下降，“屁股底下的腐败”得到了有力的遏制。可是，在热火朝天的运动背后，一个新的棘手问题如影随形地出现了，就是公车司机的清退。

按照规定，所有机关事业单位，除公检法机关、垂直管理的行政机关、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之外，一律取消公车。公车没了，公车司机自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和必要，应当予以清退。问题是，这机关事业单位的公车司机，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也是一个复杂的群体。

说它复杂，是因为如今的公车司机，用工方式多种多样：大部分司机是劳务派遣，或者机关的制度外用工，这两种用工方式都是没有正式编制的，小部分司机是事业编制，还有少数司机是公务员编制。

众所周知，在中国，一切待遇、福利都是跟着编制走的，都是编制的附属物。这不仅体现于在职时的薪酬福利上，也体现在如今的清退上。按照上面传达下来的政策口径，凡是劳务派遣、制度外用工的公车司机，只能接受领取一笔遣散费被清退的命运。按政策，每位被清退司机的遣散费，应当根据其工龄、距离退休的剩余年限等因素计算，可在实际执行中，里面的“花头经”大了去了。遣散费的计算方法、发放标准，根本不透明、不公开，不仅单位与单位之间常常不一样，即使在同一单位内部，人与人之间也常常不一样，厚此薄彼，造成了很多矛盾。更让人愤愤不平的是，一些公车司机明明是劳务派遣、制度外用工性质，已经被划入此次公车改革的清退范围，却凭着直接为领导服务的优势，抢在清退之前，通过种种非常手段、途径，硬生生地突击转为事业编制，摇身一变，堂而皇之地变成了“吃皇粮”的国家财政供养人员。这样一来，不仅公车改革的效果

大打折扣，也挤占了今、明两年本地事业单位招聘考试的录用名额，更败坏了党风政风、社会风气。

对这些公车司机的突击转编、火线转编，本地老百姓议论纷纷，非常看不惯。一位区委常委兼常务副区长的小车司机，抢在清退前最后一日办好了转编手续，成为区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的一名后勤人员，事业编制；而区政府新调来不久、排名最末的那位副区长，其小车司机就没有这般好运了——“主人”的分量不够，司机的去处便低了一等，被安排到区行政服务中心当勤杂人员，用工方式依然是劳务派遣。即便如此，这位司机还感叹说，幸好我跟的这位副区长，手上还分管着区行政服务中心，有地方安置我，工资比原来当司机时一分不少，工作又轻闲，比起那些被扫地出门、不得不自谋出路的司机，我已经很幸运了！最幸福的公车司机当属区司法局局长的小车司机，先是从制度外用工转为事业编制，岗位还是司机。听说这次公车改革将取消公车司机的岗位，局长在改革前夕当机立断，干脆让司机一步到位，从事业编制转为公务员编制，岗位定为局办秘书科科员。一时间，此事在本地传为“美谈”，老百姓一谈起来纷纷皱眉叹气。

上海 吴元特

巴西 | 音乐节

11月27日，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HONK”音乐节。图为参加音乐节的舞蹈表演者。为期4天的“HONK”音乐节用音乐、街头艺术、舞蹈将狂欢者们吸引在一起。









印度尼西亚 | 达雅文化

(上图) 11月25日, 印度尼西亚日惹当地的达雅族举行达雅文化周活动, 民众身着传统服饰在街头狂欢。达雅族是婆罗洲岛上的土著民族, 有自己的语言(达雅语)。

梵蒂冈 | 画展

(左图) 11月23日, 瑞典西尔维娅王后(右)与荷兰退位女王贝娅特丽克丝在梵蒂冈西斯汀教堂出席勃朗朗画展揭幕仪式。

美国 | 被赦免的火鸡

(右图) 11月22日, 全国火鸡联合会(National Turkey Federation)在华盛顿威拉德洲际酒店举行的媒体发布会上展出今年被赦免的火鸡“塔特”和“泰德”。23日, 奥巴马在白宫玫瑰花园举行任期内最后一次“火鸡赦免”典礼, “塔特”和“泰德”逃过被端上感恩节餐桌的命运。

比利时 | PS 达人

(下图) 比利时年轻人 Rob Van Impe 是一名新晋网红。他运用高超的 PS 技术, 把自己糅进了各种各样的名人照片中。《泰坦尼克号》的剧照里, 莱斯和杰克依依惜别时, Rob 坐在旁边的气垫轮胎游圈上观看; Rob 举着水枪参加贾斯汀·比伯的演唱会等。图为 Rob 把自己 PS 到泰勒·斯威夫特的一张照片上。





人民币贬值后的购买力

文 / 邢海洋

人民币跌跌不休，眼看对美元兵临“7”的大关口。与特朗普宣称的人为压低的操控汇率正相反，人民币的暴跌使我们又成了“最大的赢家”。对于富人，几年前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并购，海外置业更高潮不断，他们的确堪称大赢家；对穷人，货币贬值提升就业，也是前景光明；可对于中间阶层，恐要另当别论。

对普通人，外币的用途主要有两项：购物和旅游。而旅游和购物当然不仅限于美国，实际上欧洲、日韩和东南亚是国人光顾最多的地方。去年12月11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正式发布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对应的就是外汇交易中心挂牌的13个人民币对外汇交易币种，权重最高的是美元，占比26.4%；欧元次之，占21.39%。因为与美元绑定的港元也是13种货币中的一种，且占到了6.55%的比例，故而CFETS实际上由美元货币和非美货币两部分组成，美元货币约占1/3，非美货币占2/3。如果今年人民币还和去年一样，仅是对美元贬值了，对非美货币平价或升值，对海外旅游和购物的国人还是件好事。可惜，今年和去年，人民币的形势天壤之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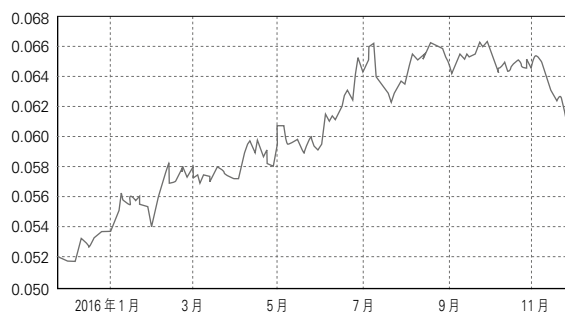
CFETS指数基期是2014年12月31日，基期指数是100点。去年12月11日宣布时，指数为101.45，而此前11月30日，数值高达102.93，较2014年底升值2.93%。整个2015年美元高涨，人民币被动升值，购买力空前。可到了今天，指数已经下落到了94一线，

不仅对美元贬值，对非美货币也贬值，贬值幅度也相仿。去年中国人海外买买买，全球扫货。中国人的旅游，特别是出境游，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志不在山水，意在购物。无论在欧洲、在美国，还是在日韩、在新马泰，大小商场、机场免税店，到处挤满来自中国的游客。去年“十一”黄金周，40万中国游客赴日，消费千亿日元。今年海外游仍在增长，但爆买的势头却不再强劲。中国海外游还是在创新高，却只是在英国脱欧、英镑贬值的情形下形成了一波黄金周抢购潮。

一年来，日元走势强劲，对人民币一度升值35%，欧元却受到欧元区前景不明的影响而与人民币相对稳定，不过今年来也涨了3%；英镑却因为脱欧，年来已经跌去了10%。这就解释了中国海外游从四面开花式的热买到选择性购物的转变。抛开影响因素复杂的游客流向，海外并购更能反映中国企业家们的取舍：Dealogic数据显示，截至7月5日，年内中企海外并购案中，在欧洲的共有133笔，总金额853.42亿美元；在北美市场的104笔，规模总计307.75亿美元。对比2015年，中企在欧洲市场完成142笔并购，总规模333.84亿美元，在北美市场并购169笔，总规模279.60亿美元。相比美国，欧洲市场的并购竞争更小，且欧洲的监管对中国企业更为友好，这是驱使中企兴趣转移的关键因素。欧元与英镑的价格优势，更使得欧洲企业具有了更高的性价比。

消费者接触最多的海外商品当然不是亲自背回来或代购的。上至进口的特斯拉下至日本尿布，无不在涨价。当然，对于全球最大的工业品制造国，上至汽车下至普通日用品我们几乎无不可以自产，且国产化程度越来越高，自可抵消到海外采购的不利因素。可大量进口的原材料却是以美元计价，价格最终将传导给消费者。今年原油和天然气等能源价格虽稳定，可铁矿石和煤炭等“黑金”，铜、锡、铝和铅等有色金属均大涨。9月份PPI终于结束了连续54个月的下滑，10月CPI回复到“2”区间，所有这些物价的上涨，都免不了进口价格因素的推动。若人民币一直跌下去，按悲观的看法甚至跌到“9”，一轮输入式的通胀就不可避免，届时受伤的就不仅是买买买的中产家庭，低收入家庭也将受牵连。☑

日元对人民币汇率



健忘

睡不

睡不好

容

压力大

容颜差

操心多



【功能主治】 生精补髓、益气养血、强脑安神



栏目插图 | 范薇

家庭财富缩水

瑞信全球财富报告显示，英国脱欧致家庭财富急剧缩水，日元走强令日本财富大增。汇率波动也导致中国的家庭财富下降 2.8% 至 23 万亿美元，被日本反超，但以人民币计算则有 4.1% 增长。中国资产净值超过 5000 万美元的超高净值人士达 1.1 万人，全球排名第二，增幅为 6.2%，自 2000 年以来上升了 100 倍。这份涵盖全球 200 多个国家的 48 亿成年人的财富数据报告显示，2016 年全球财富总值为 256 万亿美元，只上升 1.4%，与成年人口增长相符。

美元的前景

特朗普当选，美元强劲，这得自里根时代的经验：宽财政和紧货币政策组合会带来强劲美元。特朗普承诺将对富人减税、对投资者实行税收减免；或者是一种更为平衡的计划，包括增加基础设施支出。在这两种情形下，增长和通胀都可能会加速，美联储则将更早、更快地通过加息来做出回应。但围绕债务可持续性的疑虑可能促使投资者三思，故而长远看，对美元价值的唯一可靠指引是传奇投资者伯纳德·巴鲁克有关股市的至理名言：它将波动。

欧元平价隐忧

民调显示，之前极度不被看好的法国反欧盟政党领袖勒庞开始成为黑天鹅，已彻底扭转了之前极度落后的支持率，遥遥领先。若勒庞当选，全球最震撼的黑天鹅想要起飞，欧盟真要解体了。这只黑天鹅所带来的影响，比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更大。和看空欧元的高盛一样，法国兴业银行喊出更极端的口号：准备好目睹 15 年一遇，2017 年初欧元与美元平价。





地价还在飞

11月22日，广州一次性推出10宗地块，超40家房企、总轮数1134轮，抢出七区域地王，一日吸金超204亿元，其中3宗地块楼面单价破4万元。大规模推地并未缓解土地市场过热，此前一天，福州15宗地块吸金超120亿元，其中8宗达到最高限价遭遇“熔断”。在开发商拿地保证金来源受到严格监管，保证金不得通过银行贷款、股东借款及资产管理计划等方式筹集下，大房企仍如此疯狂拿地，只能说土地供需极度失衡，调控没调到点上。

如果油价破55

OPEC正致力于减产细则。产油国目标是通过减产抬升油价而获得更加充裕的财政收入，当然目标不会只是涨2~3美元，可涨多了，比如涨到55美元，对OPEC也同样得不偿失。原因是：油价一旦突破55美元/桶，美国的页岩油商可以获得12~18个月的58~60美元/桶左右的套期保值，而这个价位将足以激活美国四大页岩油产区，形成半年左右50万~80万桶/日以上的产量增量。

IPO提速

11月的第一个周五，证监会宣布核准9家企业首发申请，第二个周五又核准了15家。与此前每月两批的速度相比，发行频率有明显提高。随着IPO月批改周批，还没到12月，下半年获批企业数量和融资规模均超过上半年的两倍，“堰塞湖”明显消解。2015年12月全国“人大”对注册制进行授权，两年的授权期即将过半。《证券法》修法也在推进，注册制似有水到渠成的节奏。



第一脚：TPP

特朗普表示，将在上任第一天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TPP。奥巴马积极推动的TPP，目的是为了遏制中国，是国际意识形态斗争在国际贸易中的体现，其主要获益者是日本和新加坡，但对进口为主的美国并无益处，只不过将从中国进口的商品，转移到从日本、新加坡以及其他TPP协议签订国进口。作为商人出身的总统，特朗普一切从经济利益出发，上任第一脚准备踢在这个费力不讨好的TPP上。



你富你有理？

在美国，最穷的穷人和最富的富人，预期寿命相差可达 10 年以上。许多精英阶层为自己辩解说，这是因为穷人的不健康生活方式使然。然而，发表于《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跟踪调查了 45 只成年雌性恒河猴之后发现，能否实现阶层的向上流动对健康和预期寿命的影响更为关键。猴子不抽烟、不喝酒、不吃垃圾食品，它们不看电视，还经常锻炼。但那些在试验中被故意置于群体底层的恒河猴，会因为慢性的生活压力而致免疫系统受损，从而更容易患上各类疾病。与之相对应，群体地位得到显著提升的猴子，健康状况也会迅速改善。

好消息

手机代表你的心

初次见面，如何判断对方是怎样的人？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的研究小组日前发表论文建议，不妨看看对方的智能手机。用苹果手机的人普遍更年轻、外向、不太在乎别人喜欢的东西是不是跟自己一样，而用安卓手机的人更老成、实在、和蔼、遵守规则、对财富和地位没那么在乎。



团结就是力量

在北极如此恶劣的自然条件下，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如何繁衍生息？美国阿拉斯加大学的研究小组日前发现，分享与合作精神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在三个被调查的地区中，60% 到 75% 的劳动成果是在家庭和邻里互助的前提下获得的，物资也会按照季节和年成在社区中流通分享。

坏消息

脆弱的大男子

别看花花公子和霸道总裁们表面风光，他们的精神世界其实常常充满了黑暗和绝望。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研究者综合分析了 78 项关注男性精神健康的研究后发现，那些主动拥抱传统社会大男子主义价值观并身体力行的人最容易被抑郁和焦虑困扰，而且很少主动寻求帮助。

人善被人欺

《欧洲工作与组织心理学杂志》上的一项最新研究指出，在残酷的职场上，做个温婉可亲的好女人至少从收入来看是件不划算的事。研究者调查了一家荷兰跨国公司的 375 名雇员后发现，那些颐指气使、要求太多的女员工虽然不受欢迎，但却赚得比业绩类似但低调温和的女同事多。



一个人越是怀疑自己，越难以了解自己，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自尊越低，越容易上那些星座、占卜等骗人的把戏的当。如果没有羞怯的人，就不会有私家侦探。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奇迹般地了解了自尊的秘密，所有的星相学家、通灵者和占卜师都会破产。

——克里斯托弗·安德烈和弗朗索瓦·勒洛尔，《恰如其分的自尊》

如果我们听智者的话，我们永远都不会有爱情。我们永远都不会有友情，我们永远都不会去经商，因为我们会变得愤世嫉俗。那都是胡扯。你必须不断跳下悬崖，在坠落中长出翅膀。

——美国小说家雷·布拉德伯雷

世界是棋盘，天象是棋子，我们所说的自然法则就是棋规。我们看不到对方棋手。我们知道他的走法总是公平、公正、耐心的。但我们（在吃过苦头之后）也知道，他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失误，也丝毫容不得无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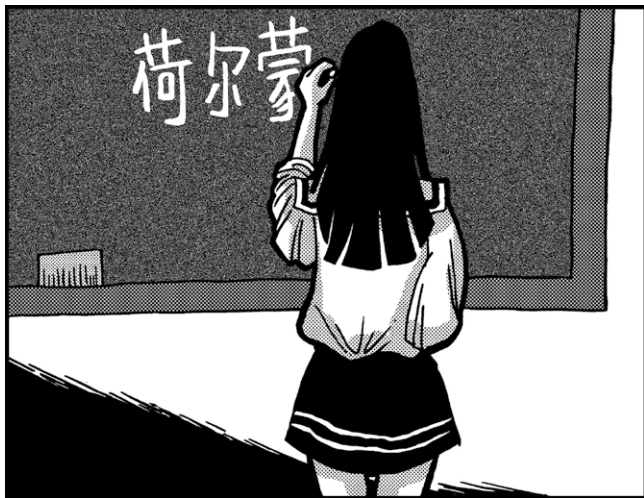
——英国博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

狗在电影和小说中出现的次数超过猫。但是互联网更像是诗歌：非线性、无条理、自然流露并且具有爆发力，一个可以同时躲藏与出击的地方。从苏斯博士到艾略特，诗歌是难得猫比狗出现得更频繁的一种文学形式。

——美国科学记者阿比盖尔·塔克谈猫为什么走红互联网

+/-

数字



(插图 山羊胡)

时间既能治愈，也能摧毁，这取决于伤口的性质；实际上，它能揭示人性。我们不是处在苦痛期，就是处在恢复期；若没有时间，两者都不会发生。除了人，时间是笔下最有意思的东西。

——爱尔兰短篇小说大师威廉·特雷弗。特雷弗 11 月 21 日去世，享年 88 岁



2145

件

英国国防部拥有的艺术品件数超过其拥有的坦克、飞机、战舰和潜艇的数量。英国军方拥有 2145 件艺术品、版画、照片、手稿、雕塑、地图以及家具和钟表等古董。而英国武装部队只有 19 艘护卫舰和驱逐舰、11 艘潜艇、227 辆坦克和 230 架直升机。

109

亿

香港特区政府宣布，将从 2018 至 2023 年斥资 109 亿港元，扩建香港迪士尼乐园，包括引入“漫威英雄”和“冰雪奇缘”两个主题区，以及扩建标志性的城堡，加建表演场地。



3.96

亿

英国政府同意增加给王室的拨款，以支付 3.96 亿英镑的白金汉宫翻修费用。翻修工程将更换 100 英里电线，还有 6500 个电源插座、5000 个灯具、2500 个暖气装置，以及 8 万平方公里的地板。

小葱黄了

文 / 尚小右

图 / 谢驭飞



“我，黄小葱，这次是彻底黄了。”朋友酒后吐真言，自称已访遍父母两系，乃至整个行政区的媒人，仍找不到对象。一年前，小葱刚做记者也刚满25岁，得知同事在30岁的末班车上很快相亲结婚，还惊叹道：“哇！你一定很爱他吧？”同事静了片刻，说：“如果错过了他，我估计永远都找不到了。”

本来把这事当笑话来看，可参加了表妹的婚宴后，小葱再也笑不出来了。夹在大龄长辈中间，“你男朋友呢”等问题比八冷碟上得还早；妈妈如打麻将出牌般，告诉她每个在场单身汉的月收入；身为家族里唯一的未婚女青年，她直接从新娘手里接过捧花——望着1994年出生的表妹胶原蛋白满满的脸，小葱决定，是时候相亲了。

在小葱看来，相亲主要有两条路：要么亲戚朋友介绍，要么父母的亲戚朋友介绍。大多媒人一次只给她一个男生的联系方式；不赞成一次性认识多个，择优深入。对此，本科在美国读艺术史的小葱颇有微词：“中国式相亲应该引入约会文化，效率太低了！”她便自我加速，只要与相亲对象不合适，立刻让我打电话救场，到后来直接按亮一下手机：“抱歉，突然有个事要去采访。”

然而，未婚男性来了又去，小葱仍然单着。其实她的相亲对象都很正常，或者说，不正常的相亲对象她主动不见：“买口红还会看一下试色

功课呢，找男朋友难道不搞清楚这人情况么？”但小葱受不了，她一和某男情投意合，全家就会立刻巴望着她办桌嫁人；她更受不了一旦没看上对方，回家就会被要求认知自我，明确定位——“你也就这样了，不好看又不瘦，又没赚多少钱，还要找一个什么样的？想得美！”

所以小葱告诉我，相亲会有倦怠期，但相亲本身是会上瘾的。可能“久病成医”，她开始热衷于评论各种情感树洞以及给朋友做媒。我今年21岁，她以好莱坞争角比喻相亲竞争之激烈：“年轻又怎么样，再过几年还不是演女主角的妈！”我说想找个“合得来的”，她立刻喝住我：“你还不如说想找有缘的呢！这种最难找到对象！”好不容易定下某男，她又说：“现在七月是‘鬼月’，本地人不爱这时候相亲。”我还很犹豫，信这个可能跟我合不来吧。小葱果然立刻否定我的“合不来”：“这有什么关系！你知道这个本地人，一个月房租能收多少吗？”

后来，小葱做媒人终于有了说服力，因为她终于有男朋友了。说起来也好笑，对象是住对门的邻居，两人倒垃圾时认识的。再见到小葱时，已订婚的她在健身房挥汗如雨。我以为她为穿婚纱瘦身，可她比了个大力水手的姿势：“我在练臂力，婆婆要我结婚时戴满金镯子！”她苦笑着叹了口气：“结婚跟相亲一样，不争取不妥协的话，都会黄的啊！”

鼻子的爱与哀愁

文 / 南瓜邮递员

图 / 谢驭飞



以前，辣椒是个人的最爱，越辣越是高兴。现在却随意了，这其中有条重要的原因，那便是鼻子碰到辣味会打喷嚏，破坏吃饭的现场。

可以说，鼻子搅了我的饭局，让我的饮食史发生转折，告别了无辣不欢，不知这算好事还是坏事。但鼻子对不同的人来讲，好坏大概是不一样的。拿奥斯卡获奖影片《西线无战事》中那几个饥肠辘辘的新兵们来说，他们要感谢从外面扛回一头猪的老兵的鼻子。战场上的老兵能灵敏地嗅到吃的东西，盲了双眼的退伍中校则可以《闻香识美人》，凭借着香水的气味来猜出对方的身高和发色。而《笑傲江湖》中被动去势成了和尚的田伯光，鼻子上的天分更是少对手，愣是闻到了主动自宫的岳不群关押恒山派众尼的秘密地点。至于《香水》中的天才恶之花格雷诺耶，这个出生在巴黎烂鱼摊的怪异的小伙子，鼻子更是他的生命之光，他的欲念之火，他的罪恶，他的灵魂。此人的鼻子好似超高辨别率的气味扫描仪，能将各种气味统统收入大脑的硬盘又细细分类存档，随时可以调出使用。

鼻子的功能这样强大，当真不可小瞧。纵使不想借鼻子来建功立业，实现宏大抱负，每个人也都希望能有个颜值高的鼻子。电影《大鼻子情圣》中身为军官的诗人，不敢向表妹说出爱意，便是因为长了个异于常人的难看的鼻子，简直像

胡适写的那样：“鼻子人人有，唯君大得凶。直悬一宝塔，倒挂两烟筒。亲嘴全无份，闻香大有功。”

鼻子给人们带来爱，也带来哀愁。最终离张无忌远去的两个美人，殷素素和小昭，都有着秀挺的鼻子。马尔克斯在《霍乱时期的爱情》开篇就写道：苦扁桃的气息总勾起他对情场失意的结局的回忆。不过也有例外，楚留香先生的鼻子虽然从小就不好使，形同虚设，但好在人家的鼻子长得有料，招牌动作揉鼻子更是江湖上摆得最帅，不只胡铁花、张三这样的好友都照学照做不误，连终极大反派石观音女士都禁不住夸赞这一举动很可爱，足以迷倒不少女孩。有研究称，失去嗅觉的人容易忧郁，但楚留香恰相反，他有花有酒有红袖，日子过得逍遥快活，这多少要归功于他那漂亮的鼻子和迷人的揉鼻子的动作，这给他带来了大把的友情及绵绵的关爱。并且，楚留香“香帅”的名头绝非浪得虚名，他虽是鼻子先天失灵的伤病人士，但喜欢助人为乐，一心想造福大众的鼻子，身上常带着装了香料的瓶子，所到之处，总会留下郁金的芳香。这气味能使人情绪放松，会让整个武林变得和谐安宁，就像有实验者将香草和巧克力的香味喷洒在纽约地铁，结果发现推挤、吵架事件少了很多一样。☑

文青与朋友圈

文 / 橘子风流

图 / 谢驭飞



又是一个光棍节，总自诩自己是文青的H先生又在朋友圈文绉绉地发了一句话：“无人问我粥可温，无人与我立黄昏。”过了一会儿看着下面一片的赞满足地笑了笑。

H先生想谈恋爱吗？答案是肯定的。每一个下雨的夜晚，看着共撑一把伞的情侣，H先生的朋友圈就会多一条“好想吃烤肉啊，下雨的声音和烤肉一模一样。只是我不想一个人吃”；每一个刮风的日子，H先生的朋友圈就会写上“风虽大，却吹不走我的灵魂。只是我的灵魂现在还没有归处”。H先生是活在朋友圈中的文青。

终于，在下一个光棍节之前，H先生恋爱了。

H先生的恋爱对象是一个娇小可爱又温柔体贴的女孩，更难得的是，女孩和H先生一样是一个文青，两人经常在一起看星星看月亮，聊诗歌聊人生，从蓝调聊到波本。两人在一起的第一天，女孩发了一条朋友圈“好像是空荡荡的心终于有了归处”，H先生看了后，挠了挠头发，清空了正在打字的内容。那一次，H先生破天荒地没有发朋友圈。

恋爱之后的H先生感觉很不好，非常不好，他感觉自己被剥夺了发朋友圈的权利，应该说被夺走了发朋友圈的大脑。用他的话说就是“丧失了悲情主义的文学色彩”。

而与H先生萎靡不振不同的是女孩的才情爆发。

两人第一次约会，女孩的朋友圈是这样写的：“遇到你之前我做出过无数假设，而这一天真的来临了，我明白了没什么假设，你就是你。”而H先生的朋友圈就很简单了：“第一次约会。”两人的第一次吵架，女孩在朋友圈写到“雨下一整晚”，而H先生的朋友圈则是“心烦”。

H先生渐渐觉得恋爱这件事似乎消磨了自己的才情，看《露西亚的情人》再也没有发朋友圈的想法，看《迷失东京》也只是看得直打瞌睡。从能量守恒的角度来说，女孩的到来带走了他的文学大脑，没有赞的日子不太好过。

终于H先生向女孩提出分手，看着面前泪痕斑驳的面容，H先生突然感觉心中一阵激荡，大脑中似乎有东西喷涌而出。“你知道的，有些人注定留不住，就像有些鸟注定不能落地，在我们的爱情保质期到来之前以这种方式来使它永远新鲜吧。”

分手后的H先生感觉自己又回到了文青的世界，手边有随时可以喝到的咖啡，电影又可以看懂了。又一年的光棍节到来了，H先生看着窗外结伴相拥的情侣发了一条朋友圈：“不管怎么样，你始终是我的缪斯，我的女神。只是没有人能让女神留在身边，哪怕是我，也不行。”

发完朋友圈的H先生看着底下快速增长的赞微微一笑：“文青果然都是寂寞的啊。”

我不想再听民谣了

文 / 林南

图 / 谢驭飞



我想听首歌，嘶哑的、深沉的都行。但我不想听民谣了，不管你“是不是有故事的女同学”，我也不想知道你的“南方艳阳里是否有大雪纷飞”，我在你们的诗与远方中已经走得饥肠辘辘，我太累了。

是从关于郑州的记忆开始的吧，我记不清了。反正当时只一心想要看看冬日下的阳光，也想闻闻巷子里煤炭的味道。后来我终于来到了郑州，才发现我上当了，郑州入冬后是极少见到太阳的，雾霾的腥辣笼罩了整个城市，那里的煤炉只不过在提醒你，没有它你是很难在冬日寒冷刺骨的北方生存下去的，哦，可恨的李志。我第一次感觉以前的我好像错了，那年我17岁。

对了，我曾经到过北京，特意去看了宋冬野的安河桥村，在安河桥北站下车以后还是被眼前所看到的事物惊了一下。我在那天的日记里写道：“今天我去了那里，安河桥下的水很清澈，即使满满的垃圾和污水也挡不了它的干净。”宋胖子在微博里不是说了吗？你心里的样子就是安河桥的样子，我那一刻觉得再也没有比安河桥水一样纯粹好看的水。我还去看了斑马，黑白相间的条纹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我想看看它的尾巴有没有受伤，结果动物园大妈吼了我好长时间。前几天猝不及防地看到宋胖子的新闻，一瞬间说不出话来，我觉得我的心现在像安河桥水一样的肮脏。我突然知道了民谣也得有好看的样子，人也一样。

米店是我觉得美得像诗的歌谣。可我也在三月烟雨飘摇的南方四处找寻有你的米店，不过只在街头的夹角处发现堆满杂货的小商铺，里面的大叔正对着电视里的打斗剧凝神聚气。找遍码头也没有看到属于我们俩的那艘船，满是泥泞的河岸里声声汽笛让我不知所措。我想用葡萄枝搭在我们家的周围，可周围的街道里满是高楼，哪里去找到葡萄枝。我从来没有这样如歌谣般的故事，当然，我从来也没有你。

“我的琴声呜咽，我的泪水全无，我把远方的远归还草原。”你不知道我有多想去草原看看，背着一把马头琴，不会弹也行。我想知道木头跟马尾在一起是什么样子的。我曾经为周云蓬的《九月》难过得不成样子。我在照片上见过他的样子，长发下墨镜遮挡了他看不见的双眼，我喜欢他的文章，一手平淡的文字下句句戳心。我不知道身处黑暗的他眼里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有没有花或草，有没有九月的草原。草原现在已经被毁得不成样子了，大概只有满堆的尘土和零落的牛羊了。不知道他有没有知道，但愿他永远不会知道。

我还想走一遍赵雷的成都，去淋一场陈粒看过的沙漠暴雨，去见一见万青口中的石家庄人。可我不想再去听民谣了，真的。✍

本栏目投稿邮箱：mensula@sina.com



无线 Hi-Fi 音箱

KEF LS50 Wireless 音箱可通过 2.4GHz/5GHz 双频段 Wi-Fi、蓝牙 4.0 aptX 解码器，异步串行 B 型 USB 等接口，实现多种连接方式。其 DSP 数字信号处理技术由于配合了 Uni-Q 的声音散布特性，可以在一个更为宽广的聆听区域中解决声音信号的延迟问题。



“公平金”珠宝

戛纳电影节奖座的设计方萧邦根据金棕榈奖的棕榈叶造型，打造了 Palme Verte 系列珠宝。这些项链、耳环和手镯的 18K 黄金都有“公平采矿”（Fairmined）认证，满足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辉光管电子钟

设计师达利波·法内（Dalibor Farny）打造的 Blub Keo Nixie 是一款基于辉光管的电子时钟。每一根光管逐个显示时间数字，同时还可以集成温度和湿度的监测显示，只需简单的 USB 连接即可充电。其金属铝质感既有未来科技概念又有复古元素。



建筑语言表盘

美度贝伦赛丽系列腕表层叠的表圈与长短时刻的组合设计，源于米兰的新古典主义建筑伊曼纽尔二世拱廊的钢铁骨架。其内部搭载的 Caliber 80 机械机芯采用了硅游丝，增强了防磁防震的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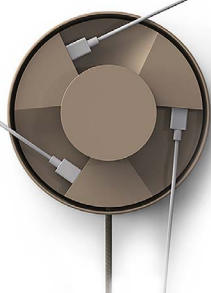


漏斗开口保温杯

LTTL 保温杯的漏斗开口设计既方便开启，又易于清洗。它可维持 4 小时以上的热水温度，以及 24 小时以上的冷饮保温功能。金属拉丝工艺的外观，也让其充满潮流感。

3D 打印艺术雕塑

这款名为 Seasons（四季）的雕塑来自美国艺术家加雷特·凯恩（Garret Kane）。他先用 3D 打印技术制造出可以拼凑成人形的碎片，然后与树枝拼贴组合，最后用自然界真实的花、石头、叶做装饰。将人与自然结合为一体，这种微妙元素的搭建巧妙地捕捉了生态的美丽和脆弱。



多线 USB 插座

ECLIPSE 是一款简约的 USB 插座。它的设计融入了人性化设计的细节，不仅可以同时用 3 根数据线给设备充电，还将接口藏在侧面。两种接口的选择高效地解决了办公或者家用多线杂乱的麻烦。



宝石夜光表

瑞士品牌 De Grisogono 的 Tondo 夜光表，白天呈现明亮多彩的风格，夜晚则光芒四射，它的夜光效果被表盘上的弧形彩色宝石所增强。



圆形扣环

爱马仕 Filet D'Or 镶钻玫瑰金手链，两个相互闭合的圆形扣环取自马鞍固件的造型，这是在向品牌的马术遗产致敬。

灵蛇包扣

宝格丽 Serpenti Forever 系列金属漆面小牛皮肩包，整体选用明亮浓郁的宝石红色，廓形翻盖装饰着灵蛇包扣，蛇鳞由红色和黑色雾面珐琅交替呈现。





圆管钢桌

塞巴斯蒂安·赫克纳设计的 Pipe 边桌，上下两个圆盘分别充当桌面和底座，坚固的结构是建立在直径 8 厘米的镀漆圆形铝管上的。

玻璃台灯

美国设计师斯蒂芬·巴克斯设计的 Chantal 台灯，透明口吹玻璃的底座和灯罩对比红色的电缆，穹顶形状的灯罩笼罩住光源，玻璃支架同样从各种角度散发出灯光。



梯子衣帽架

Ligne Roset 品牌的天然榉木衣帽架 Passe-Passe 平衡着古朴的设计与实用的功能，交织的造型唤起梯子的联想，衣服也不会从这个坚固的衣架上滑落。

切片扶手椅

法国品牌 Cinna 的 Slice 软垫扶手椅，彩色织物面料覆盖它的木材及泡沫结构，深蓝和浅蓝色脚凳与主椅具有相同的高度和宽度，可以延展成一张贵妃椅。





1959年1月，在独裁者巴蒂斯塔仓皇
逃往国外之后，菲德尔·卡斯特罗指挥
的起义军在民众簇拥下向哈瓦那进军



最漫长的告别
卡斯特罗：革命的活化石

文 / 刘怡

哈瓦那当地时间11月25日晚10点29分，菲德尔·卡斯特罗90岁的生命终于走到尽头。

他本人对此早有知觉。今年4月19日，在古巴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闭幕会上，深居简出已有8年之久的卡斯特罗意外地出现在主席台上，依旧身着醒目的阿迪达斯运动服，留下了他的政治遗言：“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在这里发言。对我们所有人而言都相同的那个时刻终将到来。但是古巴的共产主义理想，将作为一种明证在这个星球存在，证明如果你们努力且有尊严地工作，就能够生产出人类需要的物质和文化。”

卡斯特罗并不讳言自己的生命正在走向终点。事实上，曾经在马埃斯特拉山间与这位大胡子游击队长并肩作战的那些年轻人，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开始告别这个世界：卡米洛·西恩富戈斯于1959年死于一场空难，切·格瓦拉在1967年牺牲于玻利维亚，阿尔纳多·奥恰在1989年被卡斯特罗亲自下令枪决，胡安·阿尔梅达·博斯克在2009年死于心脏病。他们光辉的革命岁月，已经成为被镌刻在纪念碑和教科书上的史迹。而菲德尔最小的弟弟、从他手中接过最高领导权的劳尔·卡斯特罗，已是85岁高龄，卸任之期不远。“历史的一代”在奇迹般地领导这个拉美红色共和国将近60年之久以后，终于到了谢幕的时刻。

但我们依旧会追问：如果世界上不曾有菲德尔·卡斯特罗其人，古巴的面貌将变得如何？

革命爆发前夜的古巴，城市化率达到57%，超过1/3的人口居住在10万人级规模的大城市中，拥有76%的识字率、整个拉丁美洲最低的儿童死亡率、中南美第四大传媒网络和首屈一指的收音机保有率。但那也是一个外国资本横行无忌、贫富分化一再暴露，军事独裁者可以随时用暴力终结自由宪政的时代。街头竞选往往与枪击和决斗相伴随，军警可以随时在荒郊野岭枪杀被指控为颠覆政权者。当卡斯特罗和他的“七二六”运动公开打出反对时任总统的旗号时，他们在短短2年内就赢得了全国上下的一致支持，取得速胜。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的古巴交出的是一份复杂的答卷：贫富差距从未恢复到革命以前的水平，但多数民众的平均月收入仅为20美元；种族歧视彻底

消失，但整整1/10的人口通过各种方式外逃去了一水之隔的美国；3.7万名医护人员派驻在全球77个国家，但覆盖全国的公共医疗网却时时面临药品短缺的困窘。传媒业发达程度、城市化率、经济自由指数以及基本消费品的供给状况已经跌落到远不及革命爆发前的水平；甚至连卡斯特罗政权本身，也要靠最大的敌人美国带来的旅游业收入维持日常运转。这会是他的初衷吗？

《纽约时报》记者在1957年的一次采访创造了20世纪的“菲德尔神话”。从那一天起，卡斯特的形象开始与一些显著的符号联系在一起：络腮胡和雪茄烟，橄榄绿军装、筒形帽和枪支，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滔滔不绝的演讲术，对建制化的厌弃和对直接民主的狂热，以及反对一切不平等的“红色罗宾汉”形象。甚至连卡斯特罗本人，也成为这种符号化叙事的俘虏。他和切·格瓦拉从未自那场革命的狂飙中彻底苏醒过来，乌托邦式的国家改造计划，对理想化的“21世纪新人”的培育，对反物质化的道德共同体的塑造，在柏拉图和马克思那里仅仅是纸面上的推演和遐想，而在红色古巴却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践行。革命者甚至抛开了建制的党派、行政机构和法律议程，通过直接与民众对话以及“欢呼裁决”的方式实践他们理想中的直接民主。

只是切·格瓦拉可以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在1967年死去，卡斯特罗却还要挨过接下来的49年；他将亲眼目睹他的乌托邦陷入混乱和停滞，被迫一步步后退，最终回到他并不乐见的存在特权、商品和物质主义的现实世界里。他曾令全世界最大的经济、军事大国遭遇被击败的耻辱，曾经让整个世界处在爆发核战争的边缘，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古巴的人口和疆域规模，但到头来依旧无法摆脱曾经在诸多国家出现的革命衰败的循环。

然而卡斯特罗不必看到一切的终局。当他在90岁这一年最终离去时，古巴依旧飘扬着革命胜利之初的旗帜。他没有选择将自己的遗体永久保存，而是宣布实行火葬，从而最后践行了自己的革命理念。这一刻，他终于可以永远回到西恩富戈斯、格瓦拉和阿尔梅达身边，回到那场革命狂飙开始之初的1953年；在那里，所有人依然年轻，依然热泪盈眶。☑



走出去

爱我们的城市

善待自己

善待我们的天空



菲德尔·卡斯特罗：革命者的五重面相

文 / 刘怡



1961年6月14日，口衔雪茄的卡斯特罗在哈瓦那会见前来商讨“猪湾事件”被俘人员赎金的美国企业和媒体代表。古巴革命政权为1173名战俘开出了5300万美元的价码，以食品和药物的形式支付，双方最终在次年12月达成一致



力图使人们摆脱对现代左翼革命固有的成见，同时又反复挣扎于后革命时代经济、社会困境的纠葛，使得卡斯特罗的事业最终成为“为了革命的革命”。菲德尔的神话，也被赋予了五重复杂的面相。

《纽约时报》编辑赫伯特·马修斯（Herbert Matthews）第一次见到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其人，是在1957年2月17日傍晚，古巴岛东南部的马埃斯特拉山（Sierra Maestra）中。准确地说，这次会面是由卡斯特罗一手安排的：在游击队被政府军圈禁于奥连特省一隅、他本人被宣布“已遭击毙”的情况下，有必要通过具备更高等级影响力的平台来宣传革命者的形象和主张，并对巴蒂斯塔政府施加压力。《时报》驻哈瓦那通讯员鲁比·菲利普斯第一个接到卡斯特罗通过地下组织发出的邀请，但这位女记者不愿丧失与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于是，恰好在哈瓦那度假的马修斯主动接过了这一任务。他是卡斯特罗会青睐的那种报道者：左派自由主义者，在西班牙内战的前线报道中崭露头角，同情一切反权威行为，对拉美军人政权有一种道德上的厌恶感。更重要的是，马修斯希望抢到独家：“我要让现在的年轻人看看，57岁的老头照样写得出好新闻！”

会面在咖啡和雪茄的香气中进行。身高6.3英尺（约1.92米）、有着棕色眼睛和浓密络腮胡子的卡斯特罗低头探向他的贵客，以他在大学法律系、议会选举和法庭辩护中锻炼出来的口才开始了讲述。他以自豪的语气宣称，自己麾下有上千人马，分散成小分队在山间和精疲力竭的政府军做周旋，并且一直能获得城市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的资金援助——为了验证这一点，卡斯特罗让士兵展示了面值相当于数万美元的比索现金。领导这次军事斗争的“七二六”运动，按照这位美髯公的说法，是激进民主思想的产物，目的

在于推翻巴蒂斯塔的军事独裁体制，恢复议会制度，并通过经济和法制改革来消除普遍存在于古巴的贫困和非正义现象。卡斯特罗提到了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和林肯，提到了他对美国民主政体的敬意，宣称他正在为一个美国式的、“自由民主的新古巴”而战。最后，他主动要求在马修斯的采访笔记上签名，以示真诚和庄重。

从1957年2月24日开始，分三期连载在《纽约时报》周末专号上的这篇采访记，塑造了20世纪“卡斯特罗神话”最显著的几项符号：络腮胡和雪茄烟，橄榄绿军装、筒形帽和枪支，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滔滔不绝的演讲术，对建制化的厌弃和对直接民主的狂热，以及反对一切不平等的“红色罗宾汉”形象。它们中的一些来自卡斯特的亲身展示，另一些来自马修斯的个人理解和概括，但无论如何都易于激起美国乃至全世界公众对那位年轻游击队员的同情，尤其当他的对手是一位梳着大背头、挂着装腔作势的流苏肩章和绶带的军人独裁者时。马修斯成为古巴革命的约翰·里德（第一位报道俄国十月革命的美国记者），但他始终认为卡斯特罗是一位不同于列宁或托洛茨基的“激进反共民主派”，这在“冷战”的政治氛围下为左派媒体人公开支持卡斯特罗创造了某种正当性。美国和欧洲记者开始源源不断地涌入马埃斯特拉山，卡斯特的形象出现在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电视画面中，“七二六”运动的支持者着手发动越来越频繁的城市游行和罢工。甚至连美国顾问团也对政府军频繁动用美援重武器投入反游击作战却往往无功而返的败绩不甚耐烦，渐渐考虑抛弃巴蒂斯塔政权。古巴革命的胜负，不是在战场而是在纽约的报纸上决出了。

但马修斯并未如约翰·里德一般，享受到入葬红场墓园的待遇。短短3年后，当卡斯特罗发觉美国政府对他的示好始终保持警惕时，几乎是顺理成章地倒向了莫斯科。马修斯在美国遭到攻讦和排斥，但卡斯特罗并未向这个“创造”了自己的人伸出援手——他已经拥有了足够多的知识分子朋友和来自外界的关注，不再需要煞费苦心地联络一个外国人来维持曝光率了。马修斯在1967年从《纽约时报》退休，移居澳大利亚，10年后寂寞地死在那里。2005年，当另一位《时报》通讯员安东尼·德帕尔马驱车来到马埃斯特拉山间、寻找那次会面留下的遗迹时，发现在一处不那么醒目的山坳里矗立着一块高度不足1米的纪念碑，上面写着：“1957年2月17日，菲德尔·卡

斯特罗·鲁斯总司令在此地与北美记者赫伯特·马修斯会面。”

与马修斯之间的纠葛，只是卡斯特罗一生之复杂际遇的缩影之一。与《纽约时报》报道中呈现的那个高度符号化、似乎足够明晰的菲德尔形象不同，“革命者”（Revolutionary）这一概念本身包含了错综复杂的层次，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下可能表现为截然不同的面相。作为革命者的卡斯特罗，既是一位反常规的颠覆者，是军事上的大胆冒险者，也是政治上的乌托邦规划者和缺少先例的奇特统治者，是富于宗教气质的红色布道者，还是一位终究未能摆脱“革命之后”命题纠缠的重蹈覆辙者。用《20世纪最后的革命家：菲德尔·卡斯特罗传》一书作者程映虹教授的话来说：“卡斯特罗是本世纪最后一个打天下、坐天下的革命家。他还是唯一一个既发动了全面的对社会和人的改造，把一场国家范围的乌托邦实验推向顶峰；又一步步地从这个实验后退，直到恢复采用那些被他的革命所摧毁的政策”的革命领导人。”轰轰烈烈的古巴革命，始于对新纪元的憧憬，终于对现实的妥协，个中机理同样隐藏在其领导人的五重面相之后。

反常规的颠覆者

假使约翰·里德能活到20世纪50年代，大概会为古巴革命和早期俄国革命的相似性感到惊讶。尽管卡斯特罗兄弟和他们的同志惯于以英姿飒爽的军人形象现身，但古巴革命的核心领导者本质上仍是中产家庭出身的城市知识分子：菲德尔·卡斯特罗和胡安·阿尔梅达·博斯克毕业于哈瓦那大学法律系，劳尔·卡斯特罗在同一所大学修读社会科学，卡米洛·西恩富戈斯肄业于圣亚历杭德罗国立艺术学校，阿根廷人切·格瓦拉则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院的高材生。换言之，这些年轻人对马列主义以及其他激进左翼思潮的兴趣，至少在最初并不是产生于切身的经济和社会体验，而是智识喜好和道德热忱导致的结果。也像19世纪末的俄国革命者一样，古巴知识青年一开始会尝试在地位相对超然的大学中组织社团和集会，通过演讲和辩论、印制传单、发动游行以及推动国际学生交流等活动进行他们的城市革命实践。学成毕业之后，他们大多会选择律师、医生、记者等既容易接触到普罗大众，又具备一定社会地位和话语权的职业作为谋生之途，以服务于推动国家改革和革命的长期目的。他们对公开化社团、小规模武装暴动和城市合法斗争

的偏爱，显然更近似于俄国 1905 年革命之前的旧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而与“血统纯正”的社会主义者存在区隔。

如果列宁生活在革命爆发前夜的古巴，他多半会把年轻时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归类为“巴枯宁式的冒险家”或者“考茨基主义的同路人”。的确，尽管菲德尔早在大学时代就读过《共产党宣言》，并在 22 岁时从纽约买到了《资本论》和《国家与革命》，但直到 1953 年发动攻打蒙卡达兵营的武装暴动时为止，他依然只能算是一位同情社会主义的民族—民主政治革命家。1957 年马修斯在马埃斯特拉山间所见的那个胡子游击队员，实在不能算是货真价实的共产主义者。但这正是整场古巴革命最离经叛道之处——历数俄国、东欧和亚洲的历次红色革命，领导政党往往会在最初就明确宣示其社会主义属性，至少也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设定为长期目标，随后才会展开斗争。而卡斯特罗领导的“七二六”运动直到革命胜利为止，始终乐于承认它只是前巴蒂斯塔时代自由宪政的恢复者，而把公开信奉马列主义的人民社会党（旧古巴共产党）仅仅视为暂时的盟友。但从 1959 年 1 月到 1961 年 7 月，短短 18 个月里，卡斯特罗基于自身的经济和社会理想、对大众直接民主的偏爱以及获取苏联援助的需要，几乎是毫无征兆地“原地向左转”，反过来以“七二六”运动吸收和兼并人民社会党，组建了新的古巴共产党，并迅速打出社会主义旗号。这完全颠覆了 1917 年以来的一切经验。

不仅如此，古巴革命也是极少数自始至终没有获得过莫斯科的政治和经济援助，完全靠自身力量达成目标的社会主义运动。在那之前，即使是独立性最强的南斯拉夫革命和中国革命，多少也曾借重苏联的物质力量，并利用了国际形势变化带来的机遇。而古巴革命不仅纯系自发，而且是在“冷战”方兴未艾、美国对拉丁美洲视若禁脔的背景下迅速取胜，可谓前无古人的奇迹。甚至连新政权在经济模式方面的选择，也与莫斯科毫无关系：从 1959 到 1960 年，对未来出路深感忧虑的卡斯特罗曾专门聘请原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教授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等三位美国左派经济学家来哈瓦那授课，为他详细剖析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各自的利弊。是在美国人斯威齐而非俄国人康托洛维奇的鼓吹下，卡斯特罗最终确认了计划经济在效率和道德层面都优于市场经济，决心进一步“向左转”。而莫斯科要到好几个月之后才会和新政权建立外交关系。

颠覆惯例的奇迹背后，是拉丁美洲特殊的政治土壤。与“二战”的结束加速了东欧和中国革命的进程不同，拉美国家并未卷入战争，对 1945 年之后形成的美苏两大阵营的理念和现实对立也不甚敏感。古巴革命的初始动力，依然来自何塞·马蒂以降 50 多年间仁人志士对民族独立和民主宪政的长期追求，是一场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而它的大众主义和反美色彩，则移植自阿根廷的庇隆主义（Peronism）——1946 年通过选举登上前台的胡安·庇隆，对内以劳苦大众的庇护者自居，推行一条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福利主义并举的“中间路线”；对外则自视为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的受害者，旗帜鲜明地喊出了反美口号。由于能获得占全国选民大多数比例的工会成员的支持，庇隆政权并不排斥选举，相反极其乐意通过公众游行、全民投票等形式宣示自身的合法性。切·格瓦拉正是在庇隆政权的统治下度过了青少年时代；菲德尔·卡斯特罗同样是在 1948 年参与庇隆政权组织的“拉美青年反美大会赴哥伦比亚示威团”时，完成了自己最初的政治洗礼。当他们本身成为一场革命的领导人时，庇隆主义潜移默化的影响将不可避免地凸显。

在 1952 年富尔亨希奥·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上校通过军事政变夺取古巴政权之前，卡斯特的全部政治经验，大体来自大学时代的左翼社团活动，与巴拿马、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等国激进派政治家和学生团体的交往，以及 1947 年参与推翻多米尼加独裁者特鲁希略的不成功军事冒险。假如巴蒂斯塔的图谋不曾得逞，卡斯特多半会以人民党正统派（PO）候选人的身份在 1952 年众议院选举中胜出，以一名“粉红色”（左派）议员的形象活跃于政坛。但巴蒂斯塔的上台改变了这一切：军人集团与大种植园主以及美国资本的结合杜绝了一切合法夺权的可能性；舆论政策的收紧和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则激起了中小工商业者、知识分子和本土糖业资本家的不满。一场以城市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民主革命的爆发，可谓正当其时。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在卡斯特的传奇游击队崛起于马埃斯特拉山区之后，对颠覆巴蒂斯塔政权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依然是由城市工商业者、知识分子和激进学生组成的联合阵线。特别是 1958 年由“七二六”运动的都市代理人发起的“有巴蒂斯塔就没有收成”攻势，推动全国制糖厂、炼油厂和卷烟厂罢工停产，公路、铁路停运，直接动摇了军人政权的财政基础。

而1958年7月在委内瑞拉加拉加斯签署的反巴蒂斯塔阵线联合宣言，同样把组建联合政府、恢复宪法和自由选举设定为第一目标，仅仅承认卡斯特罗为各派革命武装联军的总司令。而卡斯特罗只有在发起“为了革命的革命”之后，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运动的温和性质。

如同这位大地主之子最终选择了颠覆性的政治活动作为终生志业，卡斯特的革命历程，自始至终伴随着种种反常规之举。出人意料的转折和“不断革命”的激情，最终也都成为“菲德尔神话”的固有篇章。

军事冒险者

严肃的军事学研究者会把1953年7月26日卡斯特罗攻打蒙卡达兵营（Moncada Barracks）的行动看作一场闹剧：135名缺乏训练、只装备轻武器的起义者正面攻打一座由400名政府军把守的坚固壁垒，在几个小时内就被击溃，丢下9具尸体（其中4人系被友军误击），只取得打死19名敌军、打伤30人的战果。接下来的几天里，又有52名落单的起义者被捕获处决，51人被送上法庭。实际上，这更像是一次孩子气的政治示威——蒙卡达兵营所在的奥连特省圣地亚哥曾是卡斯特罗童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他认为在此地举事可以省去熟悉环境的工夫；而当何塞·马蒂1895年从海外归来、参与对西班牙殖民者的武装起义时，同样是在奥连特省登陆。武装起义的目的似乎只在宣示力量和扩大影响，并无长期规划，更无常规战争所需的专业军事素养。

但从“战争乃是政治活动以其他方式的继续”这一经典论断看，卡斯特的决定并不离谱：“冷战”时期拉美层出不穷的军事政变很少有发展为大规模内战的情形；政变者只需在一两个沿海省份站稳脚跟，控制进出口大港和财源，再在主要城市煽动起一波示威，很容易就能将现任政府赶下台。1954年6月美国中央情报局仅仅以极少的物质投入和虚张声势的宣传战，就在9天里颠覆了危地马拉阿本斯政权，这是同情后者的卡斯特罗亲眼所见。而他的武力夺权规划，显然也继承了这种“政治为辅、军事为主、军事为政治服务”的特色。没有迹象显示，因为蒙卡达袭击事件而入狱一年半的卡斯特罗曾经着手学习传统军事理论；相反，他把活动中心转移到了墨西哥，很快重新组织起一支被称为“七二六”运动的小型军事团体。1956年12月25日凌晨，82名战士挤在18米长的“格



1959年1月，“七二六”运动领导的起义军开入首都哈瓦那



拉玛号”汽艇上，穿过尤卡坦海峡驶向古巴海岸：新的冒险开始了。

关于卡斯特罗兄弟和切·格瓦拉在马埃斯特拉山区（Sierra Maestra）的两年游击战，已经形成了无数真假难辨的传说。类似赫伯特·马修斯这样的主动宣传者的记录，以及将古巴革命的历程与南斯拉夫和中国革命战争所做的生硬类比，使人容易形成一种错觉：似乎是“七二六”运动领导的大规模游击战摧毁了政府军的作战能力，在奥连特省形成了一块革命根据地，最终以“边缘进攻中央”的模式取得了全盘胜利。这当然不是事实——人烟稀少、经济贫瘠的奥连特省山地根本不足以维持大型革命根据地的补给；一直到1958年夏天转入反攻时为止，卡斯特的游击队依然只有500人左右的规模，日常开销必须靠城市中的赞助者提供资金。在他向马修斯夸耀自己的力量时，整个游击队的规模还不足40人。但在1953年时尚不完备的政治战和宣传战手段，到1957～1958年已经趋于成熟：巴蒂斯塔政权对城市学生暴动和青年军人起义的残暴镇压使其站到了大部分城市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对立面，马修斯和其他美国媒体的报道则削弱了华盛顿对哈瓦那当局的支持力度。古巴完备的广播网络和相对宽松的媒体管制，使起义军的存在始终为人们所关注，放大了其影响。

而卡斯特罗在马埃斯特拉山区进行的，是一场完全不同于传统正规战争的消耗战和牵制战：他们并不以包围或歼灭对手为目标（这是克劳塞维茨式的传统战争思维），而是依托地形保存自身力量，同时灵活地袭击装备笨重、不适于高速机动的政府军，最终使对手因进攻成本过高而放弃进剿。1958年政府军的夏季攻势便是如此遭到化解：巴蒂斯塔派出14个营共1.2万人的部队投入作战，试图全歼仅有300人的游击队。但山区和河口复杂的地形使政府军无法集中投入作战，被迫分散成数个零散的集团，彼此缺乏策应，从而抵消了其数量优势。而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利用内线之利以及熟悉地形的优势，在数条战线之间灵活移动，集中攻击被山地和矿场阻挡的小股敌军，至少全歼一个营，并使另一个营遭遇重创。政府军死伤237人，有240人被俘，游击队方面仅仅战死27人。显然，巴蒂斯塔当局并非有足够的物质实力和起义者周旋下去，但在双方战损比高达20：1的情况下，必须获得稳定的财源和举国上下的支持，才能承受非对称战争的消耗。

但这种长期作战的奢望，恰恰被“七二六”运动

在城市建立的统一战线彻底消解了。1957年10月，中右翼政党古巴革命党、中左翼政党人民党、激进学生团体“学生革命指导委员会”和流亡工会代表在美国迈阿密结成联合阵线，宣誓共同推翻巴蒂斯塔政权、恢复自由宪政，卡斯特的代表同样与其形成了一致。1958年7月，迈阿密阵线的代表在《加拉加斯协议》中承认卡斯特的武装为反对派唯一的军事力量，并为其提供了4.4万美元的资助。在政府军士气低落、大中城市普遍爆发罢工和示威游行，美国也宣布停止对巴蒂斯塔政权的支持以后，1958年8月底，卡斯特罗兵分三路，派切·格瓦拉率150名精兵向首都突进，他本人指挥230人的纵队直趋圣地亚哥，西恩富戈斯的82人纵队则进攻中部重镇圣克拉拉。12月29日，格瓦拉和西恩富戈斯的联军经过3天激烈的巷战，攻克了由3900名重兵把守的圣克拉拉，俘虏2900名政府军官兵和10辆坦克。2天后，巴蒂斯塔仓皇逃离哈瓦那——电影《教父2》对此有过极为传神的表现——带着价值超过3亿美元的现金和艺术品前往多米尼加，经那里逃往葡萄牙。1959年1月8日，卡斯特罗在欢呼声中进入首都。

意味深长的是，小规模游击战的局限性，很快为一次反向的失败行动所证实。当卡斯特罗在1960年逐步“向左转”之后，迈阿密阵线中的右翼人士选择与他分道扬镳。他们在墨西哥城和迈阿密成立了“古巴革命阵线”（FRD）、“古巴革命委员会”（CRC）两个政治团体，并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组建了总数近2000人的正规武装“2506旅”。2506旅的行动计划恰恰是对卡斯特罗成功模式的模仿：首先在南部海岸登陆，占领一省地界作为根据地，并歼灭前来进剿的革命军；与此同时，设在洪都拉斯的“天鹅电台”向全国民众发出罢工、罢课、游行的呼吁，以图在几个月甚至更短的时间内颠覆新政权。1961年4月17日凌晨，2506旅的1500名主力乘坐货轮从巴拿马出发，美国海军派出驱逐舰为其护航，另有8架旧式B-26型轰炸机提供空中支援。

袭击者选择的登陆场，在古巴岛中南部圣克拉拉省的猪湾（Bay of Pigs）；这里距离哈瓦那不过160公里，显然易于对革命政权形成震慑。但开阔缺少遮挡的猪湾显然不是理想的机动场域，2506旅在控制滩头阵地以后，很快被从北部地区赶来的1.5万名革命军和苏制T-34型坦克团团包围；20万临时动员起来的民兵把守着通往山区的公路和关隘，使入侵者无处可藏。空中的战斗机则被古巴空军的“海怒”型和



1. 1961 年 4 月，被古巴革命军俘虏的 2506 旅士兵在猪湾的吉隆滩排队等待被押送。他们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参与培训，在入侵的准备阶段曾获得美国军舰的保护

2. 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一架奉命设置海上封锁线的美军 P-2V “海王星”式巡逻机飞越一艘驶向古巴海岸的苏联货轮

3. 1961 年 4 月，成功击退入侵猪湾的叛乱者之后的古巴革命军士兵展示其苏制 DShK 型 12.7 毫米重机枪



T-33 型战斗机击落 4 架，被迫退出战场。到 19 日清晨，入侵者已经死伤 478 人，若无美国援军的直接介入，几无逃脱的可能。但肯尼迪总统在最后时刻打消了对古巴直接开战的念头，海滩上的 1000 余名残军成为古巴人的俘虏。

卡斯特罗用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加上在古巴境内捕获的中情局情报员，向美国索取了价值 5300 万美元的食品和医药补偿。那个时候他似乎并未意识到，马埃斯特拉山区作战的胜利和猪湾入侵的失败不过是游击战这枚硬币的两个侧面：在缺乏对地形的了解、同时面临防御者持续稳定的反击时，游击战术也并非总能奏效。1967 年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命运，在 6 年前的猪湾就被投下了阴影。而对非正规战和以小搏大的不对称战术的盲目自信，还使他在 1962 年的导弹危机中保持了一种令人骇然的乐观主义精神：革命军在南部的所有滩头进行对抗美军登陆的演习，同时极为亢奋地怂恿苏联人冒与美国打核大战的风险。但卡斯特罗听闻赫鲁晓夫决定从古巴撤出中程导弹时，不禁破口大骂：“狗娘养的！杂种！混蛋！”

那一刻，他再度恢复了马埃斯特拉山中那个游击队员的本色。但时代毕竟已经不同了。

乌托邦规划者

一个尽管出生于大地主家庭，但从未运行过一家企业或一间工厂的革命者，要如何领导一个国家？

1956 年 11 月，卡斯特罗在他的《“七二六运动”宣言》中提出了一项宏伟的目标——消灭殖民地心态、外国经济控制、政治腐败和军人统治，恢复人民民主、民族独立以及社会正义。尽管他此时尚未完全转向马克思主义，但已经公开谴责自由企业制度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下贫富分化的加剧，并设想建立一种基于“理性运行机制”的新经济制度，“使每个古巴人有机会享受发达国家的公民正在享受的物质福利和个人尊严”。换言之，革命者认定古巴经济长期无法摆脱外部依赖和内部动荡的原因具有两重性：在外是欧美大国的新殖民主义侵略，从而损及了民族独立；在内则是自由企业制度造成的财富分配不均，从而伤害了社会正义。要摆脱这种困境，必须转向一种集中使用和分配资源的“理性模式”，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但卡斯特的理想还远不止于此。1958 年 1 月，

当他在和法国记者米涅斯谈话时，勾勒出了一幅更为理想化的乌托邦蓝图：“我将建立一种规模在 2.5 万人左右的农业单位，有牛和家禽，还有农业试验田。古巴的儿童将在这种单位下属的训练中心里成长，他们的居住、饮食、穿着和教育由集体负责；待他们长大之后，则可用自己的劳动使所处的经济单位获得效益，偿还国家提供给他们工厂和机器。每个集体单位可以容纳 2 万名农村孩子，只需经历 9 个月的教育和良好的伙食，就可以培育出一代新人……”

这实在不像是典型的社会主义学说，倒更近似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展示的理念。和“基于理性选择”走向计划经济模式一样，它们不是古巴现实国情和传统的产物，而是卡斯特罗和他那些年纪不过 30 岁左右的战友，基于完全概念化的学说和热情过度的理想主义构思出的乌托邦。而他们即将统治和管理的对象，却是依然存在 24% 的文盲的贫苦农民和资本积累严重不足的中小工商业者。但革命者有着丰富的城市动员经验和异乎寻常的干劲：温和中间派势力以及持观望态度的工商业阶层很快被边缘化，卡斯特罗开始按照他的乌托邦构想实施社会主义改造。仅在 1959 年的前 9 个月，政府就通过了 1500 多项法律和行政命令，宣布降低城市房租水平、限制私人拥有土地的规模、建设集体农场以及增加甘蔗种植园工人的收入。到 1960 年，政府决定冻结全国工资水平，形成贫富均一的局面。1961 年 5 月 1 日，卡斯特罗在“五一”劳动节集会上自信地宣布：“一场革命不必在愚蠢的事情上浪费时间，古巴已经用人民的直接统治取代了假民主，这就是社会主义！”

但社会主义没有带来牛奶和面包。由于快速提高工人收入造成中小企业主破产，以及越来越多的“蛆虫”（这是古巴政府对逃亡海外者的蔑称）拖家带口逃往海外，古巴从 1962 年初开始就不得不实行日用品配给制，而此时美国经济封锁的影响尚未完全凸显。儿童缺少鸡蛋和牛奶，妇女缺少洗衣粉、食用油和肉制品，牙膏和大米开始从商店的货架上消失，变成配给卡上孤零零的数字。1962 年夏天，政府甚至不得不动用正规军和坦克驱散马坦萨斯省反对实行配给制的妇女游行队伍。卡斯特罗不得不越来越频繁地依靠他的新盟友：1963 年 5 月，这位游击队员访问了一年前还被他们诅咒和蔑视的苏联，开始接受后者的全面军事和经济援助。1964 年，古巴与苏联达成为期 5 年的蔗糖出口协议，1972 年又加入了苏联主导的经济互助委



1965年1月，一名中年妇女参加政府开办的裁缝培训课程。革命胜利之后，卡斯特罗政府鼓励妇女兼任男性能承担的工作，壮劳力则被定期抽调到乡下参与甘蔗收割

员会（Comecon）。

但这位革命领袖从未怀疑过自己的乌托邦蓝图的正确性。在他看来，消费品短缺和工农业生产下滑并不是激进制度变革的结果，而是这种变革遭受内部侵蚀和破坏的产物。1968年1月，古巴共产党宣布挖出了以中央委员埃斯卡兰特（Anibal Escalante）为首的43人“叛徒集团”，从而找到了革命进程不顺的“内部原因”。又过了2个月，卡斯特罗在一次公开集会上宣布他新近找到了对革命事业构成最严重破坏的蛀虫——城市小贩。“这些人从不把自己和革命事业相结合，从不参加革命组织，提出申请出国的人数却是最多的。他们身强体壮，却不参加义务劳动，也不下乡砍甘蔗。那些卫生状况极差的摊位，已经成了威胁古巴民族健康的疾病之源！”他当即宣布成立“人民管理者委员会”，封闭一切小摊，由人民自己来组织小型商业机构的运营。

不到3个月时间里，全古巴5.7万个小摊和小型

私人商业机构被一扫而空，党中央机关报《格拉玛报》宣布：“寄生虫的社会基础已被挖掉。”但“人民”似乎并无自主运营店铺和商场的能力：由于货品长期短缺，且商业活动完全不为获取利润而展开，群众对填补摊贩留下的空白兴趣寥寥。而管理者委员会的存在，意味着大到进货和记账、小到修补炊具都需要召开集体会议进行审核，效率极为低下。革命前一度相当繁荣的古巴城市商业，在这次效率奇高的扫荡之后再也没能恢复到先前的水平，成为乌托邦理想的最新牺牲品。

卡斯特罗在国家治理中推行的这种“非正规”模式，相当耐人寻味。出于对官僚制度的厌恶和对直接民主之下群众热忱的虔信，在革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卡斯特罗完全拒斥按部就班的行政和法律程序，而以领袖直接与群众对话的方式解决一切现实分歧。在他看来，“革命正义并非基于法律程序，而是道德信念”。小到一项具体的法律判决，大到全国性选举

的议事日程，都通过广场对话和“欢呼表决”的方式得出结论。当卡斯特罗认为需要由民众做出直接裁决时，他会组织一场数十万人规模的集会，通过扩音器发布他的理念或质询，由群众欢呼通过。格瓦拉在个人回忆录里称这种模式的本质是“诉诸群众的直觉”。由于卡斯特的演讲术具有惊人的魅力，群众的情绪往往随着他的语调而此起彼伏，最后达到高潮。一切成了他的个人表演。

对个人魅力和广场政治的推崇，甚至使卡斯特罗不屑于完善一党制的领导模式。直到古巴正式宣布转向社会主义之后的第三年，这个国家依然不存在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七二六”运动和人民社会党以及革命指导委员会（激进学生组织）结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对现实政治生活毫无影响。直到1965年10月，上述三个组织才正式合并为统一的古巴共产党，但依然没有组建党的核心领导机构和形成定期的议事机制。而古共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居然是在整整10年之后的1975年才正式召开的！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卡斯特罗本人就是全国头号经济学家、头号道路规划专家和头号农学家。他带着自己的卫士奔走在整个古巴岛上，直接视察农场、访问疾苦，也听取基层民众的声音。但反馈意见却是以极其随意和朝令夕改的方针贯彻下去的：说到底，精力充沛如卡斯特罗，也无法完全依靠个人力量治理一个人口近千万的国家。

乌托邦式的狂热，最突出地表现在从1969年初到1970年夏天的“蔗糖战役”中。为了缓解商业凋敝带来的经济困难，特别是借助对苏出口获得更多进账，卡斯特罗在1969年宣布发起“革命攻势”，要在1970年7月24日纪念日之前实现蔗糖产量超过1000万吨的目标。考虑到1963年全年的数字还不过550万吨，这无疑又是一个拍脑门的决定。政府宣布临时执行12小时工作制，全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营农场职工在星期六还要参加10小时的义务劳动，以无偿劳动力的增加补足收割甘蔗的农用机械的不足。1969年9月，政府宣布将为每个工人建立劳动档案，对个人历史、劳动技能、教育程度、出勤率和革命觉悟实施考核，作为退休待遇以及分配住房的凭证。甚至连监狱中的犯人也组织参与强制劳动。饶是如此，到1970年7月24日当天，整整18个月的“革命攻势”也只完成了850万吨的产量。卡斯特罗被迫公开承认：“群众没有责任，是领导人对客观因素判断失误。道路是艰难的，远比我们以为的要艰难得多。”这是他





1980年5月22日，一名1965年就从古巴逃出的妇女在美国迈阿密海关移民局的拘留所外隔着铁丝网亲吻刚刚从马里埃尔港遣送来美的丈夫。在卡斯特罗的命令下，1980年秋天共有12.5万古巴人从马里埃尔港被遣送至美国



2013年，圣斯皮里图斯特立尼达镇的一名妇女展示手中的食品配给卡。从1963年起，古巴的日用消费品和食物就陷入了匮乏状态，需要通过严格的配给制定量供应

一生中不多的几次认错。

红色布道者

罗伯特·伯纳德（Robert M. Bernard）在1971年出版的《对古巴式道德激励的理论分析》中提出了一项观点：卡斯特罗及其同志在本质上是一群反市场主义者。他们口中的“理想的经济运行”，实质是用道德激励取代物质刺激，将全国变成一个上下如一的道德共同体。卡斯特罗式的共产主义，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描述存在一种根本分歧——后者尽管也曾提及道德上的“新人”，但认为那是物质达到极度丰富以后自然而然的产物；而卡斯特罗式的“新人”，

完全不以物质基础为依凭，而是抽象的“觉悟程度”的产物。在卡斯特罗看来，他可以像培训游击队员一样在古巴批量“培训”出这样的新人，成为革命机器上的“有觉悟的齿轮”。

古巴革命者关于“新人”的最系统表述，呈现于1965年切·格瓦拉出版的著作《古巴的人和社会主义》中。他在书中热情洋溢地宣布“人是一件未完成的产品”，只有通过国家机器和群众组织的直接教育，以及自我反省的间接教育，才能“由形状各异的毛坯变成统一规格的制成品”。古巴革命培养出的将是“属于21世纪的新人”，“除了革命，这些人没有别的生活”。“新人”必须把将劳动视为快乐的热忱和铁一般冰冷的决心结合起来，不允许有任何个人私情，不惧牺牲。“我们的自由和它每天的营养物质就是鲜血，这种自由随着牺牲而不断地扩大。”古巴人愿随时做好为世界革命而牺牲的准备，更需要有为国家忍受暂时困苦的道德境界。

在这一理念的驱动下，卡斯特罗于1960年宣布全面变革教育制度，将数十万大学和中学生派往乡村扫盲。考虑到革命前的古巴成年人识字率超过75%，这一政策的目的显然不在单纯的扫盲，而是要以培养“新人”为宗旨，彻底重构整个教育制度。根据政府的安排，数千名13岁左右、具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学生被送到最高领导人曾经战斗过的马埃斯特拉山区，和成年人一起胼手胝足地建造校舍，并在那里接受为期2年的准军事化学习。昔日的奥连特省边缘地带逐渐现出了一座“军营学校”的雏形，所有受训者从早上6点到晚上10点按照严格的日程表进行政治学习和劳动，了解国家大事。2年结束后，学员被分散转移到一系列山间中学，继续学习2年，在政治教育以外逐步增加文化课的比例。直到最后，他们将被逐步送回到哈瓦那，在苏联援建的马卡连柯教育学院进行最后2年的培训，同样采取军事化管理模式。这样经过长达6年的训练和淘汰，剩余的合格者被认为可以充当“乡村共同体的革命领导人”，遂由国家分配到各地中小学承担教师任务。

在培训“新人”的同时，对学校制度的改革也在进行。1967年1月28日，卡斯特罗参加了圣安德雷斯公社寄宿制学校的冬季开学典礼，并发表讲话称：“当孩子们到了上学校的年龄时，他们的生活应该围绕着学校被组织起来。学校在教他们的同时，也要负责他们的吃和玩。他们从星期一进入学校，一直到星期五或者星期六才会回家。”“即使他们只有6岁，只

有一年级，也要让他们知道如何种出一束莴苣。一旦他们有起码的推理能力，就要让他们知道物质财富是怎样生产出来的，要培养一种高尚的劳动观念。”寄宿制学校的另一项功能在于将儿童和他们那些无法理解“革命理想”的父母隔离开来，从一开始就杜绝“陈旧的家庭观念”对新人的“腐蚀”。从1966年起，又规定全国各级中学每年要把全体师生送往农村至少6周，半工半读，把教育与生产、理论与实际、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使学生从少年时代起就做好成为“螺丝钉”的准备。

相反，自身毕业于文科大学院校的卡斯特罗对高等教育的态度却相当排斥。1969年3月，他在母校和年轻学生座谈时尖锐地宣称：“传授空洞知识的大学必须被技术学院取代。所有的学生，不论其专业如何，都要在实践中完成学业：农学的下乡，机械的下厂，畜牧的去农场，医学的到医院。所有的人文学科，例如历史、文学和社会研究等等，都要彻底取消。”在领袖的现身说法下，许多人文和社会科学系科从大学里消失了。卡斯特罗倒是会时不时地驱车回到母校，让学生用自己的某一灵感作为课堂讨论和论文的话题。

这种对人的“可改造性”的推崇和以道德完善为目标的教育制度，在一段时期内引起了西方知识界尤其是左派知识分子的欢呼膜拜。1960年，让一保罗·萨特偕伴侣波伏娃造访古巴，受到卡斯特罗的热情款待。法国哲学家在随后撰写的游记中激动地感慨，在古巴发生的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是对自己的征服和超越。“古巴人必须赢得胜利，不然我们就将失去一切，甚至希望。”随后前往哈瓦那“朝圣”的还有略萨、聂鲁达以及加西亚·马尔克斯。后者获得了卡斯特罗赠送的一幢别墅、一辆奔驰280型轿车以及一条专属的国际电话线，可以随时来访。1965年美国《当代摄影师》杂志编辑李·洛克伍德造访哈瓦那，同样收获了卡斯特罗的亲切会见。他在随后撰写的《卡斯特的古巴，古巴的菲德尔》一书中给予了革命政权以谨慎的好评。

但有一类人似乎并不在卡斯特的未来蓝图中——他花费了数十年的经历研究如何培养“新人”，但对处置那些被旧制度“污染”过的“旧人”却明显缺乏心得。客观而论，古巴政治警察制度的控制力并不像苏联和东欧国家来得那么严苛；原因之一是长期依托直接民主的行政机关在运作中存在诸多混乱和不协调，之二则是古巴离美国的直线距离太近，出走的

难度相对较低。从1960年夏天到1962年10月导弹危机爆发前夕，750万人的古巴竟有整整50万公民合法地移居海外，无疑是相当惊人的数字。而在1962年底古巴政府中止发放普通公民合法出境证件之后，数以万计的古巴人开始利用渔船、汽艇、木筏甚至救生圈向佛罗里达海峡对岸的美国偷渡，就连拉丁美洲各国驻哈瓦那使馆的院子里也住满了非法居留的古巴难民。

古巴来客的源源不绝，甚至令最初主动提出收容难民的美国政府感到不胜其烦。1964年，华盛顿当局与哈瓦那达成协议，每年允许从哈瓦那飞出两班合法移民航班，分别前往迈阿密、马德里和墨西哥城。古巴政府并未明确拒绝其公民的移民要求，但提出申请者将被剥夺公职，甚至被政府支持的“保卫革命委员会”强行送往乡间劳动，直到其申请获得批准。由于申请出国者数量着实太多，普通人提交的文件可能会被耽搁到几十年之后再作处理，陆陆续续的偷渡依旧不断。美国海岸警卫队甚至不得不建立一套标准来制止汹涌流入的古巴移民：在被发现前已经踏上美国领土的称为“干脚”，可以获得庇护；还在海水中挣扎的称为“湿脚”，需要被遣返。在这些备受革命者诅咒的“蛆虫”中，也包括卡斯特的两个姐姐和一个女儿。

卡斯特罗以一种奇特的幽默感来对付“旧人”。1980年春天，当秘鲁驻古巴大使馆发生难民车冲撞事件后，他干脆下令撤去秘鲁大使馆外的卫兵。短短几个星期里，就有4000名要求移民或政治避难的古巴人涌进了大使馆的院子，秘鲁人不得不加班加点为其制作证件。到了当年秋天，卡斯特罗突然宣布：“既然那些蛆虫想要离开古巴，我们不会阻拦他们！”接着就从监狱里放出数千名刑事犯人，与妓女、传染病以及其他“社会不欢迎的人”一起送到马里埃尔港（Mariel），装上小船和木筏运往迈阿密。主动要求离境者在被注销工作和国籍、遭受集体批判和侮辱之后，也被获准离境。尽管美国海岸警卫队出动大批巡逻船进行拦截，但在短短几个星期里，仍有12.5万名古巴难民涌入佛罗里达，造成巨大的国际风波。美国海关移民局不得不进行了复杂的甄别，将其中1774名被核定为暴力或刑事罪犯者遣返回古巴。卡斯特罗认为这是对美国卡特政府重提古巴人权问题的绝妙回击；他似乎回避了，1000万人口的古巴已经制造出了整整100万外逃者，而这些出走者的觉悟还没有高到彻底舍弃家庭和儿女私情。



左图：1989年4月5日，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哈瓦那与卡斯特罗热烈拥抱。当时苏联流行的“新思维”在古巴共产党内部也产生了一定反响

右图：1974年3月，一位苏联教师（左一）在哈瓦那列宁学校为两位参加夜校学习的年轻学员讲解生物标本

重蹈覆辙者

若要问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早逝的战友切·格瓦拉究竟有何差异，最突出的一点大概是：前者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将他的乌托邦蓝图限制在了古巴岛的范围内，而后者企图将革命继续推广到非洲和南美大陆。他们被称为古巴革命的列宁和托洛茨基，一者在1967年壮怀激烈地死去，另一者以他永不枯竭的激情和冷眼旁观继续生活在人间。至少到80年代后期为止，卡斯特的革命事业只是稍稍减速，而尚未陷入谷底：他依旧能以高于国际市场4倍的价格向经互会国家出售蔗糖，为每位公民提供每个月5磅大米、半磅食油、4磅糖、12盎司牛肉和鸡肉、3罐炼乳以及20个鸡蛋的基本配给。杂乱无序的建设项目以及向非洲和拉丁美洲“输出革命”使古巴欠下12亿美元的外债，但基本的经济运行仍能维持。

危机发生在1985年。新任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在哈瓦那找到了若干同道者，这使卡斯特罗感到他的道德乌托邦可能从内部发生分裂。1989年7月13日，就在戈尔巴乔夫造访哈瓦那之后不久，马埃斯特拉游击队老战士、“革命英雄”称

号获得者阿尔纳多·奥恰（Arnaldo Ochoa）将军以及原内务部部长托尼·德·拉瓜迪亚（Tony de la Guardia）上校被控以贩毒、贪污和反对领袖罪，遭到立即枪决。这是古巴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以死刑对待高级官员，除去继续贯彻菲德尔的道德洁癖外，也有防患于未然、提前清理党内可能的不满者的意图。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包括交通部部长、海关总局局长和边防军司令在内的数十位高级官员也相继因腐败、“丧失革命精神”等理由遭到逮捕和判刑。这一次，卡斯特罗没有祭起他最擅长的群众集会、“欢呼裁决”，而是以苏东国家常见的密室政治方式完成了布局。他变得越来越像年轻时厌弃过的那种人了。

他那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多少也开始消退。1979年，当新近上台的尼加拉瓜桑地诺阵线领导人奥尔特加（Daniel Ortega）前往哈瓦那向前辈求教时，卡斯特罗告诫他：“不要追随古巴60年代的模式，不要实行过于激进化的社会政策，不要主动触怒美国，引起经济封锁和入侵的危险。要允许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实行混合经济，政治上甚至可以给反对党一定的余地。革命力量内部不能分裂，和教会也要搞好关系。”



事实证明，尽管卡斯特罗始终不曾放弃其革命的泛道德化色彩，但在具体问题上依然保持着敏锐的嗅觉和灵活性。1991年春天，在苏联解体前夕，卡斯特罗再一次在党代会上警告了试图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去马克思主义”的年轻政治家，随后却又出人意料地表示：为了渡过“和平年代的特殊时期”，可以允许逐步开放旅游业，并利用良好的生物工程技术基础，向第三世界国家出口药品、外派医疗人员。身着花衬衫的美国游人和雪茄饕餮客重新开始哈瓦那街头出现，赌场、酒吧、夜总会和妓院开始或明或暗地出现。普通古巴人虽然依旧要忍受低工资和配给制的重压，但也被半公开地允许从事黑市交易和地下贸易。这并不足以显著提升普通人的月均收入和生活水平，但至少可以使革命政权不至于分崩离析——毕竟，苏联解体和经互会的消失使古巴丧失了53%的进口贸易额和70%的出口市场，国内生产总值（GDP）在3年内缩水了35%。而利用一度为革命者所鄙视和抛弃的商品、市场以及“寄生虫”经济，至少可以稍微稀释这种冲击的力度。

卡斯特罗依旧不乐见这一切。1993年，在“七二六”运动40周年纪念大会上，他多少有些无奈地表示：

“我们本来宁可对旅游业少依赖一点……我们不喜欢它们。我们对平等已经习以为常，当看到有人享受某种特权时，我们会感到痛苦。”他也依旧认为，“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建设社会主义是重大的历史性错误”。但他承认自己的身体已经不再可靠，无法将半个世纪前在马埃斯特拉山中规划的蓝图继续下去。2006年，自革命胜利以来一直担任党、政、军最高领导人的卡斯特罗第一次因为健康原因暂停履行职权；2年后，这位82岁的老人正式退休，由同样年近八旬的弟弟劳尔继任。

2016年4月19日，在古共七大闭幕式上，深居简出的卡斯特罗罕见地亮相，发表了自己的政治遗言：“基于残酷的生命法则，这将是最后一次由我们‘历史的一代’来领导一届党代会。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在这里发言。不久我将满90岁，对我们所有人都相同的那个时刻也将到来。但是古巴的共产主义理想，将作为一种明证在这个星球存在，证明如果你们努力且有尊严地工作，就能够生产出人类需要的物质和文化。”

不妨以曾经一手制造出“菲德尔神话”的《纽约时报》发布的讣文，来总结这位革命者复杂的一生：

他和他领导下的全能主义政府得以掌权如许之久，绝不仅仅是靠镇压和恐惧。在古巴和全世界，有支持他的人，也有诋毁他的人。一些人认为他是一个残暴的专制君主，践踏权利和自由；其他不少人却像他初进哈瓦那一晚欢呼雀跃的人群一般，称颂他是一位名垂青史的革命英雄。

卡斯特罗大概是拉丁美洲自19世纪早期的独立战争以来曾经出现过的最重要的领导人。他领导的革命彻底改变了古巴社会，它对整个拉美地区的影响比20世纪的任何一场革命和反叛都来得持久。

在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卡斯特罗对美国权势的不屑使他成为抵抗事业的灯塔。在反抗者中，他那浓密的胡须、细长的古巴雪茄和绿色军装已经变成了通行的图腾。

就像他本人曾对采访者所说的那样，他的某些特质的确很像堂吉珂德。☑

（参考资料：《20世纪最后的革命家：菲德尔·卡斯特罗传》，程映虹著；《卡斯特罗：20世纪最后的乌托邦革命者》，刘火雄著；《午夜将至：核战边缘的肯尼迪、赫鲁晓夫与卡斯特罗》，（美）迈克尔·多布斯著；《隐形军队：游击战的历史》，（美）马克斯·布特著，等）



拉美左派的生与“死”

主笔 / 徐菁菁

卡斯特罗曾想象自己的死亡：“我可能会像中世纪的英雄席德一样，即使他已经死了，他的手下背着他的尸体，骑在他的马上，还是打赢了战争。”但事实上，过去的战事并未成功，未来战场或已消失。今天的拉美左派的沉浮已经进入了全然不同的逻辑。



卡斯特罗（右三）和他的顾问们



1965年，切·格瓦拉（左一）和他的士兵在刚果丛林中的营地休息

“大陆革命”

1965年1月，切·格瓦拉秘密离开古巴，去刚果领导游击战争。直到这年10月初，卡斯特罗才宣布格瓦拉离开的消息。他在一场会议上念了格瓦拉留下的一封信。信中说：“我正式辞去我在党内的领导职务，我的部长职务，我的军衔，以及我的古巴公民身份。现在我和古巴之间已经没有任何法律的联系了。”

这项免责声明缺乏说服力。尽管格瓦拉一直被视为古巴革命输出的旗手，但很显然，卡斯特罗才是关键。1975年，格瓦拉去世8年后，安哥拉内战爆发。为支持“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卡斯特罗批准代号“卡罗塔”的军援方案，隶属内务部的特种部队与炮兵搭乘苏联安-22运输机直飞安哥拉，古巴商船队则负责输送其他后续部队和装备。13年后，1988年，在“冷战”已告尾声，苏联人无心恋战的情况下，卡斯特罗仍动员超过1.5万人的古巴精锐部队投入安哥拉战场。那时，古巴投入安哥拉战场的军队超过了5万人，如果按人口比例计算，相当于美国在越南战场投入军队的两倍。直到1991年5月25日，最后一批古巴士兵才离开安哥拉。在这16年里，45万古巴人在安哥拉

工作和战斗，其中超过2600人战死沙场。

一个问题是：如此轰轰烈烈的革命输出却没有发生在古巴所处的拉美。1959年，刚刚夺取政权不久的格瓦拉出国访问。在日本，他曾对同行的古巴人谈起一个想法：在南美找一块和几个国家接壤的地区，在那里投进一股游击队，革命就会扩散到整个南美，古巴的革命就会变成拉美的“大陆革命”。从1960年起，委内瑞拉、危地马拉、哥伦比亚、秘鲁等国相继成立了众多游击中心组织，开展反政府武装斗争。然而，两相呼应之下，星星之火并未燎原。

这并非是因为卡斯特罗没有行动。1960年7月，卡斯特罗曾宣布要把南美的安地斯山变成马埃斯特拉山——古巴革命就是从那里开始的。这年9月他发表了坚持在拉美发动革命的《第一次哈瓦那宣言》。

1962年3月，美国《国家情报评估58~62号文件》指出：“卡斯特罗—共产主义在拉美的威胁主要来自于组织良好的颠覆运动，他们试图利用民众对激进社会改革的要求，来推翻抗拒激进改革的寡头统治者。”这份文件是肯尼迪政府对古巴“扩散革命说”的最早论证。中情局认为，古巴导弹危机后，由于美国做出了不干涉古巴的承诺，给卡斯特罗提供了更多

“输出革命”的空间。1962年，来自拉美不同国家的1500人接受了古巴关于意识形态和游击战的训练，其中人数最多的国家是委内瑞拉、秘鲁、厄瓜多尔、阿根廷和玻利维亚。古巴情报机构招募人员，一方面训练他们负责收集拉美各国政府机构、地方形势的情报，另一方面训练潜伏特工，暗中帮助当地开展游击运动。同时，古巴还给予各国游击队一定资金和武器援助。

1965年，格瓦拉在刚果的革命输出遭遇失败，但古巴却变得更为激进。1966年1月3日到15日，82个来自亚非拉三大洲的代表团云集哈瓦那，其中大部分代表团是各国的游击队、地下党或者民族解放阵线。从代表团的数量看，那是第三世界国家当时召开的规模最大的国际会议。代表们被安排在哈瓦那的希尔顿旅馆。为举办这次会议，古巴进行了哈瓦那全市乃至全国总动员，大批的干部和工人临时调来担任工作人员、翻译、侍者、厨师、清洁工和汽车司机。在会议的闭幕式上，卡斯特罗的演讲持续了几个小时。不久，《格拉玛》周刊报道他的另一次讲话：“当我们说古巴革命的时候，我们是在说拉美革命，当我们说拉美革命的时候，我们是在说世界范围的革命：亚、非、欧的革命！”

理想与情怀或许是切·格瓦拉成为终身游击战士的动力，但对于卡斯特罗来说，在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在拉美输出革命不仅关于理想，更关乎生存。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程映虹指出：美国1965年在亚洲大规模入侵越南，1966年在加勒比入侵多米尼加，这使得卡斯特罗再一次产生了美国直接入侵古巴的危机感。在国内，古巴经济生产的停滞和下降、物资的紧缺、单一经济结构的难以改变以及由此而来的对苏联的依赖，所有困难都使得卡斯特罗对长期的建设失去了曾经有过热情、信心和耐心。如果有一个国际革命的高潮，那么古巴也就可以摆脱这种在拉美孤军奋战的困境。国内的经济问题可以通过国际革命来解决，这是自列宁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以来就有的思路。

古巴过去在拉美的活动被证明是不够的。1965年6月，秘鲁的两个武装革命组织在两年的地下活动后又开始组织武装暴动，但秘鲁政府在美国支持下半年便将其消灭。在哥伦比亚，1966年2月，游击队的领导人被打死，运动转入地下。1966年3月，危地马拉秘密警察一举破获危共领导集团，26人被屠杀。在委内瑞拉，由于享有石油财富的物质利益和相对自由的政治，该国的劳动和中产阶级缺乏武装斗争的动力。

共产党转向苏联路线，干脆放弃了武装夺权。在玻利维亚，右派军人1964年11月发动政变，苏联派的玻利维亚共产党领导人马里奥·蒙杰也拒绝进行武装反抗。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卡斯特罗希望格瓦拉能够在拉美打开局面。1966年11月3日，格瓦拉化装成为美洲国家组织工作的乌拉圭商人从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前往靠近玻利维亚和阿根廷的边界游击队的训练基地。然而不到一年，1967年10月9日，格瓦拉死亡的消息和遗体的照片就先后传到哈瓦那。妻子阿莱达从公布的日记照片上确认了丈夫的笔迹。

不可复制的古巴

格瓦拉的死不仅使古巴丧失了“游击中心论”最重要的指挥官，也证明了一件事：古巴革命只是历史的偶然。

古巴革命的胜利得益于一些特殊的条件。在国内，1952年3月，古巴发生军事政变，独裁者巴蒂斯塔一改之前相对开明的政治作风，解散国会，制定反劳工法，废除了1940年宪法，逆民族主义潮流倒向美国。军政府同时也是古巴自独立以来最腐败的。1958年12月底，巴蒂斯塔以个人身份出逃葡萄牙时，拐走少则3亿多至7亿美元的财富。巴蒂斯塔政权的合法性极为脆弱，一盘散沙的古巴各派政治势力有了同仇敌忾的基础。

从国际环境看，美国对这场革命毫无准备，既没有料到巴蒂斯塔的政权这么不堪一击，也没有对古巴革命的性质和走向做出正确判断。卡斯特罗的革命是在“加拉加斯阵线”统一战线的名义下进行的。统一战线由古巴主要自由派组成，目标是在古巴恢复宪政。



1966年，82个来自亚非拉三大洲的代表团在哈瓦那召开国际会议。图为部分与会国家和组织的领导人。其中左四为卡斯特罗



尽管卡斯特的革命口号中也有实现“社会正义”的言辞，但它直接针对的还是在军事独裁下恶化的社会不公，这与后来发生的对私有财产无论大小全盘没收的社会主义革命绝不是一回事。在武装斗争时期，对前来游击区采访的西方记者，卡斯特罗强调自己斗争是为了恢复民主；对古巴人，他着重谈社会公正。古巴革命胜利后，新政权也没有立即表现得很激进，卡斯特罗说，古巴革命政府是“没有专制和寡头的民治政府”，人民享有“有饭吃的自由，而没有恐怖”，革命的意识形态是人道主义。古巴外长劳尔·罗亚宣布，古巴革命“不是赤色的，而是橄榄色的”。1959年1月15日，美国驻古巴使馆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说，古巴革命政府“基本上对美国是友好的，并倾向于反共”。

1961年肯尼迪上台时，局面已经完全不同。新总统对拉美事务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甚至将拉美形容

成“这一时期世界上最重要的地区”。他坚信“古巴共产主义分子正在西半球从事游击和颠覆的训练……如果不对这一左倾态势进行控制，那么将会对拉美国家的贸易、外交地位产生恶劣的影响”，因此，“铲除西半球的共产主义因素”是“当务之急”。

1962年1月18日，肯尼迪政府成立了“反暴动特别小组”，直接负责美国在拉美的反游击战政策。同年出台的“美国协防政策”的文件，标志着美拉共同防务体系的主要目标转变为防止共产主义势力向内部渗透。美国政府出台了对拉美的新“军事援助计划”和“军事训练计划”，尽可能地满足友好政府的军事需求。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随即向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等游击运动活跃的国家派遣军事援助顾问小组，指导当地政府和军方进行专业的反游击战。此外，美国还向拉美一些国家提供了包括通用飞机、直升飞机、拖拉机、吉普车、小型武器、催泪瓦



左图：1962年10月23日，美国总统肯尼迪正在签署封锁古巴的法案

右图：1975年安哥拉独立战争结束后爆发内战。图为受美国支持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士兵及葡萄牙雇佣军

斯弹等武器和军械。结合游击战机动灵活的特点，美国特别增援了一些高端科技，比如“无线电定位”设备，从而使政府军能够更精确地对游击组织进行定位。根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统计，仅1961年一年，美国就对360位拉美军官提供了防暴训练，对344位提供了反暴动训练，对160位提供了心理战训练，总花费为65万美元。这一时期，美国还向拉美警察援助项目投入了4360万美元，有超过3000名美国军官参与其中。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还在拉美推行一些发展援助计划等“软措施”，将反暴动与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相挂钩，瓦解游击队赖以生存的民众基础。肯尼迪执政时期，美国每年约向拉美投放77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其中约有52%用于拉美国家的内部防务，15%用于“市民行动”计划的支出。

1965年，卡斯特罗与格瓦拉的另一个难题是古巴与拉美传统左派共产党之间的矛盾。古巴是推动拉美游击战前进的最主要的地区势力，而各国共产党却并不看好古巴推崇的暴力革命路线。一个重要的背景是：苏联认为美国不可能轻易放弃它的传统势力范围，从

始至终都未积极支持拉美游击运动。60年代初，古巴领导人曾多次指责拉美共产党对革命斗争的漠视，游击队领袖德布雷甚至抨击“拉美正统共产党是‘民族解放斗争’中的政治无能派”，而在苏联支持下走议会道路的拉美共产党则向来对卡斯特罗冒险激进的革命方式采取抵制和鄙视的态度。然而，当卡斯特罗决定在拉美建立另一个古巴时，他又不得不借助当地共产党的力量。

1965年12月，玻利维亚共产党领导人马里奥·蒙杰到了古巴，卡斯特罗说有个重要人物要经过玻利维亚去阿根廷，需要蒙杰的协助，这个人就是格瓦拉。直到1966年夏天，古巴派愿意和格瓦拉一起打游击的玻利维亚人去玻利维亚买下一个农场作为训练和落脚之地时，才向蒙杰透露实情：玻利维亚本土也在游击战的计划中。

1966年12月，在玻利维亚营地，蒙杰和格瓦拉见面，双方在政治军事领导权问题上矛盾尖锐。蒙杰表面上对阿根廷人表示归顺，但一转身，他便要格瓦拉队伍里的玻利维亚共产党人离开这里，不然就停发



1988年6月27日，卡斯特罗（右）在哈瓦那机场迎接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

他们家属的生活津贴。在人地生疏的玻利维亚山区，格瓦拉和他那支几十人的队伍不久就陷入了困境。

最为致命的是，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行动并不像当年在古巴一样具有合法性。蒙杰曾对格瓦拉预言：“当人民知道这支游击队是由一个外国人领导的时候，他们就会翻脸，不再支持你们。你们尽可以英雄地死去，不要指望有朝一日能成功。”格瓦拉的部队途经的村庄，几乎所有人都跑光了。农民到处散布游击队的行踪，各个村的村长总是提前向政府军报告消息。玻利维亚当时已经进行了土地改革，政府发起“市民行动”，修路、在乡村地区分发学校用品，具有相当的执政合法性。政府指责格瓦拉的队伍是“卡斯特罗共产主义”特工，号召全国公民以爱国热情抗击外来入侵者。1967年10月7日，格瓦拉的队伍遇见了一位村民，这是他们东躲西藏多日来第一次见到老百姓，也是唯一的情报来源。格瓦拉让手下的人给了这个村民50比索，要她不要告诉任何人看见游击队的事。但格瓦拉在自己的日记中承认，他对此根本不抱希望。果然，格瓦拉被出卖了。

以格瓦拉为核心的拉美革命计划流产后，卡斯特

罗在拉美陷入了进一步的孤立，古巴所推崇的暴力革命潮流退去了。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调查，60年代末70年代初，拉美农村游击队人数总共不超过1000人，已经无法对政府造成实质威胁。事实上，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拉美的左翼力量在政治上一直都处于衰弱状态。1970年，萨尔瓦多·阿连德在智利通过议会道路成为民选总统，3年后便在美国支持的军事政变中遇害。1979年，尼加拉瓜左翼政党“桑蒂诺民族解放阵线”通过游击战打败亲美的独裁政府，然后由联合阵线的左翼独掌政权。桑蒂诺领导人奥尔特加非常崇拜卡斯特罗，一上台他就访问古巴，寻求指导和支持。那时的卡斯特罗向奥尔特加提出的革命建议是：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都不要重复古巴在60年代的激进化。

新语境

1994年12月14日夜里，委内瑞拉年轻军官查韦斯降落在了哈瓦那国际机场。他打开那架苏式客机的舱门，走下悬梯，瞬间激动得满脸通红、热泪盈眶。

他万万没有想到，在悬梯下迎接他的，不是古巴的同级军官，也不是外交部官员，而是卡斯特罗本人。

1992年，中校查韦斯领导了一场军事叛变。当意识到他手下的人数远不及对方，继续战斗只意味着更多牺牲后，他选择了投降。查韦斯在电视上宣布叛变结束了——但只是暂时结束。他和他的同谋者被送入监狱。去哈瓦那见菲德尔·卡斯特罗是查韦斯重获自由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查韦斯后来向《纽约客》杂志解释，当他在监狱时，他读了一篇关于卡斯特的采访，那篇文章深深地打动了。卡斯特罗谈到，由于苏联补贴突然中断，古巴经济几乎崩溃。“菲德尔说：‘迟早将会有一波新浪潮。拉美人民将觉醒，将会有一波新浪潮，它即将被看到。’”查韦斯说：“现在这波新浪潮已经来临。”他拍打着椅子扶手：“而且如果有人看不到它，只能说明他是瞎的，如果有人感受不到它，只能说明他是聋的。”

查韦斯说这话时，古巴革命胜利已经半个世纪。2009年，没人会对拉美的新浪潮视而不见。1999年2月，“第五共和国运动”领导人查韦斯上台执政。2003年，巴西劳工党卢拉上台；同年，阿根廷正义党左翼领导人内斯托尔·基什内尔上台。2004年，乌拉圭广泛阵线领导人巴斯克斯上台。2006年，智利社会党的巴切莱特和玻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的莫拉莱斯上台。2007年，厄瓜多尔主权祖国联盟的科雷亚、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奥尔特加上台。

2009年，萨尔瓦多“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的毛里西奥·富内斯拿下政权。2011年，秘鲁民族主义党也成为执政党。

拉美大陆的大面积飘红容易让人们联想起上世纪60年代轰轰烈烈的革命。这场政治潮流最前排的查韦斯强化了这种想象。他以卡斯特的推崇者和追随者自居：“对我而言，菲德尔像是父亲，像是灯塔。”他充满意识形态修辞的熟练布道勾起了人们对从前那个时代的回忆。在一次联合国大会上，查韦斯声称他在演讲台上闻到了“硫”的味道。他说那臭味是前一天结束演讲的美国总统小布什留下的。他曾把小布什总统称作“魔鬼”“懦夫”“驴”“醉汉”“危险先生”，他还说奥巴马将是美国的最后一届总统。2013年查韦斯去世后，卡斯特罗发表了悼念信。信的最后，他引用了切·格瓦拉的一句话：永远不停地革命，永难忘怀的朋友。

但事实上，革命早已终结。新世纪以后的拉美左转拥有全然不同的语境和逻辑。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军人当政风靡拉美。1982年4月2日，阿根廷军政府为收复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而派出4000名军人登陆该岛，但终因不敌英国的武力而失败。这一战争进一步激化了阿根廷国内的矛盾。面对成堆的政治经济问题和民众的抗议，军人终于答应尽快将政权交给文人。阿根廷军人的下台，在拉美开启了亨廷顿所说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最后一个实现还政于民的拉美国家是智利。在1988年10月举行的公民表决中，多数人反对皮诺切特继续执政。皮诺切特接受了这一反映民意的结果。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实现拉美公民的民主》（2004年）一书中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在拉美的18个主要国家中，只有3个国家（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和委内瑞拉）是民主国家。25年后的今天，从政治和选举角度来说，所有国家都是民主国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的绝大多数选举（包括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都能如期进行，只有少数被推迟或提前。大部分选举都能在较为公正、公开和民主的框架内进行。竞选各方即使不愿意，也必须接受选举结果。拉美的军人具有干政的历史传统，但90年代以来的军人干政最终都没有成功。

这意味着，民选政治成为理解拉美政权更替的基本逻辑。一个事实是，在拉美左派的执政无一例外，都是通过大选实现的。查韦斯正是这种逻辑的受益者。2002年4月12日，委内瑞拉发生政变，查韦斯被迫离开总统府。然而，面对民众的抗议声和国际社会的指责，接替查韦斯的临时总统卡尔莫纳不得不在政变第二天就宣布辞职。14日凌晨，查韦斯就被军方释放，乘坐直升机返回总统府。

民主的选择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转向吗？拉美人民在呼吁一轮新的革命吗？政治研究者们的许多研究都证明，在左翼政党执政的浪潮期间，无论是由一系列问题构成的意识形态光谱，还是政治身份的自我认同，拉丁美洲民众的意识形态偏好都没有太大变化。总部设在斯德哥尔摩的世界价值调查（World Value Survey）项目长期以来追踪世界100余个国家发生的价值观念变化及其对政治、社会生活的影响，研究者发现，拉丁美洲的选民在意识形态上并没有明显的左倾现象，甚至总体来看，他们比世界的平均水平更加保守。“回溯性投票”似乎更能够解释他们的选择——选民基于现任政府执政期间的经济表现对其进行惩罚或奖励，决定支持其连任或者将其赶下台。在1998～2004年，存在竞争性选举的18个拉丁美洲国

家中有14个执政党没能连任，其中多数是中右翼政党。那么，他们是因何受到选民的惩罚？

难题

2001年4月的加拿大魁北克如同一座城市监狱。铁丝网和5000名警察阻隔着情绪激动的6万名示威抗议者和参与美洲自由贸易区会议的各国领导人。在美国总统布什下榻的酒店外，抗议者和警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四处弥漫着催泪瓦斯的烟雾。

以推进西半球贸易投资全面自由化为目标的美洲自由贸易区是过去10年美国美洲政策的重中之重。批评者认为，自贸区意味着所有美洲国家必须向私人投资开放它们的医疗、养老金、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和其他政府服务，导致大公司对公共事务前所未有的控制。会场内，巴西总统卡多佐和查韦斯向布什开了炮。查韦斯极力鼓动各国寻找自由贸易以外的发展道路。这是查韦斯的一贯态度。5年前，查韦斯就是在拜访以反全球化著称的墨西哥萨帕塔游击队时，宣布参加次年的总统竞选的。他当时明确提出了参选主张：反对新自由主义。在魁北克，就是否在2005年正式建立自贸区的投票中，查韦斯投出了唯一的反对票。而当大量中左翼政府在拉美执政后，查韦斯不再是孤家寡人。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无果而终，迫使美国转而与拉美国家谈判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拉美的现代化一直面临着两个任务：政治上的独立和经济上的自主。第一个任务在玻利瓦尔和圣马丁等先驱者的努力下早已基本实现。而100年来，所有的拉美执政者无论左右都会遇到同一个问题：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如何实现经济上的自主？

1870～1920年被学者称作全球化浪潮“第一波”。当时，拉美的比较优势在于其丰富的自然资源。该地区拥有世界上40%的动植物和27%的水资源。全地区47%的土地被森林覆盖。南美洲的森林面积达920万平方公里，占世界森林总面积的23%。墨西哥和委内瑞拉是世界上的石油生产大国；巴西的铁矿储藏量名列世界第六，智利和秘鲁的铜矿储藏量分别居世界第二位和第四位。墨西哥的银和硫磺、智利的硝石、古巴的镍以及哥伦比亚的绿宝石等矿的储藏量，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的。此外，拉美还拥有良好的农业生产条件。

这使拉美各国自然而然的选择以初级产品提供者的身份加入国际分工。根据美国政府于1890年发

表的一份报告，在1870至1884年期间，拉美的对外贸易额增长了43%，而同期英国的贸易额仅扩大了27.3%。1913年，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古巴、墨西哥、秘鲁、乌拉圭和委内瑞拉九国的人均出口额平均达31.9美元，仅比六个发达国家（法国、德国、日本、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平均数少5.4美元，大大高于中国和印度的0.7美元和2.6美元，阿根廷、古巴和乌拉圭的水平甚至远远高于美国和英国。

但很快，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就证明这一模式并不能让拉美实现经济自主。世界市场对初级产品的需求呈长期下降趋势；由于发达国家控制着世界经济秩序并制定游戏规则，拉美国家的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初级产品供给弹性低及需求弹性低的弱点也使得拉美经济极为脆弱，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在1930～1934年，拉美的出口总额比1925～1929年减少了48%。

拉美知识分子反思了拉美在全球化中的角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提出了“中心—外围”的分析体系。普雷维什主张，在全球化大潮中，“外围”国家的发展不能走“中心”国家的道路。拉美国家要改变这种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不利地位，关键是尽快实现工业化。但是，拉美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不能奉行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因为拉美国家新发展起来的制造业生产成本较高而产品质量较低，不可能直接同发达国家竞争，需要以国家规划和必要干预为手段。基于这种想法，进口替代从30年代开始逐渐成为拉美各国普遍采取的第二种发展模式。所谓进口替代，就是以本国自己生产的产品在国内市场上取代原来需要进口的产品，是一种比较内向型的发展模式。

这一时期，拉美各国政府大规模介入经济发展，兴建开发公司和国有企业。50年代初期，智利的生产开发公司的投资额相当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3或全国投资总额的1/4。为了发展钢铁工业，墨西哥政府于1943年拨出巨款，建立了高炉公司；为了发展机器制造业，政府又分别于1952和1954年出资兴建了国营火车车辆制造厂和国营柴油机厂。在1940至1975年期间，墨西哥的公共投资在投资总额中的比重接近40%，1973年曾高达45.6%，其中一半以上的投资进入工业和基础设施。

进口替代模式使拉美经济实现了长达30年的稳定增长。按照1970年市场价格计算，1950～1980年，拉美地区平均经济增长5.4%，工业产值增长6.7%，



1962年，古巴农民在曼坦萨斯附近农田收割甘蔗

人均GDP年均增长2.7%，人均工业产值年均增长6.7%。

然而，正如一些左翼批评者所说，拉美不仅没有减少对外部世界的依附，反而陷入了一种更为严重的新的依附——依附于外国资本。在1980～1982年西方经济严重衰退的冲击下，拉美国家成了1982年爆发的全球债务危机的重灾区。拉美的区域性大国除了哥伦比亚情况稍好之外都未能幸免。1982年底，墨西哥外债高达876亿美元，负债率为53%，偿债率为75%，大大超过5%～20%和20%～25%国际公认临

界线。智利外债从1978年的55亿美元增至1983年的180亿美元，1982年负债率和偿债率达到77.2%和62.1%。巴西在1982年外债总额达到640亿美元，其国家负债率和偿债率分别达到35.9%和71.7%。

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内在缺陷在于可持续性。拉美国家普遍国内市场规模狭小、技术进步缓慢和资本积累水平较低。在过去30年的大发展里，拉美国家实行高目标、高投资、高速度的政策，其资金需求超出了国家财力所能承受的压力。而支撑进口替代工业的

发展模式的依然是以农矿业为主的初级产品出口。当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在 20 世纪 70 年代陷入滞涨而一蹶不振时，国际市场的原材料和农产品价格暴跌。为了平衡国际收支，为弥补资金短缺的问题，不少拉美国家大举借债。

而这些国家的偿债能力却十分不足。多年的借债并没有完全用于生产。根据联合国的材料，1978～1981 年，墨西哥进口非必需品和奢侈品总共 140 亿美元，相当于它 1981 年外债总额的 1/6，巴西进口这类商品为 100 亿美元，相当于它 1981 年外债总额的 1/9；智利进口这类商品 4 年共花费 50 亿美元，为 1981 年债务总额的 1/4 以上。影响更为长远的是，拉美国家对进口替代工业部门的保护超出了正常范围。国际贸易上用有效保护率来评估一个国家的关税制度和有效保护措施对某类产品在其生产过程中给予净重增值的影响。这个数值是一种产品在国内外加工增值差额与其国外加工增值的百分率。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阿根廷、哥伦比亚和巴西的有效保护率接近 100%，而乌拉圭和智利则分别高达 384% 和 217%，远远超过同期东亚国家的水平。而且这种保护的持续时间长，且基本涉及整个工业部门，严重制约了拉美各国工业产品竞争力的增长。

偿债压力、资金外逃、国外贷款流入减少使拉美经济在 20 世纪 80 年代陷入全面衰退。1980～1988 年，拉美地区工业年均增长率仅为 0.5%，同期内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下降到 23.8%。不难看出，80 年代，拉美掀起第三波民主浪潮，并迅速完成民主化转型的重要原因即是各国执政的军人政府都无法应对国家的经济困境。

时代议题

1989 年，美国联合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等机构，在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逊（John Williamson）的策划下形成了旨在推动发展中国家市场自由化与国企私有化为主旨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被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诞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倡导下，拉美国家和西方债权人进行了一系列的债务谈判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对于拉美各国来说，拒绝与 IMF 合作会丧失整个国家的国际信誉，于是，在新自由主义理论下，拉美国家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大多数国家毫无保留地把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

服务部门（水、电、通讯）向外资开放。1995 到 1999 年，巴西共有 1233 件合并、兼并，跨国公司均在其中获得了控股权或参了股。拉美的金融市场也打开了大门。这些国家的金融体制不完善，资本量有限，又往往采取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为国际市场上数以亿万美元计的巨大游资提供投机活动的温床，为金融危机埋下隐患。1994 和 1995 年，委内瑞拉和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1999 年，巴西陷入金融危机；2001 年，阿根廷也未能幸免。

1998 年委内瑞拉大选前，查韦斯已经目睹了持续 10 年的政治动荡。1989 年，首都加拉加斯爆发了自 50 年代以来的最大暴动。暴动的原因是总统佩雷斯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大幅削减福利，放松对工资的控制，放开物价，宣布燃料价格上升 100%，公共交通上涨 30%。1989 年，委内瑞拉的贫困率由 46% 升至 62%，极端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 14% 升至 30%。1994 年，国家爆发了金融危机后，政府再次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乞援，以便获得经济结构调整所需的 14 亿美元贷款。作为交换，政府 1996 年实施新自由主义的“委内瑞拉日程”。委内瑞拉各地随即出现罢工和街头抗，最终在 1997 年 2 月酿成了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当查韦斯以拒绝新自由主义参与民主政治竞争时，他实际上是抓住了关乎执政合法性的核心议题：社会公平。

拉美贫困人口从 1980 年的 1.36 亿增至 2003 年的 2.266 亿，占地区总人口的 44.4%。两极分化是拉美扎根于殖民时代的痼疾。初级产品出口时代，大农场主模式加剧了这一分化。进口替代则具有资本密集型的特点。在 1960～1966 年，拉美的资本产出比率为 4：1，即为了使产值增长 1 比索，需要投入 4 比索。与东亚追求的劳动力密集型外向发展模式相比，拉美工业化创造的就业机会有限，改进收入分配的作用不大。一些研究证明，绝大多数拉美国家在 80 年代或 90 年代早期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以前，收入不平等程度已经达到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但在那个时期，以阿根廷庇隆政府为代表，民粹主义政策在拉美政治中扎根。其目的正是通过政策手段调节分配，弥合社会分裂。而新自由主义则把这唯一的保护锁链斩断了。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的拉美左翼执政者并不统一。他们具有不尽相同的意识形态，来自不同政治、历史背景的左派政党和运动。

以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政府、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政府和厄瓜多尔的科雷亚政府为代表的一派，在执政



2001年，阿根廷陷入严重金融危机，政府宣布为偿还外债将施行削减工资和公共服务等政策。民众举行示威表达对政府的不满

理念和政策取向上都较为激进。三国都将建设“社会主义”作为后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战略和方向，承诺通过激进民主的形式改变现状，由国家来主导发展计划的实施，纠正极度不平等和被边缘化状态，在经济政策方面加大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力度，在外交上有浓重的反美色彩。以巴西卢拉政府、乌拉圭的巴斯克斯政府和智利的巴切莱特政府为代表的温和派向新自由主义做了妥协，实际上保留了一些新自由主义措施。他们继续执行市场导向的经济政策，也拒绝将反美作为外交政策的主要取向。

激进派和温和派在民选政治中皆得以相继上台，其关键在于他们都促进社会公平作为政府议程的首要任务。在巴西，卢拉在总统大选中屡战屡败，屡败屡战。1989年，卢拉参加总统竞选时提出了国家控制金融体系，立即停止偿付外债，但并没有得到选民的支持。1994年大选时，他猛烈抨击新自由主义改革计划，

称政府将能源、通讯等部门私有化是对国家主权的凌辱。这一回，他同样没有成功。1998年，他强调指出给生产部门以刺激，让它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实行土地改革，同样铩羽而归。2002年大选其实是卢拉政策最为温和的一次。他赞赏卡多佐政府偿付公债的承诺，认为企业私有化的结果是积极的，且一再声明如果劳工党当选，不会将已私有化的企业重新国有化。

巴西劳工党上台后，卢拉政府整合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现金转移支付计划“家庭津贴计划”。至2006年，该计划覆盖范围急剧扩大到全国1100万家庭，使4704万人受益，约占巴西总人口的25%。厄瓜多尔的科雷亚政府制定了“人力发展基金”计划，覆盖范围扩及16岁以下儿童、65岁以上残疾人，每月发放30美元的救助金。2005年，乌拉圭的“关注社会全国紧急计划”颁布实施，受益家庭每月可获1360乌拉圭比索（合62美元）的津贴。同时实施的还有针对无

家可归者的住房计划、针对失业人群的临时就业计划。2006年，玻利维亚莫拉莱斯政府为提高儿童入学率而颁布实施了“胡安·品托基金”计划，每月为符合条件的小学1~6年级贫困儿童家庭提供约27美元的补贴。在委内瑞拉，查韦斯政府共推出了30多个名为“使命”的社会计划，涉及医疗、教育、食品分配、住房等广泛领域。

这些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计划使左翼执政者得到了明显的政治回报。以巴西为例，2006年卢拉蝉联总统；2010年其钦点的罗塞夫当选总统并在2014年成功连任。在巴西贫困的北部和东北部地区，1989年卢拉第一次竞选总统时，该地区55%~70%选民不予支持，而在2006年，卢拉竞选连任时，赢得了该地区60%~86%的有效选票。

左派已死？

最近两年，拉美粉色潮流的退去已经是不争的事实。2015年，阿根廷基什内尔夫夫妻档的执政画上句号，飘扬了十几年的左派大旗徐徐落下。在委内瑞拉，反对党联盟“团结民主联盟”在议会大选中赢得了全部167个席位中的112个。查韦斯的继承者总统马杜罗领导的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仅获得55个席位。在厄瓜多尔，左翼领导人总统拉斐尔·科雷亚确认，2017年任满后不打算谋求再次连任。在玻利维亚，修宪公投以51.3%的反对票否决了总统莫拉莱斯寻求继续连任的提议。2016年9月，深陷腐败丑闻的巴西总统罗塞夫遭到弹劾。

2016年6月，墨西哥前财长、纽约大学教授豪尔赫·卡斯塔涅达（Jorge G. Castaneda）在《纽约时报》直言不讳：左派已死。但这种评价未必恰当。早在2010年的智利大选中，右翼的反对派联盟“争取变革联盟”总统候选人皮涅拉终结了左派领导20年的历史。但在其后的2013年大选中，中左派政党的

候选人巴切莱特取胜，左派回潮。

正如著名左翼学者卡茨（Claudio Katz）所言：“判断拉美左派是否陷入另外一个政治循环，不仅要看政府中的执政党性质，而且还要看政治运动的底层逻辑。许多人倾向于依据执政权的获得来做出判断，但这只是一个因素而已。”事实上，政治上的左派右派的政治循环的动力并非来自政党本身或是意识形态，而是来自经济危机所造成的拉美的政治动力学。

2003到2011年对拉美的左翼政权是一段好时光。显而易见的是，受益于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和出口贸易的繁荣，拉丁美洲各国的财政状况有所改善，这使左翼领导人可以实行自己所偏好的经济社会政策。换句话说，他们得以对国家政治生活中最紧迫的话题做出回应。

与20世纪80~90年代相比，在2002~2007年，阿根廷、巴西、委内瑞拉等左派执政的国家基尼系数平均降低了2~3个百分点。在巴西，劳工党执政以后，3600万人摆脱了极端贫困，贫困率和极端贫困率分别从2001年的37.5%、13.2%，降至2011年的20.9%、6.1%。类似的情况发生在所有拉美左翼执政国家。

但拉美依然没有摆脱经济依附对它的困扰。正如历史上发生过的一样，拉美的政治周期再次与世界经济的周期同步。委内瑞拉经济中的“荷兰病”症状变得越来越严重。巴西经济陷入零增长或负增长。80年代困扰阿根廷的恶性通货膨胀似乎可能死灰复燃。将近10年的增长大潮褪去后，反民粹主义的潮流袭来，拉美的时代主题已经从公平转向效率。当左派无法再回应这一时代命题时，第三波民主浪潮后，多元化格局日臻完善，拉美政治舞台势必做出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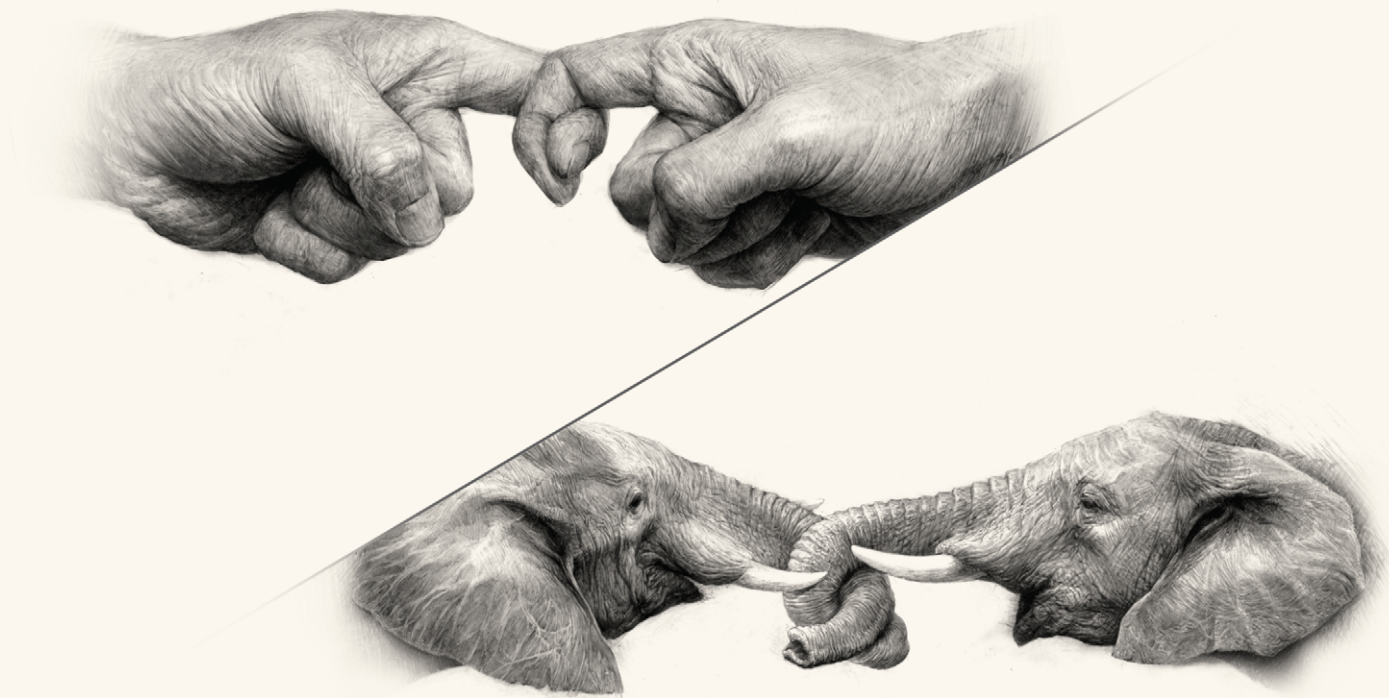
2014年，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在巴西利亚参加书展。1971年，这位当时的记者出版了《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一书，它已再版了84次，但仍是美国和欧洲书店中关于拉美的畅销书籍，其销量已逾百万册。2009年，查韦斯与奥巴马会面时曾将此书赠与后者。但在巴西利亚，加莱亚诺却表示《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已不具备可读性，他说自己在写作本书时缺乏必要的经济政治知识，而该书属于过去。

这似乎是拉美左派的隐喻。他们的政治运动虽然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反对不平等的经济体系，但是在经济发展道路选择上，他们仍然缺乏概念清晰的经济学分析。他们的执政并没有回答一个关键的问题：如何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选择之外，开启另外一种可能性？

事实上，政治上的左派右派的政治循环的动力并非来自政党本身或是意识形态，而是来自经济危机所造成的拉美的政治动力学。

勾起手指，连结拯救的决心

Link your fingers to support elephants



拒绝购买象牙制品，支持象牙禁贸。勾勾手指，
把拯救大象的承诺传递下去。

Reject ivory and support the ban. Link your fingers to pledge
your support for elephants!



拯救大象不能没有你！扫描二维码
或登录 <http://www.wwfchina.org/ivory>
传递爱的承诺。



共同发起全球拒绝
非法野生生物贸易行动

TRAFFIC
the wildlife trade monitoring network
国际野生生物贸易研究组织



上世纪 60 年代，共同执政时期的格瓦拉（左）和卡斯特罗



1960年3月5日，为悼念在“拉库布雷号”爆炸事件中的死难者，卡斯特罗、时任总统托拉多、格瓦拉等人上街游行（左至右）

90 岁的卡斯特罗与 39 岁的格瓦拉

记者 张星云

菲德尔·卡斯特罗与切·格瓦拉的相互影响贯穿古巴革命史，这种关系在格瓦拉死后延续，格瓦拉被视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种政治派别以及西方国家中的一种文化象征，而卡斯特罗则一直对他加以符号化地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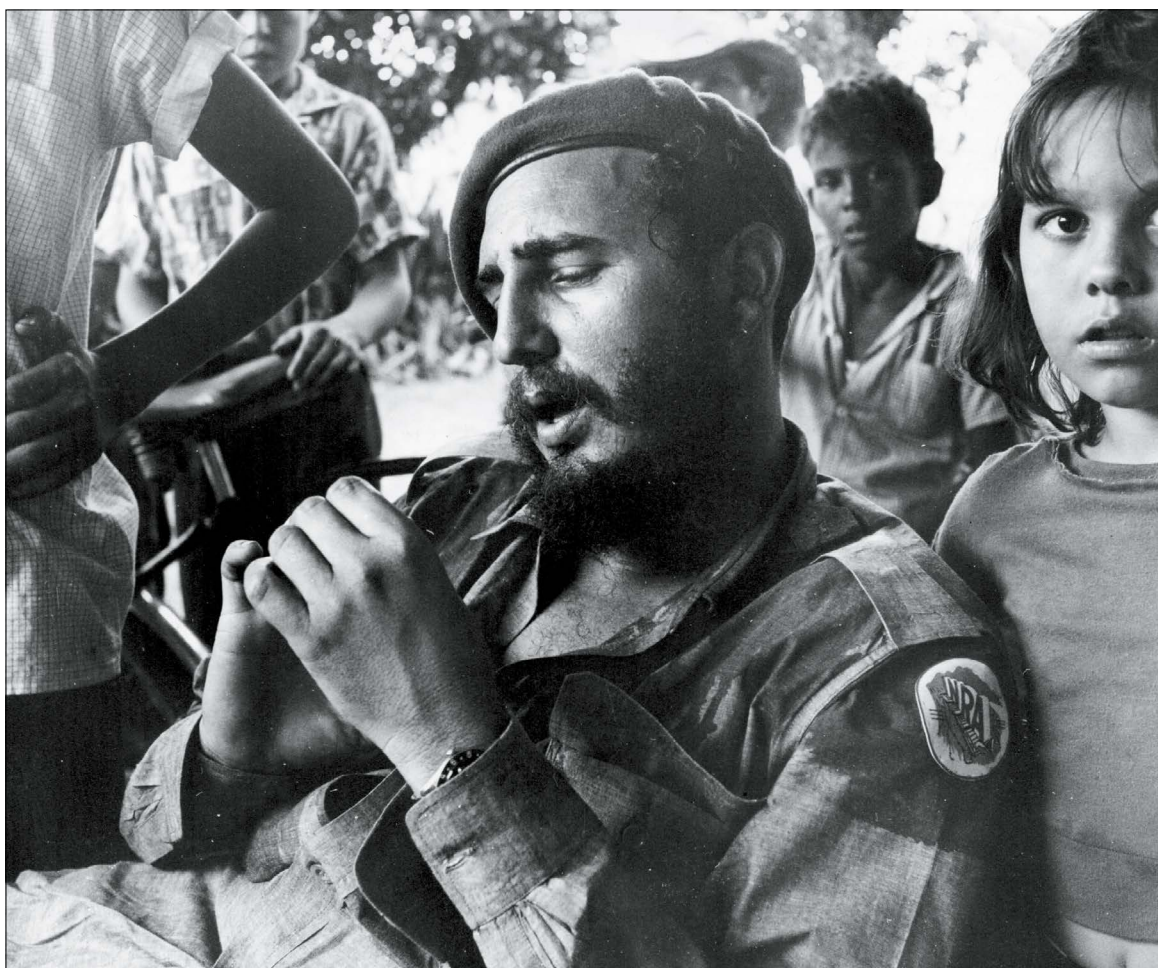
卡斯特罗的一生很少在公开场合回顾他与格瓦拉“艰难的光辉岁月”，他很清楚历史的意义，因此这种对过去经历保持沉默的做法显得非同寻常。似乎对于这个岛国曾经风云激荡的革命历史，卡斯特罗胸有成竹，就像他那句著名的话一样：“谴责我吧！——这无关紧要，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他也颇为成功地阻止过对他的过去进行严肃的历史研究。对于他和格瓦拉的关系，他更是珍爱有加，仅限于对他本人进行的为数不多的几次“独家采访”，或者在格瓦拉牺牲的一些周年纪念日上进行的回顾演讲。与此同时，格瓦拉的形象在全球范围被不同角度地符号化。

格瓦拉生前对自己生活的细节往往含糊其辞，除

了他的日记现在广为流传之外，并无太多可以证明他们两人关系的一手资料。在格瓦拉牺牲后的这将近 50 年里，卡斯特罗成了两人关系的唯一诠释者。而在历史中，这两人友谊的重要性不亚于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同志友谊，甚至比托洛茨基和列宁的合作关系与个人冲突更重要。

相识

1955 年 7 月的夏夜晚上，卡斯特罗在墨西哥第一次见到格瓦拉。在这之前两人走着各自的路，积累了迥然不同的经历。



上图：卡斯特罗在哈瓦那附近的一处甘蔗种植园休息

下图：1959年6月2日，在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几天后，格瓦拉开着一辆美国车带着第二任妻子阿莱达·马奇到哈瓦那举行婚礼



那晚卡斯特罗修饰得很整齐，头发油亮，留了一点小胡子，看上去一派律师形象，和衣着破旧、从南部过来的旅行者格瓦拉相比，显得耀眼很多。两人相互介绍认识后，卡斯特罗用他不经意的古巴风格，用手指戳着对方问道：“为什么一个医生做着游移不定的摄影师工作？”

卡斯特罗是名古巴律师，如果换一种生活，他完全有可能成为一名这个国家最有前途的篮球运动员，然而他从律师转而从事政治活动，试图在自己的国家开展武装起义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并因此坐牢，此时成了一名经特赦后幸免的革命者，因为继续受到政治打压而流亡墨西哥，他谈起自己的革命计划时依旧充满信念和热情，充满那种仿佛战争已经胜利的信心，他依旧打算在自己的家乡继续开展解放战争。

格瓦拉是一个医学院学生，但他的内心却是一个旅行家和诗人，一个自由的灵魂，梦想着干一番大事业。此时疲惫的他刚刚结束了漫长的旅行，他不想回阿根廷的家，危地马拉的政权更迭让他带着情人希尔达一同逃往墨西哥，他正以怀疑的目光审视着那些唱高调的拉丁美洲政客，他十分清楚玻利维亚革命是在引火上身，亲眼看到危地马拉早期民族主义运动失败所带来的创伤。

彼时，两个流亡的人相聚，格瓦拉27岁、卡斯特罗29岁。

在初次相见中，两人都因对方表现的政治立场做了高于自己的评价。格瓦拉说他在卡斯特罗面前完全像个小学生，只顾回答对方提出的关于危地马拉革命的问题，并被对方坚定的信念所吸引。“经过数小时的长谈，到天亮的时候，我就成了他未来的同志之一。”而卡斯特罗则说格瓦拉当时的政治观点比自己更“进步”。

客观地说，应该是卡斯特罗当时给正在寻找生活方向和斗争道路的格瓦拉指点和提供了现实的途径，即和他们一起战斗，一起回到古巴，通过革命推翻独裁统治。对于格瓦拉来说，这是他在长期流浪之后，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生活上最终找到的归属。“经过这么长时间在拉丁美洲的游历，以及在终点危地马拉所遭遇的一切，我对于参加任何异常反独裁的革命都不会有太多的犹豫。”格瓦拉曾写道。

格瓦拉不是古巴人，却无条件地随时准备与卡斯特罗他们并肩作战。他好不容易在墨西哥摆脱了数月来一贫如洗的生活，在综合医院找到工作，还兼任医学讲师，却又抛弃了所有这些诱人的职业前景、平静

的家庭生活，告别妻子和刚刚出生的女儿，投身于古巴革命。

对于当时的卡斯特罗，格瓦拉的直接作用是他略懂医道。虽然他有医学学位，但这和卡斯特的法学学位一样，很大程度上是临时抱佛脚考下来的，毕业后也没有好好用过。

1956年6月，卡斯特罗、格瓦拉和其他20多人在墨西哥被捕入狱。此前格瓦拉受命在墨西哥恰尔科市的拉斯洛沙斯农场主持未来古巴远征军的训练工作。所有被捕的人当中，格瓦拉是最后一个被释放的。出狱后又回不了家，他被迫东躲西藏，不停搬家，直到11月25日作为远征军的一员登上“格拉玛号”前往古巴。这期间格瓦拉于7月6日在狱中给父母写了一封信，第一次提到古巴和他所参与的古巴革命。“我想有个中期目标，我将投身古巴的解放事业，不成功便成仁。”

他和卡斯特罗一起登上了“格拉玛号”，在12月2日来到贝里克这片古巴东方省的沼泽地带，并在12月5日首次战役中负伤。在随后的撤退中，他面对着一个急救箱一个弹药箱，他扛起了弹药箱，从而选择了成为游击队战士的命运。没有人会预见到格瓦拉日后对古巴革命所起的巨大作用，甚至成了偶像。

在马埃斯特拉山，格瓦拉是早期起义军中第一位被授予最高军衔少校军衔以及总队司令职位的人。此后的两年战事中，他的名字不断出现。卡斯特罗深信格瓦拉作为游击队战士的作战和领导能力，因此在1958年夏天马埃斯特拉山前线最关键时刻，卡斯特罗让格瓦拉指挥起义军的西部防卫，并在战线向全国推进的条件成熟时，让格瓦拉指挥两大游击纵队中的一支，执行向古巴中央进军的艰难任务。格瓦拉和他的纵队在1958年最后几个月中赢得的战役，对最终以武力推翻独裁政权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1959年1月1日革命胜利后，推翻独裁统治的卡斯特罗和格瓦拉开始投身到建设革命中，对他们而言，战争还在继续。的确，如果他们想要维持在大山里建立起来的伙伴关系，某种形式的战争必须延续下去，频频而至的危险和各种全面斗争正是他们当前关系的基石。

掌权的卡斯特罗将格瓦拉留在了哈瓦那，后者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古巴的经济、政治、社会方面的转型工作中。他身兼数职：国家银行行长、中央计划委员会主席、工业部部长，分管若干军区司令及数个政治、经济或友好代表团的团长。

论战

那一时期，格瓦拉也开始进行公开演讲，但他的演讲与卡斯特的演讲差别很大。卡斯特罗演讲时舞动胳膊，释放无穷力量，而格瓦拉的姿势则固定很多，只是眼睛环顾四周。格瓦拉不像卡斯特罗“直接民主”式的演讲那样激动人心、富有修辞效果，但却是未来改革政策的重要指示器，演讲内容也无一例外都比卡斯特罗激进很多。

这些激进的声明，听起来与卡斯特的想法相互矛盾，但其实内在逻辑却是一致的。格瓦拉首先会提出一个大胆的提纲，卡斯特罗通常会先反对这些思路，然后再给出一个看起来更温和的形式。按下革命的按钮，需要的就是这个条件。像战时一样，和平时卡斯特罗与格瓦拉之间的分工就这样定下来了，前者面向大众发表演说，后者在幕后工作，对主要革命机构讲话。

格瓦拉是古巴领导集团中历次激进转变的主要推动者：国有化、与苏联建立军事联系、与美国决裂、宣布转向社会主义、发动拉美革命、经济计划化和中央集权化、限制和缩小物质利益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他在1960年7月就对一个朋友透露正在催促卡斯特罗尽早宣布转向社会主义，8月份在他那次对医务工作者提出“新人”概念的著名演说中，针对当时沸沸扬扬的古巴要实行马克思主义的猜测，他说要是古巴革命通过自己的实践找到了和马克思主义一样的道路，那么古巴革命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这种间接的承认或者说暗示，比卡斯特罗1961年5月1日正式宣布要早了近9个月。

卡斯特罗把经济大权也很大程度上交给了格瓦拉。他同时担任工业部部长和国家银行行长，前一个职务是卡斯特罗直接任命的，因为他需要一个有闯劲的人去搞国有化，和那些狡诈的资本家打交道；后一个则是格瓦拉毛遂自荐的。在一次会议上卡斯特罗说他要找一个“好的经济学家”主管国家银行，格瓦拉闻言立刻举手，卡斯特罗惊道：“切，我不知道你还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格瓦拉开玩笑地答道：“哦，我以为你说你要一个好的共产主义者。”虽然卡斯特罗后来否认了这段故事，称这是西方媒体的玩笑，但事关一国国计民生的国家银行行长的职务确实给了格瓦拉。

从1959年初革命胜利到1961年5月卡斯特罗正式宣布向社会主义转变，这是古巴革命的“急风暴雨”阶段。在这期间古巴领导人忙于破旧立新，没好好考

虑过最平庸但也最基本的吃饭问题。也许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使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只要宣布了人民当家做主，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就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挡都挡不住。然而结果并不是这样，古巴的经济形势面临着严峻考验。因此当格瓦拉被任命为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古巴内外对格瓦拉的争议达到了一个顶点。

在卡斯特的政府，格瓦拉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甚至是卡斯特罗所言社会主义的一种极端延伸，被旁人视为“革命清教主义”。

身兼二职的格瓦拉只拿工业部部长的每月约200美元的薪水，把银行行长的1000美元的薪水还给国家。有一次搬家时太太不舍得原来公家住宅里漂亮的吊灯，于是摘下来一起搬走，被他得知后大骂一顿，随即送回。他的汽车是国家配给的，他从来不让家属使用，即使小孩生急病也是如此。他是领导人中唯一不按照官方规定穿着的人，即使会见外宾也常常既不穿军服也不穿西装，有时就是一件皱巴巴的军便服，口袋塞得鼓鼓囊囊的，衬衫的下摆还从来从不束在皮带里。

格瓦拉上任不久就在自己主管的部门建了一个农村干部学校，地点选在古巴岛最偏僻的西端，把部里所有犯大小错误的人，从任用亲戚、迟到早退到搞婚外恋，都送到那里劳动，不去的就开除公职。他的另一个建在农村的实验农庄则相反，是他和他的一些老战友在那里共同劳动、共同生活、不拿报酬的乌托邦小天地。他每个星期天上午都出去义务劳动，弄得他的部属很尴尬，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

一次一个下属看到他外出开会没戴表，便把自己的有金表链的手表摘下借给他，等格瓦拉开完会把表还给他时金表链不见了，换了一根皮表带，还有一张银行的收条，上面写着：古巴国家银行感谢你的捐赠。

他所到之处，干部们窃窃私语，互相提醒：“当心，切来了。”

然而，像格瓦拉这样什么都不顾一心革命的人毕竟不多。自1961年起，古巴经济就开始下降。古巴领导人先从美国教授那里了解到一些计划经济的基本知识，然后直接去苏联取经。格瓦拉曾说不出一年，国有化将消灭失业，这在拉美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也许通过国家干预，失业率确实下降了，但生产也大幅度下降了。

1962年，苏联经济学界展开了对中央集权的计划体制的反思和讨论，主张用价值规律、企业自主权和物质刺激等来增加生产。它在不同的国家产生了不同的反响，东欧多数国家谨慎地跟上，在捷克则发展

到对政治体制的挑战，演变为后来的“布拉格之春”，而中国断然认为这是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

这场争论在古巴也激起了波澜。古巴领导人分成两派，展开论战，从1962年延续到1965年。争论从是否运用价值规律开始，一方以农业改革委员会主席罗德里格兹和外贸部长菲尔南德兹为首，主张实行非中央集权的独立核算制，企业自负盈亏，通过市场和其他企业交换产品，个人收入根据其劳动量而定。另一方以格瓦拉为首，主张实行严格的中央集权制，每个企业都在国家的预算之内，都是国家计划下的生产单位，产品在企业之间的交换不具有商品性，个人收入与劳动量并不挂钩。

这是古巴革命后领导集团中第一次意义重大的分歧，直接关系到古巴走哪条道路的问题。

格瓦拉不能同意苏联那种依靠物质刺激建设社会主义的想法。正是格瓦拉的这种怀疑苏联的态度使他在和美国的冲突中为古巴设想了最坏的打算，早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前就对拉美青年代表说古巴人民乐意为了自己和拉美人民的彻底解放而不惜被核武器一扫而光。当苏联试图在古巴部署核武器时他是古巴领导人中态度最积极的，而在古巴导弹危机和平解决后他又是最愤怒的。

在这场时间不短的经济论战中，卡斯特罗意外地沉默寡言，他几乎没有在公开场合发表自己的意见，一反那种不管什么题目都能滔滔不绝地说上几个小时的常规。或许他并不想公开地偏向某一方，或许仅仅是因为他对经济事务真的一窍不通，连格瓦拉都不如。只有一点是确实无疑的，他需要时间。最终，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他去了一趟莫斯科，重新修复与苏联的关系。

至今为止没有确凿的材料说卡斯特罗和格瓦拉在那时有大的分歧。他们对古巴革命目标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甚至很难说卡斯特罗在思想和行动上比格瓦拉保守，只是因为他要为全局负责，所以表现得比格瓦拉谨慎或者慢半拍。而且从古巴革命的历史来看，是他而不是格瓦拉或者其他人对政策和策略掌握得更老练。但自从他访问苏联以后，他对苏联和赫鲁晓夫的称赞就和格瓦拉的轻蔑和不置一词形成了对照。

卡斯特罗和格瓦拉在1963年以后的根本分歧在于，前者要利用苏联的力量，参照苏联的模式先把古巴的经济发展起来，巩固古巴的社会主义；而后者则认为离开了拉美和世界革命，古巴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单独维持下去，而且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已经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古巴不能走苏联的官僚主义和物质刺

激的道路。持续三年经济政策论战的同时，古巴在中苏论战中基本维持中立，这不能不说与格瓦拉的影响有关。但无疑，卡斯特罗受到苏联方面越来越大的压力，要古巴放弃格瓦拉的路线。

1965年初，卡斯特罗终于在一次讲话中对历时三年的经济论战简短表态说：“革命者的责任不是在哲学领域进行抽象的论辩。”他这话的意义是论战应该结束，双方都不要把自己的主张强加给对方。从此曾经热闹一时的论战烟消云散，报刊上再也见不到争论的文章。

同年3月，格瓦拉在阿尔及尔发表了明显具有反苏内容的讲话后，回到哈瓦那不久就从公开场合消失了。

出走

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的分歧带有鲜明的个性。像格瓦拉那样极端的革命家即使在革命家中间也是罕见的，他不愿为了任何现实的功利因素而做哪怕是很有限的妥协，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为此不惜用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存亡去做孤注一掷的战斗。难怪卡斯特罗在格瓦拉死后曾说“很难找到一个能和切相比的更纯粹、更完整、更能成为典范的革命家”。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格瓦拉的这种极端性也可能在古巴其他比较现实的领导人中间引起不满，他们会自然地联想到这毕竟不是他的国家，虽然卡斯特罗早在1959年就通过一条授予参加古巴革命并取得高级军事职务的外国人古巴公民权的法律解决了这个问题，当时只有格瓦拉一个人符合这条法律所规定的条件。

格瓦拉从联合国大会的活动开始，然后去非洲大陆参加亚非团结组织会议，进而访问了几个非洲国家，最后在访问中国后结束了为期3个月的漫长国外旅行，1965年3月15日回到了哈瓦那。

卡斯特罗去机场迎接。格瓦拉刚在阿尔及尔发表了指责苏联的讲话，他的活动和古巴其他领导人对他的态度成了各方面注意的对象。虽然古巴领导层显然已经受到苏联方面的压力，但他们仍然给格瓦拉应得的礼仪。不但如此，格瓦拉在阿尔及尔的讲话几天后全文刊登在古巴政府的一份季刊《国际政治》上，这使得有的历史学家甚至怀疑卡斯特罗实际上是在利用格瓦拉散布反苏情绪。

回国以后，格瓦拉3月22日在工业部发表了简短讲话，然后又去看了他在马坦扎斯省和一些老战友

共同劳动的农场，随后回到哈瓦那。在他离开古巴出访的那段时间里，他的妻子阿莱达生下了他们的第四个孩子。在那几天里他们一家六口留下了最后的一张合照，婴儿躺在格瓦拉的膝上，阿莱达肯定已经得知格瓦拉的计划，她的微笑带着忧郁。几天前，当格瓦拉回到哈瓦那时，她和卡斯特罗等一起去机场迎接，当时她在照片上就已经愁眉不展了。

就在那几天的一个早上，格瓦拉、阿莱达和他们孩子的保姆苏菲亚在一起吃早餐，格瓦拉问苏菲亚当一些古巴男子在革命中牺牲后，他们的妻子是否改嫁，苏菲亚说很多人如此。

格瓦拉转向阿莱达，指指自己的咖啡杯子说：“要是那样的话，你现在为我冲的这杯咖啡，也可以给另一个人。”苏菲亚当时对格瓦拉的这句话并不明白，因为她和绝大多数古巴人一样，对格瓦拉的计划一无所知。但这句话却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后来格瓦拉出走并牺牲的消息传开后，她回想起来才明白那是格瓦拉婉转地劝告阿莱达要是自己回不来的话，她可以而且应该改嫁。

格瓦拉为什么要出走？为什么要放弃在古巴的国家领导人的地位和责任？如今看来原因除了苏联的压力和从派遣别人到亲自出马输出革命，还有他在古巴领导人和普通人中显得很不合群。表现在他生活所有方面的革命清教主义使得很多古巴人觉得他和他们大不一样了，甚至他的在场都会让他们觉得不安。此外，格瓦拉最终出走的原因可能也包含他和卡斯特罗之间的矛盾，但这都没有确凿的证据。

格瓦拉对卡斯特罗忠心耿耿，更是卡斯特罗个人崇拜的制造者，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卡斯特罗就是党，就是人民。卡斯特罗也一直十分尊重格瓦拉，给他很高的礼遇。

1965年4月1日，格瓦拉离开了家，也离开了古巴，但不是以格瓦拉的名字，而是用了拉蒙·尼特兹的假名。他剃掉了胡子，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戴着眼镜，看上去像是一个大公司的经理在做商业旅行。格瓦拉选中了刚果这个非洲的腹地去做辐射革命。当他秘密离开古巴，在古巴情报和外交机构安排下转道莫斯科和开罗到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当时连古巴驻那里的大使都不知道他会亲自出马，开始也没有认出他来。

在格瓦拉出走的那一刻，绝大多数知道这件事的人都会以为这是他在古巴影响的终结，但后来的发展却证明恰恰是在他出走乃至牺牲以后，他在古巴的影响达到了顶峰。

牺牲

从4月到10月，格瓦拉在古巴领导层的消失引起了广泛的猜测。5月1日，古巴举行例行的阅兵和游行，卡斯特罗带着格瓦拉的小女儿站在主席台上，格瓦拉的妻子阿莱达站在劳尔的身边。外国记者频频发问，卡斯特罗神秘地说格瓦拉在他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古巴政府没有义务透露他的确切地点。6月16日在内务部的一次会上卡斯特罗嘲笑了外界的谣传，用他一贯的对美国人嬉笑怒骂的口吻说：“帝国主义紧张了？那就让他们去紧张吧。帝国主义害怕了？那就让他们去害怕吧。让他们用U-2高空侦察机侦察吧！”

格瓦拉临离开古巴时留下了三封信，分别给卡斯特罗、他的母亲和他的5个子女。10月初，在卡斯特罗宣布古巴共产党建立并为政治局和书记处安排座次的时候，他再也没有理由故弄玄虚，于是他宣布格瓦拉已离开古巴，到某个最需要他的第三世界国家去战斗了。他把格瓦拉给他的信拿出来念给与会代表，同时通过电视转播出去。

“我唯一重大的败笔，是在马埃斯特拉山斗争初期，对你没有更多信心，未能及时了解你作为一个领导者和一个革命者的种种能力。”格瓦拉在信中写道，“在加勒比海危机那段光辉而又悲伤的日子里，在你身旁我感受到了那种‘我属于人民’的骄傲。我为自己当时毫不动摇地追随你感到自豪，我认同你考虑和观察问题的方法以及对于危险与原则的评估。”

曾经有人怀疑过格瓦拉的信的真伪，特别是信中对卡斯特罗所表示的忠诚，听上去更像是出自卡斯特罗自己的手笔。但格瓦拉确实是卡斯特罗个人崇拜的主要制造者，这封信的语气和他的个性也十分吻合，况且当它公布时卡斯特罗知道格瓦拉肯定能看到或听到，因此由卡斯特罗自己操刀撰写的可能性不大。但它很有可能是格瓦拉和卡斯特罗在前者离开古巴时商谈的结果，而不太可能完全是格瓦拉自己的想法。格瓦拉在离开古巴前到底和卡斯特罗谈了些什么，至今无从知晓。

有个叫列奥·萨维吉的法国学者曾经出版过《切·格瓦拉：一个革命家的失败》一书，其中对格瓦拉离开古巴时和卡斯特罗达成的条件做了一些猜测，其中包括写封信澄清出走的动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再回到古巴，卡斯特罗则保证对格瓦拉的活动给予支持，等等。这种看法可以作为参考。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格瓦拉是古巴的重要领导人，他的出

走也是在古巴政府和情报机构的安排下实现的，出走后又得到了古巴的物质和人力支持，因此在出走前他和卡斯特罗之间不可能没有商量和安排。

其实，更重要的是，格瓦拉的信达到了卡斯特罗既要显示古巴仍然在支持世界革命，又要推卸古巴在国际法上对输出暴力革命和卷入他国内政所应承担的责任，既表达对苏联“和平共处”的不满，又避免了向这个政策正面挑战的目的。

格瓦拉的非洲之行在军事上是一场灾难。格瓦拉原打算在刚果战斗5年，结果只有6个月。然而就在此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使得古巴的政策又一次朝着激进的方向转变，这使得在国外的格瓦拉反而有了新的作用了。卡斯特罗希望格瓦拉能够在南美打开局面，建立第二个古巴，最终卡斯特罗选中了玻利维亚。

卡斯特罗安排好格瓦拉的玻利维亚计划以后，后者于1966年7月20日左右秘密回到古巴，住在一个乡下农场里，只有卡斯特罗和极少数人知道。格瓦拉这段时间究竟和卡斯特罗相处了多久，谈了些什么，并没有充分的记载。不过卡斯特罗肯定了解和掌握格瓦拉准备的每一步。有一次他让经过化装的格瓦拉和古巴高级领导人在一起聊天，介绍说他是自己的一个外国朋友，竟然没有人认出格瓦拉。在卡斯特罗自己撰写的回忆格瓦拉的文章中，他把他们之间的最后道别描写得很像是两个善于克制自己的男子汉之间没有多少感情色彩的分手，但据在场的其他人回忆，卡斯特罗和格瓦拉都难以抑制自己的伤感，格瓦拉和卡斯特罗拥抱后两人分开，他们的双手仍然伸向对方，就这样互相凝视了一会儿，然后格瓦拉迅速转身登上汽车，命令司机快开。格瓦拉离开后卡斯特罗独自一人在远处垂首坐了很久。黎明时，卡斯特罗叫大家出来看那架载着格瓦拉的飞机在天上飞过。

然而在人地生疏的玻利维亚山区，格瓦拉和他的那支几十人的队伍不久就陷入了困境。当地的农民和矿工并不像古巴山区的农民那样愿意加入他们的队伍，有的还向军方报告他们的动向。当玻利维亚军方证实这支游击队是由古巴人直接参加和领导的之后，他们请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员来帮助围剿。从1967年3月第一仗开始到10月8日格瓦拉被捕，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一步被逼迫到山穷水尽的故事。格瓦拉身边的人，包括塔玛拉和他在古巴工业部的副手，一个个在政府军的伏击下身亡，有的就死在他的怀里。

格瓦拉在被捕一天后，被玻利维亚军人枪杀。他的遗体被秘密埋葬，直到30年后才被发掘出来。当

他被运回古巴时，卡斯特罗为这具在野地里深埋了30年的骸骨举行了国葬。

符号

格瓦拉是20世纪最有传奇色彩的政治家和革命家。他的死在拉美、西方甚至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感情色彩十分强烈的反响。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来自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和革命运动的反响远不如西方世界。苏联阵营和拉美绝大多数共产党把他的死看作暴力革命和个人冒险主义的最后失败。

在西方世界，尤其是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中间，格瓦拉不但是对西方物质主义个人至上社会的否定，人类崇高信念和精神超越的象征，也是对苏联官僚制度和异化了的社会主义的批判。西方左翼知识界对格瓦拉的另一个评价和他们对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态度密切相关。1974年出版的《切·格瓦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革命战争》一书认为格瓦拉主义“超越了斯大林主义和改革主义，回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因此是当代革命的希望。

这些生活在西方“腐败”和“异化”的物质社会中吃穿不愁的知识分子终于等到了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英雄。这个英雄以堂吉珂德的精神与人的物质欲望战斗，以十字军的气概远征，以艺术家的热忱塑造人。而且他又是那么年轻，那么英俊，最后像耶稣被钉上十字架那样献身。这使得他们太激动了。萨特用典型的萨特式语言说格瓦拉是这个时代“最完整的人”。美国诗人、学者辛克莱·刘易斯说他是当代的加里波利。他还成为很多音乐和美术作品的题材，好莱坞在1969年就拍摄了一部正面歌颂格瓦拉的故事片，找到了一位相貌酷似他的演员。他的头像甚至被印在汗衫、纽扣、帽子和手帕上。在哈佛、伯克利和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这些美国学生运动的重镇，他成了学生的偶像，印有他头像的衣服和纪念品与娱乐、体育界的明星照放在一起在地摊上出售。这种现象在伦敦、巴黎、柏林和蒙特利尔都能见到。甚至在今欧美大学的学生宿舍和办公楼里，有时还可以看到他那张著名的以血红色为背景，头颅微昂、面容严峻的照片。

格瓦拉彻底成为西方世界的文化符号。但在当时，格瓦拉的去世却让卡斯特罗陷入了极度的被动。

格瓦拉的去世宣布了卡斯特罗向拉美输出暴力革命的政策破产，坚持了将近10年的“大陆革命”至此只得从大张旗鼓的策动转向零零碎碎的渗透。这



1997年7月12日，劳尔·卡斯特罗、拉米罗·巴尔德斯、菲德尔·卡斯特罗（左至右）参加哈瓦那游击队员圣火纪念仪式，格瓦拉的女儿阿莱达·格瓦拉（右）正在发表演讲

无疑让走议会道路的拉美各国共产党更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的主张。同时，欧洲共产党也普遍声明或发表文章反对格瓦拉的路线。

环顾全球，没有哪个有影响的大党在古巴为格瓦拉大办丧事时对格瓦拉的死说上一两句让卡斯特罗觉得安慰的话。格瓦拉的牺牲在世界共产主义阵营中换来的竟然是这么个受尽奚落的结果，这让卡斯特罗几乎陷于狂怒之中，但他还是竭力想从格瓦拉的死中发掘出他可以加以利用的资源。

10月15日，在古巴国内日甚一日的谣传中，卡斯特罗神色凝重地出现在国家电视台，证实了格瓦拉的死讯。他宣布了三天的国丧和一个月的下半旗，把10月8日定为一个新的纪念日，叫“英勇的游击队员日”。18日，百万古巴人汇集革命广场。卡斯特罗发表了长篇悼词，说格瓦拉是革命美德的肉身：“作为他的好友，我们将最大化地继承他的遗产……如果我们想要一个并不属于现在而属于未来的人做榜样，我从心底里说这样的毫无瑕疵的榜样就是切！如果我们要表达我们想把自己的孩子变成什么样的人，从我们的坚定的革命者的信念出发我们说：让他们成为切！”卡斯特罗想把死去的格瓦拉在精神上复活，利用这次

机会进一步提升群众的斗志和觉悟。

其实早在1966年以后，卡斯特的执政思想就偏回了当初格瓦拉所提倡的向共产主义迅速过渡的乌托邦倾向，物质刺激原则被公开地批判，经济政策来了一个大转变。当时格瓦拉离开古巴，古巴实行的是没有格瓦拉的格瓦拉主义。

格瓦拉死后古巴更是到了左的极端，1968至1970年，卡斯特罗发起了在经济上向共产主义转变的“革命攻势”。这时虽然古巴维持着和苏联的军事联盟，但古巴国内，早已几乎是公开地批判苏联的政策了。这些都说明，虽然1963至1965年三年经济论战时期，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的经济思想表面上并不相同，而且卡斯特罗最终选择了学习苏联的方式，但其实两人内心的想法并没有大的区别。

格瓦拉死后，卡斯特罗放弃了在拉美大规模策动革命的政策，与拉丁美洲各国恢复外交，美洲国家组织在美国的同意下取消了对古巴的经济制裁，各国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和古巴发展经济贸易关系。古巴在拉美和国际共运中受孤立的情况改变了，它从中获得的不但是政治利益，更有经济实惠。格瓦拉的形象开始逐渐被人淡忘。

这一情况直到1987年前后才又产生了转折。在那个阶段，对格瓦拉的宣传重又成为热点。“一个革命者的楷模，一个共产主义的楷模。男女老少，都能够模仿他，像他那样思考，像他那样行动。对于欧洲和整个世界至少三代人来说，切是一个象征，一个理想。”卡斯特罗那时说道。格瓦拉成了对现状的某种批判。

1987年，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于6月推行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而古巴则处于卡斯特罗所说的针对阻止社会资本主义化的“整顿进程”之中。卡斯特罗敏锐地察觉到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变化，也感受到了古巴在资本主义面前的变化。那时卡斯特罗对苏联政策含沙射影的攻击变得越来越频繁，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浪潮中他越来越多地强调古巴革命“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卡斯特罗在1987年10月纪念格瓦拉牺牲20周年的演讲中，头一次就他与格瓦拉12年所共同经历的所有事情做了总结，并说国家如今正在纠正一切否定和偏离格瓦拉的理想的现象。

“如果切得知，……他一定会很震惊。”卡斯特罗在演讲中用了八段排比句，来表达他对当时古巴官僚主义、企业徇私舞弊等现象，以及社会正在全面面临的资本主义化的愤怒。“如果切知道人们越来越挂念钱，钱已经成为他们最基本的驱动力，他一定会很震惊。他会非常震惊，因为他曾再三警告，要防止这种局面的出现。”

“不要以为切是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一个脱离现实的人。本质上，切是坚决反对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使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原理和概念的。反对将资本主义的概念转移到社会主义，然后把他们当作建设新社会的工具使用。”卡斯特罗在20周年纪念讲话中详细阐述格瓦拉的经济思想。那一时期，古巴的一位经济学家，将格瓦拉在任国家银行行长和工业部部长期间的演讲和文章整理成书，提炼出来一套格瓦拉的经济理论，取名《切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卡斯特罗评价说这些文章对建设社会主义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做了很多事来纪念切在其他方面的品质，唯有这个方面基本上被忽略了。”头一次，格瓦拉的经济思想成了指导那一时期古巴经济政策的主要依据。

1992年，卡斯特罗接受尼加拉瓜记者托马斯·博尔赫的采访，此时的苏联已经解体，柏林墙已经倒塌，社会主义阵营眼看土崩瓦解，“冷战”随即结束。此时古巴作为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孤岛，卡斯特罗又一次在国内重新掀起学习格瓦拉著作的热潮，希望通过

格瓦拉这一符号来强调古巴社会主义的独特性，并与苏联逻辑保持距离。

在被记者博尔赫问到古巴为什么重新掀起切的著作热时，卡斯特罗回答：“在古巴，我们一直都很重视切的思想。看到社会主义阵营中发生的一切，我感到对切的敬佩之情和友情更加深厚，因为他曾明确反对使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早在60年代的头几年，切就有一些预言性的观点，他预见到了东欧用来建设社会主义的那些方法的缺点和后果。他说，没有必要采用那些资本主义的方法和哲学。”卡斯特罗努力为那一时期的格瓦拉翻案，“然而那段时间，我们开始采用苏联的经济计划和管理方法。然后，我停下来想一想，我想到了切和他的预见。”

90年代的整顿过程开始后，卡斯特罗尝试广泛传播格瓦拉的理论，与此同时，“我们看到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其他国家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他们离切的思想越来越远，开始大规模地应用资本主义体系和机制。为了完善社会主义，他们使用了越来越多的危害社会主义的毒药，这就是社会主义阵营中发生这些事的原因之一”。

当1997年7月格瓦拉的遗体在玻利维亚被发现并被运回古巴后，人们在古巴中部的圣克拉拉为他修建了陵墓，以纪念他在此地赢得革命战争中的关键一战，格瓦拉进一步成为古巴的象征。“切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直到今天，他仍然是革命者和共产主义者的榜样和典范。”当时卡斯特罗在圣克拉拉的纪念讲话中曾这样说道。

几十年来，卡斯特的生活中已经缺少格瓦拉的影响。但是，他永远不可能摆脱他朋友的形象。阿贝尔托·科尔达拍摄的那张格瓦拉的著名照片，贴在大街小巷和各个学校、单位，提醒人们他们现在的生活都是这个英雄的牺牲换来的。正如一位传记作家所说，格瓦拉一直还活着，“部分原因在于：他有菲德尔·卡斯特罗作为新闻发言人”。

直到今天，格瓦拉仍然是古巴革命的偶像。而今作为这50年来对格瓦拉唯一的阐释者，卡斯特罗也最终离去，留下古巴儿童从小就会唱的那首歌：“我们可以像他，我们应该像他。像谁？像谁？切·格瓦拉。”

（参考资料：《我有一个兄弟：卡斯特罗与切·格瓦拉的非凡友谊》，西蒙·雷德—亨利著；《20世纪最后的革命家：菲德尔·卡斯特罗传》，程映虹著；《切·格瓦拉：卡斯特的回忆》，菲德尔·卡斯特罗著）

卡斯特罗最后的书友会

主笔 鲁伊

菲德尔·卡斯特罗去世后，发自世界各地，或热情赞颂或皮里阳秋の万千唁电里，有一份格外不寻常。

写这封电报的人比卡斯特罗小10岁，父母都是意大利人，但却生在长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少年时代，他和卡斯特罗都是在耶稣会设立的学校中接受的教育。多年以后，他们还有个共同的朋友，叫马拉多纳。

这个人名叫豪尔赫·马里奥·贝戈利奥（Jorge Mario Bergoglio）。他还有个前两年新起的不那么佶屈聱牙的名字：方济各（Francis）。没错，此人就是罗马教廷第266任教皇，千年来第一位来自拉丁美洲的教皇。

作为梵蒂冈的元首，在建交国的在任政府首脑去世时发唁电，差不多已经成为固定程序。但这一次的非同寻常之处在于，首先，卡斯特罗早在2008年就已经宣布退休，现在当政的是他的弟弟劳尔，在讲究名正言顺、地位对等的国际外交界，还是颇为破例。但更重要的是，在人们通常的认知中，宗教与社会主义就算不是针尖对麦芒的敌我矛盾，那也是井水不犯河水，风马牛不相及。更何况，1961年猪湾行动后，因为有天主教神父参与了密谋推翻卡斯特罗的武装行动，古巴一度与梵蒂冈划地绝交，没收教产，国有化教会学校和医院，这梁子也结得不小。

然而，在卡斯特罗因病而深居简出的最后时光里，教皇方济各却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曾与他长时间会面并共同出现在媒体闪光灯前的国际要人。更有意思的是，发生在2015年9月20日的这次会面，至少从表面上看，更像是两个经常上豆瓣留言的书呆子的线下接头。

履行上一任教皇本笃十六世2012年访问古巴时许下的承诺——“我会给他寄几本有趣的书读读”——方济各送给卡斯特罗的见面礼，是4本书和两张CD。

当时关于这场会面的英文媒体报道中，大多数聚焦于其中一本书和两张CD的作者、耶稣会士阿曼多·略伦特神父（Father Armando Llorente）身上。这主

要是因为，他与卡斯特罗有着不解的渊源：少年卡斯特罗在寄宿制的贝兰耶稣会预科学校（Belen Jesuit Prep School）读书时，略伦特神父是他的老师和辅导员。1945年，略伦特曾在卡斯特罗的毕业纪念册上写道：“菲德尔·卡斯特罗，拥有成为英雄的潜质。他的祖国的历史将会传颂他的名字。”而在1958年12月的古巴革命中，略伦特更是乔装打扮成一名放牧人，潜入卡斯特罗率领的游击队的营地，与这位不久后就会推翻巴蒂斯塔政权、主政古巴40余年的风华正茂的革命领袖会谈。略伦特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卡斯特罗当时向他忏悔，说自己失去了对基督教的信仰。但略伦特回答说：“失去信仰是一回事，失去尊严是另外一回事。”令人遗憾的是，世易时移，风云突变，二人的师生之情于1961年画上句号：略伦特被驱逐出古巴，客居迈阿密，直至2010年4月28日以91岁高龄去世。

把一本收礼人很可能早已熟知其中大部分内容的书送给这位出了名热爱阅读、喜欢写文章、很少用人代写演讲稿的“大独裁者”，美国天主教出版物《主日访客》（*Our Sunday Visitor*）的专栏作家巴利·哈道克（Barry Hudock）因此解读为，这是一份故意要“让你不爽的礼物”（uncomfortable gifts），而2012年创办、专攻移动客户端新闻传播的《独立期刊评论》（*Independent Journal Review*）上的文章则宣称，教皇是在跟卡斯特罗当面开撕，劝他不要死到临头不悔改。这解释比稳重端庄的老牌媒体们一笔带过的陈述事实要有趣得多，但我严重怀疑，这两个作者没好好做功课。先不说这绝对不是方济各的作风，哪怕只是把一向主张宽恕和解、直到临终前都认为卡斯特罗是自己最值得骄傲的学生的略伦特的讲道集走马观花地读一下，再看看一起送出的另外三本书和卡斯特罗的回礼——剧透一下，也是一本书——就绝对不会犯这种以己度人、充分暴露文人小家子气的错误。

方济各送出的另外两本书，出自他自己之手：2013年11月24日发布的《福音的喜悦》（*Evangelii Gaudium*）和2015年5月24日发布的《愿祢受赞颂：论爱惜我们共同的家园》（*Laudato Si: On Care for our Common Home*）。在第一封教皇劝谕（Apostolic



2015年9月20日，罗马教皇方济各抵达古巴，开始为期4天的历史性访问，并探望卡斯特罗

Exhortation) 中，方济各向全世界的基督徒发出挑战，从自己做起，对垄断经济说不，对拜金主义说不，对呼风唤雨的金融系统说不，对滋生暴力的社会不平等说不。他劝勉基督徒不要在人世的苦难之前闭上双眼，并质疑现存的教会体系是否在帮助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传递福音的慈悲和喜悦上做了足够多的有实质意义的工作。第二封通谕 (Encyclical Letter) 的主题，则是生态危机和气候变化。方济各向所有生活在地球上的人建言，严肃对待为一己私欲而对地球上的水、土地、空气和生命所造成的污染与破坏，摒弃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消费文化和丢弃文化，出于爱和团结，寻求化解环境危机的可持续之道。他特意指出，经济、商业和制造业的高速发展其实对不发达国家和穷人有着最沉重的社会亏欠，因为这些处于最底层、几乎无法从发展中获益的人们连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和尊严都被否定了。如果对已经暗潮汹涌的危机继续拖延或无视，或者极端地固守某一种意识形态的解决方法和意见，世界末日则可能真的近在眼前。

至于最后一本书，几乎所有的媒体报道都语焉不详，只是给出了作者的名字——意大利神父亚历山

德罗·普龙扎托 (Alexandro Pronzato) ——以及书的主题——“幸福与灵修”。上图书馆查一下，这位1932年出生于意大利瓦尔马卡小镇的神学家写过十几本书，但被译成英文、我能看懂的，就只有一部《沙上冥思》(Meditations on the Sand)。不过看看其他几本书的标题和这本在意大利出了31版的畅销神学著作的内容，似乎还就是它能和“幸福与灵修”贴上边。在这本书里，普龙扎托用相当富有诗意的语言，追念基督教早期自愿选择远离繁华、退居沙漠隐修的沙漠教父们 (Desert Fathers) 对现代人的启示意义。他写道，人们常说隐士们厌世，但其实他们只不过是舍弃那些转瞬即逝的尘世繁华，寻求永恒的意义。而选择孤独的象征之下，是在参与和体会那些被主流社会摒弃、压迫、侮辱，因而喑哑无声的沉默大多数的境遇，并现身说法，彰显在痛苦中所能体会的喜悦，在束缚中所能感受的自由。

把这四本书放在一起，上世纪60年代起兴起于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 (Liberation Theology) 的主题呼之欲出。关于这一神学主张，半个世纪来出版的众多著作可以装满一堵墙的书架，但它最重要的

特色，却可以用拉美革命运动中的传奇人物、身为哥伦比亚天主教神父的卡米洛·托雷斯·雷斯特雷波（Camilo Torres Restrepo）的一句名言概括：

“如果耶稣活着，他也会是一名游击队员。”

那么，老游击队员卡斯特罗又是如何回应的呢？

他“以古巴人民的钦佩和尊敬之情”，回赠给教皇方济各另一本书：《卡斯特罗话宗教》（*Fidel & Religion*）。

这是本老书，首次出版于1986年，作者是巴西天主教多明戈会教士弗雷·贝托（Frei Betto）。当过新闻记者、因为反对巴西军事独裁政府坐过4年大牢的贝托是拉美解放神学的代表作家之一。1985年5月，他与卡斯特罗进行了8次长谈，在此基础上撰写了这本当年光是在古巴就卖出了100多万册的畅销书。2005年，教皇保罗二世病逝、本笃十六世即位前后，贝托将此书重新修订再版，被翻译成23种语言，在32个国家发行。英文版首页的献词里，贝托提出的一个说法相当耐人寻味：“献给拉丁美洲所有的基督徒们，他们在不为外人所了解中，却蒙受着饥渴慕义的祝福。他们正在以施洗约翰的方式，为天主在社会主义中的到来准备道路。”

生长在一个绝大多数居民信奉宗教的国家，父母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不到7岁就被送到教会寄宿学校中读书，但在成年后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自称“无神论者”，卡斯特的这段个人历史并不是什么秘密。但有趣的却是他在这本书中给出的解释：“在漫长的历史中，信仰变成了统治和压迫的工具。因此，想要改变整个不公正系统的人，自然而然地就会与宗教信条发生冲突，与那些工具和信仰发生冲突。”值得注意的是，他也表示，解放教会（Liberation Church）和解放神学可以被定义为“基督教回归自己的本源，回归到它最美丽动人、最有英雄气概、最绚烂的历史”，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因为解放神学奉行者所做的，是从那些“剥削者、征服者、压迫者、干涉者和掠夺者”手中夺取“用以迷惑、欺

骗和分裂大众，从而继续实行剥削的最重要的工具”。正因为此，贝托认为，与其说卡斯特罗是“无神论者”，倒不如说是“怀疑论者”更贴切。而1991年10月古巴共产党修改党章，允许教徒加入共产党的转变，更被许多人解释为卡斯特罗个人信仰回归的映射。但不管怎样，在方济各此前在阿根廷担任枢机主教时发表的众多传道文和就任教皇之初发布的文告中，一个中心思想，就是重新定义传福音的焦点——不在于划界限下定义扣帽子，而看到底有没有身体力行，参与拯救。

但是，卡斯特罗是拯救者吗？他统治下的古巴，曾有“穷人天堂”之称，但也存在各种为人诟病的问题。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以及苏联解体的影响，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古巴的经济状况一直面临巨大的增长压力，近两年实行的私有制改革前景如何，也存在众多未知因素。更何况，成功与失败，大英雄与落水狗，历史的言说又从来都是因时而异，因果性与相关性，纠缠不清。一个有趣的参照，或许是新约四福音书里最早成书也保存着最质朴本来面目的《马可福音》。在里面，救世主耶稣基本上以一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形象出现：行神迹没什么人看见，看见的还会被吓跑；跟随他的人经常不理解他不信任他，动不动就大惊小怪准备分行李散伙；被捕前夜，他忧伤得要死，让门徒在自己祷告的时候警醒等候，结果回头就发现睡倒了一片；被钉在十字架上，所有的看客都在辱骂嘲笑，谁都不把他当回事；没有人亲眼看见他复活，被告知消息的妇女们“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她们害怕”。

然后，在最可信的古老抄本中，就没有然后了。

然而，无论是方济各，还是卡斯特罗生平最崇敬的作家之一、解放神学的代表人物古斯塔沃·古铁雷斯·梅里诺（Gustavo Gutierrez Merino），都曾经写到过，也许正是这种看似冷冰冰的现实，是救赎的恩典总与这世界上的苦难同在的最扎实的证据。

这样想着，再细琢磨一下卡斯特罗与方济各互送的五本书——都不是什么新问世的偏门作品，对方看过或者至少知其大概的可能性远远超出前所未晓的可能性。回头看去，在那样的时间、那样的地点、那样的情形之下，简直有一种预言式的嵇康五言诗里的意境：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

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嘉彼钓叟，得鱼忘筌。

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卡斯特罗说：“在漫长的历史中，信仰变成了统治和压迫的工具。因此，想要改变整个不公正系统的人，自然而然地就会与宗教信条发生冲突，与那些工具和信仰发生冲突。”

喧嚣时代 给灵魂一个栖息之地

阅读之美



绘画 阿梗

生活周刊

每周一出版 全年52期 多样便捷的订阅方式

邮发代号:82-20 拨打11185上门收订

零售单价:15元 零售年价:780元 订阅单价:10元 订阅年价:520元,全年净省260元

读者服务电话:010-84050425/84050451 读者服务邮箱:dzfw@lifeweek.com.cn



4 岁的埃里安妮·迪亚兹和祖母合住在马坦萨斯市的一家廉价旅馆内。由于两次跌进地板上的破洞，她的眼部神经严重受损，正在缺医少药的诊所排队等待手术



逝去的卡斯特罗和那些古巴生活

文 / 刘冬花

最后连卡斯特罗本人也遗憾地说：“古巴模式对我们自己都不适用了。”



当消息最终传来的时候，那些最初来到岛上等待这一时刻的外国记者们大多已白了鬓角。他们已经登岛10年、20年，甚至30年，皮肤晒成了当地混血种人的巧克力色，每天像古巴人一样喝小杯的浓缩咖啡，加很多糖。他们在不知不觉间学会了一口带浓重古巴味的西班牙语，也在不知不觉间娶妻生子，扎根在这片土地上。

“我真死的那天没有人会相信的。”

在90岁的年纪，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逝世。如果从大学时代参与反政府示威游行算起，他已经在政治舞台上活跃了70年，而他的名字与古巴历史并排书写也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这位革命战士八十大寿那年有人送他一只乌龟作为生日礼物，寓意长寿，他却戏谑道：“送我这个干什么？你要知道，养宠物很麻烦的，好不容易养出感情来了，它却要死在你前头。唉，让人伤心啊。”

永不认输，这就是世人所知道的硬汉卡斯特罗。

1959年1月1日，当年仅33岁的卡斯特罗带领军队势如破竹般进入哈瓦那时，他并没有想过要把古巴变成社会主义国家。革命的初衷就是反对社会不公，武装夺权后整个古巴岛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3个多月后卡斯特罗出访美国，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用英语掷地有声地说：“I came for good relation, for good understanding, for good economic relations.”（我来这里是为了关系友好，为了增进理解，为了良好的经济关系。）

然而美国人却无意与这个革命斗士建立良好关系。那是“冷战”的年代，任何形式的革命都被认为是共产主义阵营来的祸水。于是卡斯特罗和肯尼迪就像两个吵架撕破脸的负气少年一样开启了古美交恶的历史。先是古巴革命后美国试图干涉其内政，紧接着卡斯特罗把在古巴的美国银行和企业收归国有。1961年1月美国宣布美古断交，3个月后卡斯特罗宣布古巴革命为社会主



左图：2014年9月，哈瓦那郊区的一位妇女在简陋的公共厨房中准备午餐

右图：2007年9月，皮诺·德阿瓜地区一所小学的数学教师正在给两名仅有的新生上课。根据《教育法》，即使每届只能招到一名学生，国家运营的公立学校也必须运转如常

义性质，第二天肯尼迪下令入侵吉隆滩，卡斯特罗则亲自驾驶坦克指挥战役，并在72小时内击退入侵的雇佣军。1962年，肯尼迪在提前购入1200支上好的古巴雪茄后，宣布对古巴实行全面禁运。

没有人想到这场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会持续半个多世纪之久，并与卡斯特罗的名字一起成为古巴的符号。与美国交恶，那就转向苏联。1960年2月，苏联副总理米高扬访问古巴，古巴与苏联签订了贸易和援助协定，苏联在此后5年里每年购买古巴糖100万吨，并向古巴提供1亿美元贷款以购买苏联设备。那时候，意气风发的古巴人民正满怀希望地建设自己的国家，苏联人的石油和贷款解了燃眉之急。革命成功仅仅几年后，这个加勒比岛国的人均寿命、识字率、医疗服务水平就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新生儿死亡率等社会发展指标更是跻身发达国家之列，甚至比美国还低，这无疑让古巴人引以为豪。在革命胜利初期的影像记录中，首都哈瓦那的街道与建筑格局已经几乎与今天一样，只有里面的人，哪怕衬着黑白的底色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精神面貌。

当人们回顾历史的时候才知道，古巴时间在那一

刻凝固了。无论是哈瓦那海滨大道上的防洪堤，抑或是25层高的自由哈瓦那酒店，还是上世纪60年代产的雪佛兰，以及卡斯特的橄榄绿军装，都将在未来的50多年保持同一个模样。

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使过度依赖经互会的古巴遭受重创，出口额骤降了80%，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那是一个被叫作“特殊时期”的年代，物质的匮乏成为萦绕在整个社会上的阴云。做比萨没有奶酪，就把避孕套煮烂，捣碎了撒在饼上；做汉堡没有牛肉，就把家里的抹布煮烂，夹在面包里；女人们学会了与外国游客搭讪，只为一顿晚餐；很多育龄妇女带着遗憾只生养了一个孩子，因为根本没有足够的食物让她们再次生养。在我听到的众多关于“特殊时期”的故事中，唯一让人泪中带笑的就是乐观的古巴人把三色彩纸撕成条贴在自家的黑白电视上，臆想看到的是彩电。只有听到这些令人匪夷所思的故事，你才能想象出逾10万人从这个岛国逃向美国的情形。他们把自己能找到的一切材料——木头、轮胎、泡沫塑料——做成筏子，与亲人挥泪作别后就冲向未知的大海。那一刻，就是生离死别，因为即使没有被海上的风浪打翻，“干脚”踏上美国土

地的一瞬间也意味着从此无法回头。

从古巴到美国的90海里成为一代古巴人心中难以愈合的伤疤。这一时期的卡斯特罗在一些领域政策开始有所松动，比如允许公民有宗教信仰，以及开放个体经济。1995年，卡斯特罗访问中国期间，特意参观了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还表示“深圳的发展成就令我震惊”。1998年他在哈瓦那迎接了到访的保罗二世教皇，并说见到他“内心喜悦”。

时至今日，古巴人均拥有医生的数量依然远高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教育全部免费，住房基本不用花钱。那些依然坚定支持革命的人大部分是革命前贫苦人家出身的孩子，如果没有卡斯特罗，他们可能永远没有机会上大学。然而平均主义抹杀了这个社会的活力，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做基础，公共产品的质量已经降低到让人无法忍受。一家几代人挤在逼仄的老房子里，没有个人空间。社区医院时有停电停水，缺医少药已司空见惯。优秀的人才都不愿意当老师，因为工资太低，他们宁可在学校给学生卖盒饭。这些人也曾经怀揣梦想，在填报高考志愿时慎重写下自己喜爱的专业，但最终的结果是有一半人将去学医或者师范，剩下的一半被分配去政府机构或国有企业需要的律师或会计等专业。免费的医疗和教育机构不仅消耗了政府一半的预算，也让很多并未立志当老师或医生的青年走上这条路。他们未来的职责除了进入古巴的学校或医院，还有可能是被派到其他国家进行服务，以便为古巴赚取外汇。因为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可出口的了，只好出口人才。那些学习了律师或会计专业的年轻人未来很可能将面对一本“剪不断理还乱”的账本。在自由市场上1美元相当于24古巴比索，而在国有企业那里1美元却相当于1古巴比索。没有人能算得清这些糊涂账，也没有古巴企业还有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最后连卡斯特罗本人也遗憾地说：“古巴模式对我们自己都不适用了。”

很多没去过古巴的人都会问我，他们的平均月工资真的只有20美元吗？当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几乎又全都毫无例外地问，那怎么活？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活。粮本上可以用国家补贴价买到的东西品种越来越少，先是非生活必需品如香烟、咖啡等从粮本里消失，后来则是土豆、豌豆。与此同时，供给的数量也大幅缩水。在有经互会的年代，国家配给的食物基本可以满足每日所需，几块钱就可以买齐全家老小的食物。而如今，一小包粮食、半斤肉、一把豆子、一大勺油就是一个月的全部供给，再有需要只能去放开价格的商店里买。在那里，他们面对的是与世界接轨甚至更高的物价，1美元只够买两瓶水或三卷卫生纸。连古巴人自己都常

常感叹，他们是怎么活的。当我们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时，常常会发现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那就是约八成古巴人的生活都有国外亲戚接济，而其中大部分来自美国。换句话说，卡斯特罗带领古巴人民坚持战斗在反美前线，而最后帮助很多人支撑下去的却是佛罗里达海峡对面寄来的美元。

这也是为什么，奥巴马竞选连任时古巴人那么关心选情，而在得知他获得连任后又有那么多家庭关起门来偷偷庆祝，因为只有他才会采取对古宽松政策，包括与众多古巴家庭息息相关的允许侨汇和古侨探亲。很多人认为奥巴马在其8年任期内的外交政策乏善可陈，但最终促成美古关系正常化成就了他总统生涯中闪亮的一笔。

2006年，卡斯特罗因肠胃出血住院接受手术，重病之后他将自己在党内和国家层面的权力全部移交给了弟弟劳尔·卡斯特罗，只保留了名义上古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这一年菲德尔80岁，劳尔75岁，距离兄弟俩并肩在马埃斯特拉山的丛林里打游击已经过去了50多年。尽管劳尔讲话一向掌握在30分钟左右，其号召力也远不如哥哥，但他依然是菲德尔最信任的人。在2008年劳尔当选国务委员会主席后，古巴以外的人们开始频繁从新闻中看到这个消息，几乎每隔几个月就会有新政出台。从个人可以购买电脑、手机，到放宽出国限制，从开放二手房买卖，到修改移民法，被加勒比的海风侵蚀了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古巴开始迈出变革的艰难步伐。

卡斯特罗从古巴的政治生活中消失后，开始更多以撰写文章的形式发声。他在《格拉玛报》的专栏每次都以个人签名结尾，落款的时间常常是深夜或凌晨。人们一直猜测这位革命斗士会反对任何形式导致贫富不均的经济改革，关于菲德尔和劳尔不合的传言也没有断过。作为回应，卡斯特罗在自己的报纸专栏中曾多次提到“劳尔干得很好”，但他从未对具体的改革措施做过评论。从他的文章里，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关心环境变化和粮食危机的老人，他的思考常常触及人类的未来，却鲜见对古巴社会民生谈及一二。

对于他死后遗体的处理，人们也曾做过多重猜测，安放在位于圣地亚哥的何塞·马蒂墓地是一个可能。那里毗邻他的家乡，也是其革命生涯的起点。已经葬在那里的就包括弟弟劳尔的妻子比玛玛，而她灵柩的隔壁就是劳尔给自己预留的空棺木。来这里参观的人可以看到墙壁上并排刻着两人的名字，让人想起这对伉俪曾经一身戎装征战南北的峥嵘岁月，不禁唏嘘。与劳尔早就公开示人要与妻子合葬的风格不同，菲德尔从未明确表

示过自己的遗愿。当弟弟亲自宣布哥哥去世的消息时，人们才知道，这位战斗了一生的勇士生前意愿是火化。卡斯特罗一生不喜欢个人崇拜，古巴的公共场所张贴着他各个时期的大幅照片，却看不到以他为原型的雕塑、画像。无论外界如何评说，他自己都更愿意以一名革命者的身份被人们记住。

尽管很多中国友人给卡斯特罗送来的带他头像的工艺品被束之高阁，但他对中国美食却情有独钟。中国驻古巴使馆的工作人员都知道，总司令爱吃松花蛋，爱喝桂花陈酿。作为回报，他常常派人给中国使馆送来辣木，据说富含多种矿物质、维生素，营养价值极高，人们也猜测这是他长寿的秘诀之一。卡斯特罗领导下的古巴与中国有着特别的缘分。革命胜利不久的1960年9月2日，在哈瓦那革命广场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卡斯特罗在演讲中突然向在场群众大声询问：“古巴人民是否愿意古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现场近百万民众齐声答“是”。26天后，中古双方发表建交公报，确认建交。古巴成为西半球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

那是毛泽东的时代，是尼赫鲁的时代，也是卡斯特的时代。如今，同时代的伟人都早已离去，只剩大胡子一人孤独的背影。

从十几年前起，卡斯特罗每一次在公开场合的摔跤、晕倒就已经成为外国媒体争相报道的谈资。尤其是在无数次暗杀计划中失败的美国人，他们不厌其烦地播放卡斯特罗跌倒的视频，试图从中找出这位老人已患帕金森或老年痴呆的证据。如果他在报纸上的专栏久未更新，就会有人怀疑他已经失去意识；如果在他的近照里看不到任何有信息的参照物，就会有人怀疑图片作假；如果有好几个月在电视和广播里听不到他说话，就会有人怀疑他已经失声。于是，记者和卡斯特罗之间的猫鼠游戏上演得越来越默契。每一次关于卡斯特罗病重或去世的传闻一出现，《格拉玛报》就会公开一些卡斯特的照片，照片中的总司令不是在看近日新闻就是手持近日报纸。电视台则会适时播放他参加某活动的视频报道，让人们能够看到他、听到他。这些或动或静的影像并没有提供什么新的内容，但每次都能成功驱散流言，因为没有坏消息就是好消息。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去世之后，人们从古巴电视台的新闻中再次看到卡斯特罗。一向目光坚毅、腰身挺拔的菲德尔在特写镜头里竟眼眶湿润。那一刻，人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奋斗一生的反美战士，而是一个因故友离去黯然神伤的老人，令人唏嘘。

几年前我曾经问一位古巴记者，这个国家的未来在哪里。他没有提古巴，倒是先问我中国是怎么开始改

革开放的，我刚回答那是在1978年，他就打断我说：“对，1978年，在那一年你们改革开放了，我们需要等待的也是一个生物解决方案（una solución biológica）。”其实，所谓的“生物解决方案”并不会解决任何问题，它只是让一个时间点变成了历史书里的分页符。在太长的日子里，人们习惯了有卡斯特的古巴，而当我们审视今天的古巴才会发现，他的影响力已经更多留在了过去，他的精神更多留在了那些斑驳的宣传画上。自21世纪以来，古巴是世界上少数还在喊革命口号的国家，在群众集会上你偶尔还可以感受到革命热情的余温，但从每一张鲜活的脸上已经感受不到这些口号带来的力量。

年轻一代其实对革命无爱亦无恨，他们只知道向前看。像任何其他地方的同龄人一样，他们为手指一滑就可以打开的智能手机疯狂，即便这需要千辛万苦托朋友或亲戚从国外捎来，然后再花上几美元一小时的上网费去浏览一个页面。也许这个岛国暂时落后于时代，但早就知道“爸爸”会离开的年轻人们已经做好了独自闯荡的准备。一旦他们与世界联通的那扇门打开，积累多年的能量就会自然流动起来。

对于这一点，古巴人自己有着清醒的意识。2013年，劳尔·卡斯特罗连任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并宣布届满5年后将不再连任。同一天，52岁的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当选古巴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各级领导层也加紧了新老交替的步伐。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古巴老百姓说话时以“V”形手势避免直呼二号人物劳尔的名字，如今，迪亚斯·卡内尔成为真正让外界期待的二号人物。这位革命胜利后出生的政坛新星开始频繁在国内媒体上露面，并代表国家出席一些重要的外交场合。在开国元勋还占大半的政治局委员中，迪亚斯·卡内尔的出现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尽管他为人低调，做事谨慎，似乎缺乏菲德尔·卡斯特罗那样的领袖魅力，但在地方政府的工作经历给他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外界猜测他在地方经济发展上的政绩是赢得劳尔信任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这也反映出劳尔政府对古巴未来发展的期望。可以想见，任何一个后卡斯特罗时代的接班人都可能被评价为个人魅力不足，而这已经不重要，毕竟，这已经不是一个靠个人魅力管理国家的时代。

“人们为了生存而斗争，我却为了斗争而生存。”那个曾经不安分的青年为自己的革命理想至死不渝，而人们最终看到的不是战士在枪林弹雨中英勇就义，而是一部20世纪的历史悄然画上句号。■

（作者是2010至2014年央视西班牙语频道驻古巴哈瓦那记者）

菲德尔·卡斯特罗谢幕，古巴将向何处去

记者 付晓英

“卡斯特罗兄弟时代”即将谢幕，而古巴将继续前行。

菲德尔·卡斯特罗于当地时间25日22时29分逝世，享年90岁，而只比他小5岁的劳尔·卡斯特罗也曾明确表示自己将在2018年卸去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职务，“卡斯特罗兄弟时代”即将谢幕，古巴将何去何从？我们采访了中国社科院拉美所研究员袁东振以及拉美所古巴研究中心执行研究员范蕾，对古巴的政局、经济改革以及古美关系等问题进行相关讨论。

权力交接与制度建设

三联生活周刊：卡斯特罗兄弟执掌了半个多世纪的古巴政权，如今菲德尔·卡斯特罗已经去世，劳尔·卡斯特罗也曾明确表示自己将在2018年卸去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职务，现在的老一辈革命领袖迟早会退出政治和历史舞台。对于不可避免的领导人更迭，你认为古巴准备好了吗？

范蕾：以前古巴的领导层基本都是跟随菲德尔·卡斯特罗干革命的老一代，年龄都比较高，他们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也会在制度建设上进行一些准备。今年4月召开的古巴七大也针对古巴领导层建设做出了专门的规定。在七大上，劳尔·卡斯特罗再次当选古共中央第一书记。与此同时，一批新面孔也进入古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劳尔·卡斯特罗在讲话中明确指出，随着古巴革命元勋逐渐老去，古共七大将是“历史性一代领导的最后一次古共全国代表大会”，“古巴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旗帜将交到年轻一代的手中”。他重申自己将在2018年卸去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职务，届时将由年轻一代来领导古巴的社会主义革命。

为了加快推动领导层的年轻化，劳尔·卡斯特罗在古共七大上为进入古共领导层的新人划了一条“年龄线”：进入中央委员会的新人年龄不能超过60岁，进入政治局的新人年龄不能超过70岁。在本届大会

上，55名中央委员会新增成员年龄都在60岁以下，古共中央委员会的人数增加到142人，平均年龄下降到54.5岁。古共中央政治局的成员从“六大”的15人增加到17人。从本届大会选举产生古共新一届领导层，到2018年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选举新一届国务委员会成员，古巴将在今后两年逐步完成最高领导层的平稳交接和过渡，呈现“新老结合、以老带新、平稳交班”的政治格局，而且这个思路会贯彻下去。古巴政治权力正通过渐进的、有序的方式向年轻一代移交。

三联生活周刊：卡斯特罗兄弟是古巴的政治强人，也是权威的代表，过去半个多世纪，古巴一直处在政治强人的执政模式之下，但是新一代的继任者在个人魅力和威信上，恐怕永远无法与卡斯特罗兄弟相比。魅力型领袖一旦离去，古巴原有的道路模式以及改革还能持续下去吗？

袁东振：维持一个国家体制的正常运转，领导人的个人威信和魅力有时候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一旦魅力型的领袖不在，还是要依靠健全的体制机制。制度设计好了，不管谁来执政，都要受到各方面的制约，在制度的框架内行事，而不能超越制度设计自行其是。

过去，古巴领导人的威信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了很大作用，通常是少数人的决策成为国家意志，将来老一辈的领袖不再，势必要更多依靠制度设计。在这方面，古巴的制度现在基本上已经成型了，比如规定领导人任期不能超过两届，地方人民政权代表机构的作用也在强化，更加强调集体领导和决策的科学。最近10年，古巴也针对老一辈领导层退休进行一系列体制设计，现在领导层框架已经显示出来了，老一辈领导层对将来古巴的发展方向也已经做出了一些妥善安排，比如古巴的经济改革已经形成共识，包括在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上也已经做出了相关引领，即使劳尔·卡斯特罗退休，这些政策应该也会持续下去。

范蕾：关于古巴将来的领导核心，外界普遍认为古巴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贝穆德斯可能会成为劳尔的接班人，另外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古巴的外交部部长，还有一个是经济和



11月26日夜间，一名身披国旗、手持蜡烛的女大学生在哈瓦那大学校园内为前一天过世的卡斯特罗守灵

规划部部长，这三个人相对比较年轻，也支持带有古巴特色的经济改革。

古巴共产党和政府已经在贯彻领导梯队建设理念，逐步展开领导干部新老交替进程，各级人民政府代表机构和代表制度运转正常。

古巴改革也将在古巴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深化，今年古共七大讨论通过了《古巴社会主义发展的经济及社会模式的概念化草案》这样一份核心文件，明确了古巴发展模式的战略目标是推动和加强建设在经济、社会、环境等领域繁荣而可持续的社会主义社会，同时要在主权、独立、民主、繁荣、可持续的社会主义国家巩固革命所塑造的道德、文化和政治价值观。

当然，随着改革深入，政治风险也将逐步提升。2018年国家领导人的继任人选、政权能否顺利交接存在一定不确定性；而一旦1959年古巴的老一代革命者完全退出领导层，社会冲突和挑战领导权力的风险都会大大增加；改革要求更大力度的制度机构调整，建立更加有效的生产结构和收入分配模式，古共六大提到货币体制和凭本供应等敏感问题，很可能触动本来就不

能满足居民基本生活需求的社会福利体系，带来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不过目前的货币体制和凭本供应等敏感问题的改革还尚未开始，同时古巴的国内外环境也在改善，这些都会降低政治风险的可能性，古巴共产党和政府的权力稳固，政局应该不会出现剧烈动荡。

改革的进程

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劳尔·卡斯特罗正式上台，他是积极的改革者，认为古巴“要么改革，要么沉没”，之后推出很多改革的措施，比如逐步放松对个体和私人经济的控制等，而在此之前，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公开表示绝不放弃计划经济。对于古巴的改革，应该怎么来理解？

袁东振：很多人将劳尔·卡斯特的改革看作“突然的改革”，这是不准确的。古巴的改革并不是新鲜事，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了改革进程，只是这一进程非常曲折，经常出现反复，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间歇性。但总体来看，古巴现在的改革是过去改革进

程的有逻辑的延续。

20世纪80年代初，古巴曾对经济政策做出重要调整，推出的措施包括：重用专业技术人才，增加用于消费和服务的投资；放宽经济政策，在各市、镇开设农民自由市场，允许农民在完成交售任务后出售自己的剩余产品；在哈瓦那开设艺术品自由市场；改革工资制度，减少一些免费的福利项目等。1982年2月，古巴就颁布《古巴和外国合资法》，规定合资企业中的外资比例最多可占49%。但是改革很快就中止了。因为在改革初期，古巴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政治思想工作减弱、党的领导作用淡化、贫富不均等，机关干部和企业职工贪污受贿等不法活动也日益增多。菲德尔·卡斯特罗认为，改革已偏离正确道路，产生了资本主义倾向，于是从1986年起开始所谓的“纠偏运动”，提出加强党的领导、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关闭自由市场、限制个体经济发展等。

80年代末，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古巴“遭到政治、军事、经济的三重打击”，美国和西方国家一度认为古巴社会主义走到了尽头。但是1990年9月，古巴宣布进入“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提出“拯救社会主义”的口号，把维持社会主义的生存作为首要任务。1991年10月，古巴共产党明确提出对外开放政策，并从1992年起实施，措施包括放宽对外资的限制，将合资企业确定为一种经济所有制形式，宣布将所有生产部门向外资开放；宣布私人持有美元合法化；将国营农场或企业转变为合作社性质的“基层组织”，这些组织拥有生产、经营和核算的自主权；取消国家的外贸垄断权，扩大企业自主权，扩大个体经济等。1995年9月新的《外国投资法》还规定，除防务、卫生保健和教育外，所有经济部门都向外资开放，外国可以在古巴购买房地产，也可以在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进行投资等。古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在改革进程中也出现收入分配差距加大、卖淫、腐败、盗窃等现象。2003年下半年起，菲德尔·卡斯特罗多次发表讲话，批评经济改革造成很多扭曲和失误，产生了很多与革命原则不相容的现象。古巴政府就此扭转了经济改革走向，收回一些被认为比较激进的政策措施，改革再次陷于停滞。

2008年劳尔·卡斯特罗上台，古巴顺利实现了最高权力交接。他上台后逐渐放松一些限制，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陆续推出一些新的改革措施。比如，古巴人可以自由选购一些家用电器，可以购买手机、可以用手机打国际长途等。但是古巴的收入水平很低，

这些措施的象征性意义更大。当然，古巴政府也在推进一些实质性改革，涉及“社会主义模式革新”的问题，比如，允许农民承包闲置土地，以增加农业生产，减少粮食进口；推进改革工资制度，试图按工作状况和贡献确定工资额；实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改变国家包揽一切的做法等。在政治领域实行权力下放，给地方更多的决策权和自主权等。

总体来看，古巴的改革是稳步渐进式的，他们对改革有自己独特的认识，很多改革措施是困难时期被迫的调整或开放，是暂时的“让步”，目的是解决和应对困难。正因为如此，一旦困难过去，政策就会出现反复。古巴改革延续至今，其实并没有太多超越体制的内容。古巴领导人认为，“系统的、稳健的调整与修正是必要的，但绝不能操之过急”，任何改革都不能危及古巴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危及共产党的领导，不能违背社会公正的原则，这是不能超越的底线。未来随着新一代领导层的出现，古巴经济和社会制度可能会出现某些松动，但短期内不会超越卡斯特罗划定的底线。只要国际环境不发生根本改变，古巴应该就不会发生颠覆性的剧烈改革和全面开放，而是会继续沿着稳健和渐进的路径前行。

范蕾：对于国家的改革，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存在一些观念上的差异，菲德尔更倾向于革命浪漫主义，而劳尔的思想更灵活务实。他们所处的时代也在发生变化，时代要求古巴继续向前，古巴需要推进改革使国家更开放、多元，争取更多资金和技术支持。

三联生活周刊：这一轮改革给古巴带来了哪些变化？古巴目前的经济状况如何？

范蕾：促进经济强劲增长一直是古巴经济改革的核心目标。2014年，古巴的经济增长率仅为1%。2015年，在内外利好因素驱动下，古巴经济表现持续好转，全年GDP增长率达到4%，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居前列。2016年，古巴经济仍保持增长，但增速放缓，建筑业、旅游业、能源业成为招商引资谋求发展的优先领域。随着新航班的开通和旅游业投资的活跃，古巴旅游业增长迅速，古巴政府还计划新增和改造酒店，满足游客需要。根据古巴国家统计局11月中旬公布的数据，2016年上半年，古巴旅游收入超过12亿美元，同比增长15%。

但是，古巴现在所处的改革阶段还是比较初级的。它的物资很短缺，市场供应不足，仍然实行配给制，需要凭票购买；古巴的个体经济比较多的是开餐馆、

在街头卖点小商品等小本生意。因为美国的封锁禁运，进口只能绕道第三国，古巴的药品绝大多数需要从国外进口，因为运输周期长、成本高以及资金缺乏，经常出现药品短缺，国内民众也会因此恐慌不安。

古巴的经济改革也面临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比如：古巴的经济结构相对单一，古巴的三大经济支柱旅游产业、医疗输出和镍矿出口都容易受到外部因素影响；技术和基础设施仍比较落后，投资者观望心理明显。目前古巴仍实行货币双轨制，政府机构采用10古巴比索：1可兑换比索的可调整汇率；非国有部门则采用24古巴比索：1可兑换比索的“非官方”汇率；古巴政府早在2013年就公布了币制统一时间表，但一直未能付诸实施，而为了规避风险，币制改革仍然会谨慎而缓慢地推行。外部因素也可能对古巴的经济改革产生较大影响，比如，古巴严重依赖外部能源供应，石油一半所需由委内瑞拉以优惠价格提供，而去年12月，委内瑞拉反对党联盟赢得议会选举，随即宣布将重新审议现任政府的石油外交政策，古巴有可能会失去委内瑞拉的优惠石油供应。

古美关系的进展与变局

三联生活周刊：菲德尔·卡斯特罗更像是一名坚定反美的斗士，但是2014年底，美国和古巴两国元首宣布恢复中断了53年的外交关系，两国关系出现历史性转折。今年3月，奥巴马访问古巴，备受瞩目。菲德尔似乎也对古美关系的缓和乐见其成，对此应该怎么理解？两国关系的实质是否发生变化？

范蕾：奥巴马是自1928年柯立芝总统以来首位访问古巴的美国总统，因此被视为两国双边关系发展史上的里程碑。美国对古巴政策的失败、美国调整拉美政策的需要、古巴开启“更新”进程以及奥巴马在最后一任期的政策选择等都是两国关系缓和的原因。

两国关系缓和之后，美国在一些方面做出了松动，比如通邮、通航，恢复商业航班，美国公民可以以教育活动目的、以个人身份前往古巴等，直接影响是古巴的游客数量增加，对经济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这些制裁措施的松动远远没有满足古巴方面的愿望，他们的官方声明和媒体言论认为美国的封锁禁运政策严重影响了古巴经济社会的发展，现有的松动措施实际上效果不大。而我们作为外部观察者，也确实认为美国的措施并不能产生实质性影响。

因此，虽然美古关系已取得若干积极进展，但实

现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依然会漫长而曲折。

古巴的目标是解除封锁，而美国的目标是通过接近、接触使古巴改革走上民主化改革和自由市场经济的道路。美国始终掌握着美古关系发展的主动权，对古政策改变的仅仅是手段而非目标。两国在人权、移民政策、关塔那摩军事基地等很多问题上都存在巨大的分歧，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

奥巴马访问古巴的时候发表演说称：“美国既没有能力，也没有企图操纵古巴发生变化，古巴的变化取决于古巴人民。我们不会强加我们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因为我们知道，每个国家，每个国家的人民都应当决定自己的命运。”“古巴正在发生演变、代际变化。古巴青年人必须建立起新的东西，古巴的未来在古巴人民手中。”对于这些言论，古巴也是很警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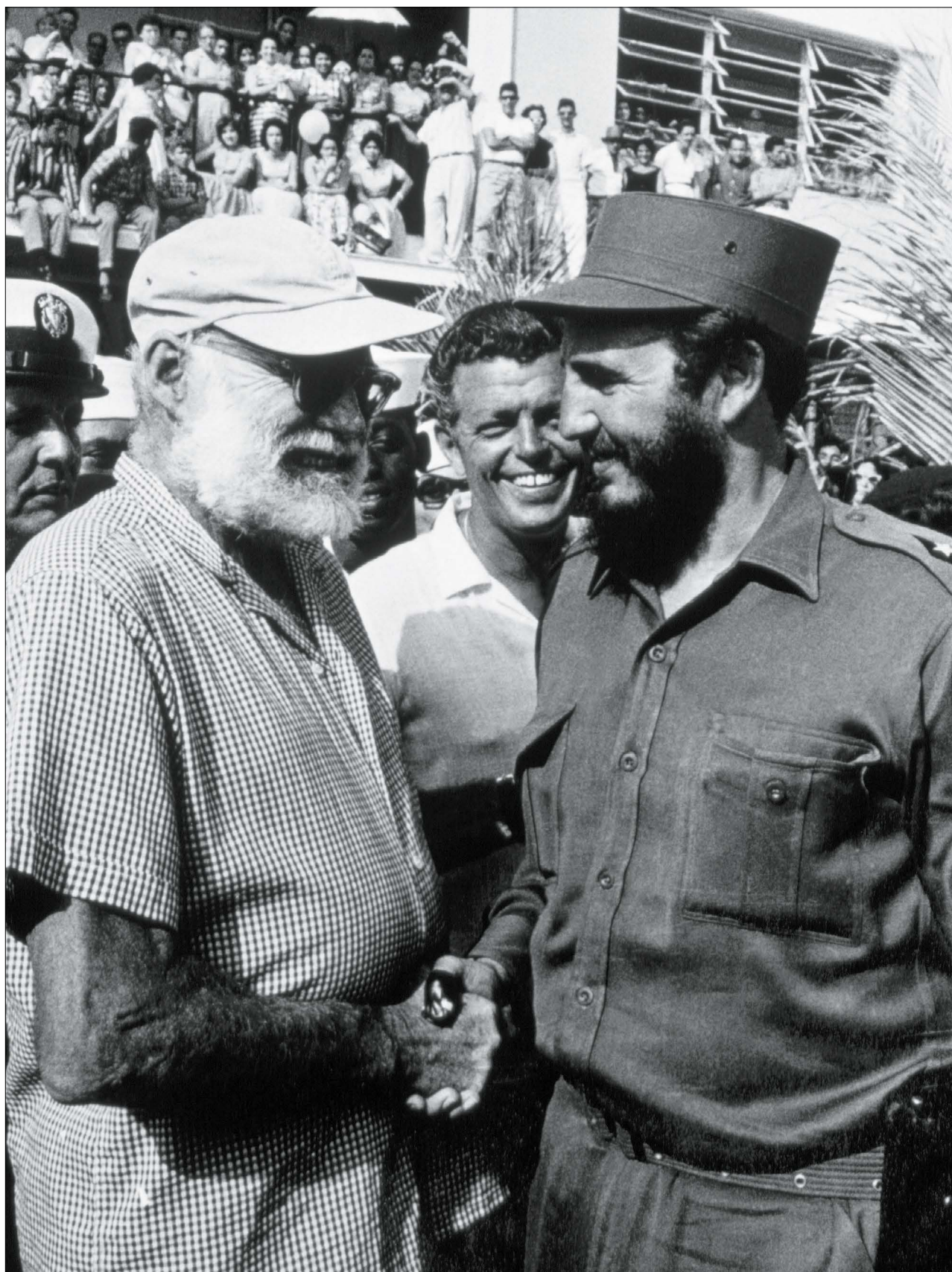
古巴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格拉玛报》一直在强调保持社会主义的方向、要加强意识形态的建设、在青年一代中保持革命的精神和传统等。菲德尔·卡斯特罗本人更是如此，奥巴马访问古巴后，他立刻发表评论，大意是美国颠覆古巴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没有变，只不过转换了方式来渗透等。

现在，古巴仍然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卡内尔曾公开指出，社会网络上的意识形态斗争主要靠年轻人，青少年一代是国家的未来之所系，必须加强对他们的培养和教育，重视有关古巴历史和拉美地区历史的教学，让他们获得坚持斗争和责任心的不竭精神源泉。而从2016年1月开始，古巴还在校园启动“菲德尔在我们中间”活动，旨在为青少年树立革命领袖形象，发扬传统革命精神。从6月至9月，古共青盟还广泛组织七大文件的讨论，让青年和学生提出修改或扩编建议等，明确社会主义方向，加强意识形态教育。

三联生活周刊：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与古巴的关系可能会发生哪些变化？

范蕾：奥巴马执政期间曾经几次提出解除对古巴的封锁，但是都被驳回，共和党认为奥巴马的步子迈得太大。共和党执政后，美国和古巴的关系可能不会出现很大的推进，有可能在现有的层次上停滞不前。

袁东振：特朗普在竞选中就公开表明反对奥巴马和民主党的政策，他上台确实会对古美关系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但美古两国关系改善的大门已经打开，在关系正常化中可能会有一些波折，但是不太可能重新关闭。至于会发生哪些具体变化，还要继续观望。■



菲德尔·卡斯特罗和海明威在古巴

海明威，古巴，以及卡斯特罗

记者 张月寒

这片神奇的土地以及作家、革命者、湾流和代基里酒的故事。

1959年有一张著名的两个大胡子握手的照片，如今在古巴也是除切·格瓦拉之外挂墙率较高的一张照片。照片里，一个大胡子须发花白、戴着太阳眼镜；另一个青年大胡子则身着军装，浑身上下散发出一种浓烈的英武之气。后面一群笑逐颜开的群众，热烈注视着他们俩。

他们分别是欧内斯特·海明威和菲德尔·卡斯特罗。一对不约而同称自己是“普通的古巴人”（CubanoSate）的历史人物。这张照片是在海明威举办的一次捕鱼比赛上拍摄的。当时海明威邀请卡斯特罗前来，卡斯特罗还钓到一条大金枪鱼，荣获一等奖。

那时，卡斯特罗春风得意，是刚刚解放祖国的年轻英雄，整个世界都知道了他；而海明威则相对处于自己的低谷期，大量酗酒，得了忧郁症，正一天一天逼近自己定下的死亡日期。此后仅两年，作家就用猎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2013年，海明威的孙女在圣丹斯电影节首发一部纪录片，追溯海明威家族的精神疾病史，指出，家族谱系中目前已有7人死于自杀。

海明威去世后，古巴在卡斯特罗号召下将海明威的居所“瞭望山庄”（Finca Vigia）建成博物馆。开放日这天，卡斯特罗发表了一场有关于海明威的即兴演讲。演讲中他对海明威作品的细节性熟悉，使人惊讶。而另一方面，这似乎也让世界读者第一次发现，海明威对卡斯特罗甚至间接于古巴历史上某些重大事件的走向，竟然有着这样一种影响。同样，古巴，这个位于加勒比海的最大岛屿，高温多雨的气候、洋流丰富的捕鱼条件，也毋庸置疑对海明威的人生乃至作品，产生极大的塑造型作用。

在这次演讲中，卡斯特罗尤其强调了《丧钟为谁而鸣》对他“一生的重大影响”。

“我想起《丧钟为谁而鸣》整个故事情节发展的起点。一队尚未抵达前线的巡逻骑兵，逼近正在战斗的区域；一名持有机枪的士兵从远处注视着那队骑兵。……

我一直记得海明威对敌人阵线后面所发生的事情的描述。这是一本叫人醒悟的书，我从未忘记过那本书。”卡斯特罗说。

《丧钟为谁而鸣》用文学形式反映了1936年初到1939年春的西班牙内战，是海明威于哈瓦那郊区“瞭望山庄”开始创作的小说。他用细致入微的动作描写和丰富多彩的对白讲述了一场紧凑非凡的战争故事。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主人公的形象非常丰富。这位美国蒙大拿大学西班牙语系的青年讲师，痛恨法西斯，对西班牙人怀有强烈的感情。1936年夏，他向校方请假，并言“反对所有暴政，为你所信仰的一切，为你理想的新世界而斗争”，于是奔赴西班牙，投入马德里保卫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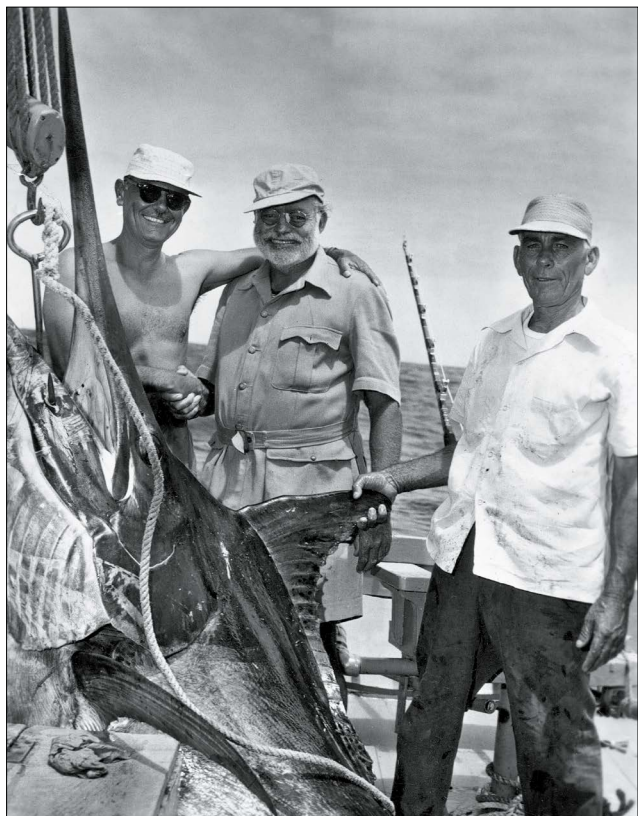
今天，再纵观《丧钟为谁而鸣》，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初激昂的革命者会喜欢它。小说中探讨的个人幸福与人类命运的问题尤其深刻——人们的命运息息相关，每个人都与人类难解难分。

卡斯特罗本人对于词语的热爱也一直是一件众所周知的轶事。在革命初期，凯旋进入哈瓦那没有几天，他曾在电视上连续演说了7个小时。而在那场著名的审判中，26岁的卡斯特罗以律师身份担任了自己的辩护律师，他的辩护词《历史将宣判我无罪》本身就是一部激情洋溢的文本。

那么，古巴这个国度，究竟有什么神奇之处，使海明威一而再再而三选择回到这里，并最终于此定居呢？

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以西一个非常典型的中产阶级小镇，海明威骨子里却向往的是那种大海的狂暴。他11岁时去波士顿第一次看见海就激动不已写下自己的第一篇小说。从此，鱼群、洋流、各种钓具……在他作品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篇幅。

1932年夏天，海明威33岁时，第二次来到古巴。在这里，原本两个星期的钓鱼之旅发展成长达两个月的惊脸奇遇。而之后，在他作品中我们熟悉的那种对于海水的痴缠、与风浪的搏斗，特别是《老人与海》关于钓绳、拖钩、鱼叉和“卷在桅杆上的帆布”这一系列对于钓鱼器具极度细致的描写，都几乎发端于这两个月酣畅淋漓的钓鱼之旅乃至今后他所追随一生的对于出海捕鱼的痴迷。那两个月里，海明威在“阿妮塔号”上钓鱼，



1. 海明威与他的最后一任妻子玛丽在古巴（摄于1948年）
2. 1956年，作为编剧的海明威（中）在《老人与海》的拍摄现场
3. 位于古巴首都哈瓦那的海明威故居博物馆内景

望着船上的古巴人“怎样用装有倒刺的尖状物插进肉的肋腹”，以及怎样用“鱼钩戳进鱼饵的口中并穿出鱼饵嘴巴”。

这期间他也经常流连古巴多诺万饭店的酒吧间。一个肮脏逼仄的小地方，离码头不远。有水手、捕鱼人和烟花女子。这让人推想《老人与海》中“聊洋流，聊自己能把渔线送进大海多深”是不是也来源于他经常厮混这些渔港小酒吧的经历。

1933年，海明威夫妇（当时他的妻子是波琳）在哈瓦那的“两个世界”旅馆住了一段时间，在这里，海明威与有夫之妇简·曼森发生外遇。这段经历也部分见于《富人与穷人》《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

一日，与简在旅馆里幽会过后，第二日，海明威又乘上“阿妮塔号”船外出捕鱼。而简则带领海明威

和自己的孩子开车去拜访住在米拉格拉斯山庄的一位朋友。谁知，就是在这次拜访途中，简和孩子们发生了车祸，还被1933年5月24日的《哈瓦那邮报》报道。所幸没有严重伤亡。这桩险些发生的悲剧和1947年另一桩汽车车祸，构成他《激流中的岛屿》里记叙的篇章。

当时，他和简非常喜欢去一家小佛罗里达餐馆，喝餐馆里独创的双料代基里酒。这段时光开心部分虽然很多，但身处这种不伦关系中海明威所体会的矛盾、不安、内疚又竭力自我安慰的复杂情绪，在《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中可窥知一二：

现在是午餐时间，他们都坐在餐厅帐篷绿色的门帘下，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

看来昨晚她进去的时候把他给吵醒了，威尔逊心想。他那双不动声色的、冷漠的眼睛打量着他们俩。真是的，他干吗不让自己老婆待在她该待的地方？他当



3

我是什么人？我又不是柳下惠。他该让她待在该待的地方，都怪他自己。

与现实中的简相似，小说中弗朗西斯的妻子，也是某护肤香脂公司的一名代言模特。这段私通最终因为简另外结识了一个年轻巨富而结束。海明威也顺便在《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表达了自己的嫉妒和不满。

1939年，刚亲历西班牙战场的海明威，返回古巴，开始伏案写作一本有关西班牙内战的新书，就是我们后来知道的《丧钟为谁而鸣》。他那时已经邂逅了一个叫玛莎·盖尔霍恩的女子。玛莎·盖尔霍恩是一名颇有追求的战地记者，海明威就是和她一起去的西班牙，虽然当时，他还处于已婚状态。回到古巴后，海明威继续和玛莎在哈瓦那相聚，在“两个世界”旅馆住下。这时，玛莎想更长期地待在古巴，于是他们开始寻找一处可以作为长期居所的地方。一天中午，在朋友介绍下，他们去看了一处很是偏远僻静、当时还属于多恩家族的宅邸。一处“远景一览无余的农庄”，年久失修，有破落之感。玛莎一眼就爱上了这座宅子，海明威

当时却觉得它过于破旧了，并且“离哈瓦那那么远——离湾流也很远”。

之后，在海明威又一次的出海捕鱼中，玛莎雇人整修了这个宅子。海明威回来，看见大为改观的宅邸后欣喜非凡，于是，他们立即决定搬进去。

这就是后世所熟知的，也是如今被改成海明威故居博物馆的“瞭望山庄”。作家在当时给编辑的一封信中表达了对这座房子的喜爱：

亲爱的马克斯：……在这里的乡间，户外天气晴朗，这地方有许多鹌鹑和不少野鸽。帕特里克和格雷戈里（海明威的儿子们）都在这边度假，他们玩得很痛快。

这段时间，海明威也最终与前一任妻子波琳离婚，正式迎娶玛莎。

事实上，玛莎由于自己本身的追求，当时的确怂恿了海明威与自己进行了很多战地报道。这某种程度上启发或影响了海明威的写作，另一方面，也终究为他们分道扬镳埋下隐痕。

那段时间，在去中国及附近战场报道回来后，海明威和玛莎继续在瞭望山庄创作自己的长篇作品。然

而，通过这次战地采访，海明威开始感到玛莎心中最高的追求还是当一名战地记者而不是一个作家之妻。不过，这段时间，在瞭望山庄，海明威还是享受了一段比较稳定的家庭相处期，这让他感觉幸福。其间对于亲子关系的感受，也融入他当时的作品。这也是他为什么如此喜欢古巴夏天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兴冲冲为山庄雇了一个厨师、一个女仆、一个花匠和司机，竭力维持这种稳定的家庭生活。可是，当夏天结束，孩子们都离开，海明威又进入一种全然的隐居生活，感到寂寞。于是接下来的日子，他又一头扎入有关潜水艇的研究。

事实上，海明威这个于“二战”期间开始的对潜水艇的研究，卡斯特罗后来也颇为关切。

“你们不要以为试图逮住潜水艇不过是小说里的事（《激流中的岛屿》），”卡斯特罗说，“任何熟知这位作家的心理、经历和人生的人都知道，他写的并非虚构之事。”

也许，记者出身的海明威使得他创作本身就一直在优美的“虚构和非虚构”之间徘徊。而他本人坚持参战、身体力行报道的这种模式，对后世新闻学也影响颇远。

可是，研究潜水艇期间，就在海明威兴致勃勃地和一群海上伙计每日来家开会、再纵身于海洋时，他和玛莎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大。玛莎讨厌他搜寻潜水艇的行为，认为那不是真正的“战争”，不过是一伙人以那个名义又去海上钓鱼。而她自己，则一心想要追求战地记者的伟大事业。最终她说服海明威一起和她去欧洲战场报道。谁知，这一次战场之行使海明威又开始了另一段婚姻，也是他的最后一段。

海明威在欧洲认识了玛丽·威尔希，认识她没多久后就向她求婚，虽然当时两人都分别和他人结婚。最终，他们一起回到瞭望山庄。

和上一任妻子因出海打鱼而产生分歧，玛丽·威尔希却喜欢捕鱼，也是颇让海明威觉得高兴的一点。威尔希第一次出海就捕到一条白色的金枪鱼，还要求拥有一条自己的小渔船。1946年3月14日，他们于哈瓦那结婚。不过，古巴婚约上也规定，他们一旦分手，所有东西将物归原主。礼毕，海明威带玛丽去佛罗里达餐馆——重叠了他太多回忆的地方——享用甜醇的美酒。

1936年4月号的《老爷》杂志，海明威发表了题为《在蓝色的水面上：湾流通讯》，记述了年迈的古巴人和尖嘴鱼的一些故事。而这篇通讯里古巴老人在海上虽捕了一条大鱼但最终却只带回一副鱼骨，以及鲨鱼围绕着船而不肯离去的场景，也显而易见地发展为后来的《老人与海》。

“要是有人问我，我最喜欢他作品的什么地方，我一定会说是他的独白。差不多在他所有作品里都能找到。不过最集中、最为出色的是《老人与海》里有关主人公的小段叙述。他孤独一人在海上，自言自语，沉思冥想，反省生命、梦想、奋斗——苦苦努力达到终点，得到的不过是他捕捉到大鱼的一具尸体。”卡斯特罗这样评价《老人与海》。

这部作品，确实是海明威一部极具震撼力的作品，为他赢得了普利策奖、诺贝尔奖。而当海明威把《老人与海》的手稿给最后一任妻子玛丽看过以后，她说：“欧内斯特，我原谅你过往做过的所有错事；也原谅你在今后生活中仍可能做错的事。”

《老人与海》是海明威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在这之后，瞭望山庄就成了他的城堡——那里有他的9000本藏书。除了钓鱼或打猎，他从此以后也很少出门。而这段时期直至他去世前，古巴由于被美国封锁而导致发展异常缓慢。海明威60年代时发现自己的手机型号仍是50年代的；古巴的街道、建筑，也几乎和10年前没有任何变化。

当卡斯特罗于古巴掌权后，海明威对于他的态度凸显了作家的聪明。他既没有公开同意过卡斯特罗，也非常注意不引起对方的反感，并颁发给他一个无关痛痒的钓鱼一等奖。

事实上，最终促使海明威离开古巴的并不是革命，而是他自身不稳定的精神状况。那时，一切已经积聚到一种非常严重的程度，最终发展为后来那声枪响。

纵观作家这一生，他在古巴大约度过了三分之一的时光。在他于意大利为《假日》杂志写的一篇稿《蓝色的大河》，海明威用深深的笔触解答了自己为什么那么喜欢古巴：

在夏天最炎热的日子里，清晨去俯瞰哈瓦那的群山，那里每天早晨总是凉快舒适，空气新鲜。不用说一年到头在山庄里总会看到说不出名字但又可爱的小鸟，还有路过这里的候鸟……不用说打猎俱乐部就在路旁，在那里我们以前老是举行打鸽子比赛，奖金可观……你可以告诉他们你住在古巴，因为在那凉爽的早晨你可以在那里照样工作，就像你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工作过一样。☑

〔参考文献：CNBC网站：The Life of a Revolutionary；《地中海日报》：“海明威在古巴”，Charles Bane, Jr 著；《海明威在古巴》，（美）希拉里·海明威、卡伦娜·布伦南著，王增澄、唐孝先译；《蒙卡达审判》，（古巴）玛尔塔·罗哈斯著；《生活与斗牛差不多：海明威传》，徐珊珊著；《丧钟为谁而鸣》，海明威著，程中瑞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三联生活周刊十年》《三联生活周刊廿年》

《有关品质》

《生命八卦》

限时 **8.5折**

扫码直接购买



微信



淘宝

淘宝店铺搜索“三联生活周刊 lifeweek”

微信关注“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号，进入微店

典藏特惠

慢享20年的文字与时光

1995-2015年，

三联生活周刊20年的成长历程，

我们先后四辑出版这套精选文丛，

包括经典栏目作品集及主创个人作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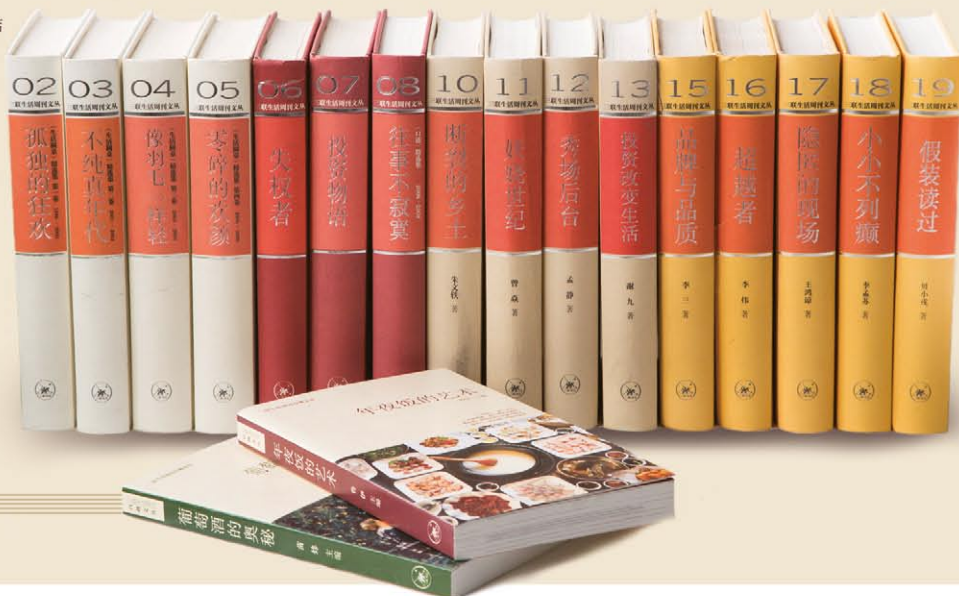
《三联生活周刊》精选文丛

与《葡萄酒的奥秘》、

《年夜饭的艺术》

单本 **6.5折**

2本及以上 **4.5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十年 | 孤独的狂欢 | 不纯真年代 | 像羽毛一样轻 | 零碎的欢颜 | 失权者 | 投资物语 | 往事不寂寞 | 有关品质 | 断裂的乡土 | 妖娆世纪 | 秀场后台 | 投资改变生活 | 生命八卦 | 品牌与品质 | 超越者 | 隐匿的现场 | 小小不列颠 | 假装读过 | 葡萄酒的奥秘 | 年夜饭的艺术 |
| 10元 | 25元 | 25元 | 25元 | 25元 | 25元 | 25元 | 25元 | 25元 | 25元 | 25元 | 25元 | 25元 | 25元 | 25元 | 25元 | 25元 | 25元 | 25元 | 25元 | 25元 |

如需购买整套文丛产品，欢迎致电读者服务中心：010-84050451/84050425，或登录官网商城：<http://shop.lifeweek.com.cn/>

暗杀卡斯特罗的那些闹剧

记者 薛巍

美国历史学家鲍耶·贝尔说，中情局当年暗杀卡斯特的计划用的都是老把戏、不恰当的技术和无能的特工。

美国人除掉卡斯特的痴念

卡斯特罗曾经说，如果躲过暗杀是奥运会的一个项目的話，他会获得一枚奖牌。他屡次死里逃生，以致催生了许多笑话。其中一个说，有人送了他一只加拉帕戈斯象龟当礼物。当得知这种乌龟大概只能活100年时，他礼貌地谢绝了。他说：“宠物有一个问题。你好不容易养出感情，它却要死在你前头。”

古巴情报部门（DGI）的负责人法比安·艾斯卡兰特1996年退休，2006年他出了本书叫《执行行动：暗杀卡斯特的634种方法》，在书中记述了暗杀卡斯特的阴谋。2007年，英国电视四台以他为主角制作了一部几乎同名的纪录片——《暗杀卡斯特的638种方法》。

卡斯特罗曾对法国记者拉莫内说：“对我的暗杀有好几十个计划，其中有几个差一点就成了。有记录的一共有600多次。”600多次暗杀好像过于夸张，但是鉴于卡斯特的政治生涯特别漫长，平均下来好像还说得过去。按照艾斯卡兰特的计算，在艾森豪威尔担任美国总统期间，美国策划了38次谋杀卡斯特的行动；肯尼迪政府时期，42次；约翰逊时期，72次；尼克松时期，184次；卡特时期，64次；里根时期，197次；老布什时期，16次；克林顿时期，21次。

1975年，美国参议员弗兰克·丘奇主编了一个《关于暗杀外国政治领导人的计划》。丘奇委员会认为，1960～1965年，由中央情报局直接参加和提供资助的针对卡斯特的8项暗杀计划已得到确认。

美国记者唐·博宁在《对卡斯特的痴念》一书中说：“从卡斯特1959年上台直到6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寻求动摇其经济和政治上的稳定，以及宣传、操纵、破坏活动和谋杀计划来除掉卡斯特。这是‘二战’之后一个国家针对另一个国家的政府所采取的最广泛、最持久、最徒劳的秘密行动。”

英国记者邓肯·坎贝尔在《卫报》上的一篇文章说：“美国中情局当年痴迷于杀死卡斯特，这种劲头在当代只有抓捕本·拉登的活动可以与之相当。有时好像美国安全部门对杀死古巴领导人的兴趣比保护他们自己的领导人更感兴趣：在1963年肯尼迪遇刺那天，一位特工在巴黎拿到一支钢笔注射器，被派去暗杀卡斯特。”

罗伯特·达莱克在《肯尼迪传》一书中说：“感情冲动的鲍勃·肯尼迪（弟弟）很可能把暗杀行动视为一种必要的手段。但是他比较冷静的哥哥似乎曾经反对过这种建议——不一定认为其不道德，而是觉得不现实，可能会适得其反。肯尼迪认识到，卡斯特的死似乎很可能会加强共产党在古巴的控制，因为他的弟弟劳尔和格瓦拉会把他的死转化为一种感情上的呼唤，从而证明他的一生和信仰。”

美国记者蒂姆·韦纳在《中情局罪与罚》一书中说：“肯尼迪把中情局的秘密工作交给他弟弟掌管。这是肯尼迪总统在任内最不高明的决定之一，因为他弟弟当时只有35岁，冷酷无情、酷爱搞秘密行动。兄弟俩以空前的强度大搞秘密行动。艾森豪威尔在任8年只发动了170次大型秘密行动，肯尼迪兄弟不到3年就发动了163次。1961年11月，约翰和罗伯特·肯尼迪兄弟暗中成立秘密行动的规划组织——特别小组，它的使命只有一个，就是废掉卡斯特。”

里彻尔森在《兰利奇才——美国中央情报局科技分局内幕》一书中说，主管计划的副局长理查德·比斯尔对除掉卡斯特的可能性尤其感兴趣。从1960到1965年，至少有8个要卡斯特的命的阴谋。“其中一些并不具科学性，只不过使用机枪和子弹而已。其他阴谋依靠技术服务处。西奥多·罗斯福的孙子、1960年任技术服务处处长的科尼利厄斯·罗斯福说，考虑用注射用贝类毒素、液态细菌材料、细菌感染过的香烟或雪茄、用细菌处理过的手帕。鉴于卡斯特经常喝茶、咖啡或肉汤，他记得当时最好的方法是液态细菌。”

种种离奇计划的破产

暗杀卡斯特的种种计划都未能成功，这是因为卡斯特的安全人员非常能干，另一方面，中情局的特工又特别拙劣。美国历史学家鲍耶·贝尔（Bowyer Bell）

在《暗杀：政治暴力的理论和实践》一书中说：“1960到1965年间中情局至少制定了8个计划，几乎所有的计划都非常古怪、不成功，回过头看也都非常愚蠢。中情局用的都是老把戏、不恰当的技术、无能的特工。”

1971年卡斯特罗出访智利，中情局特工把炸药装在卡斯特罗乘坐的汽车上，结果炸药没有爆炸。他们又安排两名特工冒充记者，把武器藏在摄影机里，准备在卡斯特罗演讲时下手。然而就在演讲前两小时，其中一名杀手突患阑尾炎，另一名杀手慌了神，没敢再轻举妄动。

2000年11月8日，卡斯特罗前往巴拿马出席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卡斯特罗抵达巴拿马半小时就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宣布老牌反古巴分子波萨达及其同伙企图用炸药和其他武器杀害他，他们在演讲台下面放了90公斤炸药，被卡斯特的安全人员检查时发现，卡斯特罗在发布会上还展示了一些照片。

2003至2005年，法国记者伊格纳西奥·拉莫内跟卡斯特罗做了几次长谈，写出了一部《卡斯特罗访谈传记》。卡斯特罗对拉莫内说，暗杀他的600多个计划一共由三种不同形式推行：第一种，由中央情报局直接组织；第二种，成立所谓独立小组，向它们提供全部行动资金，美国机构不直接介入；第三种是煽动，搜罗了很多，给可能的杀手灌输猎人心理，灌输有一个人应该猎取的意识。他们有完全的豁免权来进行狩猎，来给所谓的政治团体募集资金，雄厚的资金，例如那个著名的基金会和居住在迈阿密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数十个黑帮团伙。

卡斯特罗说：“在另一次暗杀中，他们想利用一个化学特务制造的强力迷幻剂，来毒化我要去谈话的一个电视工作室的空气。另一次，他们用致命毒药喷洒我要抽的一盒雪茄烟。1971年我访问智利时，有一阵儿，在几米远的地方，用一架里面藏着枪的电视摄像机把我锁定在目视孔里。但是如果他们开枪的话，肯定也会死在那里，所以他们没有开枪。最近一次引人注目的暗杀计划是在巴拿马会议期间（2000年），路易斯·波萨达·卡里莱斯卷入了这个计划，他是1976年炸毁古巴飞机的凶手，也是负责进行这次行动的小组的组织者。”

那些暗杀卡斯特的计划中，除了传统的开枪和使用炸药、偷偷下毒，有的想法如同从间谍小说里看来的，就像可笑的闹剧，尤其是想破坏卡斯特罗公众形象的那些点子。

《暗杀卡斯特的638种方法》这一纪录片中说，美国人曾经想嫁祸于卡斯特罗：“如果美国人最喜欢的宇航员约翰·格林消失在太空中，他们计划把责任推到卡斯特罗头上，说他用磁射线攻击约翰的登月舱。结果宇航员安全着陆，这一计划随之破产。”



1977年11月，玛丽塔·洛伦兹出席新闻发布会。19岁时，洛伦兹跟卡斯特罗有过恋情，20岁时卷入中情局暗杀卡斯特的阴谋

其他匪夷所思的计划有：

除掉卡斯特的胡子：卡斯特罗的大胡子就像雪茄一样，是他的形象的一部分。他的照片很少有不带胡子的，所以得了个外号叫“大胡子”。胡子不仅是卡斯特罗和他的同志们的时尚宣言。当他们在野外作为游击战士训练时，他们弄不到剃须刀片。蓄须除了出于无奈，也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手段。如果有人想渗透进他们的群体，他至少需要6个月才能长出那样的头发和胡子。

美国中情局讨论过如何解决他的胡子：在他的鞋子里放毒药。他们想把老鼠药的主要成分铊盐放进他的鞋子里，卡斯特的胡子就会脱落。中情局认为，在卡斯特罗出国住酒店的时候可以接近他的鞋子。那时经常有人在住高级酒店时，把鞋子放在门外，以便鞋子能得到清洁。中情局甚至在动物身上测试过这种毒药，但这些药后来没有被放进卡斯特的鞋，因为他取消了行程。

在贝壳里放炸药：肯尼迪总统安排德斯蒙德·菲茨杰拉德去推翻古巴政府。卡斯特罗喜欢潜水，菲茨杰

拉德让他的助理研究可不可以把炸药放入贝壳里。如果可能的话，把一个贝壳一样的诱杀装置放在卡斯特罗可能去潜水的地方，彩色的贝壳应该会吸引卡斯特的注意。最后这个计划因为无法实施而被否决了。毕竟，卡斯特罗捡起某一个特定贝壳的概率太低。而且别的不起疑心的潜水者检视这个贝壳的话，会把它引爆。

克林顿政府公开的文件显示，中情局曾经买了许多加勒比海的软体动物，希望找到足够大的、能够装足以致命的炸药的贝壳。英国纪录片中的说法是：“中情局购买了两本关于加勒比海软体动物的书，就是找不到一个足够大的贝壳来装炸药。”

毒潜水衣：中情局计划让律师詹姆斯·杜诺万送给潜水爱好者卡斯特罗一件紧身潜水衣。这位律师负责跟卡斯特罗谈判释放猪湾事件中被捕的囚犯。他跟卡斯特的关系很友好，因此不会引起怀疑。技术服务处购买了一件潜水衣，然后用肺结核杆菌处理了呼吸设备，用菌类孢子处理了紧身衣，能够导致一种叫足分枝菌病的慢性皮肤病。这个计划后来也废弃了，特制的潜水衣从未离开过实验室，因为杜诺万把他自己的潜水衣送给了卡斯特罗，他就没道理再送他一件，中情局只好毁掉了已被感染的潜水衣。

毒钢笔：1961年，中情局的一位工作人员跟罗兰多·库贝拉见面。库贝拉经常能接触到卡斯特罗，他对中情局说他想杀害卡斯特罗。但他希望中情局设计一个方法，使他自己不要陷入危险。中情局想出的一个办法是制作一支有高渗针头的钢笔。针头非常细，人被注射后甚至不会有感觉。中情局把这支钢笔交给了库贝拉，里面装了一种名为烟碱的杀虫剂。中情局对他说，可以像镖枪一样使用这支钢笔，但他觉得这支钢笔不够尖端，问中情局能不能想出更好的东西来。这支笔从未被用过。

毒冰淇淋：1962年，中情局买通自由哈瓦那酒吧的桑托斯，让他在冰激凌里下毒谋杀卡斯特罗。等了一年，到1963年3月，卡斯特罗光顾这家店。桑托斯去开冰箱取毒药片时，发现药片已经被冻在了冰箱壁上，他用力抠药片，结果把药片抠碎了，里面的毒液随着冰水流失了。桑托斯只好把无毒的冰激凌端给卡斯特罗。

在茶和咖啡里下毒：在1961年2月，中情局技术服务处向安全处处长爱德华兹提供了肉毒杆菌毒素药片，打算找人投进卡斯特罗喝的茶或咖啡里。爱德华兹把它转交给了迈阿密的黑帮成员约翰尼·罗塞利。罗塞利又把药品转交给了卡斯特罗随从中的一个人。这个人答应帮助杀掉卡斯特罗，但后来失去了这份工作，无法接触卡斯特罗，又把药品还给了他们。

毒眼药水：20世纪60年代初，中情局收买了时任

卡斯特罗医务人员的米勒，为其配备了微型发报机，以报告卡斯特的日常活动。不久，米勒接到毒死卡斯特的命令，当时卡斯特罗患了眼疾，正在治疗。中情局让米勒偷出卡斯特罗使用的几种眼药水，把药水取出，代之以他们研制的一种毒液。米勒起初不敢下手，最后终于鼓起勇气准备动手，但由于心慌，不小心把毒药瓶掉在地上打碎了，强烈的毒性顿时腐蚀了水泥地面。最终他选择了自首。卡斯特罗没有追究他的责任，而是安排他到一家医院工作。

两次美人计：英国的纪录片中说：“卡斯特罗离婚后，跟一个德国女孩好上了。玛利塔·洛伦兹热爱卡斯特罗和他的革命，但是他们的关系恶化了。中情局说服她去杀害她的前任情人，她把毒药藏在面霜里，偷偷溜进卡斯特的房间，当她把药拿出来时，药已经有点融化了，她觉得不管用了，算了吧。卡斯特罗问她是不是回来杀他的，她说是的。卡斯特罗递给她一把手枪，说开枪吧。她用枪指着他一分钟，然后放下枪，说她做不到。卡斯特罗说，‘你当然不能，没人能’。”

1965年，中情局将一名经过一年半强化训练的古巴姑娘和十几名杀手偷偷送入古巴。这名姑娘化名巴蒂，凭着她美丽的容貌和出色的艺术才能，很快在古巴文艺界崭露头角，并结交了一些政府要员。1966年1月1日，古巴国庆节前夕，中情局给巴蒂下达行动命令，她通过关系搞到了卡斯特罗参加国庆活动的具体安排，准备在卡斯特罗和青年人交谈时，混入其中，和另外两名装扮成记者的杀手用无声手枪向卡斯特罗射击。但在动手前夕，反古巴分子策划了一起爆炸，她的弟弟和妹妹也被炸死，这使巴蒂痛苦万分，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她在国庆前一天主动向古巴政府自首。

为什么暗杀卡斯特的计划都没有成功？有人问卡斯特罗是不是穿了防弹衣，他解开纽扣证明自己没穿，他解释说：“我有一件道德防弹衣。”反古巴分子恩里克·恩西诺莎（Enrique Encinosa）解释说：“卡斯特罗可能是所有的政府首脑中最有安全保障的人，他坐飞机总会动用三架飞机，你不知道他到底在哪一架上。他去外国访问时，总是带着一切，没有人能下毒杀死他，他带着他的食物、水、冰块。他有很多替身，其中一个是他的哥哥罗蒙，跟他长得很像。他有50到60处住所，他经常变换住所。”

卡斯特罗说，他有时候只是侥幸把暗杀他的计划给化解了，比如毒药被冰箱冻住了。但他也是比较谨慎的。他的海外行程直到动身前一两天才会被宣布。提前更多时间的话，想谋杀他的人就更有机会策划方案。有时他的出访在他回来之后才会被公开。■



松果

一万个生活家

有营养，有态度



为父亲的摄影

实习记者 肖楚舟

作为老卡斯特罗晚年唯一的官方摄影师，亚历克斯是他父亲离开公众视线后，最亲密接触的人之一。亚历克斯自然也深知我们的想法。多数时间他都沉默地微笑，温和而谨慎地回答涉及他父亲以及卡斯特罗家族的每一个问题。

2016年10月，亚历克斯·卡斯特罗（Alex Castro）以当代艺术家的身份来到北京。他有一组风景摄影正在北京798艺术区的程昕东国际当代艺术空间里展示。在这个名为“古巴先锋艺术”的展览中，其他作品则和他传统的摄影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前卫风格，它们大多是“政治波普”式的绘画、雕塑和装置，和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那一代艺术面目相似。而这些作品意图影射和消解的，正是亚历克斯的父辈——父亲老卡斯特罗和他的亲密战友们所建立的古巴政治。

我们约好采访的这个中午，亚历克斯迟到了15分钟，不过原因只是因为北京令人头疼的交通。并没有簇拥的随从，陪同他来的只是司机和古巴驻中国使馆的一位工作人员。和他父亲在那些欧洲左翼知识分子描述中的“半优雅半狂野”的帅气形象相比，亚历克斯很普通，是一个身材高大健壮的中年男人，甚至没有蓄留卡斯特罗家族令人印象深刻的标志性的胡子。他比同行的使馆人员高出一个头，头顶一只牛仔帽，穿着大红色T恤、牛仔裤和工装外套，按我一位朋友的说法：“活像个乐于助人的美国卡车司机。”他带着照片上那种快活劲儿向我们点头致意，在谈话中不时腼腆地揉搓厚实的手掌——但我们很少获得与他对视的机会。

“小胖子”：温和的旁观者

在广为流传的卡氏家谱中，卡斯特的两次婚姻给他带来六个儿子，此外他的无数艳遇还留下了至少一个私生女、四个私生子。

亚历克斯的母亲是老卡斯特的第二任妻子达利亚·索托·德勒·瓦尔（Dalia Soto del Valle）。老卡斯特的第一任妻子马尔塔·迪亚斯·巴拉特（Mirta Díaz-Balart）来自古巴富裕家庭，是他在哈瓦那大学一位朋友的妹妹，两人育有一子，生于革命年代的“小菲德尔”（Fidel Angel “Fidelito”）。在这段婚姻中，

卡斯特罗背叛了妻子，与绰号“Naty”的传奇女游击队员生下了第一个私生女阿琳娜（Alina）。1961年，卡斯特罗与后来成为他第二任妻子的达利亚·索托·德勒·瓦尔偶然相遇。那是在维拉克拉拉省做演讲时，卡斯特罗对站在人群中的达利亚一见钟情。与马尔塔和“Naty”一样，女教师达利亚是个金发碧眼的美人儿，“而且很瘦，高得像个芭蕾舞演员，瘦削的身材比金发更吸引卡斯特罗”。次日，卡斯特罗就请人给他引见了这位美丽的的女教师，短短三次约会之后，卡斯特罗就邀请达利亚前往哈瓦那，住在他的一栋郊区秘宅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段关系都是非常隐秘的，卡斯特罗尤其提防着美国人，不愿将达利亚暴露在暗杀的风险中，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很难找到这位陪伴卡斯特罗直到他去世的、最重要人生伴侣的相关资料。1962～1974年，达利亚为他生下五个儿子：亚力克西斯（Alexis）、亚历山大“亚历克斯”（Alexander “Alex”）、安东尼奥“托尼”（Antonio “Tony”）、亚历杭德罗（Alejandro）、安吉尔（Angel）。他们的名字均以A开头，故而被合称“5A兄弟”。

卡斯特的爱情、婚姻与家庭，混杂着人们对革命名义之下的浪漫激情的美化。世人鲜有途径可以窥见卡斯特罗家族的真实面貌——儿女、兄弟、妻子与情人，都化作这位革命领袖图腾式面容之后虚化的背景。警卫胡安·雷纳尔多·桑切斯（Juan Reinaldo Sanchez）曾为卡斯特罗家族服务17年，他的回忆录，是为数不多对卡斯特罗家庭生活的直接描述。他在书中这样形容卡斯特罗与第二任妻子所生的五个儿子：“他们都是聪明人，但总的来说，没有太多过人的智慧。”

亚历克斯·卡斯特罗是达利亚的次子，也是父亲最后一任私人摄影师。

桑切斯将童年时候的亚历克斯描述为一个乐呵呵圆墩墩的小家伙，外号“El Gordito”（小胖子）。后来成为职业摄影师的亚历克斯，本人鲜少出现在镜头前，只在外媒报道中能找到他几张凝望着父亲肖像的侧影：肩膀宽厚，浓眉大眼，面颊圆润，脸上总是泛着快活而温和的微笑，像一位随处可见的邻家老伯。在卡斯特的子女们中，亚历克斯·卡斯特罗是在外媒报道中形象非常开放、友好的一位。正如桑切斯在回忆录中描写的，他打小就是个人见人爱的“小胖子”，“似乎天生不会与人起冲突”。2006年卡斯特罗因肠胃疾病退休以后，外



2015年8月13日，亚历克斯·卡斯特罗在妻子的陪同下观看在何塞·马蒂纪念馆举办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主题展

界对其健康状况猜测四起，亚历克斯的镜头，成为“父亲尚在人世”这一事实最有力的证人。在卡斯特罗人生的最后阶段中，亚历克斯的镜头成为几乎唯一的记录。然而当我们带着想象的滤镜去观看亚历克斯镜头下的卡斯特罗，却有种失焦的错觉——他似乎不应该只是个穿着阿迪达斯外套给外宾签名的小老头，我们还想看得更清楚。

在亚历克斯的叙述中，从事摄影源于兴趣，但更多是一份包含着家族责任的工作。亚历克斯向我们回忆起自己第一次拿到相机的场景：他清楚地记得是在13岁，但机器的型号已记不起来了，只知道是家里一位老朋友带来的苏联相机。第一次摁下快门之后，他便再也舍不得放下这台机器——“那台相机后来再也没还给人家，最后也不知道去哪儿了。”亚历克斯说。

有资料曾记述亚历克斯和他另外两个兄弟一样，学的也是计算机专业。但事实上，亚历克斯告诉我们，虽然他喜欢摄影，父亲当时仍建议他选择了化学工程专业。“父亲会对我们的人生和职业做出建议，但不会帮我们做决定。我虽然喜欢拍照，但周围人都说我的专业不错，我就学了下去。”

从卡斯特罗家儿女们的人生轨迹看，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确做出了最为理智的建议，也留出了让步的空间。长子“小菲德尔”前往苏联学习核物理，归国后帮助父亲管理古巴原子能委员会；第二段婚姻中的长子亚

力克西斯和四子亚历杭德罗都选择了计算机专业，亚历克西斯对此兴趣寥寥，亚历杭德罗还真有点儿极客精神，甚至写了个程序卖给日本公司；热爱运动的安东尼奥虽然听了父亲的建议去学医，但最终还是成为优秀的棒球运动员，兼棒球队队医；爱车的小儿子安吉尔不爱读书，最后当了奔驰公司的高管。

亚历克斯从化学工程系毕业后，转而进入古巴电视台工作，成为职业摄像师，直到今天，他还保留着这重职业身份——他说，在古巴，由国家机构提供的稳定职业仍是多数人的选择。亚历克斯没有受过专业的摄影教育，只是通过结识一些摄影师朋友来进行自学，比如西班牙摄影师何塞·马里亚·梅里亚多（José María Mellado），他从何塞那里学到了雄浑壮丽的风光摄影风格。这些年，亚历克斯也和其他古巴艺术家一起，到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参加各种当代艺术展览，接受媒体访问。在古巴国内，他也有机会出售自己的摄影作品。“如果你是一个有天赋的艺术家，在古巴，做个职业艺术家也能过得不坏。”亚历克斯说。

问及为何父亲要将私人摄影师的工作交给他，亚历克斯说：“首先是因为我是家人。”依照我的理解，家人意味着信任、安全和亲密，而对亚历克斯来说，家人还意味着责任：“你知道，人们对家人的要求总是对外人的要严格得多，我父亲也是如此。但父亲不会对我的摄影提出具体要求，他相信我会做得很好。”



卡斯特罗的儿子亚历克斯·卡斯特罗

(蒙小川摄)

亚历克斯镜头下的卡斯特罗少有独处的时刻，这也许是因为他的主要工作是在父亲接受访问时进行单纯的记录，而非闯入他的私人时光。当谈话从摄影艺术延伸向政治话题，随和的亚历克斯总是谨慎而圆滑地选择回避。曾有外媒记者问亚历克斯，在父亲与圣方济各教皇或者与美国前总统卡特会面时，作为摄影师的他是否听到了一些谈话内容，亚历克斯表示：“我是个局外人。我只负责拍照，而不是去听他们说什么。我情愿什么也不听。”

2006年退休以后，卡斯特罗隐居在他的神秘住所“Zero Point”中，仍不断接见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政客和崇拜者，儿子亚历克斯成为这些私人会面唯一的官方见证人。2012年，亚历克斯在墨西哥首次展出了题为“卡斯特罗：私密影像”的一组肖像作品，2015年他将这些作品集结成书，并将自己的摄影展作为礼物献给父亲的90岁生日。亚历克斯镜头中的卡斯特罗与罗马教皇、俄罗斯总统、伊朗总统、巴西前总统会面、交谈，与球星马拉多纳热情握手，在自己的画像上签名作为送

给美国导演奥利弗·斯通的礼物（后者因为拍了一部正面展现古巴风貌的纪录片而饱受争议），在送给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的棒球上签名……多数时候我们很难看到卡斯特罗表露太多个性化的情绪，他仿佛总是一位友好的接待者、冷静的倾听者。只在一张照片中，这位年过90的老人独自站在中国人送他的一尊巨大半身像前，陷入了沉思，亚历克斯说：“父亲不喜欢个人崇拜，古巴国内不允许有他的塑像，外国友人送他这样的礼物，他会接受，然后束之高阁。”

有趣的是，在亚历克斯的镜头中，老卡斯特罗从来没有抽过雪茄，这与我们印象中永远叼着雪茄的古巴革命领袖形象截然不同。卡斯特罗曾是一名重度雪茄爱好者，他最爱的品牌是高斯巴（Cohiba），一个创建于古巴革命胜利7年后的雪茄品牌。在高斯巴公司的品牌故事中，传奇始于一位当过兵的卷烟工人，他给自己的战友、卡斯特罗的保镖卷烟，保镖将这种烟推荐给了上司，卡斯特罗对它一见钟情。他不仅自己抽，还慷慨地将高斯巴雪茄赠与国际友人。上世纪80年代，卡斯特罗为推动古巴禁烟运动，曾宣布戒烟，但不久人们又在媒体上发现他叼着烟会见外国友人的照片。为了这场“革命”的成功，卡斯特罗曾表示彻底告别了雪茄：“我好多梦到雪茄，有时候还会梦到自己在抽雪茄呢。”

亚历克斯向本刊记者说：“他现在戒烟了。一方面是由于健康考虑，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支持禁烟运动，必须做出表率。”

苏联记忆

亚历克斯走进展馆时，西班牙语翻译还没到场，他便先与艺术空间的工作人员交谈起来。我发现他们说的是俄语。多数时候亚历克斯只是听着，偶尔简短回答两句，但很流利。

俄语是6年苏联留学生活给亚历克斯留下的印记。与长兄“小菲德尔”一样，亚历克斯在莫斯科接受了良好的高等教育，但在他本人向我们提起此事之前，我们没有从任何资料中获知过这一信息。实际上，卡斯特罗兄弟的教育背景都是一团迷雾，我顶多能从桑切斯的回忆中翻出只言片语：“兄弟几人都在母亲为他们创办的埃斯特班·费尔南德兹小学上过学。”在警卫的回忆中，卡斯特罗家孩子们的基础教育是精英化、封闭式的，身为教师的母亲亲自为他们挑选校长和老师，筛选入学者，一共只招收50名学生，让人想起普希金就读的皇村中学。

后来执掌古巴核能委员会的长子“小菲德尔”的教育经历带着点“冷战”时期的谍战色彩，传说中他曾

用化名在苏联绝密机构学习核物理。而亚历克斯谈及的苏联大学生活则轻快而普通，没有假身份、保镖、秘密，甚至也无关政治。“我只是个普通的学生，同学们知道我是谁，但并没有特殊对待我。和我交往多了，成为朋友以后，他们很快就会明白，我只是个普通人。”

1979至1985年，是亚历克斯的大学时代，他在莫斯科学习化学工程。对于苏联来说，这也是和古巴最后的蜜月期。亚历克斯在莫斯科生活的那几年，古巴作为苏联在“冷战”中最重要的宣传工具之一，正享受着丰厚的“盟友福利”：1965～1992年，苏联在与古巴的贸易中几乎年年逆差，1984～1988年逆差的数额一度接近17亿美元；80年代上半期，苏联对古巴的经济援助一度占其对外援助总额的一半，金额之高甚至引起了国内民众的不满；到1985年，与苏联的贸易在古巴贸易总额中所占比例已经超过70%。

1985年戈尔巴乔夫带来的“新思维”搅乱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生态，摧毁了古巴与苏联一度牢不可破的战略同盟关系。1989年戈尔巴乔夫在访问古巴期间甚至公开宣称放弃输出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结束“冷战”，实行“去意识形态化的务实外交”。随后苏联国内舆论突变，喉舌媒体《消息报》《论据与事实》《共青团真理报》纷纷发起对古巴领导人及其社会主义事业的抨击，《莫斯科新闻》将古巴形容为“一个赤贫的警察国家，试图模仿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共产主义”。这在卡斯特罗看来，显然是重大的背叛。1991年苏联解体，各加盟共和国断绝了对古巴的大部分“供给”，导致古巴经济几乎陷入瘫痪。1992年叶利钦撤走驻扎在古巴的大多数文职人员和军事人员，同年俄罗斯驻联合国代表团支持通过一项谴责古巴违反人权的决议案，革命时代的友谊从此荡然无存。

但这些剧变都发生在亚历克斯离开莫斯科以后。莫斯科于他，只是一座充满青年时代温暖回忆的异国之都，“那里的情况和古巴没什么差别，即使有，也是由于两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不同罢了”。当我们问及他青年时代的罗曼史，他有些腼腆地笑着点点头。“是的，我也与几个俄罗斯姑娘交往过。只不过后来我回古巴了，这些恋情也就自然留在了莫斯科。”他对我用俄语一字一句地说：“我离开苏联，已经太久了。”

“卡斯特罗只是个普通的姓氏”

“在古巴，有许多人都姓卡斯特罗，这是个很常见的姓氏。”Google搜索Alex Castro这个名字，我们会发现一位菲律宾歌手、一位西班牙球员和一位好莱坞演

员都与亚历克斯同名，相较来说，这位古巴摄影师反而是知名度最小的一位Alex Castro了。

为父亲拍摄肖像之余，亚历克斯喜欢带着相机四处搜寻少有人注意的自然风景。“在外面拍照的时候要是被人认出来，大家也就是跟我打个招呼，之后就该干吗干吗去了。”亚历克斯说自己在国内不是什么名人，“我们跟电视明星不一样，很少出现在媒体镜头里，所以也没有太多人认识我。”

老卡斯特罗退休之前，这位铁腕领导者的家庭生活对于外界而言完全是个谜团。2012年卡斯特罗一家与荣休教皇本笃十六世见面的照片，是许多古巴人看到的第一张总统与家人的合影。当我们试图问及他的家庭生活，亚历克斯最常用的表达就是“普通人”“普通家庭”。他说：“我的童年与其他孩子没有什么区别，和普通男孩一样爱做一些冒险的事情。”“我们家人的关系很亲密，但家庭聚会的频率嘛，就和普通家庭一样……”

实际上，卡斯特的孩子们并不普通——他们性格各异，但多少都继承了父亲的叛逆基因。曾经最受父亲宠爱的私生女、卡斯特罗与女游击队员“Naty”之女阿琳娜，不仅叛逃西班牙，还辗转到了美国迈阿密当起电视台主持人，并出了一本题为《卡斯特罗之女：古巴逃亡记》的回忆录，后来又受聘在CNN发表古巴评论，甚至对父亲的接班人人选“指点江山”。亚历克斯的弟弟安东尼奥，从小热爱体育，但苦于父亲要他学医，他向警卫桑切斯倾诉过自己的烦恼，桑切斯建议他以一种委婉的方式，既不违抗父亲，又坚持自己的梦想，“比方说学体育医学”。果不其然，安东尼奥不满足于当棒球队的队医，如今已经成为国际棒球联盟副会长。每当媒体问及与父亲有关的政治问题，安东尼奥总是娴熟地将话题引向棒球，他发表过的最“尖锐”的政治言论，无非是“古巴的棒球想要发展，必须与政治脱钩”。相比之下，亚历克斯还是那个与世无争的“小胖子”，谈及对儿女的期望，已经当了外公的亚历克斯坦言，他仍希望自己的子女拥有正式、安稳的工作。“在古巴，大多数人会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年轻人也是如此，很少有完全的自由职业者。”

通过亚历克斯的叙述，我们得以获取一条有限的路径，试图钻进“卡斯特罗想象”的密林深处。但卡斯特的逝去，也消解了我们对革命传奇最后的想象。直到故事的结尾，我始终感觉徘徊在这个家族的秘密之外。当我们追问亚历克斯，那项他总不离手的牛仔帽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时，亚历克斯笑了：“这是我在美国买的，因为没带什么御寒的东西，在这里可以挡风，回古巴可以遮太阳。”也许，接受平淡的真相，放弃猜测与构建，是我们与一段历史传奇最后的和解。☑



2015年2月26日，哈瓦那第17届古巴雪茄节到来之际，雪茄工厂的工人为游客制作雪茄

抽一支无产阶级的雪茄

文 / 范庭略

符号人物与符号物件之间，相互借力才是正常的，比如卡斯特罗与古巴雪茄。

作为资本主义的享乐道具，一根粗大的雪茄和一杯很有分量的单一麦芽威士忌，已经成为京沪两地高级酒吧的标配。尽管30年前的港产片里揸AK47冲锋枪的省港旗兵也想学着大老板点上一支粗大的雪茄扮扮酷，但是雪茄屁股后面插进去的一根牙签还是暴露了“菜鸟”的身份。今天的年轻人更懂得如何将一根

雪茄不动声色地抽到三分之二或者更多，然后炫耀地看着烟灰依旧没有掉下来。虽然也有国学爱好者将雪茄结实的烟灰与艾灸搞混，但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在威士忌酒吧里老气横秋地抽起一支粗大的古巴手卷雪茄，那种首都豪情或者黄浦江豪情都会不自觉地演变成一种致敬，那就是雪茄客们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两位偶像——格瓦拉和卡斯特罗。那种来自革命主义浪漫色彩的海报已经成为众多雪茄馆的标配，切·格瓦拉和卡斯特罗在革命战斗中结下的友谊，让他们喜欢在一起煲烟。还有谁比咬着一根大雪茄吞云吐雾的时候更牛的吗？估计也就剩下丘吉尔了。

古巴驻沪总领事曾经跟记者说雪茄不是资本主义，朗姆酒也不是资本主义。这两样古巴人可以傲视全球的著名产品，都已经成为古巴的特产。对于享受的共同追求，可以让人与人的关系更为和谐。古巴雪茄虽然在1961年的时候开始被美国禁运，但是卡斯特罗作为古巴雪茄最为知名的推广者，依旧在全球各地为数不多的出国访问中尽情展现古巴雪茄的魅力。雪茄作为古巴重要的收入来源，排在各种创汇产品的第五位，在雪茄前面的有白糖、镍、鱼类、旅游业，旅游业在古巴是最挣钱的行业，而雪茄则是为古巴带来了无可替代的声誉。目前古巴每年生产1.6亿支雪茄，年产值10亿美元。尽管在美国禁运开始之后，古巴雪茄再也无法出口至美国，但是每年最少800万至1000万支古巴雪茄是由美国人消费的。而签署禁运令的肯尼迪总统也是一个雪茄客，他每次都会让朋友从古巴带些雪茄到白宫。还好，这个禁运总算是在卡斯特罗去世前解除了。以往美国的规定是美国人合法到古巴旅游，可以携带价值100美元的古巴商品包括雪茄回国，但是美国人到第三国家譬如英国、法国和墨西哥时，便不可以购买古巴雪茄，美国商务部在3月份宣布撤销这个禁令，美国人可以合法购买古巴雪茄了。

卡斯特的西班牙父亲来自加利西亚，他对雪茄烟和西班牙葡萄酒的爱好深深影响着年轻的卡斯特罗。他的父亲非常欣赏精美的雪茄，也非常喜欢喝品质上佳的西班牙里奥哈葡萄酒，他的烟龄从15岁开始计算，一直到他59岁成功戒烟，在后面的将近30年里面，他都没有再抽雪茄。在他抽雪茄的这段时间，他仅仅只有两次停止抽雪茄，这是因为种植园的农民起义而对雪茄的制造产生影响，从而使烟草生产下降，为了声援他们，卡斯特罗放弃了一段时间的雪茄，当然在生产恢复之后，卡斯特罗继续开始享受雪茄的美好，这是他极少情况下不抽雪茄而改抽香烟的革命背景。当1985年8月26日，古巴因为普遍的健康问题而发起全国性的戒烟运动的时候，卡斯特罗终于开始带头戒烟。最初他并没有承诺，也仅仅是在电视镜头前以及公众场合不抽雪茄，但是他还保持着把一支雪茄放在嘴里的习惯，于是在一个只有外国人参加的会议上，他还是准备抽雪茄。后来他觉得自己必须以身作则来真正参加到这个戒烟运动中的时候，他开始戒烟了。从戒烟的毅力上来看，卡斯特罗是一个意志力坚强的战士，因为在他接受美国记者采访的时候，他骄傲地说他甚至在家里也不抽雪茄了，因为他觉得为

了抽烟你需要有一个小团伙，有人买雪茄给你，另外还需要有些人去帮你清洁烟灰，这样的话，最少要有三四个人知道你在抽雪茄，而他不想让这几个人觉得他在欺骗全国人民，所以决定一根都不抽了。

当人们问起卡斯特罗为什么喜欢雪茄的时候，他说：“我喜欢它的香气、它的味道以及它燃烧的样子。”雪茄为古巴带来了荣誉，也为古巴带来其他国家所不具有的优质著名雪茄质量。多年以来全世界都是看到卡斯特罗右手拿着一支硕大的高斯巴导师雪茄（Cohiba Esplendido），这支长约178毫米、环径47毫米的标志性产品，是古巴国有雪茄公司用自己所有的技术来开发的，口感绵长而浓郁，味道要比看上去的更加浓烈。他觉得这个款式的雪茄燃烧更加均匀。高斯巴这个品牌是1961年开始由烟草管理局专门为他创立的，这个原生的名字来自印第安人对雪茄的叫法，而不是烟草和雪茄的名称。在革命之前，作为学生的卡斯特罗更喜欢抽不同的雪茄品牌，从罗密欧的丘吉尔型到H Upmann，或者是Bauza以及Partagas等不同的品牌。等到他发现高斯巴的时候，他觉得这款雪茄是如此的柔软，不是一个过于紧凑的雪茄，非常容易抽，于是他开始觉得值得建立一个雪茄工厂来生产，而今天这是一款全世界雪茄爱好者所公认的全球最优秀的雪茄品牌。他早年在山区打游击的时候，经常有人从山下偷送雪茄给他，他总是不抽最后一根雪茄，而是把它放在上衣口袋里，等待着好消息或者坏消息才会抽最后一根。

而有趣的是，卡斯特罗出于对雪茄的挚爱而坚决不去抽香烟。他的看法非常有意思，他认为香烟是需要吸到肺里去的，所以可能导致肺癌。而雪茄在全世界被很多聪明人享用，包括很多医生。他们认为抽雪茄的风险并不比骑着摩托车飞驰或者滑雪运动更多。所以卡斯特罗坚持锻炼身体增强他的肺活量，他一直认为雪茄对于身体的危害更小，即便香烟有了所谓的过滤嘴之后也依旧很危险。但是也有医生说抽一支雪茄相当于抽一包香烟的尼古丁含量，而且至少含有60种致癌物质，所以雪茄爱好者罹患口腔癌以及咽喉癌是一般吸烟者的8至10倍。由于雪茄燃烧时产生的气体为碱性，而香烟为酸性，碱性的气体令口腔以及食道黏膜更容易吸收尼古丁，加上雪茄没有滤嘴的设计，外层直接包裹加工后的烟草，所以加速吸收尼古丁，其吸收的速度约为香烟的8倍。卡斯特罗在戒烟多年以后力陈抽烟的害处，他说：“这盒雪茄最好的用途，就是拿来给你的敌人。”

深港通来了

主笔 / 谢九

11月25日，中国证监会和香港证监会发布联合公告，深港通将在12月5日正式开通。

与两年前开通的沪港通相比，深港通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投资标的的变化。沪港通主要对接的是上海和香港两地的大盘蓝筹股，深港通除了对接深圳和香港两地的大盘蓝筹股之外，一些中小市值的股票也纳入其中。

对于内地投资者而言，最关心的是深港通相比沪港通多出了哪些可以投资的港股。从公布的深港通细则来看，可以投资的港股主要包括四类：（1）恒生综合大型股指数的成份股；（2）恒生综合中型股指数的成份股；（3）定期调整考察截止日前12个月港股平均月末市值不低于港币50亿元的恒生综合小型股指数的成份股；（4）A+H股上市公司在联交所上市的H股。如果对比沪港通不难发现，其中1、2、4其实在沪港通下已经开通，此次真正新增的投资品种是“市值不低于港币50亿元的恒生综合小型股指数的成份股”。

而对于香港投资者而言，因为以前沪港通下开通的是上海市场的股票，而此次深港通开通的是深圳市场股票，因此对香港投资者意味着新增的都是全新的品种，主要包括：（1）定期调整考察截止日前6个月A股日均市值不低于人民币60亿元的深证成份指数和深证中小创新指数的成份股；（2）A+H股上市公司在深交所上市的A股。

当初沪港通开通之际，分别设置了总额度和每日额度的限制，港股通总额为2500亿元人民币，每日额度为105亿元人民币，沪股通总额为3000亿元人民币，沪股通每日额度为130亿元人民币。此次深港通保留了每日额度的限制，深股通每日额度为130亿元人民币，港股通每日额度为105亿元人民币，和沪港通每日额度一致，不过深港通取消了总额度的限制。主要原因在于，沪港通开通两年之后，实际使用额度距离总额度还有相当远的距离，截至2016年10月底，沪股通额度共使用约1420亿元，占总额度的47%，港股通额度共使用约890亿元，占总额度的

36%。由此看来，总额度实际上也是名存实亡，所以此次深港通直接取消了总额度限制。不过为了防范资金每日大进大出的跨境流动风险，还是保留了每日额度的限制。今年8月份，沪港通也已经正式取消了总额度限制，在资金额度限制上，沪港通和深港通目前保持一致。

从沪港通运行两周年来看，无论是沪股通还是港股通，市场表现基本上可算波澜不惊，内地市场没有如想象中迎来大规模的增量资金，而香港市场也没有给内地资金太多惊喜，无论是北上还是南下的资金，都没有给对方市场带来过多的影响和冲击，平稳兼平淡可能是过去两年沪港通的主要特点。从沪港通的资金使用额度就可见一斑，过去两年来，沪港通共使用额度47%，港股通共使用额度36%，二者使用额度均未过半，一定程度上也说明市场的热情其实远低于当初的预想。深港通开通之后，虽然新增了一些中小创的股票，成交活跃度可能会有所上升，但是总体市场表现预计基本上和沪港通一致。

内地和香港市场由于投资者结构、投资风格等存在很大差异，虽然两地市场在技术上打通，但是投资文化也很难融合，两地市场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呈现出一种疏离的状态。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两地投资者而言，两个市场之间互相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因此两地市场都很难指望对方的投资者能够扮演救世主的角色。

对于内地投资者而言，香港市场的最大吸引力在于估值低。在沪港通开通之前，很多内地投资者一度相当憧憬香港市场的低估值，认为两地市场打通之后，两地市场的估值差异将会抹平，低估值的香港市场可能会带来巨大的投资机会。但是沪港通运行两年之后，内地投资者绝望地发现，即使两地市场已经打通，但是两地的估值差异依然如坚冰难以融化，内地市场高昂的估值始终难以回归，而香港市场的低估值也难以向上，绝大多数时候表现得死气沉沉，让活跃的内地投资者难以忍受。

香港市场对于内地投资者的另一大吸引点在于规避人民币贬值，由于香港实行和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也就意味着人民币对港元同

步贬值,从去年8月份中国央行汇改以来,港币/人民币从0.79升值0.89元,涨幅约为13%。内地投资者在沪港通或者深港通下购买香港股票,相当于将人民币换成港币资产,在目前国内投资者无法直接购买美国股票的背景下,购买港股相当于曲线规避人民币贬值。理论上而言,通过购买港股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人民币贬值,不过这种做法难以成为主流,一是因为人民币在连续大幅度贬值之后,随时面临回调的可能,美元的过度强势能够持续多久始终是一大悬念;其次,股票市场自身波动极大,股价的波动远大于汇率的波动幅度,投资者即使能够规避人民币贬值风险,很有可能最终在股价波动上蒙受更大的损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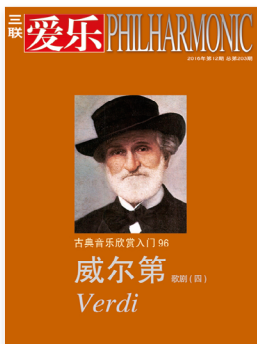
对香港投资者而言,内地股票市场开通最主要的吸引力,在于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手中的离岸人民币有了更多的使用途径。不过和两年前沪港通相比,现在深港通开通的时机可能会使得这一吸引力下降。两年前人民币兑美元还处于上升通道,当时香港市场有大量的离岸人民币苦于没有合适的投资渠道,因此当时的沪港通在一定程度上为香港离岸人民币找到了一条投资路径,也为人民币国际化迈出了重要一步。不过时至今日,人民币贬值正处于风口浪尖,在贬值预期下,离岸人民币大都处于抛售状态,因此在深港通下购买内地股票的吸引力并不是太强,而且,离岸人民

币如果有意进入内地股票市场,也早就可以通过沪港通的渠道进入,深港通的开通对此并无实质性影响。

另外,内地市场的高估值一直是香港投资者的拦路虎,在沪港通时代,香港投资者尚且畏惧内地的高估值,而沪指的市盈率远低于深圳市场,深港通时代,深圳市场的高估值可能更会让很多香港投资者望而却步。目前香港恒生指数市盈率大概为11倍,沪市市盈率为16倍,而深圳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的市盈率分别为27倍、54倍和81倍,很难想象谨慎的香港投资者可以接受这样的估值水平。内地市场如果迎来牛市,最终也一定是靠内地资金来推动,而不太可能指望香港投资者。

虽然说深港通的开通不会对两地市场的走势带来实质性影响,但是也并不能因此否认其积极意义,因为对于两地投资者而言,至少拥有了更丰富的投资标的,比如内地市场牛股频出的军工、医药和白酒行业等,在香港市场就属于稀缺资源。同样,香港市场的一些高科技股票,同样也向内地投资者打开了大门,比如腾讯控股,在沪港通开通之前,大部分内地投资者都没有投资机会,而沪港通开通之后,内地投资者可以分享这家公司的成长,从沪港通开通两年来看,腾讯控股的股价从100港元左右最高上涨到220港元,这都是内地投资者可以参与分享的投资收益。■

大家都来听一点古典音乐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 84050425 84050451
84681046 84681042 (传真)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爱乐》杂志网址:
<http://www.lifeweek.com.cn/philharmonic>

《爱乐》2016年第十二期要目

古典音乐欣赏入门系列96

- 威尔第颂
- 王立彬、雷苗苗、秦子超、任海杰对威尔第的《麦克白》、《命运之力》、《阿伊达》的精彩解读

逝者 纪念英国指挥家、小提琴家内维尔·马林爵士

专访 青年钢琴家郑吟访谈

话题 指挥艺术历史中的继承关系梳理(三)
意大利歌剧的历史到底有多长?

爱乐笔记 舒伯特 D.960 的四个版本

乐史空间 莱茵河岸边盛开的花朵——曼海姆乐派

作曲家档案 被遗忘的作曲大师泰勒曼

演奏家档案 记伟大的匈牙利音乐家科奇什

唱片说明书 听富特文格勒指挥的理查·施特劳斯《变形》

作品 弗朗克的《前奏曲、圣咏与赋格》

听片、购片与收藏 琴键上的波兰之肖邦大赛冠军唱片记

我的爱乐往事 凯尔特竖琴

《爱乐》2017年订阅须知

2017年《爱乐》月刊,每期240页,全年12期,零售单价:20元,全年定价:240元。

2017年《爱乐》邮局发行,邮发代号:

82-24,读者可到各地邮局直接订阅,也可汇款至杂志社订阅。全年订阅8折优惠,订阅年价:192元。欢迎咨询、订阅与作为礼品馈赠他人。或在卓越网订购: www.Amazon.cn

邮局汇款: 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收款人:爱乐

银行汇款: 开户行:工行王府井金街支行

户名:三联生活周刊

账号:0200000719004641092

网上支付: www.lifeweek.com.cn



(视觉中国 供图)

郭川：成为船长

记者 / 邱杨

“当时有人跟我说，你只要坚持到最后从船上走下来就行了，你就是狗熊也不会有人知道。”但郭川心里明白，自己代表的是中国元素，并不是因为实力而入选。“或许有些人觉得这样的经历已经足够，但我要做到名副其实。”

失联

郭川出发前，朱悦涛曾特意飞到北京为他饯行。这天晚上，老大哥放心不下即将远行的兄弟，不厌其烦地反复叮嘱：“大江大海都过来了，你小子一定不能大意，可别成了老水鬼。”没想到，这一面竟成了他们之间的诀别。

事实上，朱悦涛对这次穿越太平洋的航行并不担心。相较于三年前持续了138天的单人无间断环球航

(视觉中国 供图)



左图：2016年9月16日零点48分24秒，郭川带领6人团队驾驶“中国·青岛号”冲过白令海峡终点线，创造了完成北冰洋东北航线的世界纪录

右图：2012年11月18日，郭川驾驶无动力帆船从青岛奥帆中心起航，进行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图为郭川与送行的家人

行，郭川这次的挑战难度不算大。他的状态也很轻松从容，以至于身边的朋友们并没有将之视为一次危险的航行。自从10月19日晚上，郭川独自驾驶着超级三体大帆船从旧金山金门大桥出发后，朱悦涛也没有像郭川过去单人环球时那样，密切地关注他每天的实时航迹。直到26日上午10点，一则电话打破了平静。

“郭川那小子，已经20个小时没动静了。”电话里传来朋友焦急的声音，朱悦涛心里咯噔一下，赶紧打开网站查看郭川的实时航迹——原本20节的船速已经降到几节，航迹变动很慢。“会不会是GPS故障？”朱悦涛依然不敢相信出事了，不死心地追问。直到朋友告诉他，美国军舰已经赶往事发地，究竟人还在不在船上，一切都是未知数。

这并不是郭川第一次失联，12年前那种刻骨铭心的恐惧煎熬，瞬间从朱悦涛的记忆中打捞出来。2004年9月，是郭川第一次作为船长，从青岛远航至日本下关。就在起航的第二天，他们的船就遇上了台风。到了下午17点约定好的通话时间，朱悦涛却怎么也打不通卫星电话。作为这次航行的策划人，他急得整晚都没敢合眼，船毁人亡的阴影始终伴随着失联的焦

灼，就像一颗迟迟没有爆炸的哑炮。

第二天清晨，天刚微亮，朱悦涛又开始一遍接一遍地打电话。直到7点左右，一直闷声不响的电话突然被接通了，在听到郭川声音的那一刹那，积蓄了整晚的焦虑和担忧一下子得到了释放，40多岁的朱悦涛在电话里哭得像个孩子，眼泪按捺不住地往外涌。

此刻的他多么希望，这次失联也像当年一样，只是虚惊一场。但很快，美军的前方搜救传来了坏消息——“青岛号”帆船的大三角帆落水，船上并没有找到郭川的踪影。人船分离的现实，让朱悦涛很难接受，他相信一定是在极其意外的状况下造成的。在他的印象中，从12年前第一次见面时起，郭川就一直是非常严谨的人。

“形象船长”

彼时的朱悦涛是青岛奥帆委的综合部部长，正在为全国第一艘无动力远洋帆船“青岛号”寻找船长。见到郭川第一面时，他试探性地问：“你玩过帆船吗？”郭川说：“做过，在香港和奥克兰学过一点儿。”

不同于很多人满嘴打包票的做派，这个老实直白的回答让朱悦涛心生好感。眼前的中年男人话不多，甚至有些不善言辞，但给人感觉很踏实正派，对人不设防。仅仅第一面，朱悦涛心下就认定，就是他了。

事实上，朱悦涛已经为船长人选犯愁了很久。作为北京奥运会帆船赛事的承办城市，青岛开始提出打造“帆船之都”的城市口号。朱悦涛由此萌生了“航海三步走”的大胆设想：第一步跨洋出海，第二步中国沿海行，第三步环球航行。但在彼时的青岛，海面上几乎看不到大帆船的影子，在中国的沿海城市里，也鲜有停靠远洋帆船的港口。

一个偶然的时机，在2004年的上海船展上，朱悦涛认识了张伟民。后者刚刚买下两艘美国亨特40远洋帆船，并成为其在华的商业代理。看准了正在升温的奥运会效应，在船展上两人一拍即合，张伟民同意将船停靠在青岛，来实现朱悦涛的航海设想——由青岛人驾驶远洋帆船，跨洋出海宣传奥运会。

这下子船有了，但棘手的是，缺少一个能驾驶远洋帆船的青岛人。在朱悦涛心里，合适的人选除了是青岛人之外，还要对帆船航海有热忱，还得有闲不缺钱，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来远航。如此苛刻的条件，以至于他找遍了整个青岛，愣是没找到合适的人选。

“我们虽然有全国第一所航海运动学校，但上到教练员，下到运动员，都是玩的运动帆船，这和远洋帆船完全是两个概念。他们也不具备远洋航行的心理素质和技术能力。”朱悦涛打听到厦门、深圳等地有这样的航海能人，但青岛人的限定条件又把范围圈死了。

就在这时，张伟民向朱悦涛推荐了郭川，当时的郭川已经在极限运动圈小有名气。在此之前，郭川一直是传统意义上的“学霸”：以优异成绩考上北航飞行控制器专业，又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第一批MBA毕业生，毕业后在航天部下属国有企业工作，负责国际商业卫星发射的相关工作。

但在体制内待久了，郭川总有种被束缚的感觉。1999年，34岁的他辞去了副局级的职位，一头扎进了极限运动的世界里。那时的北京，生活成本并不高，也不像现在有着房子车子等一大堆令人紧张的话题。他只觉得人生还很长，趁着单身，该干点自己喜欢的事了：他学开滑翔机、潜水、滑雪，玩风筝板……尝试一切有趣的挑战，帆船也是他的诸多兴趣之一。

和郭川见面后，朱悦涛当即判断，眼下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除了郭川是青岛人中为数不多摸过大帆船的之外，更打动朱悦涛的是郭川身上的那股韧

劲。“说不上来是种什么感觉，就是觉得他这个人挺靠谱的。”他向郭川描绘未来的宏伟蓝图，一定要把郭川打造成青岛的第一位远洋船长。

2004年正好是青岛和日本下关建立友好城市25周年的历史节点，朱悦涛便策划了“奥运友好使者行”的活动——郭川作为船长，驾驶着“青岛号”帆船将青岛市市长的信送到下关市。现在回想起来，朱悦涛却感到后怕：“那时候真是无知者无畏啊！当时的我们对航海根本没有概念，想得很简单，反正船沉不了，漂着也能漂到吧。”

当朱悦涛向青岛市领导汇报时，有人泼冷水说：“一个浪拍过来不就完了？”但领导最终下了决心，同意朱悦涛用“青岛号”的名字，注册了当时全国第一条无动力远洋大帆船，代码“001”。“注册时，到底是归体育总局管，还是交通部管，在法律上也是个空白。去保险公司也不让投保，从来没遇到过，一切都是新鲜事物。”朱悦涛到企业去拉赞助，“甭管你说得多天花乱坠，也没搞到钱，最后才拉到了二三十万元，纯粹就是裸奔。”

而郭川去办签证时，也遇到了一个小插曲。日本签证官问他什么时候出发，郭川说9月12日出发，22日到达。签证官一听不对劲：“这10天你们在哪儿？”郭川很无辜地回答，在路上。“什么路需要10天？即便坐游轮也要不了这么久。”郭川赶紧解释是怎么回事，日本签证官一听竟然是驾驶无动力帆船前往，就立刻给了签证。

万事俱备，但很显然彼时的郭川尚不具备远航的能力，朱悦涛对他也没法儿百分百信任。为此，郭川请来了香港的职业“船老大”保驾护航。出发前，朱悦涛叮嘱郭川：“在岸上、在媒体的镜头里你是‘形象船长’，但一旦上了船出了海，香港的船老大才是真正的船长，你一切都要听他的。”郭川顺从地点点头，这让朱悦涛对他的好感又多了一层，“他知道自己什么行什么不行，不行的时候很谦逊，不争名逐利”。

2004年9月12日，在青岛尚未竣工的奥帆基地施工现场，郭川第一次驾驶着“青岛号”帆船出海了。朱悦涛夹在欢送的人群中，站在岸边久久目送。眼看着船刚刚驶出湾口，却突然打了个趔趄，停住不动了，远远看到船上的人手忙脚乱。朱悦涛心里一紧，赶紧给郭川打电话，原来是船好像碰到了什么东西。他脑门上直冒汗，对着电话嚷嚷：“别停别停，你们赶紧走！岸上的媒体镜头还在拍着呢！”直到帆船消失在视线中，他的心才算落地。

可没想到，当天夜里21点多，“青岛号”帆船

又悄悄回来了——船舱出现不明原因的漏水，不敢再往前开了。时任青岛航海运动学校校长的代志强，特意找了几名潜水员下水察看，却也没找到毛病出在哪里。一时之间，只能僵持在这里。这时，郭川突然蹲下来，舔了舔漏出来的水，发现味道是淡的，也就是说，渗进来的不是海水。众人顺藤摸瓜，很快找到了出水点——原来是出发时的意外碰撞，导致船舱淡水箱漏水。一场虚惊后，船又再次出发了。

在经历了起航时的意外碰撞、当天夜里的返航，和第二天的台风失联事件后，好事多磨的“青岛号”首航，终于在10天后顺利抵达日本下关。

第二天就是日方的欢迎仪式。由于担心郭川不善言辞，作为“船长”的发言讲不到点子上，朱悦涛头天晚上特意替他写好了发言稿。尽管在朱悦涛看来，这篇发言稿尽是“正确的废话”，但在第二天的公开场合里却不失为稳妥的保障。他特意叮嘱郭川：“一定要照稿子念，千万别说错话。”

到了第二天，“船长”郭川在众人的簇拥下上台致辞。到了台上，他显然有点紧张，肩膀不自觉地往上耸，手也不知道往哪儿放，两个大拇指硬邦邦地插在裤兜里。看到站相不佳的郭川，台下的朱悦涛使劲给他使眼色，却也无济于事。等到郭川一开口讲话，朱悦涛心里就直呼：“坏了！这小子没按稿子念，连拿都没拿。”

但出乎意料的是，郭川自己讲的，要远比讲稿好得多。朴素又真挚的话语，让朱悦涛对他刮目相看，在场的日本议长也感动得频频点头。朱悦涛现在回想起来，这段早年的发言，或许就是郭川内心深处，对航海最初的真实感悟——

“6年前我来过日本，当时坐飞机也就是两个小时的事儿。6年后，在现代交通如此发达的当下，我却以一种最原始的方式，冒着最大的风险，在海上航行了10天，才又一次踏上日本的土地。作为一个信使，通过这种最传统的方式，来表达一个青岛市民对关人民真挚情谊。”

受挫的“英雄”

当“航海三步走”面对第三步环球航行时，朱悦涛心里却打起了退堂鼓——通过前两次远航，他愈发感到航海不是简单的事。在朱悦涛看来，环球航行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出于技术和安全的考虑，他只得暂时搁置，等待时机。

没想到，时机很快就自己找上门来。2005年的某

天，一个商业代理辗转找到青岛奥帆委，向朱悦涛推广克利伯环球帆船赛。在得知这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业余环球航海赛事之一后，朱悦涛的第一个反应是，机会来了。他想借助这项赛事，实现“青岛号”环球的设想。

但商业代理一张口就提出了100万美元的冠名费，这让朱悦涛傻了眼。政府没钱赞助，企业不愿赞助，他找了很多奥运赞助商一家家挨个游说，却一无所获。他不住地感慨道：“即便是在今天，大家对航海这件事也没有足够的认识，更何况在10年前。”

朱悦涛并不死心，他直接给克利伯在英国的市场CEO发邮件，并劝说对方亲自到中国来直接沟通。在朱悦涛有理有利有节的游说下，更是在奥运魔力的吸引下，CEO最终同意——青岛市以零资金，将克利伯赛事帆船冠名为“青岛号”。

接下来，又回到了选人的老问题——当克利伯赛事帆船在青岛靠岸时，一定要有一个英雄般的人物从船上走下来。朱悦涛第一个就想到了郭川，他要继续把郭川打造成青岛的“航海英雄”。但不巧的是，郭川当时已经订好了飞往新西兰的机票，为户外媒体拍摄滑翔翼的短片。已经答应的事，他不想临时爽约。

这天晚上，朱悦涛在咖啡馆里和郭川谈到半夜。“我跟他说，你一定要继续走下去。”好一阵动员后，郭川才终于同意了，代表“青岛号”参加新加坡站至青岛站的比赛。对于彼时的他来说，帆船航海和滑翔翼一样，与他的诸多其他爱好并没有太大差别。他之所以答应，或许更多的是出于一个青岛人的责任。

2006年1月，郭川作为首位征战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登上了“青岛号”。在船上，他的身份是水手，但他却觉得自己更像一个“插班生”：“周围都是素不相识的外国人，而他们彼此间都很熟悉。”所幸大家有着共同的目标，郭川逐渐融入到队伍中去。尽管曾经有过两次沿海航行经历，但这却是郭川第一次面对真正的大洋。多年后，郭川曾充满感情地如此回忆：“参加克利伯，是我完成单人不间断环球航海必须要经历的第一步。”

当年4月，当郭川随船抵达青岛时，整个青岛都为他轰动了。“当我们在家里穿着棉袄，吃着烧鸡，喝着咖啡的时候，郭川却在大洋里战风斗浪。”在朱悦涛看来，如果说过去的两次航海，人们的注意力都在“青岛号”上，那么这一次，舆论的焦点都落在了郭川身上。当他从船上走下来时，就完成了从“形象船长”向“青岛英雄”的转变。舆论赋予他的意义，结结实实地触动了青岛人心里的柔软神经。当年，郭

上图：2016年10月18日，国际裁判莎玛叮嘱郭川过旧金山金门大桥出发线时的注意事项

下图：2016年10月18日，郭川驾超级三体船冲过旧金山金门大桥下的出发线，正式开始“金色太平洋挑战”航行



川被评为感动青岛的十大人物。

或许郭川自己都没有料到，参加完克利伯回来会是这样的境况。他还是一如既往，徜徉在极限运动的世界里，帆船航海也并没有从此变成他的唯一。但朱悦涛却敏锐地感觉到，或许正是从这个节点开始，作为公众人物的郭川开始自觉不自觉地背负起一种隐形的责任，尽管这种责任在彼时还很轻微。

而真正对郭川的内心产生巨大冲击的，则是两年后的沃尔沃环球帆船赛。为了打开正在悄然兴起的中国航海运动市场，沃尔沃环球帆船赛决定在青岛设立停靠站，以中国赞助商命名的“绿蛟龙号”也将邀请一位中国选手参赛。得知消息的郭川，这次却主动提出了申请。在完成从爱尔兰到冰岛近2000海里的测试航行后，船长伊恩决定，郭川入选媒体船员，成为这条船上11名船员中唯一的亚洲人。

但郭川却有点沮丧，成为媒体船员而不是水手，意味着他将不能参与航行的实际操作，而是负责拍照摄像，记录航行中的点滴传回后方。这是他始料未及的结果。在好友黄剑的记忆中，那一天，郭川趴在桅杆上纠结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接受媒体船员的新身份。“毕竟没有哪个水手能拒绝沃尔沃的诱惑，就像没有水手能躲过女妖塞壬的歌声。”而黄剑也加入了“绿蛟龙号”的岸队。

作为全球顶尖的专业帆船赛事，沃尔沃环球帆船赛有“海上珠穆朗玛”之称。一上船，郭川就立刻感受到了差距：船长伊恩获得过两届奥运会亚军，拥有四个世界冠军头衔；值班船长达蒙刚刚获得巴塞罗那环球帆船赛冠军，有七次环球30万海里的纪录；前桨手贾斯汀是沃尔沃上一届冠军队船员……甚至连其他船上的媒体船员，也都参加过奥运会帆船赛，个个身强力壮，经验丰富。

好比是“一个小学生面对着十个教授”，无论是驾驶技术、身体素质，还是对航海精神的理解，郭川和队友们都隔着巨大的鸿沟。完美主义者郭川一下子倍感压力，甚至压得他透不过气来。在完成第一段航程抵达南非开普敦时，郭川曾这样剖白心迹：“这个航行实在太苦了，如果有十分力气，那我必须全部拿出来，再加上我对航海的热爱才能坚持下去。”黄剑在旁边，能感受到郭川的纠结：“他好像很羞愧，那些藏在他内心深处的恐惧、退缩有时会变得非常强大。”

也正是在这个赛段里，高速航行的“绿蛟龙号”意外撞上一条大鱼，20节的速度瞬间停滞，郭川一时控制不住，直接从舱门摔进前舱的垃圾堆中，几乎

把鼻梁骨撞断。他也时刻担心自己记录得不好，会拖这艘船的后腿，也觉得没面子。作为老友，朱悦涛很能理解郭川此刻的心境：“他是个很要强不服输的人，尽管不擅长表达，嘴里不说，但常常暗自较劲。更何况，他不愿意在老外面前丢中国人的面儿。”

但压力往往真的会压垮人。在接下来的赛段里，郭川开始出现严重的失眠，几十天睡不着觉——“就好像在水里一样无法呼吸，溺水一般苦不堪言。”在郭川眼里，海上只剩下“热”和“没风”，航行已经失去了乐趣。但他仍然咬牙坚持着，就像打仗受伤后爬着往前冲。

当船队抵达新加坡时，巨大的压力让郭川患上了抑郁症。他站在酒店26层的阳台上，问黄剑：“我要是现在跳下去，会怎样？”事实上，他一直在服用随队医生开出的抗抑郁药物。在黄剑眼里，郭川已经陷入巨大的黑暗之中，“甚至不会笑了”。为了以防万一，伊恩船长也告诉黄剑，要随时准备好出发，加入下一赛段。

但是对于郭川来说，如果“绿蛟龙号”在抵达家乡青岛时，自己不能荣耀地站在船头和支持他的家人朋友挥手，是比死还难受的事。“如果因为现在的困难退缩了，那我就永远回不到海上了……”船队从新加坡出发的前一天，郭川要求跟着船队继续参赛，他将迎着寒冷的西北风，从新加坡北上青岛。事实上，这也是一段艰苦卓绝的航程，有三艘赛船在此赛段中因损坏而退出了比赛。

在抵达青岛的那个晚上，郭川和前来迎接他的姐姐在码头上紧紧拥抱。对他来说，停靠青岛是个坎——当抑郁失眠牢牢缠绕他时，亲友和故土的温暖让他感到眷恋，甚至一度萌生退意。但“英雄”不能退缩，“一定要在大家的目光中、在媒体的镜头前，雄赳赳气昂昂踏上船再次出发”。尽管心疼郭川的状态，但朱悦涛依然劝他：“你必须继续走下去，不然前面所有的努力就都完蛋了。”

为了缓解失眠，朱悦涛陪着郭川彻夜打球。他甚至还给单身的郭川介绍对象，想让他上岸有个牵挂，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但见面后，郭川觉得不来电，也就没成。身边的家人和朋友们，也都在想尽一切办法帮他回到正常。

很快就到了重新出发的这一天，郭川再次拒绝了船队让他休息一个赛段的建议，咬咬牙继续航行。下一个赛段是从青岛到巴西里约，也是沃尔沃有史以来的最长赛段——1.23万海里，这意味着他们将在海上连续航行长达40多天。尽管失眠抑郁的症状仍未消除，

但郭川很清楚，船一旦开走，自己肯定会后悔。

当船越过赤道，郭川的状态竟然变得越来越好，行至南半球时，他的病症竟然神奇地消失了。“好像过了某个时刻，心里所有的负担就慢慢放出来了。”他终于熬过了这道坎，知道极限在哪里。“当时有人跟我说，你只要坚持到最后从船上走下来就行了，你就是狗熊也不会有人知道。”但郭川心里明白，自己代表的是中国元素，并不是因为实力而入选。“或许有些人觉得这样的经历已经足够，但我要做到名副其实。”

在此之前，或许帆船航海和他热爱的其他极限运动并没有什么差别，但当他沿着隐形的轨迹一步步走过来，郭川越来越清晰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刚接触大海时，它给我的感觉就是好玩，那是一种单纯的喜欢。当很多其他因素加了进来，包括你的经历——比如一不留神参加了沃尔沃那次航海赛，在这个过程中，痛苦不堪的那部分，逐渐变成了收获。到最后，我希望自己能达到一个高度，这个高度已不再是起初那种单纯的好玩了。”

“我只是希望把爱好变成一个真正让别人信服的东西，对得起别人对你的尊重。”这个念头在他的心里疯狂蔓延生长，这一年，郭川44岁。

蛰伏的“疯子”

在沃尔沃帆船赛结束后，郭川突然消失了，从人们的视线中淡出。

他单枪匹马远走欧洲，开始按照职业化的方式进行系统训练。“从一开始，郭川的想法就很明确，只瞄准了单人航海。”曲春是青岛航海运动学校的副校长，出发前，郭川曾跟他深入探讨。相较于法国，曲春感觉英国的培训更加严谨。但郭川最终选择了法国，他看中的恰恰是法国在单人航海上的成熟度。“法国有很多针对单人航海的专项训练，从设备器材到市场环境，都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这里盛产单人航海的冒险家。”

尽管在此之前，圈子里还从未有人敢做这样的挑战，但这个决定放在郭川身上，曲春却并不觉得突兀。早在十几年前，曲春就认识郭川，在他的印象中，郭川做事从来都是踏实严谨。“他很清楚自己的差距，也不盲目冒进，而是一步一个脚印地成长进阶，默默积攒力量。”

事实上，从团队航行转向单人航行，风险和难度都呈数量级的增长。“比如说睡觉，要训练每20分钟

醒一次，一般正常人谁扛得住？还有潜水、水下维修、气象分析、无线电通讯等等专项课程，要求也更严苛。”在曲春看来，单人航海对人的综合能力要求极高，当遇到故障、遭遇凶险时都得一个人去应对，难度之大不言而喻。

更难熬的是心理上的孤独和恐惧。曲春也曾随团队出海航行，“在海上的夜晚，如果没有月光，那真是漆黑一片。尤其在极度疲劳时，极易出现各种幻觉”。曲春就总感觉前方有一座大山堵住航道，眼看着船马上就要撞上去。尽管有电子导航设备和雷达，但这种恐惧感却挥之不去。在苍茫的大海上，一船人显得过于渺小，这种恐惧会传染，时间长了甚至连交流能力都会下降。“更何况是单人航海？幻觉、恐惧、无助会轮番侵扰你的意志。”

航海的人通常分两种，一种是十年怕井绳，另一种是会上瘾。吴亮很能理解郭川对帆船航海的痴迷，他和郭川一样都是理工科背景的名校毕业生，都是在玩遍极限运动后最终停留在帆船上。或许旁观者很难理解郭川的投入和付出，但吴亮却感同身受：“内心深处想要给自己一种自由方式，来诠释对生命的理解和热爱。”事实上，帆船航海是很孤独的。“在海上你没有观众没有镁光灯，一个人赤裸裸地面对大海，用心在和它对话。”

“世界上有将近1000多个级别和项目的帆船，你能想象吗？”在吴亮看来，帆船不仅是所有体育项目中最复杂的，也是对人的综合能力要求最高的。“仪表、风向、水流、机械、电子、力学，这些知识储备在航海中都很重要。”作为典型的理工生，吴亮越来越发现，之前的积累都仿佛是为了遇上帆船而准备的。这是吴亮的优势，同样也是郭川的优势，其中的复杂和变化对他们来说，有着极大的挑战乐趣。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渴望尝试单人航行，尽管单人航行在航海圈中荣誉极高。“这意味着要放弃正常人的生活，就这一点，99%的人都做不到。”吴亮也暂时没想过单人航行。“按正常人的标准来看，我们玩船的都是异人，但单人航行，全世界也只有极少数的‘疯子’才会干，这需要更为强悍的意志和能力。”

而郭川恰恰就是这样的“疯子”，他背井离乡孤身一人来到法国艰苦训练。他曾这样描述那段苦行僧般的日子：“风景再美，也视而不见。我很清楚自己需要什么，我得去克服什么——那些孤独、情感、似有似无的情绪。”对郭川来说，那也像是一种精神上的训练。他后来之所以能在海上一个人忍受138天，这段经历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很多人问我会孤独吗？

当然会，但比你们想象的好得多。”

黄剑在生活中见证了郭川那个阶段的“疯狂”。“郭川是一个很专注的人，在法国为了训练，他可以天天吃我们看起来会受不了的单调食物，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脑子还要满负荷运转。”黄剑相信，以这样一种职业态度执着准备的人，成功只是时间问题。跟朋友聊天时，郭川也吐露过想成家。“他说最好是在城市繁华一点的地方，因为航海这些年，总是在荒凉偏僻的荒野，太寂寞了。他也希望家里有个为他熨衬衫的女人……”

几年后当郭川终于成家时，却无法与妻子长相厮守。他仍然继续在法国过着苦行僧般的留学生活：每天早上8点到港口训练，晚上19点回去查邮件，并给怀孕的妻子打电话。此时的他，仍然在为航海梦想而孤身奋战。所幸成效已逐渐显现：他是参加环法帆船赛并首次夺冠的中国人，也是首位参加跨大西洋Mini Transat 极限帆船赛事的中国人。

但追逐梦想的道路上不是没有遗憾，郭川甚至错过了与父亲的最后一面。当他在法国为Mini Transat 资格赛做准备时，接到了父亲在青岛去世的消息。在巴黎机场，他一直等到凌晨3点，却被告知航班因机械故障而取消。那一刻，他知道此生再见父亲一面已是奢望。在郭川的记忆中，父亲长期卧病在床，嘴上却总说自己很好，催促儿子赶紧回去做事。“人总要遇到这一关，可我还不会怎么面对。父亲总是以我为荣，所以我不能停下来。”郭川就像憋着一口气想要潜到彼岸，“因为一旦停下来，我就会迷失方向。”

138 天的修行

郭川是在2010年的春天，萌生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的念头。心念一旦生发，就难以遏制。对于这个念头，朱悦涛是强烈反对的：“太危险了！”郭川让朱悦涛放心，他的决定并不是盲目冒进，经过这几年的系统训练和比赛实践，郭川早已不是往日的他。

在那段时日里，他总是反复向朱悦涛说起一部电影：男主人公也在进行不间断单人环球航行，但在靠近南美某个岛时，他受不了靠了岸，后来他又继续航行，最终回到了英国。媒体把他称为航海英雄，但英雄却一直自责，最终受不了良心的谴责而自杀了。在郭川眼中，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是他实现自我价值的梦想，他不容许自己中途放弃。

郭川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创纪录。事实上，帆船项目在西方国家开展很早，世界上已经有近70位

专业水手驾驶帆船完成过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郭川需要寻找一个窗口期——他发现在40英尺这个船体级别，国际帆联还没有环球航行的世界纪录。他选择了一条异于前人的新路线：从青岛出发穿越赤道，抵达南美洲最南端合恩角，然后向东绕过好望角，再穿越赤道从南中国海域回到青岛。

事实上，单人环球绝不只是一个人的奋斗，而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很多社会资源的整合协助。一向严谨务实的郭川很明白这一点，尽管他的性格并不擅长社交。2012年3月，在三亚沃尔沃帆船赛的一次晚宴上，郭川认识了刘玲玲。当时距离他的环球挑战仅剩8个月，他还在寻找专业经纪团队的协助。“吹牛的人太多了，我一开始不太敢相信。”这是刘玲玲的第一反应。直到她亲眼看到了郭川在法国的训练，郭川的专注打动了她，临走时，她决定帮助郭川，成为他的项目管理人。

但找赞助却远比想象中困难。朱悦涛也曾经尝试帮郭川拉赞助，但很多企业都难以理解——“这么个小船，那不是说翻就翻吗？”担心航海失败影响企业形象，纵使朱悦涛说破了嘴皮子，对方也不认可。现在回想起来，这恰恰是郭川航海面临的现状。“中国人是不亲水的，这种文化基因决定了骨子里不具备海洋意识。哪怕青岛人靠着海，还总说别淹着，归根结底还是害怕冒险。”朱悦涛越想越遗憾，“多少年才出了郭川这么一个人啊。”

尽管喝彩声寥寥，2012年11月18日，郭川还是独自驾驶“青岛号”帆船离开了陆地，开始了未知的环球之旅。临出发的这天早上，曲春作为国际帆联的代表，来为郭川即将创下的纪录做行前认证。走到船边他看到，船上只有零零星星几个人在忙碌，郭川的妻子正对着清单，安静地整理食物和矿泉水。这个清晨的静谧画面，让曲春印象深刻，恍惚有种夫人送英雄出征的感觉。而郭川则是一贯波澜不惊的样子，即便有大事也不轻易表露情绪。

半人高的麻袋堆在船角，里面放着郭川的全部口粮。曲春翻开一看，竟是300多包薄薄的冻干食品，连种类也只有雪菜肉丝面、西红柿炒蛋饭等三样。“大半年在海上就吃这个，受得了吗？”曲春有些讶异，郭川却默默地憨厚一笑。带上船的矿泉水，在出海后也将很快喝完，郭川随身带了一个海水淡化器，尽管淡化出来的水喝起来味道怪怪的，但这也是唯一的办法。

参加过各种大小极限帆船赛的郭川，比谁都清楚即将面临的风险。首先得熬过睡眠这一关，不能进入



10月28日，在山东青岛奥帆中心情人坝，中国航空航天大学校友和社会各界人士100多人，为25日在太平洋海域失联的郭川祈福。

深睡眠，每睡20分钟就要醒一次。他和箱子、杂物挤在不到10平方米的船舱里，尽管里面原本有张担架床，但他却一直睡在地板上，以便一旦出现状况，可以迅速翻身起来。海上潮气侵蚀进来，地板上总是湿漉漉的，他也只得和衣而睡。

在船上，他仿佛始终处于提心吊胆的状态。“机械故障、电子系统失灵、帆的破损，这些都会带来令人抓狂的想法——会不会造成连锁反应？会不会就此结束？”所有问题都可能对他的心理造成极大冲击，“相对而言，孤独又算得了什么？”

焦虑如影随形，郭川听说过一个在水手间流传的真实故事。一对法国情侣出海时遇到事故，男人爬上桅杆修理，但下来时却突然卡住了。这真是最危险的事，上面的人动弹不了，下面的人帮不上忙，只能眼睁睁看着男人挂在桅杆上，被吹成了肉干。

而在海上，任何小问题，都可能演变成无穷大的问题。12月的一天，帆船突然遭遇大前帆破损，船帆坠入水中。郭川只得紧急停船，在漆黑的夜里用了整整一个小时才将帆捞起。风浪中他距离水面仅一步之遥，而人一旦落水，船开走了就几乎没有存活的机会。

2013年1月5日，是郭川的48岁生日，也正好

是航行的第48天。他打开电脑，和妻子孩子们视频了一小会儿，彼时他最小的儿子还不到10个月，他给儿子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郭伦布。他的年夜饭也是在船上吃的，一袋冻干食物、一袋腊肠和一盒罐头，对他来说半饱半饥是一种常态。他也不怕承认：“在海上我常常流泪，有时候那并不是因为苦，那是一种很复杂的情绪，是一种十年磨一剑终于要爆发的感觉。”

在郭川环球的日子里，朱悦涛一直为他捏着一把汗。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察看郭川的航迹，只有看到航迹在变化，他才能安心，“起码说明人还活着”。有时候郭川也会用卫星电话和朱悦涛通电话，但绝大多数时候，郭川在电话里是闷的，偶尔聊上几句，只有在通过台湾海峡前，郭川曾和朱悦涛聊起正在犹豫如何穿过海峡。“从海峡外侧走安全，从内侧走节省时间，但可能遇上台风。我说你只要平平安安回来，哪怕是用200天、300天都无所谓，都是世界纪录。”但郭川很有主见，最终还是走的台湾海峡内侧。

事实上，郭川的冒险并不是匹夫之勇，而是一场谨慎的冒险。尽管经费有限，他还是花20万欧元聘

请了全球最顶级的气象专家，为这场“战斗”配备了最好的情报机关。气象专家给出的精准气象研判，是他做出判断的重要依据。这也不是他第一次做出类似的决策。郭川拒绝任何浪漫化的意图，在他看来，运气也是大自然对团队辛勤努力的恩赐。

经过长达 138 天艰苦卓绝的环球航行，郭川和“青岛号”奇迹般地回到了出发地。快要靠岸时，他情不自禁地扎进冰冷的海水里，奋力游向岸边。在爬上岸的瞬间，他长跪不起，深情地埋头亲吻脚下的土地。

停不下来的船长

在朱悦涛看来，单人环球成功后的郭川已经是个登峰造极的人物了，各种荣誉如潮水般涌来。老大哥有时候也劝郭川：“这个年纪了，挑战也总得有个头吧。”尽管郭川也袒露过，停下来以后想专门做远洋的航海培训。但说这话时，朱悦涛并没感觉到郭川真有退意。“他骨子里不会停下来，他总是不断地为自己树立更高的目标。”这让朱悦涛有些担忧，“这家伙早晚是个水鬼。”

而对于郭川来说，嚼过的馍再吃就没有味道了。接下来他要驾驶一艘 99 尺级别的三体帆船，挑战北冰洋东北航线的世界纪录。东北航线多年来一直被国际帆船界视为“死亡航道”。为了这次航行，郭川对上世纪 70 年代起至今的全套全球冰图进行数据分析，经过近两年的可行性研究，他终于发现了其中的机会——东北航线在某段时日里有 20 天左右的无冰期，这仿佛是老天为他所开的一扇窗。

不同于以往的单人航海，郭川又一次显示了他的谨慎，对尚未熟悉的超级三体船，他并不轻易独自操控，而是率领船队前往。对他来说，这次航行也是与船不断磨合的过程。四名来自俄罗斯、法国、英国和挪威的顶尖水手，成为郭川的队友。在人选的配置上，郭川也有细致的考量，航行途中要经过俄罗斯的军事管辖地，船员中有会说俄语的当地人显然要便利得多。

浮冰、狂风、大雾和彻骨的寒冷，在 15 天的航行中，郭川和他的船员们克服了这些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在极端环境里，人性往往以最原始的姿态呈现，对于郭川来说，如何让这些个性十足的船员们协同作战，则是他作为船长的考验。但此刻的他早已不是 10 年前那个手忙脚乱的“形象船长”，现在的他已经成为真正的船长，有能力把整条船凝聚在一起。

2015 年 9 月 16 日，郭川再次创造了自己的职业新高度——实现了人类第一次以不间断、无补给方式

穿越北冰洋东北航道的世界纪录。这次开拓性的航行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帆船界权威杂志《帆船与航行》把年度成就奖授予郭川，并这样评价：“作为来自帆船航海并不发达的国家——中国的水手，郭川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帆船航海的潜力。”而在中国帆船航海圈里，郭川也逐渐走上神坛，影响了很多后继者。

但在郭川的内心，挑战却是永不止步的。在这次单人驾驶三体船穿越太平洋的挑战中，吴亮原本要代表国际帆联，见证郭川冲过终点。在他的印象中，出发前的郭川一直很忙，除了要对船上众多的复杂细节进行检查外，还要应对繁忙的媒体采访和公益活动。“这几乎是所有职业航海家都要面对的，除非你没有赞助商，不需要媒体曝光量。”尽管从私心来讲，航海家们或许不愿在此耗费过多时间，但对于被贴上英雄标签的郭川来说，他无疑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他是代表着中国航海界在挑战，而不是当初寂寂无名的冒险者。

“他也在不断树立自己，不断让自己的成绩与外界的预期相契合。”朱悦涛承认，这些外部的标签和力量也会影响郭川内心的选择。但他更愿意将之视为一种精神动力，“如果是包袱，郭川不会越走越高”。尽管如今的郭川在面对媒体时，交流越来越自然，肩膀也不再会紧张地往上耸起，但在朱悦涛眼中，郭川仍然还是当初那个纯粹的人。“他只是变得更谨慎，自制力更强。”

反而是家人朋友们一直希望郭川缓一缓。郭川的一位同学曾这样描述：“我从来没把他当英雄看待，从来没有对他说‘加油’，也没有鼓励他去创造新的世界纪录。看到他，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心疼，我感觉他有压力，内心有种东西在搅扰他。”

在苍茫的大海上，伴随着悠扬的歌声和儿子的笑声，结束了一天劳作的郭川手握船舵，凝神望向远方。夕阳洒在他黝黑泛红的面庞上，海风微微扬起蓬松凌乱的卷发，他的眼神里流露出一股沧桑孤独又满含柔情的味道——这是郭川留给世界的最后一抹影像。在郭川失联后，朱悦涛常常反复播放这首《Hero》，从歌声中他仿佛能读懂郭川的心境。“这或许是一种信号，生活中那些曾经失去的、难以两全其美的东西，或许他越来越明白航海不是生活中的唯一。”郭川的小儿子已经上幼儿园了，他最羡慕的是妻子能去孩子的家长开放日，这种俗世的温暖越来越让他眷恋。而这次太平洋挑战归来，原本可能是一个句号。■

（参考资料：《郭川的大洋梦》，黄剑著；《郭川：海上 138 天》，谢丁著）



(插图：老牛)

冒牌高校教授，正版绝命毒师

记者 / 刘敏 实习记者 / 项文虎

一个年近六旬的盲眼化工专家，自称名校教授，宣称有 60 多项填补国内空白的待申请专利，然而守在老小区的顶层蜗居里，他最终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编织出了一张纵横全国的毒品网络。

顶楼的怪人

被抓时，58 岁的陆勇已经失明了 7 年时间。2007 年，他有一种化工产品正在出售，对方要求做提纯，就在做提纯实验时，玻璃容器爆炸了，崩出的碎片割坏了陆勇的眼睛。

陆勇形容此前的自己，是“医药化工、生物化工、生命科学等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专家、教授”，多次

参加学术会议，有 60 多项待申请的专利，大部分都将填补国内研究的空白。被抓后，陆勇在审讯室先喊出来自己是“副教授”，警方才知道这个盲眼的老头还有另一重真实身份。

现在查证，陆勇一长串的自我介绍半真半假。在中国知网上只能找到陆勇的一篇文献，是 2002 年发表的关于吗啡及其衍生物的论文。他的专利也远没有自己宣称的那么丰富，注册成功的只有两项，是关于两种化合物的合成方法，2007 年 4 月申请，已经因为未缴年费而终止失效。

西安交通大学的化工学院，在电话里急匆匆地撇清了与陆勇的关系：学院的教职员名录里从未出现过陆勇的名字。陆勇的公司曾经有西安交通大学产业集团总公司入股，也许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陆勇有了一个在学校的合作身份，这并不是上课带学生的正式教

学职位，那个“副教授”恐怕只是一个称呼。“就像我们到哪个小学上课，人家给我们颁个名誉副校长的聘书一样。”办案警察解释说。

但是这个“交大副教授”的头衔，案发后很快传播出去，在新闻和公众号的层层演绎里，变成了陆勇最令人咋舌的背景。盲眼、教授、毒品——听上去跟美剧《绝命毒师》别无二致。某公众号痛心疾首地感叹：“他曾经是一个 / 拯救病人于危难的白衣天使 / 如今却变成了荼毒生灵的毒枭。”

而 2013 年，当江苏人陈玉强找到陆勇时，这只不过是两个潦倒中年人的相遇。陆勇自己住在西安碑林区的一个老小区里，从 2009 年开始，他就已经跟妻子任虹分居，女儿也被妻子带走。任虹雇了一个保姆，照顾陆勇的日常生活。陆勇此时已经没有什么社会活动了，他性格暴躁孤僻，本身就没有几个朋友，如今眼睛看不见，又住在顶层，他几乎常年不出房门一步。

陈玉强是陆勇过去在化工圈的朋友，2012 年刚刚因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被判刑一年。他当时做的是盐酸羟亚胺，这种化合物是一种医药中间体，最终可制成医用麻醉剂氯胺酮——也就是 K 粉。在 2012 年这桩案子里，盐城警方曾来西安找陆勇谈过话，最后不了了之。等到 2013 年，陈玉强出狱，他又一次找到了陆勇，两个人想一起再生产个什么东西。

酒石酸

陆勇此时搭上了另一条线，就是在上海的谭泳强。谭泳强 32 岁，是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他开了一家专门做销售的化工公司。陆勇告诉谭泳强，他那儿什么都能生产。

一开始，谭泳强要的是酒石酸，一种药用化工原料。陈玉强拿了陆勇开的配方，在陕西渭南租了一个车间试制。这批货经过陆勇卖给了谭泳强，拿到了第一批 20 多万元的货款。

然而谭泳强销售出去的酒石酸很快就被下家退货了：质量不行，没法用，得退款。

这让陆勇非常尴尬：他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如果不是失明，也许不会遭遇这样的失败。陆勇之前的公司下属回忆：“陆老师的办公室里随处都是化工专业书籍、期刊、论文资料，别的什么都没有。很多老板的办公室都有茶桌鱼缸什么的，陆老师的办公室除了书还是书。他也没有烟酒嗜好，就是在看论文、做

实验。技术工艺上的任何问题，他张嘴就来。”陆勇也遇到过失败，他成功合成过抗艾滋病的司他夫定的仿制药，被多家媒体报道，但技术不太稳定，最后无法产业化，专门成立的制药公司也因此倒闭了。但陆勇也成功改进过抗癌药 7- 乙基 -10- 羟基喜树碱的合成路径，“以至于实验室的小姑娘都已熟练掌握，和当时的厂长一起出去自己干了”。

一直以专家、“教授”自居的陆勇，现在却被黑暗困在了房子里，他有大量的精力发泄不出去，唯一的消遣变成了指导保姆帮他做试验。陆勇所在的小区常常弥漫着化学品的酸味儿，曾经有人报了警，等到陆勇到派出所做笔录，小区的人才知道这里还住了这么一个奇人，家里连洗涤剂都是自己动手配的。

更窘迫的是，陆勇失明后，他已经失去了固定的经济来源。此前为了治眼睛，他到深圳、西安等地看病，更换角膜，每次都要花掉二三十万元。然而因为伤势太重，加之他有糖尿病，手术效果并不理想，治疗费用基本都打了水漂。当下的经济情况恐怕只能用坐吃山空来形容。

陆勇手里已经没钱了，他只好把自己的一些化学试剂发给了谭泳强抵债。这一批化学试剂值不了多少钱，直到谭泳强被抓捕，还一直堆在他的库房里没有动过。

既然酒石酸没有成功，谭泳强说，那就做 α - 甲基氨基苯丙酮盐酸盐吧。

事后陆勇对外宣称， α - 甲基氨基苯丙酮盐酸盐第一可以给妇女做减肥药，第二做药可以作为中间体，第三可以治妇女产后忧郁症。

“他们搞化工的其实一说，互相之间就明白这是什么了。”三原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副大队长李一鸣告诉本刊记者，他们做的东西就是甲卡西酮。

甲卡西酮又叫 α - 甲基氨基苯丙酮，也称浴盐、“丧尸药”，是近几年刚刚兴起的一种毒品，吸食后容易引起幻觉，且能导致急性健康问题和毒品依赖。如果吸食过量，容易造成不可逆转的脑损伤甚至死亡。甲卡西酮早在 2005 年就被中国列入 I 类精神药品，对生产和销售进行严格管制。

甲卡西酮与 α - 甲基氨基苯丙酮盐酸盐的分子式只差一个 HCl，实际上可以画等号，都能起到致幻剂的作用。而如果被警方抓到，利用这个分子式上的细微差别，制造者就可以说自己做的不是同一个产品来逃避责任。事后陆勇和陈玉强确实也用过一个比喻，认为自己做的东西就像菜刀，“卖出去后，别人拿它来

做什么跟我没关系”。

陆勇又一次给陈玉强写了配方，带着这个单子，陈玉强和同乡陈健在渭南再次开了工。二人前后试制了二三十次，陈健带着样品到陆勇家里做检测，反反复复，都是不行，做出来的产品一直是黑红色的。

大家分析，问题出在了原料上：渭南的工厂只能买到四氢呋喃，做出来的东西都是红色的，想要做出白色的粉末，必须要除一道杂质，这就需要用到丙酮。

丙酮是国家管制的易制毒化工产品，必须有资质的公司才能进货。数十次的试验失败，加上还没有堵上的资金缺口，陆勇决定动用自家的公司。2013年11月，陈玉强搬到咸阳县，的西安科创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创药业”）在这里有一间租用的车间。

科创药业是陆勇1997年创办的，在眼盲之前，这家公司没有实体，主要销售陆勇研究的化工技术。其中有70%的股份来自西安交通大学产业集团总公司，因此也可以看作是西安交大的校办企业。2007年的事故之后，陆勇没法再研究技术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转成了任虹，公司在三原县租了一个车间，开始制造类似托吡酯这样的化工产品赚钱。

科创药业的实际情况，并不像“交大主控股公司”这个名头一样漂亮。三原县的大程镇有一家民营的化工厂，因为经营不善，把车间拆分着租了出去。科创药业租了其中一个不到100平方米的小车间，装备了离心机、反应釜、干燥机、甩干桶、分离机等基础化工设备。

在2013年，科创药业的订单已经差不多了，基本处在半歇业状态。任虹每年10万元的租金正在白白浪费，她乐得有人过来接手这些设备。陈玉强前后一共租了两次车间，每次持续半个月左右的时间。陈玉强可以通过任虹，从能合法申报的科创药业购买丙酮和盐酸；任虹每次出租厂房，都能收到4万元的月租金弥补亏空。双方各取所需，一拍即合。

黑的还是白的？

陈玉强做出来的 α -甲氨基苯丙酮盐酸盐，大部分都卖给了陆勇。陆勇以400元/公斤的低价收入，再以900~1200元/公斤的价格卖给谭泳强。每个蓝桶能装25公斤货，平均每次运输4桶，当货物用物流运到上海，一条连绵不断的销售路径就开始了。

谭泳强卖给山东的下家，是1800~3000元/公斤，山东下家卖到河南，就至少是3000元/公斤。此后的链条再依次加价。李一鸣和同事们跑了十几个省份，抓到了谭泳强和他的第一级下家，一共抓了17名犯罪嫌疑人：“像河南我们抓了一个姓杨的嫌疑人，他知道有人卖‘土冰’发财了，就找到河南的王金明想买点‘土冰’，王金明认识谭泳强，就叫了几个人一起开车去上海进货。姓杨的已经是很末端的买家了，他从谭泳强那里拿到的价格已经变成了每公斤1万元。”

交易中，这些嫌疑人用“土冰”“甲卡”来称呼这批 α -甲氨基苯丙酮盐酸盐，实际上就是把它当作甲卡西酮来买卖。李一鸣花了两周时间清查出自谭泳强的快递记录，发现他用公司楼下的一家快递公司向全国发了100多笔货，发货地址包括河南安阳、河北邯郸、四川双流、福建龙岩、山东菏泽、山西长治等多个省份和地区，很多收件人用了“李先生”“张老师”这样的化名，一些快递上标注了重量，2.3kg、5.7kg、13.6kg，这并不是批发普通化工产品的正常销量。

2014年5月，有人向三原县禁毒大队举报，说在大程镇的一家公司厂房里有一群人“行为诡秘”，常常半夜生产运输，工人都戴着防毒面具，生产的产品气味刺鼻。张勇是禁毒大队队长，他过去抓的都是倒卖和吸食海洛因、冰毒，从来没抓过新式毒品，接到这样的举报，其实警方并不太懂。

“我们是去了第三次，才真正开始行动的。之前侦查员去的两次，发现要么没人生产，要么门窗紧闭，不敢随便进去打草惊蛇。但到厂子里抓捕的时候，说实话我心里也没有底，不确定这家工厂到底合法不合法，只觉得可能性很大。”张勇干了6年禁毒工作，一进车间，他立刻心里有了底：满屋子堆着丙酮、盐酸、硫酸，这些都是易制毒的化工原料。在三原县，任何工厂要使用这些原料都必须在公安局报备。“我们从来没接到陈国发这个厂子的报备材料，起码在原料使用上已经是违法的了。”

整个车间此时正在全速运转中，满屋子都摆着40cm×60cm的不锈钢托盘，刚刚生产出来的 α -甲氨基苯丙酮盐酸盐还是湿的，正在阴凉处晾干。几名生产工人一脸蒙，不知道为什么还招来了警察，陈玉强也在，张勇问他这些产品合不合法，“陈玉强现场说了一个化工名词，自己又承认说，反正这些东西是违禁的吧”。

当场扣押的122公斤成品、2000余升半成品，三

原县并不知道该怎么鉴定，一层层向咸阳市公安局、省公安厅上报，结果大家都没有处理这种新式毒品的经验。最后，是市局有一位懂化学的警察提了建议，让张勇用水把这些粉末化开，滴在平时测吸毒者的尿检板上看看是阴性还是阳性。

张勇当时还拿不准用哪一种尿检板，是测海洛因、冰毒还是测氯胺酮的？“他告诉我都用上试试，我一测，好家伙，三个尿检板都显示阳性。看到这个结果，我们就说别等了，赶紧抓人吧！”

几天后，警方审出了车间背后陆勇的角色。“其实陆勇几天联系不上陈玉强，应该已经知道坏事儿了。”李一鸣去西安抓捕陆勇，一押到车上，陆勇就问他：“你们查到的货是黑的还是白的？”李一鸣说是白的，陆勇听完，“嗯”了一声。

“如果是黑的，那还是渭南那批不合格的货。他这时候已经明白了，真正的窝点被端了。”李一鸣说。

审判

在2015年3月，任虹以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因为从始至终对所制产品不知情，她和其他几名销售丙酮、盐酸的参与者被另案处理。

科创公司的出纳李娜，每次帮助陆勇从车间收货，向上海发货。李娜、保姆、车间里的普通操作工人，对陆勇在倒卖的这些化工品都一无所知。每次谭泳强下订单，陆勇都以“陈玉强的货”来指代那些白色粉末，李娜填完物流单子，货物发走，从始至终都以为跟过去科创的普通化工品没有两样。

三原县警方花了7个月时间，从谭泳强开始抓，跑了十几个省市，一共抓了17个人。“按照我们禁毒的惯例，我们从陈玉强这里算，向上抓一级，向下抓一级，其他的交给当地警方处理。”其中有一名嫌疑人已经把货从云南背到了缅甸，卖给了缅甸的赌场。李一鸣告诉我们，他们还查到了一名吸食者，从车间里出来的 α -甲基苯丙酮盐酸盐，已经是可以吸食的成品了。因为吸食后间隔时间太长，这名吸食者已经做不了尿检。“他也知道这事儿很严重，已经不认了。”

谭泳强、陈玉强、陈健，被抓之后全都招供了。谭泳强最年轻，他1982年出生，青岛理工大学毕业，此前在上海打工，2012年开始自己出来开公司。谭泳强的目的很明确，他要赚大钱，趁年轻早日移民海外。

禁毒大队的警察们轮番审问，很多老资历的警察进去也问不到任何内容，最后都变成了陆勇给警察上课。“不管对面坐的是谁，陆勇都是讲一大串化学公式，谁也听不懂。”

“我们抓他之后，有证据的他都承认了，没证据的不认。后来他觉得情节严重，自己也开始要立功，检举了河北也有个做甲卡西酮的。”张勇说，谭泳强懂化工，也懂法，知道现在只能好好配合，否则这么大的销售量，最后肯定是死刑。

陈玉强、陈健也招了，原原本本地讲了自己如何从陆勇处拿了配方，前后几十次做试验，到陆勇家里检验，并销售给陆勇。

只有陆勇不招，直到今天，陆勇还是不承认自己做了毒品。

抓捕当天，陆勇就在审讯室破口大骂了整整一夜，宣称：“怎么带过来的，以后会怎么把我送回去。”禁毒大队的警察们轮番审问，很多老资历的警察进去也问不到任何内容，最后都变成了陆勇给警察上课。“不管对面坐的是谁，陆勇都是讲一大串化学公式，谁也听不懂。”

陆勇以眼睛看不见为由，拒绝在任何笔录上签字。检察官王志宏发现陆勇不签字，告诉他可以从头到尾宣读一遍提审记录，陆勇反问他：“我哪知道你读的是不是真的？”王志宏告诉我们，陆勇从始至终都采取一种抵抗不合作的态度：“他否认了所有事情，包括给陈玉强提供配方、鉴别产品、提供改良的方案，还有和谭泳强的交易，这些他都完全否认。”王志宏觉得，如果真的是合法经营，完全没必要隐瞒所有的交易过程，而这些过程全都有充分的人证和物证。“包括法庭上，陆勇态度都是非常恶劣的，他在法庭上动不动就是破口大骂、大声大笑，也许这都是他掩盖内心波动的一种方式。”

那些查没的 α -甲基苯丙酮盐酸盐取了样品后，一级一级上传，咸阳市局、陕西省公安厅都没有对新式毒品做鉴定的技术，最后是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取得了鉴定结果：所送检的 α -甲基苯丙酮盐酸盐中含有甲卡西酮成分。几份样品分别含有51%、49%、50%的甲卡西酮，还有一个未提纯的液体混合物，含量约0.4%左右。

陆勇在看守所已经羁押了两年半的时间，这起案子是陕西第一例新型毒品案件，而且涉及1200余公斤的生产销售总量，在国内也没有先例。

今年5月份，咸阳中院邀请公安部鉴定中心的专家参加庭审。这次庭审的现场，陆勇的辩护律师、禁毒警察、检察官有不同表述。李一鸣因为办这个案子恶补了一大堆化学知识：“办这个案子真把人办蒙了，全是这些化学名词，我们、律师，都是外行，谁都辩不过陆勇。”庭审上漫长的专业名词辩论让人云里雾里，李一鸣形容，就像是学过一点英语的人去听一堂全外语教学课：“其实庭审的时候陆勇、谭泳强以及公安部专家，他们心里都跟明镜似的。”

在陆勇的辩护律师康博明的叙述中，公安部的专家没有提出一个可信的证据，陆勇逐条批驳了专家的鉴定方法，还在法庭上直接斥责对方：“还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物证检验专家，我都为你感到脸红。”陆勇的脾气一直不好，即便对康博明也是这样，康博明说：“他认为毒品快1000公斤，那不是死刑么，人到这时候就急了，什么话都敢说。老陆一直有抵触情绪，对检察官、法官都有抵触情绪。我跟他说不不要抵触，有事情说事情。所有人好好讲道理都能听明白，你说有冤屈我帮你洗冤，有抵触了怎么替你说话？”

王志宏最后听出来了门道：公安部专家和陆勇说的是两种鉴定方法。“陆勇是参照食药局颁布的食品药品检验的程序和标准。而公安部的鉴定是依据公安机关、公安部颁布的毒品检验的程序和标准。所以这两个是不同的概念。要让他们在这上面取得一致是根本不可能的。”

“公安部是咱们国家最高的侦查机构，我们从事司法工作的人，对于公安部的鉴定结果是很少持怀疑态度的。除非他的程序违法，或者说送检的程序有什么问题。”王志宏告诉我们，不管控辩双方对鉴定的标准有什么样的争议，在毒品案件的审理中，一个最基本的准则是，检查产品里是否有毒品的成分。而查封样品里含有高含量甲卡西酮成分，这是确凿无疑的结论。

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的《非法药物折算表》，1克甲卡西酮相当于1克海洛因。如果判处

死刑，除了定性分析产品中是否含有毒品成分，还要定量分析其中的毒品含量，以海洛因为例，毒品重量是以化学品中含毒品25%为核算分界，超过25%的按实际重量算，不到25%的要折成25%来计算贩毒的数量。

陆勇在看守所已经羁押了两年半的时间，这起案子是陕西第一例新型毒品案件，而且涉及1200余公斤的生产销售总量，在国内也没有先例。在今年5月份的庭审中，咸阳中院因“客观原因致使本案不能在审理期限内审理终结”做出裁定，此案暂时中止审理。

为什么要制毒？

陆勇住在一个老小区里，房子很破，三室一厅不到100平方米。警方从中一共搜查出45万元现金，其中5万元是藏在阳台上的一堆破鞋盒里，另外40万元在书房。陆勇的书房里书架堆了几面墙，这些钱就藏在一个书架的背后，估计连保姆都完全不知道。

“陈玉强的货”一共给陆勇赚了85.9万元纯利润。谭泳强靠这笔买卖真的发了财：警方调取他的银行记录，2013年谭泳强全部家当就30万元，2014年他从春节之后开始卖货，到被捕时，一共销售了3个多月，此时谭泳强的账面上已经有四五百万元的余额了。

陆勇以前也爱钱。过去的科创公司销售医药中间体、原料药，转让陆勇研究的合成技术，每年能有300万~500万元的收入。他通过律师告诉我们，自己的每项技术能卖出50万~60万元，最高的一次卖到了300万元。

陆勇“交大副教授”的身份，过去更像是一个公司销售的金字招牌。他的员工记得，陆勇以高校教授的身份在《参考消息》上打广告，吸引了很多人来买技术。其中山东一家企业，是下岗职工拿着自己的遣散费合资筹办的小公司。“但是他卖出的技术其实有很多问题的，可行性报告也是倒着写的——先写营收、平衡点，然后倒推其他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就是骗人呢。”

眼睛失明后，一切都开始走下坡路。陆勇说自己做了十余次手术，花费了上百万元，自己原本预计再用五六十万元继续治。被抓后，警方一度把他送到西安的安康医院，这是西安公安局的医院，关的都是犯人。康博明探视过，得知陆勇在这里态度也很暴躁，每天大喊大叫，这听起来不是一个积极的治疗态度，最后医院不堪其扰，又把他送回监狱了。

几名采访对象都说，陆勇的眼睛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估计也没什么治愈的希望，至多是恢复一些质感。

此前有媒体称陆勇卖了毒品后只要现金，这只是部分的真实：李娜确实去银行把钱取出来拿给陆勇，但并不像《绝命毒师》那部美剧一样，整个交易因为隐秘，需要用现金来躲避警方的追查。警方查到的证据中，嫌疑人们的金钱往来在QQ、微信、短信上有大量的交易记录，下线之间也有短信，虽然没写着具体的名目，但类似“1×2.4+1×3=……”这样结账的算式也都还留着。陆勇的钱从上海到西安，每一笔流动都在银行留下了痕迹。所以眼下能想到的可能就是，陆勇的这笔钱只是想瞒住他想瞒着的人。

“到了我们这个年纪，自己老了，又有孩子，都想留一些私房钱。”在采访中康博明律师没头没尾地说过这么一句话，他今年53岁，跟陆勇的年纪相仿，在他有限的、保守的叙述里，没有继续挑明原因。

警察去抓任虹时，发现她住在另一处高档小区里，装修很精致，房子面积很大，她自己带着女儿在这里生活。任虹看起来是完全被动地卷入了这桩案件，她的姐姐只给她请了辩护律师，并不愿多管陆勇的案子，姐姐言谈中对陆勇多有怨怼：“任虹能跟制毒扯上关

系，她所有的朋友都不相信。陆勇这个人过去脾气就不好，我们跟他没什么来往，这两个人差了20多岁，最早他们在一起，我们家里就一直都不同意。”

事实上，陆勇和任虹两个人一直没有领结婚证，二人的女儿已经15岁了，现在被任虹的姐姐抚养。二人在案发前的经济来往，在律师和家人罗生门一样的叙述中很难判断清楚。

李一鸣没有追问过陆勇储存现金的理由。这些事关家庭和私人关系的细节，不是他审讯的重点，他只是想起来，陆勇曾经有一笔20多万元的收入被任虹发现后，就被任虹从账上划走了。

“那20多万元是什么钱呢？就是谭泳强支付的酒石酸的货款。”李一鸣回忆。

以陆勇当时的经济条件，他无法及时堵上这笔资金的窟窿。他东山再起的期待遭遇了第一笔巨大亏空。这笔亏空也促成了他和谭泳强下一步的合作，新研发的产品租用了任虹的厂房，使用了科创公司的丙酮和盐酸，紧密的合作链条上每个人都得到了滚滚而来的大笔利润，最终，每个人也都在这种白色粉末里面越陷越深。■

（文中禁毒警察李一鸣、张勇为化名。嫌疑人陆勇、谭泳强、陈玉强、陈健、王金明为化名）

《新知》2016年第5期上市

（总第17期）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84050425 84050451

读者服务部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新浪微博 @新知

微信公众号: 新知 WISSEN

关心一些恒久的事情——理性进步,智识生活的乐趣,美

Wir müssen wissen. Wir werden wissen.

[新知 2016 年第 5 期要目]

Entrée

天空中的微生物

宠物之魅

八卦人生

小人国和暗物质

Main

奇美拉的“美丽新世界”

人形动物的人文主义

动物的生活：后人类主义、鱼和庄子

梦狼：中世纪北欧狼人与史塔克家族

鸦科的傲慢与人类的偏见

从“人猿泰山”看人与动物的理想国

本世纪第一个灭绝的类人猿？

冰岛 DNA 档案

Fusion

哥白尼颠覆了人类中心主义吗？

当诗歌遇见达尔文和进化论

一切的开始：伦敦动物园今夕

北京动物园的回忆

丰容：为动物提供情趣

克服杂草焦虑症

Dessert

我们如此不同，又如此相同：一个人类学家的观察

真实世界中的虚假感觉：再谈“瓮中之脑”

难道还能给太阳也申请个专利吗？

帕普特和他的 LOGO 教育微世界

影像报道：奥特伊赛马，可怕的疾驰

月光下

1BOOK140 短评

《新知》2016 年订阅须知

《新知》双月刊，每期 160 页，全年 6 期，零售单价 20 元，全年定价 120 元。

2015 年珍藏礼盒，合订本已上市。

2016 年刊开始征订！

读者可到三联生活网订阅：www.lifeweek.com.cn，全年订阅 8 折优惠，订阅年价 96 元。

或在卓越网、京东商城等订阅：www.amazon.cn / www.JD.com





中国距离建立空间站还有多远？

——专访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焦维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前宇航员焦立中

记者 / 吴丽玮 实习记者 / 刘周岩

未来在中国自己的空间站里，“非军人出身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医学专家都有可能成为中国的航天员”。焦立中这样告诉本刊记者。他曾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服役 15 年，4 次乘坐飞行器飞向太空，共计完成 6 次太空行走，并且是世界上第一名华裔国际空间站站长，他在太空停留总时长累计超过 229 天，同时也是在太空一次性停留时间最长的美国宇航员之一。另一名专访对象焦维新教授来自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同时他也是中国空间科学学会空间探测专业委员会委员。

“三步走”与空间站目标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里，第三步是要建造空间站，“神舟十一号”飞船返回地球后，中国距离建立空间站的目标更近了一步。明年还要发射“天舟一号”货运飞船，与“天宫二号”对接，进行推进剂补加等试验。在此之后，是否我国建立空间站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

焦维新：载人航天两个最关键的技术，一是太空行走，一是空间交会对接。太空行走在“神舟七号”



左图：2015 年 10 月 19 日，Expedition 45 远征队员聚集在国际空间站的美国“命运号”实验舱商量如何应对当时的突发情况

右图：欧洲空间局工程师在国际空间站拍摄的地球照片

就完成了，而空间交会对接难度更大，所以从“神八”开始，“神八”“神九”“神十”，主要目的都是攻破、掌握空间交会对接技术。

“天宫二号”跟“天宫一号”都是我们载人航天第二步走的重要内容，但是它俩分工不一样。“天宫一号”属于第二步走的第一阶段，它主要扮演的角色就是空间交会对接的目标飞行器。“神八”来了，“神八”跟它对接，“神九”“神十”也一样。通过“天宫一号”，我们基本上掌握了空间交会对接技术，这是建立空间站和维护空间站最关键的技术。

“天宫二号”就更进一步了。整个第二步走都是在为空间站建设做准备，但准备的内容不一样。“天宫二号”跟“天宫一号”的最大不同，就是携带的科学实验的项目多了。“天宫一号”也就是两三项科学实验，我们这次有 14 项科学实验，是为了以后空间站开展各式各样的科学实验做准备。通过这 14 项科学实验，我们可以进一步获知，未来选择哪些类型的科学实验效益更好一些，同时实验设备该如何制作。当我们国家的空间站完全建成后，里面要放置大概 10 个实验柜，每个实验柜里边放不同的实验装置，大大

小小的项目都算起来有近百项科学实验。首先需要论证做哪些实验的效果更好。而且地面做实验是有人操作的，在太空做实验大多是自动完成，所以实验装置怎么设计等等，都需要经验。“天宫二号”就是为将来我们空间站建成以后那么多的科学实验积累经验。

“天宫二号”的第二项目的，就是把航天员在太空驻留的时间逐渐延长，现在叫中期驻留，原来一两周叫短期驻留，长期驻留要至少半年以上。现在国际空间站的航天员基本上都是驻留半年，也有个别航天员一次驻留超过一年。他们在太空长时间飞行，本身也是项科学实验。看看人类长期在微重力环境下，到底身体状态怎样。长期在微重力环境下，到底人体有哪些反应，待一个星期就回来了可能不太明显。当然一个月也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今后的实验目标至少要驻留半年。

第三步建立空间站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主要是新的核心舱和实验舱的研制。这些舱不仅仅是外壳的问题，还有里面的控制系统以及最主要的科学实验项目的准备。未来要有近百项空间实验，实验柜怎么安排、使实验便于操作又不互相干扰，这些工作对我们来说都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焦维新

是全新的。

另外就是空间站组合体的控制技术。载人飞船和载货飞船都要和核心舱对接，大的组合体控制是我们面临的新问题。现在这个组合体只是一个飞船跟一个实验室，那将来若干个舱在一起会是怎样的姿态现在还不清楚，它们不一定都在一个平面上，这就会出现姿态控制的问题。

还有发射这些大吨位舱需要的新型运载火箭。新舱重20多吨，之前升空的运载火箭运载能力都没这么大。11月3日“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的发射场成功发射，这是目前国内运载能力最大的火箭，未来空间站的发射都要依靠“长征五号”。

三联生活周刊：此次“天宫二号”与“神舟十一号”任务实现了多项技术验证，同时进行了14项空间实验，这其中你认为最重要的成绩是什么？

焦维新：这些实验是经过反复论证和选择过的，有些看似简单，但意义都很重大。这次的实验主要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在微重力环境下的空间科学实验。比如

说微重力环境下流体力学的实验、微重力环境下的环境科学实验、微重力环境下的燃烧科学实验等，这一类属于探索基础科学规律的。

第二类是新技术验证的实验。这次我们有一个实验是空间冷原子钟。如果这个实验获得成功的话，会使我们的原子钟授时精度提高两个量级，这对于提高我们的导航卫星精度有很大帮助。钟表经历了摆钟、石英钟、原子钟等发展，精度越来越高。原子钟利用不同能级之间的振荡，发出信号，信号的频率非常的稳定。不过原子钟也要热运动，热运动影响精度，于是专门用特殊的激光束作用，使它运动缓慢下来，又可以提高精度，就是冷原子钟。再进一步，冷原子钟在地球重力的作用下，做加速运动，又影响授时的精度。在空间微重力的环境，那又可以使它的精度提高一两个量级，这就是空间冷原子钟。这可以大大提高我们北斗系统的定位精度。新技术验证还有很多，还比如说激光通信。太赫兹是无线电中最高的频率，频率越高能携带的信息越多。这个非常有用，将来探测火星等的通讯都可能应用太赫兹频率。但是太赫兹受大气层衰减，地面上这个实验就不行，要放到空间上做。我仅仅举这两个代表性的，就是说在我们有空间站建成以后，利用这个平台，可以发展许多新技术。

第三种类型是太空产品开发。比如说计算机的芯片，芯片最原始的就是晶体，在地面产生的各种比如硅单晶、锗单晶、铋单晶等，有重力情况下单晶就小，而且结构不均匀，在微重力环境下，单晶结构又大又均匀，性能就好，我们把它做成大规模集成电路，这就是太空产品了。还有各式各样的蛋白质晶体、太空制药等等。制药的时候不可能是一种元素组成的，都是复杂的高分子化合物，可是混在一起比重不一样，也不可能做到均匀的混合。可是在微重力下不存在比重的问题，所有的物质都没有重量，可以均匀地混合，药的疗效可能也就更好。

在这之前呢，国家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我们北大的先进技术研究院，召集理科各院系的老师，大家可以提出自己想的空间科学实验室做的实验。经过有关专业专家批准，可以进行预研，再进行下一步工作。这些项目都是一级一级在准备，毕竟成本非常高，一公斤有效载荷运到太空的成本大概是两万美元。空间站还没建成，实际上早期的研究工作好多年之前就开展起来了。实验内容筹备是我们载人航天一个关键问题，我们的空间站能否超越现有空间站，不在于外形设计新颖不新颖，关键还是能取得更多的科学反

馈。空间站本身只是一个平台，就像一座大楼，重要的还是里面的内容，也就是开展的空间实验项目。

空间站里的航天员

三联生活周刊：明年我国将启动第三批航天员的选拔工作，新一批航天员将会有有什么新的选拔要求，从而能满足在空间站工作的人才需求？

焦维新：我们现在都是飞行员为基础的航天员上天，将来空间站形成一定规模以后，就该有任务工程师上天了。之前的航天员都是从飞行员中选拔的。航天员必备的三个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业务素质，前两批航天员主要注重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未来对业务素质，包括许多空间实验的科学知识和操作方面的要求会逐渐增加，也会考虑从青年学者当中选拔任务工程师。包括一些年轻的博士生，只要他身体可以，经过一定训练，能适应发射返回的过程，空间站里将靠他们来真正做实验。前两批航天员本身是飞行员出身，不是实验项目领域的专家，虽然现在的实验操作都是在地面上教过的，但他们很难理解实验背后本质的东西，如果实验过程出现新的现象，或者出现问题需要解决，可能就无能为力。如果我们探索更新的东西，就需要行业的专家亲自去天上做实验，像美国的航天飞机上早就有任务工程师的角色了。

焦立中：美国和苏联一样，第一批航天员都是从空军中选拔出来的。美国也是在空间探索的经验日益丰富之后，开始吸收科学家和工程师进来，这很正常，中国毋庸置疑也会按照这样的模式为空间站做准备。不同学科背景的航天员根据个人所长进行选拔，在掌握必备的技术和知识之外，每个人也会因此被施以不同的训练内容。

1990年我被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录取，在此之前我在企业的实验室工作，我从学士一直到博士时，所学的专业都是化学工程，后来在实验室研究太空复合材料。在成为宇航员之后，我在飞行过程中担任的职务是任务专家，飞行过程中，还有飞行员、飞行工程师、任务指挥官等职务。任务专家的任务是医学实验和技术探索，比如太空梭空电整合实验室里航天飞机飞行软件确认等等。我一共飞行过4次，1994年第一次飞向太空乘坐的是“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当时我负责进行科学实验；第二次飞行是1996年，当时我进行了两次太空行走，目的是为了实验建造国际空间站的设备和装配技巧，并且测试改善后的

太空服的保暖性能；第三次飞行是2000年，当时的主要工作是领导出舱的宇航员队伍，为建立国际空间站做更多准备；我最后一次升空是2004年，当时作为国际空间站的站长，在空间站驻留了半年，主要负责大多数的美国实验，同时也给其他的俄罗斯航天员帮忙。国际空间站的站长要对这次任务全权负责。正常情况下，每天要先跟地面任务控制中心开一个短会，讨论当天的活动，随后宇航员根据各自的日程开始工作，周末时工作会相对轻松一些。

我曾经访问过中国航天员中心，航天员中心的训练方法非常专业，和美国以及俄罗斯都有很多相似之处。未来随着中国载人航空事业的成熟，非军人出身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医学专家都有可能成为航天员。这些人需要具备在中国空间站里完成复杂实验的能力。我也和杨利伟、费俊龙、聂海胜都见过面，我知道中国的航天员选拔非常严格，在我看来，他们的技术都非常好。

空间站与国家竞争

三联生活周刊：随着本次任务的圆满完成，中国的空间站计划正在稳步推进，预计2020年前后初步



10月17日，“神舟十一号”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

建成独立的空间站。是否可以认为，空间站是当前中国航天的核心项目？空间站工程与探月工程、火星探测工程、深孔探测工程等的相互关系是什么？

焦维新：空间站项目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的核心。我们载人航天“三步走”的最终目标就是建立空间站，我们既然费这么大力气造出空间站，以后就不会喜新厌旧再搞别的东西，而是肯定充分利用空间站，脚踏实地把这个工作做得有特色，真正得出一大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成果，对推动我们国家技术的发展也会起到很大作用。

载人登陆火星对我们来讲还太遥远了，现在不去考虑。但是未来空间站之后很有可能进行载人登陆月球。我们载人登陆月球绝不是简单重复美国几十年前做的事情，我们再登陆就是完全不同的。

当年美国阿波罗计划主要目的是政治竞争。现在没有那种“冷战”思维了，我们完全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搞载人登月。我们要搞载人登月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建立月球基地。我们为什么要在南极设立科考站，有科学家长期驻守，而不是去两三天就回来？因为得到的科学成果肯定不一样。我们建立月球基地，就相当于在月球又建立了空间站，对于研究月球各种各样问题非常有价值。都说月球含有丰富的氦三，我们可以让航天员在月球实际做实验，在月球不同地点取到不同深度，得到月球不同区域氦三含量。另外详细测量月球的地质特征，这样可以跟遥感测量对比，来矫正遥感测量的结果。在六分之一地球重力的环境下，也可以开展生命科学实验，比如看动物产卵是否会有变异。天文学家还提出在月球背面建立射电望远镜。我们要做出真正的科学成果来，长久以来我们国家在深空探测方面都非常落后，中国人关于火星、土星等的知识都是西方提供的。我们不能过了几千年了还和孩子们说四大发明，中华民族要为人人类知识做出贡献，月球是一个合适的起点。

另外还有月球资源的问题，我们还完全没有搞清楚。即使是我们每天生活的地球，还年年有新的成果，高校每年还要招收地质学的学生，科学家在不断发现新的油气田。

再一方面就是技术上的发展。如果我们一开始没有探测月球，可能就不会有“长征五号”火箭。同样，如果不搞载人登月，可能我们的运载火箭就停留在“长征五号”上了，有新的目标了，就会促进技术发展。我们将来运载火箭目标是130吨，而现在“长征五号”只是20多吨。有了这么大的运载火箭，对于我们科

技实力、国防实力的增加，都是无法想象的。像阿波罗登月，其实它整个推动了电子、材料的发展，美国的工业迈上了新的台阶。我们的火箭、导航、通讯等技术也会随着载人登月而发展。

焦立中：中国选择空间站作为目前最重要的一个目标，这个计划非常合理。空间站为更多的太空探索提供了研究保障，同时也使得中国能拓展其在航空领域的国际合作。未来在中国的空间站里，也是应该以生物医学研究为主，之前美国和苏联都是同样的研究目标。

三联生活周刊：国际空间站在几年之后将会退役，美国和其他国家就目前来说，未来也并没有新的空间站计划。这是否意味着空间站项目的研究成果有限，未来发展前景不大？我们所努力的空间站计划，是否能够超越美国和其他国家在这个领域上的成绩？

焦维新：空间站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这方面苏联资格最老，前三代都是苏联搞的，国际空间站是第四代。但是我们今天搞空间站并不是说别人有什么我们就搞什么、别人不搞我们也不搞，还是从自身需求出发进行的。而且年代也不一样，比如说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空间站上的电子技术和现在能比吗？我们今天搞的也是不一样的东西，不是简单重复。

况且国际空间站在实验方面组织得不是那么好，都是各干各的。实验舱基本都是独立的，俄罗斯有“星辰号”实验舱，美国的叫“命运号”实验舱，欧洲空间局的“哥伦布”实验舱以及日本的实验舱，实验舱通过过渡段连接。实验都是各国搞各国的，也有些交流，但主要还是各顾各的。我们基本的理念就是面向未来科技的发展，根据国家自身的需要独立自主地来设计有针对性的实验。

国际空间站还有一个问题是科技成果没有及时返回，它过分重视往上面运材料、人员，没有足够重视把取得的科研成果及时研究应用。比如一些材料科学的实验结果，应该及时返回地面进行扩大规模的应用，但是往往是许多成果在上面待了很长时间，接航天员返回的时候才带回来，但实际上应该用专门的货运飞船及时运送回来，这方面重视不够。

美国航天事业的一个特点是喜新厌旧。探月竞赛结束以后，那么先进的阿波罗飞船扔在一边不要了，去搞航天飞机。而同时苏联去发展空间站。事后证明苏联的这条路是对的。苏联“和平号”空间站运行了15年，而航天飞机一次上去也就两周，在空间科学实验方面没法比。航天飞机其他一些好处也因为事故和

预算超支等等没能完全实现。

焦立中：首先，国际空间站原定运行到2024年，但我认为很有可能会延长至2028年甚至更久。而我在今年5月曾发表一篇文章指出，美国的空间计划因为资金缺乏遭到严重阻碍，更为严重的是，美国的空间发展失去了方向。美国现在眼睁睁地看着中国和俄罗斯取代了它的地位，在月球探索以及未来的火星探索中成为主导国家。空间计划曾是美国的威望来源和软实力的象征，但随着总统选举如火如荼地进行，对于宇宙探索的话题似乎被搁在一边，无人问津。NASA目前面临着资金不足的困境，在财政预算不断增加的同时，NASA的资金投入从20世纪60年代的4%，下降到了90年代的1%，现在甚至连1%也不到了。另一方面，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合作即将瓦解，据我所知，欧洲、日本、加拿大这几个国际空间站的合作国家，都纷纷开始与中国商讨未来在中国的空间站进行合作的计划，甚至合作还将延续至不甚明朗的月球探测计划中。

三联生活周刊：国际空间站时代，中国是被排斥在外的，未来我们将以何种态度面对国际合作？

焦维新：美国一开始发展航天飞机，后来意识到空间站的用处，想独立搞空间站，但是力不从心，因

为技术积累都在苏联那边。苏联搞过若干代空间站，“和平号”空间站坠毁以后，曾经想搞和平二号。但苏联很快解体了，俄罗斯政治经济都不景气，无暇顾及。美国有钱没技术，俄罗斯有技术没钱，所以他们一拍即合。欧洲空间局也想搞自己的实验舱，日本也想搞。加拿大搞不了实验舱，但是机械手的技术还算先进，也参与进来，所以就有钱出钱，没钱出力，十六国共同建造起了国际空间站。

当初国际空间站中国被排斥在外就是因为美国的反对，怕我们通过合作偷走技术。美国排斥我们也促使我们下定决心，独立自主地开展自己的载人航天事业，“921计划”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未来我们会抱着开放的态度开展国际合作。毕竟像俄罗斯、欧洲都有自己的实验舱，也做一些实验了，有科学经验。所以2024年国际空间站退役以后，可能在太空运行的只有我们中国的空间站一家。美国也好，欧洲也好，或者俄罗斯和其他国家，你有好的点子，有一些想法愿意到我们这里实现，我们都抱着一种开放的态度来讨论。两国科学家讨论之后，看以怎样的具体方式实现，无论是共同设计实验，还是说允许其他国家的单独实验舱连接空间站，既然我们抱着开放的态度，那就都有可能。☑

《读书》2016年第十二期目录

刘东 进化与革命

商伟 言文分离与现代民族国

家：“白话文”的历史
误会及其意义（下）

刘桂生 从文字误译到精神扭曲

短长书

本土化：学术与意识形态的双重诉求
（王学典）· 后殖民与全球化时代的
中国（金惠敏）· 华语电影，谁的华语？

谁的电影？（李焕征）· 送别（刘涛）

卜键 模棱首

邵菁 历史社会学的“现在时”

唐晓峰 从资本主义到拉铁摩尔

彭斌 谁统治“疯狂动物城”？

张振涛 钢琴与铁律

罗杨 在文明的“心史”之间

戴海斌 “出使日记”中的晚清外交

品书录

解读万历时期的财政改革（贾康）· “对
象”的言说：“他者”与近代“中国”
认知（李建军）· 时空穿越中的文化
中国认同（苏力）

曾艳兵 何为“卡夫卡式审判”？

孙柏 卡尔·施米特与《哈姆雷特》

刘增人 刘泉 路在脚下

高峰枫 《西奈抄本》的发现与收藏

张承志 轻轻地触碰（三）

洪再新 三十年“长”“远”之见



生活需要读书，
《读书》丰富生活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读者服务部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邮购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读书》邮购部
邮政编码：100125 国内代号：2-275



这一年奔驰做了哪些正确的事

主笔 / 李三



戴姆勒董事唐仕凯（左）与奔驰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裁倪恺

“做正确的事情”，这是北京—奔驰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裁倪恺的口头禅。

今年4月在全新长轴距E级车的全球首发式上，倪恺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唱了一首经典的中国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经过了生长的夏天和收获的秋季，他深有感慨：“做正确的事情，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却没那么容易。我们常常将心比心扪心自问：如果我们是客户，是否会选择奔驰现在的产品和服务？实际上，做正确的事情就像爱一样，可能很难名状，但它真正来临的时候你就会感知到。”

2016年是梅赛德斯—奔驰在中国的又一个丰收年，这一年，奔驰在华推出了16款全新或改款车型，除了创新产品，在客户体验以及业务模式上，也都进行了积极的尝试。“今年，梅赛德斯—奔驰有望实现重回全球第一的位置。”负责大中华区业务的戴姆勒董事唐仕凯强调，“中国市场在梅赛德斯—奔驰的全球战略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联生活周刊：你预计未来新能源汽车销量在整个汽车市场的占比会有多高？

唐仕凯：政府出台的配套政策和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认可，使我们坚信中国市场在该领域拥有巨大的潜力。毋庸置疑，中国目前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这得益于中国政府对于新能源汽车的大力扶持及出台的各项积极的政策措施。奔驰预期到2025年，新能源汽车产品将占据奔驰15%到25%的销量份额。15%到25%是一个相对较大的区间，但可以肯定的是，影响新能源车市场的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客户的接受度，另一方面是政策法规、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度。目前的趋势是，新能源汽车正在赢得更多客户的认可。

三联生活周刊：奔驰在中国的新能源战略体系是如何布局的？

唐仕凯：我们将在电动出行领域加大投入，不断追求卓越并掌握未来发展的方向。EQ是梅赛德斯—奔驰旗下全新电动出行子品牌，未来我们会基于EQ这个品牌 and 平台，努力打造更加丰富的奔驰新能源汽车产品阵容。未来所有奔驰的电动车产品都会列入EQ品牌，在中国市场上，我们也会延续同样的品牌战略。

戴姆勒将不断加大投资，研发高效环保的新能源汽车，这也是我们在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我们在中国市场拥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北汽、比亚迪，这两家企业在新能源汽车方面都有着丰富经验。

三联生活周刊：关于新能源汽车和共享经济有哪些具体的发展计划？

倪恺：我们用“C.A.S.E”这四个字母分别指代四个趋势，中文叫作“瞰思未来”，这将是戴姆勒对于未来交通解决方案的重要战略。其中“C”是指智能互联（Connectivity），在中国我们有70%的客户激活了智能互联功能，我们的智能互联2.0系统——Mercedes me提供17项专为中国市场量身打造的专属功能，如微信功能、紧急救援服务等；“A”（Autonomous）是我们在通往自动驾驶之路上的努力，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全新E级车，它已搭载多项智能驾驶辅助功能，可以说它是通往自动驾驶道路上非常重要的里程碑；“S”（Shared）代表共享出行，我

们的 Car2Go 即行项目已在运营；“E”（Electric）代表电力驱动概念，在中国市场已经引入了三款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知道奔驰在全球已经取得了豪华车市场的第一名，目前在国内豪华车市场上奔驰仍排名第三。中国市场的发展有何期许？

倪恺：目前，奔驰取得了全球豪华品牌第一的位置，但我们不一定要靠在中国夺冠来保证奔驰在全球第一，奔驰绝对不会不惜代价换取销量增长。中国的增长对于我们全球的表现非常重要，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也是梅赛德斯—奔驰全球第一大乘用车市场。在中国市场，奔驰仍位列豪华车市场第三，我们与竞争对手的销量差距正在不断缩小，强劲的产品助力奔驰进一步提升市场表现，我们会继续努力缩小与对手之间的差距。但对梅赛德斯—奔驰品牌来说，销量并不是我们衡量业绩发展的唯一指标，我们希望成为一个能持续不断为客户提供愉悦体验的品牌，希望能够实现可持续增长，也希望能对我们的经销商合作伙伴提供更多价值。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未来几年中国豪车在哪些细分市场有更大的潜力？

倪恺：中国汽车市场越来越成熟，每一个细分市场都很重要，我们希望在每一个细分市场都取得良好的表现。在我看来，新生代车型与 SUV 产品都将持续得到市场的青睐。

奔驰拥有非常全面的产品阵营，我们在紧凑级车型中也有非常丰富的选择，新生代车型家族，包括 GLA SUV、A 级车、B 级车、CLA 运动轿车。今年 1～10 月，我们的新生代车型家族取得了 77% 的增长，这一表现也超出了预期。

我们的 SUV 家族也持续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力，今年 1～10 月奔驰 SUV 家族取得了 45% 的增长，奔驰 SUV 家族有着非常好的产品布局，在每个细分市场均有强劲的产品。轿车市场对于我们亦非常重要，备受客户好评的 C 级车、E 级车、S 级车，目前都有着非常好的市场表现。

当然，市场发展越来越呈现出金字塔结构，产品

价格与销量会持续呈反比，这也符合市场发展规律。中国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今年，中国整体汽车市场取得了约 15% 的增长，非常可观，我们对中国汽车市场未来的发展保持信心。

三联生活周刊：销量增长会带来产能的压力，对产能规划是否有相应举措？如何应对因为保有量增长给售后服务带来的压力？

倪恺：现在国产车都在北京奔驰工厂进行生产。对于我们来说，产能不是问题，我们目前的销售是按照计划有条不紊进行的，根据市场需求为客户提供充足的选择，保证良好的车型配比。

关于售后服务，我们目前有近 500 家服务网点，随着网络的不断发展，我们的售后服务网络也将变得愈加强大。目前为止，有 75% 的客户都选择由经销服务网点提供的服务，证明我们力求为客户提供物有所值的售后服务体验这一努力获得了回报。的确，在发展中会有一些压力，但这种压力也是让我们做得更多、做得更好的动力；我们欢迎这种正向的压力出现。

三联生活周刊：戴姆勒将如何推进本土化，实现在中国市场的长期发展？

唐仕凯：戴姆勒将不断加大在华投入，本土化是我们在中国市场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未来，我们将会实现更多车型的国产化。同时，我也会把中国市场的趋势和中国客户的声音带到斯图加特，融入我们的全球产品战略之中。

倪恺：中国对于我们而言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中国的同事、消费者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对于奔驰这个传统品牌来说，如果在这个市场上要有所作为，创造力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创造力”，不仅是将一些全球的举措引入中国市场并本地化，更要有中国专属的解决方案，比如智能互联、共享出行以及中国消费者更加倾向于手机的使用。我知道中国有一句名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对我们而言，认清自己从何而来，以及未来向何方发展非常重要。目前，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我们希望以此为基础继续前行。■

紧凑型宝马驶入蓝海

主笔 / 李三



华晨宝马营销高级汽车有限公司
副总裁高乐

国产全新 BMW1 系运动轿车在广州车展全球首发。

作为德系三大豪车品牌中形象最为“年轻”的一个，宝马在几年前就开始布局中国的紧凑型豪车市场，先后在华晨宝马投产 BMWX1、创新 BMW2 系旅行车，以及在进口渠道推出宝马 1 系，直至国产全新 BMW1 系运动轿车的亮相，至此，华晨宝马紧凑型产品线已经全面拉开阵势。

紧凑型豪车会是下一个蓝海吗？华晨宝马营销高级汽车有限公司副总裁高乐先生志在必得，他说：“一年以后，让我们再来看 1 系运动轿车的销量。”

三联生活周刊：相比竞品车型，全新 BMW1 系运动轿车是后来者，在这个细分市场是否注定失去先机？

高乐：在这个细分市场我们的确不是开创者，已有竞品车型在先。我们的竞争对手在考虑把紧凑型车引入中国市场的时候，其实在宝马内部也进行了调查和论证，竞争对手选择的方式可能是把最小最紧凑的车型直接引入中国，但宝马的做法有所不同，我们希望专门为中国消费者量身定制一款专属车型，这一点使宝马在豪华紧凑细分市场中独树一帜。豪华汽车的许多特性和配置都会移植到这个紧凑车型当中，全新 BMW1 系运动轿车不仅体现了豪华特征，同时也装备了许多高科技配置，这在其他同级别紧凑型车型阵容中是没有的，包括年轻时尚的动感设计、运动性与舒适性兼备的底盘调教，以及在中国各种气候和路面条件下进行的车辆测试等等为中国用户量身定制的诸多专属特性。

我们之前已经有过成功的后来居上的经验，比如

宝马当前一代 5 系就成功超越了它的竞争对手而成为这一级别市场的销量冠军车型。我们也期待 1 系运动轿车能够同样出色。

三联生活周刊：BMW 1 系运动轿车的目标人群有哪些？

高乐：1 系运动轿车锁定的目标客户和人群是非常年轻的消费者，小于 30 岁，这可能是他们人生第一辆豪华车。由于他们比较年轻且成长于互联网时代，因此这款车上配备了先进的互联驾驶技术，比如全彩色平视显示系统，可将 GPS 导航信息和交通标志牌等信息投射到前挡风玻璃上，8.8 英寸高清显示屏是同级最佳配置，带中文手写输入功能的 iDrive 触屏控制面板也是同级最好的；1 系运动轿车还将配备 BMW Connected 应用，功能也非常强大，其功能就如同是客户的一位私人助理，能把与客户个人交通出行所必要的各种服务整合起来，不仅是与车辆，还包括其他各种智能终端等，这也是同级独有配置。

三联生活周刊：紧凑型豪华汽车市场，从既往几年来看，厂家的经营其实并不好，竞争非常激烈而难以取得突破，为什么宝马要花大力气选择进入这样一个细分市场？

高乐：整体汽车市场仍然是一个传统金字塔形的市场。我认为，在金字塔基层，其实有很多人对紧凑型豪华车还是有需求的，比如现在开的是一辆非豪华品牌车型，可能就会有升级到豪华品牌的打算。如果还没有升级车型，我猜想，可能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现在市场并没有能够符合他这么多需求的紧凑型豪华车。所以我们认为，只要在豪华紧凑级这个细分市场

中有针对性的产品设计，如果能够找对消费者需要的点，就会有很多人愿意把现有的非豪华品牌车型改善升级成豪华品牌车型。我们自信1系轿车拥有足够的实力撬动中国紧凑型汽车市场，并且改变人们对于这一级别的传统看法。

三联生活周刊：宝马集团已经引入中国数款新能源汽车产品，相比国产化车型，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存在一定的困难。宝马在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发展策略将如何推进？

高乐：在新能源车方面，我们可以画一个四区象限，左上方表示纯电动汽车，右上方的象限指的是插电混合动力汽车，左下方是国产新能源汽车，右下方代表进口新能源汽车。在中国市场来看，新能源汽车的国产化肯定是一大趋势，因为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技术在不断进步，本土供应商的电池性能也在不断改善。我们相信未来新能源车最终都会走向纯电动汽车，当然这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趋势。

对宝马新能源汽车现有的产品组合来说，我们在这四个象限都已有一席之地，包括BMW i3、i8、740Le，还有规划中的X1插电式混合动力等。虽然新能源汽车国产化是大势所趋，但是还在发展和进化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在每个象限当中都有所部署。目前来看，BMW i品牌取得了很好的成就，无论是纯电动i3还是插电式混合动力i8，可以说，宝马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正在有效推进新能源汽车市场的进化和向前发展。

三联生活周刊：市场对新能源的反馈如何？你对此是否满意？

高乐：从销量来看，宝马集团经历数年才实现新能源汽车销量突破10万辆。而即将到来的2017年，我们可能一年内的销量就能突破10万辆，可见，宝马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已经走在豪华汽车品牌的最前面。市场的发展趋势的确是在向着有利于新能源汽车的方向转变。

三联生活周刊：今年豪华车市场表现竞争激烈，宝马是否感受到压力？

高乐：从宏观总量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自然而然所有汽车公司都希望能够在此耕耘

和收获。我们已经看到，相比豪华汽车市场的传统三强，二线豪华车品牌的确是在奋起直追。过去传统三强在豪华汽车市场的销量占比可以达到90%，其他品牌占比10%，未来这比例可能会逐渐变为80%比20%，这都是可能的。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中国豪华汽车市场的整体规模在不断扩大，因为未来虽然传统强势品牌的占比会下降，但是从销量的绝对数量上来看还是在稳定上升的。

中国是很多汽车公司大有可为的市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特别喜欢中国市场的主要原因。如果身处传统的欧美市场，它的销量和各车型占比通常数年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在中国非常让人激动的是，只要能够抓住时下或者将要到来的趋势，并且设计出好的产品，只要车型设计贴近消费者最新的需求，新车型就能取得成功，而业绩单就会非常快地反馈回来。

我们深知，无论多么优秀的车型，都会有自己的产品生命周期，到了产品周期末，车型的受关注度自然就会下降，因此任何一个车型的市场表现都会有起伏的。未来数年，宝马将迎来产品升级换代的一个高峰，大家会看到许多车型都会再次被注入新的活力，比如明年国产5系就将升级换代。

三联生活周刊：近年来整个中国汽车市场最火的车型实际是SUV，从宝马竞争对手来看，都有了两款国产SUV车型，宝马为何不引进更多SUV车型，比如BMW X3进行国产呢？

高乐：决定某一款车型是否进行国产有很多因素，其中车型的生命周期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选择一款车型进行国产，最合适的时机就是在这一款车型换代升级的时候，如果一款车型已到了产品生命周期的中段，那就不是最适合进行国产化的时机，我相信所有厂商在选择一款新车型进行国产时都会考虑这一因素。目前采取进口销售的BMW X3的确销量表现很好，而且我们也已经宣布下一代X3将会在中国落地进行国产，这个已经是既定的方向和计划。届时再看华晨宝马，大家会看到一条非常完整且丰富的产品线，1系、2系、3系、5系、X1、X3，全面覆盖不同的细分市场，华晨宝马的竞争实力也将得到极大加强。■



2017年，TREK 崔克与 C-TREK 蔚领在四个城市进行 TREK100 慈善骑行活动

强强联合 C-TREK 蔚领与 TREK 崔克将擦出怎样的火花

★日前，一汽—大众首款跨界旅行车“C-TREK 蔚领”与世界顶级自行车品牌“TREK 崔克”达成战略合作，宣布将整合双方优势资源，在品牌体验、户外运动、旅行生活以及市场营销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

★一汽—大众希望通过与 TREK 的战略合作，打造一个围绕 C-TREK 的生态圈，涵盖摄影、旅游、文化等丰富多彩的内容，让更多爱生活、爱旅行、爱运动的年轻人“带着生活的热度去旅行，带着旅行的心境去生活”。

11月18日，一汽—大众首款跨界旅行车“C-TREK 蔚领”与顶级自行车品牌“TREK 崔克”在广州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宣布将在品牌体验、户外骑行、旅行生活以及市场营销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为广大用户带来升级的旅行和骑行体验，并打造一个围绕 C-TREK 的生态圈，在旅行、骑行、生活等方面创造一种新的时代潮流，引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一个是跨界旅行车市场的创领者，一个是世界顶级自行车的巨头；一个能带着你去找诗和远方，一个能

练就你的体魄和心态；一个倡导旅行生活，一个推广骑行文化。

双方的战略合作，将擦出怎样的火花？

强强联合 跨界而合

首先，让我们先来看一下一汽—大众 C-TREK 蔚领和 TREK 崔克双方的家世背景。

C-TREK 蔚领是大众全球首款 A 级跨界旅行车，同时也是一汽—大众大众品牌第七车型品牌，集轿车、旅

行车、SUV 多能于一体，不仅拥有轿车的舒适操控性，更拥有旅行车的易载大空间和类 SUV 的通过性。它采用了大量的跨界元素，将大空间、多功能、良好的视野及较高的离地间隙完美融合，既适合日常工作生活使用，更能很好地满足旅行和户外使用需求。

TREK 崔克自行车成立于 1976 年，总部位于美国威斯康星州。创立时只有 5 位员工，通过近 40 年的不懈创新与努力，凭借对自行车发自内心的热爱，TREK 已经成长为行业内的领导品牌，并拥有全球最大的经销商网络，超过 70 个国家和地区都可以购买到 TREK 产品。2005 年，TREK 进入中国，大力推动自行车运动在中国的发展，积极支持各项赛事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到自行车这项健康环保的运动中来。

无论是一汽 - 大众，还是 TREK 崔克，双方都是各自行业里的佼佼者。但纵观当下多个行业的合作联姻，不难发现他们都有着相同的用户人群或使用场景的重合，而一个是汽车行业，一个是自行车行业，两者看似毫无相关，却为何跨越各自的市场边界，携手走到了一起呢？难道仅仅是因为双方的名字相似吗？

答案是否定的，双方实际上高度契合。

珠联璧合 天作之合

“TREK 崔克自行车和 C-TREK 蔚领有着相同的品牌理念、相同的用户人群，倡导相同的生活方式。”一汽 - 大众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马振山表示，“双方战略合作是个良好的开端，明年大家就将在许多一汽 - 大众的

4S 店里看到 TREK 自行车，此外我们还将为消费者营造旅行和骑行场景化需求。未来，我们还将联合更多品牌展开跨界合作，打造一个围绕 C-TREK 蔚领的全新生态圈，涵盖摄影、旅游、文化等丰富多彩的内容，将线上线下都做起来，让更多的合作伙伴加入进来，不断扩展丰富这一生态圈，让更多消费者真正去享受丰富多彩的生活。”

“TREK 不仅仅是一个产品，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现代人越来越需要走出城市探索自然，自行车和旅行车当然是最好的工具，无论是品牌主张还是运动专业性，TREK 与 C-TREK 都完美契合。” TREK 自行车中国区总经理赵大勇表示，“明年我们将与 C-TREK 蔚领在四个城市进行 TREK100 慈善骑行活动，并基于 TREK100 骑行模式在全国 12 个区域进行推广。”

作为“大众品牌首款量产适合日常使用且具有探险精神的跨界旅行车”，C-TREK 蔚领主张“带着生活的热度去旅行，带着旅行的心境去生活”；而 TREK 崔克自行车致力于制造简单且世界上最好的自行车，主张“发现生活的美好，用自行车去解决复杂的问题”。尽管双方的用户人群来自各行各业，但他们都喜欢旅行、喜欢运动、喜欢丰富多彩的生活。

欧美的旅行和骑行文化都已有上百年历史了，但在中国还有很大的潜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双方不仅仅是在卖旅行车和自行车，更重要的是推广一种文化、引领一种生活方式。那就是：让更多爱生活、爱旅行、爱运动的年轻人“带着生活的热度去旅行，带着旅行的心境去生活”。



C-TREK 蔚领全系标配承载式全铝行李架，让郊外骑行不再是梦想

马林斯基的中国月

记者 王丹阳

俄罗斯的文化符号，近观之中，战斗民族之特性，仍是鲜明。

《战争与和平》在哈尔滨

10月26日凌晨，哈尔滨下了今冬第二场雪，雪中的俄罗斯建筑黯沉紧闭，渺茫如林中小屋，未来这两天，哈尔滨将重温一段真正的俄罗斯风味。此时，圣彼得堡马林斯基剧院在中国已经巡演了7天，那天将来到哈尔滨，演两场普罗科菲耶夫的歌剧《战争与和平》。

就在雪花渐渐覆盖俄式尖顶的时候，我看见微信里上海大剧院的朋友发的谢幕图片——马林斯基在上海的最后一场演出大功告成。据说两场都一票难求，加座一放出来就抢空。

那场芭蕾的独舞女主角是40岁的马林斯基首席舞黛安娜·维什耶娃，现已在美国国家舞蹈团担任客座首席近15年，明年即将退役。她是俄罗斯文化输出的一个“芭蕾界的符号”，在这个对民族文化有种执拗的举国性狂热的国家，她作为舞蹈演员被誉为人民艺术家。马林斯基剧院是“国家体制”的产物，大量艺术人才在艺术总监、也是俄罗斯“艺术沙皇”级人物瓦莱里·捷杰耶夫（Valery Gergiev）的慧眼下度过少年、青年时期，达到艺术的巅峰期。

据说这一次维什耶娃是被捷杰耶夫一个电话从美国叫来的。“你不要待在美国，今后就驻海参崴的马林斯基新剧院，在这之前我要带你来次上海。”上海大剧院的总经理张笑丁这样告诉我，捷杰耶夫就像个不可抗拒的磁场，多少活跃在海外的艺术家对他来说就像线头在手的风筝，不管是否隶属马林斯基，都一呼百应。

马林斯基剧院这次的中国巡演可谓是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共演19场，上海7场、哈尔滨2场，其次是北京、广州、天津……几乎没有一天空隙，其中捷杰耶夫亲自挥棒10场。所以当哈尔滨即将迎来东方第一缕曙光时，捷杰耶夫还在上海午夜的街头享受着



啤酒，这对他来说是每晚工作后的精神提振剂。

哈尔滨大剧院于今年7月刚刚落成，是个后现代派艺术的建筑，在松花江北岸，冬日退潮的沼泽中，一具极富剥离感的银灰色盔甲破冰而出，像是外星上的外物在工业城市老迈的阳光下反射着新生的光。《战争与和平》无疑将在17点就入夜的冰城搅动起一股令人渴望的晚餐热汤，600人登台的大戏对任何城市来说都那么罕见。

捷杰耶夫到达大剧院的时候是下午16点，在中



俄罗斯马林斯基剧院在上海大剧院演出歌剧《黑桃皇后》

国经纪公司“吴氏策划”总经理吴嘉童的陪同下哼哧哼哧地出席了下午举行的文化论坛，致了一个辞，转而就排练去了，此刻距离开演还有3个多小时。跟着捷杰耶夫当空中飞人，吴嘉童无时不徘徊在惊险和侥幸的两极。“本来我建议今天歇一天可以彩排，他说我不需要彩排，我倒背如流。”吴嘉童说，显然他承担了很多风险，那晚的乐队有没有替代指挥先不说，最要命的是交响乐团是当天上午的航班从上海起飞，乐团不可能有替代。

这种生活捷杰耶夫已经过惯了，在他看来，不需要在国外巡演的时候浪费哪怕一天，只要有档期都可塞满。马林斯基剧院不愧是俄罗斯最大的艺术工厂，4000名雇员和艺术家，1200多部作品，每年国内常规演出2000场，捷杰耶夫亲自带队赴国外演出三四百场……人们很少可以看到世界上哪家剧院如此高产，简直就像永动机。一切又归功于捷杰耶夫有这样的魄力和体力，允许他整天整天地文化输出。吴嘉童说：“‘姐夫’就是一劳模，全世界都知道的，3点

睡觉，7点起床。”“姐夫”是中国艺术界给他的别名，捷杰耶夫自1998年第一次来上海，参加上海大剧院落成演出后，就与中国结缘。

真正俄罗斯的东西

剧院内部是用水曲柳木材装成的，像一个刨得光光的木雕装置，流线体的造型把观众席分割成蜂巢和一个个黑洞的形状，是冰天雪地中的好去处。《战争与和平》演了4个小时，两幕13场，让人全程忘却外面的寒夜。这是一出地道的俄罗斯歌剧，由苏联著名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在1941年写成。虽然托尔斯泰的原著背景是1812年抵抗拿破仑欧洲侵略的俄法战争，但作曲家的创作意图则受激发于“二战”初期的苏德战争。马林斯基剧院的《战争与和平》有八九个版本，那显然是俄罗斯人的“主旋律”式的剧目，鲜见于世界舞台，也就是在英国考文特花园和美国大都会歌剧院等少数场合演过，主要原因是制作价格不菲，很少有剧院接得下来。

用捷杰耶夫的话来说，这是“最俄罗斯的东西”，600个演员，其中出现有名字的就60多人，第一幕为爱情，第二幕为战争。但这毕竟是一出历史剧，非以人物性格与命运的逻辑为引线发展而去，所以两幕之间基本各自为政，片段式的情节松弛而流布全剧，如同看一部活的战争电影。特别在第二幕中，为凸显莫斯科人民情愿大火烧城以驱赶拿破仑军队，衣衫褴褛的人民站在战壕上远眺红光印天居然被装在了一个舞台上，俄国总司令库图佐夫与拿破仑的交战再现为担架、伤员、枪炮压台……

毕竟，这是普罗科菲耶夫历时12年的生命最后之作。1935年，他从美国结束17年的流亡回到苏联，想着写一部苏维埃题材的作品，最后落在《战争与和平》上，也注定了它的意识形态烙印和特定的时代情绪。普罗科菲耶夫使用朗诵调和合唱来发挥俄语的歌唱性，所以对比管弦乐和声乐做出了很大的让步。这样，它就和歌剧的正统之源意大利歌剧相去甚远，毕竟，意大利歌剧更具古典性，人民性和革命性只是俄罗斯的东西。

俄语本身发音靠后，使得歌剧听起来不如意大利的尖突高亢，而19世纪末发端的俄罗斯歌剧本身就与即将黯然收场的没落贵族同步，所以不及南欧明丽的巴洛克宫廷赋予歌剧的视觉色彩。正在和捷杰耶夫洽谈合作的中国男高音袁晨野也来了，他可能在将来

会演皮埃尔一角，这位莫斯科的失意又善良的贵族最终与娜塔莎成了一对。但歌剧中就再没回到这一主题，而是结束在对法的胜利上……袁晨野谈起俄式歌剧与意大利歌剧的区别：“这个戏巧就巧在选的每一个演员都是与角色相当契合的，它不会像是意大利的《阿依达》式的英雄主义历史剧，皮埃尔的人物设定注定了他不会被写成英雄男高音，这个跟人物是符合的。”

上海大剧院总经理张笑丁看完《战争与和平》后，暗暗自付还好上海没有接这部戏，因为舞台布置难度太高，对于那几天歌剧、交响乐，又歌剧、芭蕾舞的连轴转，根本没法完成转台。一周前，在看了上海的开场演出歌剧《黑桃皇后》后她说：“对于角色的理解，他们是吃到骨子里了。你会发现作为演员他们就是最适合的，比如盖尔曼一角，男主角的音色跟第一个马林斯基版的唱片中的音色是极接近的，够尖但不够雄厚，就是因为这个人物本身就是病态的。”

马林斯基剧院在上海的七场演出，是今年的上海大剧院在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最重要的演出。10月18日开演前两周，技术团队带着14个集装箱抵沪。《黑桃皇后》是柴可夫斯基人生末年时期的歌剧，被音乐界看作是他一部色调最阴郁、心理张力最极端、风格最多样化的超现实主义之作。

上海七场的幕后

张笑丁在拿到策划公司给的节目单时，最初的开幕剧是《茶花女》，而最终两场芭蕾是《天鹅湖》。但是她一直心想着，首先那该是一部正宗的俄罗斯本土歌剧，而不是俄罗斯的外国作品，虽然“姐夫”海纳百川，外国作品都信手拈来；其次《天鹅湖》在上海演得太多了，能不能有些稍冷的。今年3月，她赶去圣彼得堡，为了找“姐夫”敲定最后的剧目。她记得她先是在马林斯基剧院看了一场肖斯塔科维奇的歌剧《鼻子》，终场时去到侧台等待乐池上的捷杰耶夫下来。那一刻她发现一溜人都在候着他，把侧台站成候诊区一样。

“我们既然是中国人的脸，我想就站在他目力所及的地方，等他看到我们。”张笑丁说，捷杰耶夫走过来说自己有个电视采访，“要我们务必今晚等他，不然就没有时间谈了。”随后那个电视采访做了两个小时，他们在午夜等到捷杰耶夫。“马林斯基的助手也跟我们提示，‘你们一定要抓住他，不然谁也做不了主’。”

袁晨野告诉我，他也“逮”过捷杰耶夫。去年，



马林斯基演出芭蕾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剧照。首舞黛安娜·维什耶娃担任女主角

他作为声乐评委前去莫斯科的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和捷杰耶夫约好谈一个角色，结果满场找不到人，“他的助手也找不到他”，于是再通过中国区的评委联系人，也就是经纪方的吴嘉童才找到他。在马林斯基，只有捷杰耶夫的话才算最终拍板，他的“音乐沙皇”之名不是空穴来风，如今，人们更尊他为“音乐界的普京”，他本身就跟普京过从甚密。“老柴比赛时普京坐在下面三个小时没有动地儿。”袁晨野说。国家体制加上个人威权统治在艺术上的表现，马林斯基剧院是不二之标本，正因如此，帮助剧院成为俄罗斯体量最大的艺术工厂，前提是有捷杰耶夫这样一部中枢地位的活机器。

那时，张笑丁看到去年的新版《黑桃皇后》剧照，舞美奢华而气度不凡，心里定了就要演这一部。直到来了才知道，装台的难度远超想象，因为这次把歌剧、交响和芭蕾都搬来了，这对上海大剧院来说是第一次如此密集地换台。更难在协作调配，俄方的技术团队各自为政，灯光、吊杆、道具“各种工种做完完事，都没有一个协同”；每日的工作进程没有一个落在纸上的准数，“都为他们做好通宵的准备了，他们到了中午说可以了，下午不用干了”。再比如，开演《黑桃皇后》前一天晚上，演员与捷杰耶夫齐到上海，夜晚22点来到大剧院“心血来潮”地要彩排，让中方人员手足无措。此前捷杰耶夫刚在日本巡回了10天。张笑丁记得捷杰耶夫曾经那么跟她谦虚过一句：“我们俄罗斯人就是这样，无组织无纪律，相比还是德国人和日本人比较严谨。”

500人的俄方团队被分配在上海5个酒店，光接待就超出了上海大剧院的常规极限。“中间交响乐团还去了澳门演出，24日演《罗朱》的当天上午才赶回来，等于要给他们弄二次签证，对我们的演出是有风险的。”大剧院方也牵动着神经，就怕万一在最后时刻搞砸。整个完事后，大剧院松了口气，给上海出入境管理处送了一面锦旗，确实，如果没有公家的帮忙甚至绿色通道，妄论舞台上的光鲜。

国家体制产物

马林斯基剧院始建于1849年，在苏联时代曾被更名为基洛夫剧院。更早的有叶卡杰琳娜大帝时代的圣彼得堡大剧院，而马林斯基剧院仿制意大利式的U形环绕舞台，可容纳1625人，舞台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1890年，圣彼得堡大剧院愈加相形见绌，在

原址上拆除建造了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原剧院编制被马林斯基剧院吸收。

俄罗斯音乐的灵魂人物柴可夫斯基就师出圣彼得堡音乐学院，他的作品首演几乎都在马林斯基剧院。承着这样的脉系，1978年刚从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毕业的捷杰耶夫顺理成章进入了马林斯基剧院，担任特米卡尔诺夫的助理指挥。他曾师从当时的指挥巨匠、一代宗师伊利亚·穆辛（Ilya Musin），此公曾一举培养出特米尔卡诺夫、捷杰耶夫以及比契科夫三位俄罗斯指挥家。

1988年，苏联政体风雨飘摇之际，剧院在自由经济的召唤下也开始搞选举改革。时任艺术总监特米尔卡诺夫，还是捷杰耶夫的师傅，但35岁的捷杰耶夫以85%的票数被选为新的艺术总监，于是特米尔卡诺夫转会圣彼得堡爱乐乐团，接棒刚逝世的指挥巨擘穆拉文斯基。1991年苏联解体，作为国营单位的马林斯基剧院的国家财政拨款突然跳水到原来的15%，面临动荡的转型期，演员流失严重，捷杰耶夫在重压下只能大刀阔斧地改革，包括搜罗非专业年轻演员、力推海外演出、举办音乐节。

捷杰耶夫是俄罗斯《福布斯》排行榜上排名第三的人物，年入1650万美元。“从来没有华丽的衣着。”吴嘉童说。他见过太多享受型的艺术家，但捷杰耶夫是那种有钱没时间花的人，有次他去捷杰耶夫在圣彼得堡的家，那普通人家的气息把他惊到了。那是一栋很不起眼的20层高的居民楼，内装远比不上中国的商品房小区，他至今带着自己的家庭和母亲、姐姐同住，那是一个相当传统的高加索艺术世家。“他有个15岁的儿子，也在学钢琴，但我从没见过他把自己儿子一个劲往台上推。”

10月28日，是捷杰耶夫演完两场《战争与和平》后难得不用工作的一日，他和吴嘉童下午就要赶到北京，因为翌日下午在国家大剧院有场交响乐。他们在酒店餐厅边吃早餐边对着明年的计划，捷杰耶夫的脑筋里永远在转着日程安排，他几乎能精确地告知明年他几时还有空档可以留给中国。在奔赴机场前吴嘉童问他还有什么地方想去，他说想看一看哈尔滨的东北虎园。“他就是什么都新奇，什么都想看，没有不吃的东西。”完事后吴嘉童松了口气跟我们说。

三联生活周刊：你如何看待《战争与和平》在哈尔滨的演出？

捷杰耶夫：我24岁时就指挥过八九个版本的《战

争与和平》，留存下来的录音就三四版，这部剧是我职业生涯的第一站。我现在还在寻找最好的声音，9个月前海参崴的新边疆剧院落成，至此我们有4个大歌剧厅、5个小室内音乐厅，共8万平方米面积，我们雇用4000人，360个乐手。但我知道观众是重要的，从造一个剧院，到制作精良的演出，再到怎么把观众带进来。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上海连演七场共四种不同种类的演出，如何做这样的准备？

捷杰耶夫：确实这种持续又多样的演出方式是不容易的，但我在这里指挥的第一场《黑桃皇后》不是在这里彩排的，它已经存在15年了，我已经对它滚瓜烂熟。我只需要不同的舞台上摸索音响效果，在舞台上为贝斯、鼓、管乐等等寻找最恰当的摆放，制造最好的视听效果；其次作为指挥，我只需要为当晚积蓄能量。

三联生活周刊：这些剧目都是怎样确定下来的？

捷杰耶夫：在谈项目的时候我必须迅速决定什么是最适当的呈现，我在两年前谈上海曲目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我18年前来过上海，还能演什么，把《黑桃皇后》搬到上海是不容易的，它需要凑齐一些很重要的演员。这次可以把交响、芭蕾、歌剧、儿童剧一起搬到上海，对我来说是一个满意的组合。我是第一个把音乐会带入上海大剧院的国外指挥，2008年国家大剧院建成后几乎一年来一两次，我在那里演了不下25场，把柴可夫斯基、斯特拉文斯基、肖斯塔科维奇、拉赫马尼诺夫的作品一一演过来。

三联生活周刊：对于歌剧歌手来讲，你挑演员的标准是什么？

捷杰耶夫：训练歌手包括了语言、表达方式，甚至每一个词在情绪强弱上的表达，我们要花很长时间来讨论这个，要录很多版本跟国外的原版做比较。音色是每个歌唱家最基本的区别，但是成名的大艺术家往往会误解自己什么都能演，这就错了。从传统上来看，意大利歌剧和德国歌剧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系统，但今天你可以看到全世界范围的好声音正在轮流串台，德国人会用韩国歌手，马林斯基也会用中国的歌手，我们的演员也在意大利、美国、德国、萨尔茨堡登台，融合已经是种趋势。我也会拿来这个时代最好的歌手，我指挥过12种威尔第的歌剧，5种普契尼的歌剧。

三联生活周刊：有观众发现你在指挥时曾经双手靠背，只用眼神，这是哪种风格？



马林斯基剧院艺术总监、指挥家捷杰耶夫

捷杰耶夫：音乐是一种富于情绪色彩的表达，它不仅表现在肢体语言上，还有很多可以是眼神和面部表情的流露。我很幸运的是我早年学指挥时见过真正的指挥大师，虽然很多已逝，比如穆辛。我遵循的风格还是要按照谱上的表情记号来指挥，读懂作曲家的原意，也让乐队读懂你，剔除不必要的动作，知道如何在挥与不挥间调配，最重要的是不要给歌手或者乐队造成心理负担。

三联生活周刊：欧洲的剧院有长年驻演的传统，但中国的剧院并没有这种传统，如何看待这种区别？

捷杰耶夫：中国的剧院数量的确是近20年赶超上来的，欧洲的剧院都有自己专属的传统，有些就是有历史声名的歌剧团或芭蕾舞团的常驻剧院。我给中国的剧院一个建议，如何赋予它艺术生活的内容，那就是制作儿童剧，因为儿童剧不是独唱或独演，它会给大量的演员以机会，同时也提高着技术、舞美、服装的实践能力。我们每年有上千场演出，海外巡演所付的所得税甚至可以说养着一个城市，3年前我说我们一起来做一些孩子的节目，能不能从一年2000万美元的税钱里抽100万美元给我们，我们给所有的幼儿园、小学演一遍。☑



《神奇动物在哪里》：重回 J.K. 罗琳的魔法世界

记者 / 宋诗婷

《哈利·波特》系列电影 5 年前完结，如今，J.K. 罗琳以《神奇动物在哪里》重启魔法世界。她说，《神奇动物在哪里》有一个核心主题：人类对于自己不了解的事物所产生的恐惧，以及对这样的恐惧所采取的极端手段。虽然这部作品的题目是“动物”，但故事的实质还是要回归到人类。



《哈利·波特》血脉

《神奇动物在哪里》的零点首映像是一场《哈利·波特》“粉丝”的大派对，他们身穿黑色斗篷，头戴霍格沃茨魔法学院分院帽，在深夜冒着寒冷和雾霾涌进各大影院。格兰芬多学院的红黄围巾与斯莱特林学院的灰绿色将他们的偏好区分开来，“粉丝”派对也是校友聚会，而他们的上一次相聚还是在5年之前。

2011年，《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下）》上映，海报上一句“It all ends”宣告了《哈利·波特》



左图：电影《神奇动物在哪里》剧照

右图：导演大卫·叶茨（左）在该片拍摄现场

系列的终结。尽管制片方和主创一直强调，《神奇动物在哪里》是一个新故事，但“哈迷”们还是愿意把这个新的魔法世界视作《哈利·波特》的延伸。

他们的判断并非一厢情愿。对于《哈利·波特》“粉丝”来说，《神奇动物在哪里》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它曾以教科书的形式出现在《哈利·波特》中，是霍格沃茨魔法学院“奇兽饲育学”课的课本，这本书涵盖了上百种魔法世界的神奇动物，是每位魔法师必备的工具书。《哈利·波特》的原作者J.K. 罗琳也曾把《神奇动物在哪里》作为读物出版，全书只有54页，与其说是一本书，不如说是一本罗列神奇动物名录的小册子。

《哈利·波特》曾是华纳影业最赚钱的大IP，8部电影总票房78亿美元，除第三部之外，其他7部作品的票房成绩都挤进了影史前50位。电影完结后，华纳一直希望再与J.K. 罗琳合作，续写《哈利·波特》的辉煌。

在所有《哈利·波特》的周边素材中，华纳选中了《神奇动物在哪里》这本小册子。“当制片厂告诉我，他们想把《神奇动物在哪里》拍成电影时，我很激动。而且，那时我的脑子里已经对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有了一个布局。我知道，纽特·斯卡曼德的故事一定得由我来写，因为我太了解他了，我是不二人选。”J.K. 罗琳说。

J.K. 罗琳口中的纽特·斯卡曼德就是电影《神奇动物在哪里》的主人公——一位满世界寻找、研究神奇动物的英国魔法师，他就是《神奇动物在哪里》这本教科书的作者。

与宏大的《哈利·波特》原著相比,《神奇动物在哪里》的54页原著几乎在剧情上没有任何贡献,J.K. 罗琳不得不从头开始亲自创作剧本。这种体验,对于指导过四部《哈利·波特》电影的导演大卫·叶茨来说也是全新的:“以前是把已经写出来的内容变成剧本,但现在我们直接由罗琳去写剧本,之前是一个二手的体验,现在是一手的,作为导演,我能够从参与创造这个世界,这种感觉让我非常激动。”

从人物的塑造和故事的完整性来看,《神奇动物在哪里》的确是一部独立的、不需要做功课就可以看懂的商业片。但考虑到《哈利·波特》“粉丝”的感情和大IP的票房号召力,J.K. 罗琳和大卫·叶茨还是联手在电影中埋下了很多与《哈利·波特》相关的彩蛋。

男主角纽特·斯卡曼德脖子上的黑黄色条纹围巾是霍格沃茨魔法学校赫奇帕奇学院的标志,他在与美国魔法部部长的对话中提到了邓布利多——后来的霍格沃茨魔法学院的校长。电影中还出现过死亡圣器、护树罗锅、家养小精灵等元素,这些小细节都是《哈利·波特》“粉丝”的温馨记忆。

新四人组与神奇动物

全新的人物,全新的故事,但由J.K. 罗琳编剧,《神奇动物在哪里》的剧情模式和《哈利·波特》血脉相连。大卫·黑曼曾是八部《哈利·波特》系列电影的制片人,这次也担任了《神奇动物在哪里》的制片人,他说:“电影里有很多潜在的《哈利·波特》信息。比如,因为宽容带来的幸福,与偏见、压抑带来的危害形成了鲜明对比。弱者、异类可以团结起来变得更强大等待。罗琳传达的这些情感和理念完全能使世界各地的人们产生共鸣。虽然这部作品的题目是‘动物’,但故事的实质还是要回归到人类。”

J.K. 罗琳自己也说,《神奇动物在哪里》有一个核心主题:人类对于自己不了解的事物所产生的恐惧,以及对这样的恐惧所采取的极端手段。

从《哈利·波特》到《神奇动物在哪里》,J.K. 罗琳的魔法世界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价值观体系。电影在这样的设定下展开叙事,男主角英国魔法师纽特·斯卡曼德带着一手提箱神奇动物登陆纽约,在美国,魔法世界与普通人的世界完全隔绝,反魔法组织塞勒姆致力于煽动舆论,铲除魔法和魔法师,而黑暗势力的入侵正让魔法世界处于暴露于众的危险中。纽特意外

走失的神奇动物让他与“麻瓜”(美国魔法世界对不懂魔法的普通人的称呼)雅各布结识,同时,也被美国魔法部的蒂娜逮个正着。蒂娜在勉为其难中将纽特和雅各布带进了自己的生活圈,蒂娜美艳的妹妹奎妮顺理成章地成了三人的同盟。在后来的对抗黑魔法师格林德沃和保护神奇动物中,四人齐心协力,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这个四人组的人物塑造依然有哈利·波特和小伙伴们的影子。J.K. 罗琳的作品一直关注那些有弱点的边缘人,喜欢让他们成为故事的主角和大英雄。男主角纽特有一定程度的交流障碍,他与现实中的人疏远,不善沟通,只有在与动物的相处中才能感到轻松愉悦。女主角蒂娜是个固执、严厉的前傲罗(抗击黑魔法的精英魔法师),因工作失误而被贬职,每天郁郁寡欢。蒂娜的妹妹奎妮没有姐姐的上进心,她明媚动人,却不思进取,掌握摄念技能,却宁愿用这魔法来谈情说爱。丹·福格勒饰演的雅各布是个“麻瓜”,这是J.K. 罗琳第一次让不会魔法的普通人成为推动剧情的主要角色。作为唯一的“麻瓜”扮演者,丹·福格勒喜欢自己的角色:“雅各布就像是我,雅各布走进了魔法师的世界,就像我进入这个电影剧组一样,他像是观众的眼睛,观众可以从他的视角去感受这一切。”

全新的四人组看起来更具可挖掘的戏剧空间。《哈利·波特》中,哈利与小伙伴们的设定是未成年人,而《神奇动物在哪里》的主角都已成年,有可以发展爱情线的空间,在这第一部的剧情里,奎妮和雅各布的爱情来势汹汹,而男女一号纽特和蒂娜的感情在结尾埋下了伏笔,看似会成为第二部剧情的一条主线。

在这四名主要演员中,除奥斯卡最佳男主角获得者——饰演纽特的埃迪·雷德梅恩外,另外三人都不算大牌。导演大卫·叶茨说,男主角纽特的演员人选是最先确定下来的,另外三个主要角色的选角都围绕埃迪·雷德梅恩展开,与男主角搭在一起是否合适,这成了导演大卫·叶茨和制片人大卫·黑曼的选角标准。“埃迪和我们一起飞到纽约进行演员的试镜赛选,在长达48小时里,我们与无数的蒂娜、雅各布和奎妮分别进行了相同场景的饰演,最终才敲定了最后的演员人选。”大卫·叶茨说,“而选择埃迪是因为他是典型的英国人,绅士又有些羞涩,这是纽特这个角色的特质。”

在饰演纽特之前,埃迪·雷德梅恩以《万有引力》

中的霍金一角得到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后来，又因《丹麦女孩》中男扮女装的出色演技再次受到好评。从出道开始，雷德梅恩就以对边缘人物的精准把握而出名，这次饰演的羞涩魔法师似乎也能列入边缘人物之列。“这个人物比较内向、害羞，但他在面对那些神奇动物时又非常开心外向，我要把这两个矛盾点结合，与不同的神奇动物建立很好的联系，这是两个很大的挑战。”雷德梅恩说。

如何用好这些神奇动物？这不仅是让雷德梅恩头疼的事，也是大卫·叶茨和后期制作团队最大的挑战。在整个故事背景中，J.K. 罗琳一共设置了40到50种动物，与剧情相关联的一共有7种。动物的造型设计一共耗费了9个月时间，他们制作了250多个不同版本的动物，稿子经过了15到20次修改。“我们希望那些生物看上去可信，大家愿意相信它是真实存在的。我们从周围的环境中得到很多灵感，所有设计都是从身边开始的。”大卫·黑曼说。

电影中最先出场的神奇动物名叫嗅嗅，它垂涎于一切闪闪发光的东西，因为贪恋钱财而成了整个故事的罪魁祸首。作为一款魔法世界的经典神奇动物，嗅嗅惹了不少麻烦，但也是电影的笑点担当。J.K. 罗琳为可以自由伸缩大小的鸟蛇设计了一场独立的戏，它变身庞然大物，填充了整个房间，如何让鸟蛇变小成了一道难题，这道难题就是“四人组”协力解决麻烦的开始。护树罗锅是雷德梅恩本人最喜欢的神奇动物，它忠诚、黏人，永远缠着纽特。在表演与护树罗锅的互动场景时，雷德梅恩要完全靠想象力表演，想象着自己手上有一只小生物，抚摸它、安慰它，与它配合展开行动。这种特殊的表演方式让雷德梅恩对护树罗锅情有独钟，因为，那个小生物的动作和情感几乎是他创造出来的。在J.K. 罗琳的观念里，最后为整个城市洒下“失忆雨”的雷鸟是“极其美国的神奇动物”：“我想有一个典型的带有美国特质的东西，那就是雷鸟。当雷鸟扇动它几对翅膀而产生风暴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强大而神秘的存在。”

电影涉及到虚拟动物，CGI技术就不得不大量使用。雷德梅恩一向擅长现实主义的表演，刚开始接触CGI技术时，他内心有些抵触，不知如何对着空气演戏。“还好有一些小道具，小木偶，可以帮助我们表演。”雷德梅恩说。道具部门制作了与动物们体态、尺寸相似的道具，在拍摄现场为演员提供参照。“互动的真实感是最重要的，要让观众相信，这些神奇动物与我们处于同一时空。”视觉效果指导提姆·波克说。

在那场中央公园的戏中，大卫·叶茨甚至动用了话剧《战马》的道具师，他们制作了巨大的毒角兽等比例道具来配合雷德梅恩的表演。在那场戏中，纽特要搔首弄姿，引诱发情的毒角兽钻进手提箱。他把麝香涂在身上，大跳艳舞，他说：“这部分表演我是和一个舞蹈家合作的，我们之前看了很多鸟的求偶叫声和行为，我排练了好多天，最后跳出了那段舞，这样的表演实在是有些丢人。”

与雷德梅恩一样，其他演员也常常要对着道具和空气演出。奎妮的扮演者艾莉森·苏朵儿就要对着空气演一出魔法烹饪大戏，这场戏她唯一可以依靠的也只有自己的想象力。

这里是纽约

接受采访时，艾莉森·苏朵儿分享了拍戏时的趣事：“拍戏第一天，我很紧张，现场每个人都跑来和我说，你还好吗？我想说，我还好，难道我看起来不好吗？我把我的紧张都暴露出来了吗？大概第七个人问我这话之后，我才知道，这就是他们英国人说‘早上好’的一种方式而已。”

苏朵儿是典型的美国女孩，演员之间的英美文化差异，看起来像是电影的延伸。

《哈利·波特》是英国人J.K. 罗琳创作的关于英国魔法师的故事，而《神奇动物在哪里》的时空背景是1926年的纽约。上世纪20年代的美国有个浪漫的名字——爵士时代。在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爵士时代”被描绘成一个不惜一切享乐，疯狂追求富华和刺激的迷茫时代。这个“一战”后的空虚时代成就过很多伟大的作家，也诞生了火车、汽车、无线电等影响世界发展进程的发明创造，人们的生活方式正在经历巨大的变革。

“如何呈现那个时代的纽约是我们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大卫·叶茨喜欢上世纪20年代的美国，疯狂无处不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也容易让人相信，电影中抵制魔法的第二塞勒姆，疯狂的黑魔法势力是真实存在的。

为了重现真实的“爵士时代”的纽约，场景设计师找来了成千上万张那个时代的美国照片，把所有建筑编辑成档，希望能从中捕捉场景搭建的灵感。最终，剧组在里维斯登摄影棚——《哈利·波特》场景所在地搭建了完整的纽约场景。钢铁结构的建筑风格，赤褐色砂石外墙的公寓，美国魔法国会秘密总部，可以

同时跑马车和小汽车的街道……“这工程量非常浩大，但是很有必要，这些场景能帮助展示角色在这座伟大城市里的生活状态。”美工设计师斯图尔特·克雷格说。

除了建筑和场景设计要展现“爵士时代”风格，电影中的人物造型和生活细节设计也从英伦风变成了50多年前的纽约风格。蒂娜和妹妹奎妮都是短发造型，去地下酒吧时不忘换上时髦的flapper（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时尚女郎的造型）妆容，背景音乐很爵士，很纽约，雅各布要开面包店的银行贷款桥段也暗藏着1929年金融危机来临前的暗流涌动。

当然，一切背景设计和细节展示都为剧情服务。作为英国魔法师，纽特闯入了纽约魔法界。和英国魔法界相比，纽约的魔法界更封闭、压抑，且危机四伏，这里的魔法界与世俗世界泾渭分明，这里的魔法学校叫伊法魔尼，这里的魔法师管“麻鸡”叫“麻瓜”，会摄念术的奎妮读取纽特的心思时略有难度，因为口音不同。

种种文化和理念上的差异，将20年代的美国魔法界与90年代的英国魔法界区分开来，而不同的身份背景，也让男主角的纽约行成了一次冒险之旅。“罗琳很聪明，她犀利地设定了英美魔法界的不同，并用细节去填充和推进，这是一次全新的挑战，全新的世界。接下来几部电影会有更多和《哈利·波特》相联系的地方，我相信，这电影会带大家回到当年那个看《哈利·波特》的美好时代。”大卫·叶茨说。

专访导演大卫·叶茨

三联生活周刊：J.K. 罗琳第一次担当编剧，如何评价作为编剧的她？

大卫·叶茨：她在边做边学，觉得这件事很有挑战性，但她是一个快速学习者。我们原计划写三部剧本，在第一部的剧本写到一半时，她说，我把第一本写了，后面的找别人去写。但当她把第一部第一版剧本写完时，她就对我说，自己一定要写第二部和第三部。第二部写到一半时，她又说，这不是三部故事，是五部！她的自信不断增长，故事在她脑海中越来越清晰。

三联生活周刊：你们会一直保持联系，更新进度？

大卫·叶茨：是的，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几周前，我跟她说，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我们先休息一下，你让我们知道现在进行到哪里，大家对故事有一个总的

了解，你先写12页剧本出来，把每一幕的要点写出来就好。两天后，她发给我一个102页的剧本。有时候，你很难跟上她的节奏，她太完美，太精力集中，太多元，太聪明，和她合作我感到非常荣幸。

三联生活周刊：剧本从零开始，作为导演，电影中是否有你提出的情节或点子？

大卫·叶茨：作为导演，你总要提出新点子，有时罗琳会接受，把它变成自己的想法，有时她会说，不不，这不会发生。最后那场魔术雨的戏是我提出来的，我说，我们也许可以有一场雨，把每一个地方都浇到，她说，这个不错，我们试试，最终意见被采纳了。男女配角那场吻戏也是我提出来的，我说，罗琳我们可不可以试试有一段吻戏，她喜欢这个点子，喜欢这里的感情，那个画面拍出来确实很美。

三联生活周刊：哪个场景最难设计？

大卫·叶茨：最难的就是纽特那个行李箱里的世界，他向雅各布介绍动物的那个空间包含太多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这些场景、动物和动作是如何设计的？

大卫·叶茨：要先有一个大致的概念，把它们放在3D模型里，需要和动画制作人员合作，我在整个过程中必须一直参与创作，因为有时候需要在3D制作过程中改变动物或场景的颜色，也许仅仅是把羽毛变小一点。我们有一组非常优秀的动画制作团队，你和他们合作就好像和演员合作一样。在创造角色的性格和呈现方式上，罗琳在故事线层面给我们灵感。比如，剧本中写了嗅嗅如何到处跑，我们就回去寻找有类似特性的动物，以现实世界的动作特性为依据，逐步创造我们的角色。这个过程可能要花上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最后再进行动作效果设计，很耗费时间，需要通力合作。

三联生活周刊：约翰尼·德普作为一个大彩蛋在电影结尾出现，为什么选择德普？这个角色在接下来的电影系列中还会出现吗？

大卫·叶茨：他会的。他是一个很优秀的演员，很有魅力，很有趣。我们希望找一个合适的人来出演反派，很奇怪，我们所有主创人员几乎在同一时间想到德普。大卫·黑曼（制片人）来拍摄现场，我和他说，要是德普能来演大反派就好了。他和我说，我们工作室的考特尼刚给他发了邮件，说是不是能请德普来演。然后，我打电话给罗琳，她也说，要是德普来演就好了。最后，我们给德普打电话，问他对加入这个魔法世界感兴趣吗？他说，好啊。☑



万变：李零考古艺术史文集

李零 著 定价：128.00元

收入李零考古与艺术史领域的文章 22 篇，涉及古代器物、建筑砖瓦、雕刻绘画、艺术中的动物形象等主题。由考古遗物、遗迹入手，结合历史学、艺术史与古文文献学，或探究其渊远流变，或寻绎外来文化与古代中国文化的交流与相互影响，在考古与艺术史之间自如游走。

海昏侯刘贺

辛德勇 著 定价：49.00元

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是 2015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墓主人刘贺的传奇经历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本书是第一本有关海昏侯及其时代的学术研究专著。作者以文献记载的刘贺生平为基础，并结合出土文物，将汉武帝晚年至汉宣帝时期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详细解说。



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

李伯重 著 定价：49.00元

早期经济全球化的出现和发展，导致东亚世界原有的秩序被打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这个时代的特征是“火枪与账簿”。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未能抓住机遇，从而不得不再等上两个世纪，才又在新的国际环境中重新开始近代化的进程。

视差：美国与东亚的关系

[美] 布鲁斯·卡明斯 著 李茂增 译 定价：46.00元

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布鲁斯·卡明斯在 20 世纪结束前对东亚地区历史和现状，以及美国与东亚关系所作的解读，至今仍具有启发意义。书中既从东亚一方，也从美国一方探寻双方复杂的互动关系，尤其是对美国进行自我反思。



欲望之石：权力、谎言与爱情交织的钻石梦

[美] 汤姆·佐尔纳 著 麦慧芬 译 定价：45.00元

本书作者跨越十国探寻钻石的真谛，从非洲的“血钻石”地区、打磨钻石的印度童工、北极圈矿场、巴西的非法采矿地，到戴比尔斯的伦敦总部……书中交织着钻石业不为人知的历史、铁一般的权力现实以及被钻石编织的意义之网所缠绕的亦真亦幻的故事。

为什么你该花更多的钱，买更少的衣服

[英] 露西·希格尔 著 王芷华 李曼萍 译 定价：42.00元

Topshop、H&M 等品牌创造了“快速时尚”的模式：更短的生产时间、更快的上市速度以及更短时尚潮流。快速消费的背后，更是环境问题、动物保护、血汗工厂等一个个不忍直视的现实。





时尚是仅次于石油的第二大污染行业，以及仅次于农业的第二大用水行业

衣裳的归途与未来

记者 杨聃

被过度消费的衣服在引发更严重的环境问题之前似乎找到了科学的解决方案，然而，科技的介入让衣服的属性也变了。

回收你的衣服

每当看到快时尚品牌在打折区域堆砌如山的货品，难免让人好奇那些“处理”不掉的衣服下场会是

怎样的？事实证明是我多心了，只要价格足够便宜，总归会有人买单，大家可能是这么想的：“便宜啊，哪怕穿一次也值！”就这样，穿过就扔的习惯被消费者慢慢养成了。

以 Zara 为例，它以星期为周期的出新频率刷新了时尚界每季两次的更新规则。就这样，服装通过系统的速度越来越快，它在寻找那些或者是任何愿意支付几百块来追求“潮流”的人。这似乎让每一件衣服都印上了时间的标签，哪怕不到一年的时间，它很可

能已经过时了。

二手店基本不接受来自 Forever21、H&M、Zara 和 Topshop 的货品。他们认为这些东西基本没有再次销售的价值，重点是它们满大街都是。既然不能再次销售，就只剩被丢掉这一宿命了。根据美国环保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的数据，2012 年在美国就有 84% 的丢弃服装进了垃圾填埋场或焚烧炉。

当天然纤维，如棉、麻、丝，或是黏胶、天丝和莫代尔这样的，从植物纤维素获取的半合成纤维，被埋在垃圾填埋场时，就会像食物垃圾那样在降解过程中产生甲烷。但与香蕉皮不同，这些旧衣服即便是由天然材料制成的也变不成肥料，毕竟那些纤维在制衣过程中经历了许多不自然的过程，比如被漂白、染色、印花，以及浸泡在化学物质里等等。同时，众所周知合成纤维如涤纶、尼龙、腈纶会造成更多环境问题，它们的降解时间太长了。

在不到 20 年的时间里，美国人每年折腾的衣服数量从 700 万吨增加到 1400 万吨，平均每人“贡献”了 80 磅重量。粗略估计，运输它们就要动用 730 万辆卡车，不考虑运输成本，光想想二氧化碳排放对环境的影响就觉得这事儿有点严重。

既然卖不掉，销毁又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无偿捐赠总行了吧，还有那么多需要救济的人呢。

“人们感觉他们在做好事，可就像在美国我们也没有那么多衣服的需求，涌出来的捐赠太多太快了。”乔治城大学经济学教授皮特拉·利沃里（Pietra Rivoli）对《新闻周刊》说。快时尚迫使慈善机构在更短的时间内处理大量的服装，如同一个二级市场零售商一样。

为了让整个行业“可持续”起来，当然是在不能损坏其商业模式的情况下，各品牌想出了各自回收的法子。“可持续时装的解决方案可以是闭环采购。”开云集团可持续执行官玛丽·克莱尔·达弗（Marie Claire Daveu）对《Vogue》说，“就是说重复使用旧材料，从中重获纤维制造新材料。”

如今回收利用已经成了服装行业的口号。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据 H&M 去年的数据显示，它在 62 个国家有超过 4000



在综合多种传感器如接近度、脑电波、心率等，让服装带有传感功能并与周围环境沟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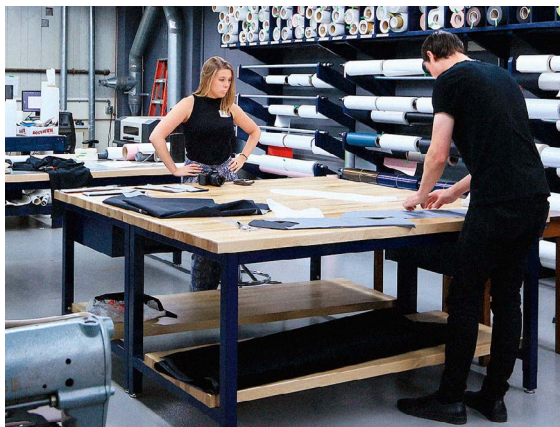
妮可·舒可辛格穿着 CuteCircuit 的推特服出现在伦敦 EE4G 移动网络的首发仪式上

Chromat 与英特尔共同设计的能根据穿者的呼吸、汗水与体温等因素改变外观的裙子



左图：以 Zara 为例，它以星期为周期的出新频率刷新了时尚界每季两次的更新规则

右图：麻省理工大学的开放式实验室在设计更多符合大众的服装



家店面，卖出了价值超过 245 亿美元的 T 恤、短裤、夹克和裙子。H&M 的可持续发展经理亨利克·兰帕（Henrik Lampa）表示，只有 0.1% 的服装被慈善机构和回收项目募集到，用于再生纺织纤维。大部分衣服还是散落在各个角落。

即便回收利用在商业范畴勉强可操作，保守估计闭环纺织回收技术仍然需要 5 年至 10 年的时间。据 2014 年可持续服装联盟（Sustainable Apparel Coalition）的报告显示，闭环纺织回收技术对纯棉制品来说是可行的，可一旦它被染色处理或与其他材料混合就行不通了。被处理过的棉、亚麻、丝和羊毛只能被机械地切碎回收。这样它们就会产生一种低质量的短纤维，必须与原始纤维混杂在一起才能制成服装。所以，LVMH 集团的碳基金设定了到 2020 年要减少集团总碳排放量 25% 的目标；英国设计师品牌 Stella McCartney 也公布第一份环境损益表，用货币衡量其采购、制造以及销售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同时改变了材料的选择，比如减少使用人造皮革；像 H&M、Zara 开始提高使用有机棉和更好棉花（better cotton）的比例；而像李维斯这样普遍使用染料的品牌开始解决另一个难题。

全氟化合物、邻苯二甲酸酯和偶氮染料都是服装行业广泛使用的化学物质。面临更安全与可循环的需求，品牌需要另辟蹊径了。它们要用使用细菌、真菌、酵母和甲烷气体产生的物质，来替代 95% 以上从石油中提炼的化学物质。

目前，李维斯已经采取了一些环保举措。为了让牛仔裤呈现磨损的效果，它们用真菌产生的酵素替代漂白剂，在臭氧气体中对牛仔裤进行做旧处理。而这

项工艺带来了额外的好处还让公司在过去三年节省了 10 亿加仑的水。

有些公司在环保需求上所花费的金额与研究开发的支出同样多。绿色和平国际（Greenpeace International）的“为时尚去毒”运动在 5 年时间里和 78 个品牌签署了协议。即便如此，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就把化学试剂变得更环保。开发出更安全的替代品至少需要几年时间，而用于生产防水和污渍防护剂（如全氟化碳）的某些化学物质目前还不存在环保替代品。

至少有一点值得欣慰。“10 年前，人们甚至都不愿意搭理我们。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你别无选择地要使用那些会带来风险的化学品。” Beyond Surface 公司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马蒂亚斯·弗塞尔（Matthias Foessel）对《Bloomberg》说。看来在所有技术成熟之前，只能寄希望于消费者不要挥霍无度了。

更多问题与解决方案在路上

今年 6 月在纽约 Spring Studios 举办的 BoF VOICES 活动上，问题与机遇成了最大的话题。首先，全球对皮革等原材料已供不应求。更重要的是，气候变化消磨着产出时装所依赖的羊绒与真丝等原材料的自然环境，这让原料更加紧缺。

纽约初创公司 Modern Meadow 的创意总监苏珊妮·李（Suzanne Lee）当即表示：生物技术可以帮助解决这一问题。Modern Meadow 就是一家专门研发时装制造所需材料如皮革的实验室培养机构。“缩短动物养殖时间的方式，意味着皮革的质量会出现下

降，”她解释道，“如果出现伤痕还得把这些部分剪掉，又造成了浪费。”这样计算下来每件兽皮可能会出现30%到80%的浪费。不管是从效率还是从生产角度来看，都是个大问题。

“目前的材料革命遍地开花，我们开始要求纺织品与纤维之间产生互动。”Manufacture NY联合创始人、首席研究员阿曼达·帕克斯（Amanda Parkes）也在活动上发了言。

过去几年，材料科学领域取得了很多重大突破，比如在废弃虾壳与丝绸中提取蛋白质“虾丝”（Shrilk），这是一种透明、可降解的材料，强度与铝材相当但重量只有一半；还有Qmilk牛奶丝纤维，它是用坏掉的牛奶制成的新型纤维，能够防止细菌并预防起火；美国科学家研发出一种低成本的新型塑料纺织品，可以自动降低人的体表温度。《科学》杂志的工程师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介绍，这种面料的面世意味着人们身处高温环境中，即便不用空调，依然能感觉到凉爽。

还有些新面料将在微观层面、在纤维中嵌入计算纤维，使得服装能随着温度变化而变化，或像电池一样储存能量。在实验室里创造一种能够储存能量的纤维并不难，而要把它织入衣服里面就要走出实验室。这将是科学家、制造商、设计师之间的合作，需要各方深刻理解消费者需求以及如何用这些发明去满足这些需求。

如何让这些高科技可穿戴材料不再停留于技术人员手中？扎克伯格曾说过：如果不能成功让10亿人用上这东西就不要做了。“想一想明确功能性与目标受众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时装公司最擅长的地方。”帕克斯说道。虽然像iPhone这样的科技产品会同时有70岁男性与14岁少女来买单，但能同时销售给这两大人群的时尚单品还没有。

“有了时装设计师，你会明确你是要给女性还是男性做设计，而且是特定的男性和女性。”英特尔（Intel）开拓与创新战略总监托德·哈珀尔（Todd Harple）赞同她的意见。2014年，英特尔与Opening Ceremony合作设计了一枚名为“Mica”的高科技手镯，售价为495美元，可推送电邮与短信通知。Harple以Mica为例，它在小众群体间获得巨大成功，而有趣的是，技术圈媒体则将其视作失败的产品，因它不能符合更大众的需求。

创新时装产品还能解决其他行业的问题，比如被Fitbit、Apple Watch等可穿戴设备盯上了的健康产业。

曾与明星碧昂丝（Beyoncé）、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等合作过的纽约品牌Chromat，与英特尔联合设计了一款裙装，它能根据穿者的呼吸、汗水与体温等因素改变外观。在哈珀尔看来，这简直太棒了。“如果我母亲上了年纪，我想随时了解到她什么时候害怕或是焦虑，怎样才能在不打扰她的情况下实现呢？或者说，如果我要照顾患有自闭症或自闭症谱系疾病的孩子，怎样才能知道他什么时候注意力集中、什么时候没有呢？这些问题都能通过服装来解决。”


产业革命步步逼近

随着科技向更小、更快、更节能的方向发展，已经有了邮票大小的计算机，这预示着与时装设计师们合作的潜力。那些衣服将不再像以前那样诞生于设计草图与传统面料，而是具有全身扫描与计算的能力，它们更可能是用3D打印的尼龙而制成的。在综合多种传感器，如接近度、脑电波、心率等，让服装带有传感功能并与周围环境沟通，这将改变服装的属性，让它成为人与周围世界的交互窗口。

当然，这一切需要供应链与商业模式等方面的重新构想。但最重要的是，这必须跨行业协作。就像几百年前，科学刚刚萌芽的时候，也是综合了各方面的知识与物质基础。

在化学领域，罗伯特·波义耳就像炼金术士那样使用盐、硫磺、水银、石灰和各种酸类物质进行相互作用。在物理领域，望远镜的发明就得益于威尼斯匠人的玻璃工艺与德国金匠的金属技能。这两种技术结合起来还很快造出了对生物学至关重要的显微镜。钟表计时也对潜水和航天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几何学的价值先是被艺术家运用到透视法上，又被水手用在航海绘制的地图里，从而推广了数学的思维方式。巴鲁赫·德·斯宾诺莎被看作那个时代的双重象征：他一边享有“以几何学来展示的”《伦理学》，一边在阿姆斯特丹靠磨制镜片为生。正是那些看似不沾边的经验和技能共同造就了现代人所受益的科学。

不过就当下而言，时尚产业革命中发生的技术转型将触发的讨论，包括未来将涉及的访问、健康、隐私与自我表达等数据带来的安全性和伦理道德等影响。就最直接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从毛衣里拉出块太阳能电池板给手机充电，你说这是一件衣服呢？还是新的设计理念？（本文参考了《Newsweek》《Bloomberg》与《Business of Fashion》的相关报道）

五年之壮志未酬

文 / 张斌



11月21日，美国足协宣布克林斯曼正式下课

克林斯曼去职是有先兆的，毕竟胜负是有天壤之别，尤其是在奔向世界杯的旅程中。需要提醒的是，德国人挥别的不仅仅是帅位，还有美国足协5年前郑重礼聘的技术总监一职。这很重要吗？当然，美国足球要的不仅仅是看似遥不可及的俄罗斯世界杯的四强梦，他们要的是体系与足球文化之变。5年，不长不短，克林斯曼没能支撑自己走得更远，转身离去留下的大师与庸者的论题还是持续良久，再一个5年后如有收获，还会公平地说声“谢谢！尤尔根”吗？

不赢球，是悲剧。连续不赢球，则是灾难。近5个月来，美国队的艰难晋级路被描绘为“寻找灵魂、无限焦虑、饥寒交迫的过程”，美国人无法忍受拿不到通向俄罗斯的门票，只好来一次匆忙间的系统重启。美国媒体很会自嘲，声称当今顶级国家队无一不在转折的痛苦之中煎熬，并称此为“新常态”，美国也无可遁逃。深度思辨后，美式视角中，英美足球同病相怜，新帅几乎无人可选，只得求助老迈之士。你可历数强国足球的各自特色基因，而英国虽贵为现代足球发明者，但其足球身份内核居然是一直在追问什么才是自己的身份内核，美国足球一样一样的，也始终求而不得。

时至今日对克林斯曼尚怀有好感的人们认定，5年前，德国人引领美国足球航程，本意绝非仅仅在胜负之间，而是意图完成一次足球革命。更为积极的打

法，更为有效的训练，美国人自然想从克林斯曼的合同立竿见影转化出来，但德国人还准备了超级大礼包——完整的青训体系，简言之就是复制德国足球2004至2014年再捧大力神杯的复兴之路。勒夫有言，2004年我们很衰，但决策正确，强调教育，因此德国人技术很不错啦。复兴伟业中自有克林斯曼的功业，他缔造的德国队班底最终在勒夫的手中登顶成功，又一茬青训努力则通过里约奥运会的夺冠瓜熟蒂落。

因此，克林斯曼除巨星身份之外，还被赞誉为战略规划者和系统建设者，当年美国足协愿意与之签约，也是看中了后面两种角色。纠结良久，美国足协无奈终结了5年半的合作，主席古拉蒂感慨不少，在克林斯曼推动下的足球体系已经初见成效，更多的美国人亲近足球，一代青训成果开始成为国脚。更值得肯定的是，克林斯曼精心搭建的体系并非是域于美利坚一地，而是颇具全球性，美国足球凭良心说，已开始享受新体系的红利。

《足球无疆界》一书专门记述了克林斯曼发动美国足球革命的全过程，读来并非只有归化国脚的段落才有声有色，有大量的细节会告诉我们，美国足球发展体系相当复杂，长期不能形成高效统一，整合成本巨高。克林斯曼曾暗下决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美国足球人，十年之功，让美国队稳定在世界前十，塑造自信、勇气和创造力的国家足球基因。当然，那个18年世界杯进四强的目标太过耸入云端，吊足胃口，让自己难有腾挪的余地了。

克林斯曼传记的作者如今忧心忡忡，他认定美国人的足球文化，不足以让每个人都去感念这位德国人过往5年半的功劳与苦劳。显然，担心多余了，贬损克林斯曼执教能力的论调的确不少，但心明眼亮之人也不在少数，他们看到了身为技术总监的克林斯曼很多时间伫立在青少年联赛场边，积极倡导尊重球员本能与天性，在他眼中这是美国足球与世界最先进足球之间最大的认识差距，保护足球少年的创造力是一切的核心。

理想挫败，克林斯曼没有能够行至十年规划的尽头，帅位上的败者，系统再造的耕耘者，都说成败转头空，但足球世界里，没有胜利，是万万不能的，天下概莫如此。■

洛克希德·马丁的“亚太再平衡”

文/宋晓军

11月25日，我在CCTV“东方时空”栏目中做了一次连线短评论，内容是日本正在考虑部署美国的“萨德”反导导弹。连线中我强调了日本此举与之前韩国不顾中、俄反对强行要部署“萨德”一样，都是试图通过将美国的“萨德”反导系统部署在本土进而影响美国对东亚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当然，我这一观点背后的潜台词也可以说成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其实说清这个问题，还要从11月23日韩日两国签署的可共享安全领域机密情报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说起。实际上，美国要在韩日两国部署完整版的“萨德”反导系统，恰恰是韩日两国刚签署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重要支撑。从军事上说，“萨德”反导系统可探测2000公里的雷达及拦截高度为150公里的导弹，将与今年8月美国批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升级的3艘韩国驱逐舰和2艘日本驱逐舰上的“宙斯盾”系统一起，在未来西太平洋地区构成一个更加完善、拦截概率更高的弹道导弹拦截作战体系。从政治上说，借用2000年兰德公司在一份题为《美国与亚洲——探索美国的新战略和兵力态势》中的一段话就是：韩国与日本历来存有敌意，而这种敌意正由于美国一直在两国保持存在以及它们共同加入与华盛顿的安全安排才有所缓和。由此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

洛马公司不仅仅是向韩日提供一些武器平台，而且还为美国提供了某种难以取代的外交与安全的政策工具。

说到“政策工具”，可能有人会问：洛马公司作为一个私营公司充当“政策工具”，会有什么好处，以及如何影响美国政府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呢？其实只需列举一例就可以得到答案。这就是之前日本和韩国先后斥巨资向洛马公司订购的超过80架的F-35A战机。主力战机一旦采用某公司的一种型号，其后跟进的利润对于这家公司而言就是非常可观的。比如就在韩日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前一周，韩国政府就通过了授予洛马公司一份价值为12亿美元的合同。合同内容是将韩国空军的134架KF-16战机升级为KF-16V型战机。说到对美国政府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影响，可以注意到，在2016财年美国大选和国会选举中，洛马公司的政治捐款再次名列美十大军火公司之首。而在这其中，F-35战机分布在44个州的1300多家分包商的利益无疑是占了“大头”的。难道未来美国总统和国会在制定外交和安全政策时不需要斟酌吗？

其实目前就可以得出判断，虽然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曾对韩国和日本说过一些“狠话”，但在他当选后就不可能不考虑军火公司的利益。事实上，在美国国会中不仅有大批共和党议员支持洛马公司，而且也有相当数量的民主党议员同样支持（2016财年洛马公司的政治捐款有59.5%给了共和党，40.1%给了民主党）。换句话说就是，即便特朗普上台后可能会在表述上放弃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但洛马公司也会在实质上维持自己版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对此，航空航天与军工的标普指数从11月8日至11月25日上涨了12%就是最好的证明。那么这一结果会对中国周边的安全形势带来什么不确定性影响呢？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特朗普当选后一周时台湾地区媒体报道称，台湾行政主管部门于当日对2017年度的防务预算进行了审查，审查结果显示：正在洛马公司进行的F-16A/B战机升级计划完成进度已超前，台空军的144架F-16A/B战机预计可在2023年完成改装升级为战力更强的F-16V战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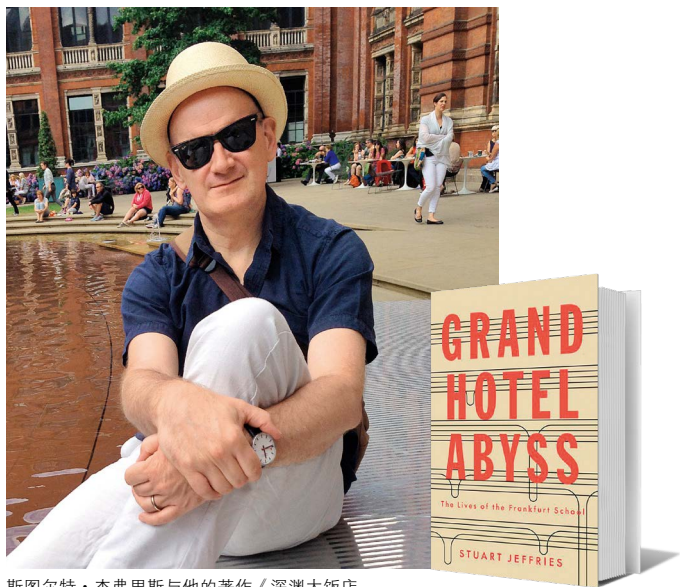


8月25日，国防部召开例行记者会，发言人吴谦上校就萨德反导系统、南海岛礁建设等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批判理论的悖论

主笔 / 薛巍

在《深渊大饭店：法兰克福学派的生平》一书中，英国文化评论家斯图尔特·杰弗里斯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做了通俗、风趣的介绍。



斯图尔特·杰弗里斯与他的著作《深渊大饭店：法兰克福学派的生平》

悲观的阿多诺和乐观的哈贝马斯

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说，叔本华是他所说的“深渊大饭店”的第一位客人。1848年，欧洲各地爆发的政治起义蔓延到了叔本华居住的法兰克福街头。叔本华靠他父亲经营船运业挣到的钱过着舒适的生活，但他认为人生充满苦难。财富、健康、爱情或政治都提供不了满足感。沉思艺术能够带来知识和偶尔的缓解，但什么也改变不了。面对楼下的骚乱，叔本华叫来了奥地利的军队，以便他们可以从他家的窗口往下开枪。1962年，卢卡奇在《小说理论》的序言中说：“德国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如阿多诺，已经搬进深渊大饭店了，如同我在评论叔本华时做的批

注，我把这个大饭店描绘为一个富丽堂皇、设备齐全、处在深渊、处在虚无和无意义边缘的饭店。在精美的膳食之间或风雅的娱乐之间，每日注视着深渊，只能强化精妙的舒适享受所带来的快感。”

《卫报》专栏作家斯图尔特·杰弗里斯用卢卡奇所说的“深渊大饭店”当作一部法兰克福学派史的书名。他认为这表明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个悖论：对深渊加以研究，却并不采取行动，认为深渊是逃不开的。1969年，许多学生认为该把阿多诺等法兰克福学派学者的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了，要摧毁资本主义。对此阿多诺表示反对。杰弗里斯解释说，阿多诺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人非常了解专制主义人格。他们都是为了避免被纳粹杀害而被迫流亡的犹太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专制人格就是他们的专业课题。法兰克福学派所有的大腕都花了很多时间解释为什么德国人都愿意被统治而不是起来反对压迫。阿多诺认为，学生运动也呈现了希特勒统治下兴起的专制人格。二者都做出了反专制的姿态，但都复制了他们要推翻的压迫性结构。在阿多诺看来，相对于静坐和设路障，思考是真正的激进行动。“所有思考的人，都在抵抗；随着潮流游泳更舒服，虽然有人宣称他是在反潮流。”

杰弗里斯说：“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擅长理论，但在实践方面很差劲。这是敏感的天才们的问题：他们不是能够行动的人。”英国哲学家汤姆·斯特恩为阿多诺辩护说：“法兰克福学派早期成员的核心思想是，正确的思考是学者所能做得最好的事情，也是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在深渊大饭店预订一个房间是正当的，如果待在其他地方只会让深渊变得更深。”

阿多诺之所以只有理论、没有实践，是因为他很悲观，认为人们无法摆脱他所描述的境况。但1979年，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中坚力量哈贝马斯说，他不认同批判理论的基本前提：工具理性获得了如此的主导地位，人们无法摆脱整体性的错觉。他反驳说，既然那种错觉如此整体，这些哲学家肯定也被欺骗了。他的前辈认为只有先进工业社会的崩溃才能克服这种整体性的错觉。哈贝马斯则提议对现存的体系进行改革，他认为交往理性能够促进公共领域的兴盛，对体制加以制衡。

流行文化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起初叫社会研究所，成立于1923年。该学派的理论是近半个世纪前一批德国哲学家提出的，如今它们还有什么意义？杰弗里斯说：“一些学者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学者跟特定的历史时期如大屠杀和‘冷战’相关，因而忽视了他们对当代社会现象的价值，比如21世纪的大众传媒和互联网。他们的理论跟我们现在的生活相关，他们的分析在现在比在他们写作时更切题。法兰克福学派最重要的工作是揭示资本主义如何把文化当作工具，而如今文化产业的控制比他们那个年代更加强烈了。”

他在书中援引了《纽约客》乐评人艾利克斯·罗斯的观点。2014年，罗斯在《反对者：本雅明、阿多诺和流行文化批判》一文中说：“如果阿多诺看到21世纪的文化景观，他可能会因为他看到他的担心变成了现实而感到一种凄凉的满足。流行文化的霸权近乎完成了，其超级巨星主导了媒体，掌握了大亨般的经济力量。歌剧、舞蹈、诗歌和小说仍被视为精英主义的，虽然世界上有实权的人不怎么用它们。过去的高低之分已经变得虚假：流行文化是执政者。”

迈克尔·德达写道：“起初，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借助马克思关于阶级、异化和资本主义的理论来解释和理解当代社会。慢慢地，这些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焦点从生产转向了消费，从考察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转向了研究发达社会如何用文化产业实现社会控制。但他们的目标没有改变，仍然是希望把人们从幻觉中唤醒。”他们提出，发达工业社会的人有一种虚假意识，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但实际上他们不断受到广告、营销、好莱坞、新技术以及社交媒体的操纵。人们基本上都是被动地消费。亨利·福特用装配线使工作变得非人性化，同时把他的员工变成了欲望机器。人们不由自主地渴望得到新车、名牌运动鞋或最新款手机，把世界变成了俗艳的幻景，瓦尔特·本雅明会称之为地狱的一圈。在这里，消费主义者不停地买卖，以为这种活动能够带来满足。

为了分析资本家操控的各种形式，法兰克福学派使用了所谓批判理论，这是一种解构主义，一种激进的反思，要挑战官方的历史和知识活动。“批判理论要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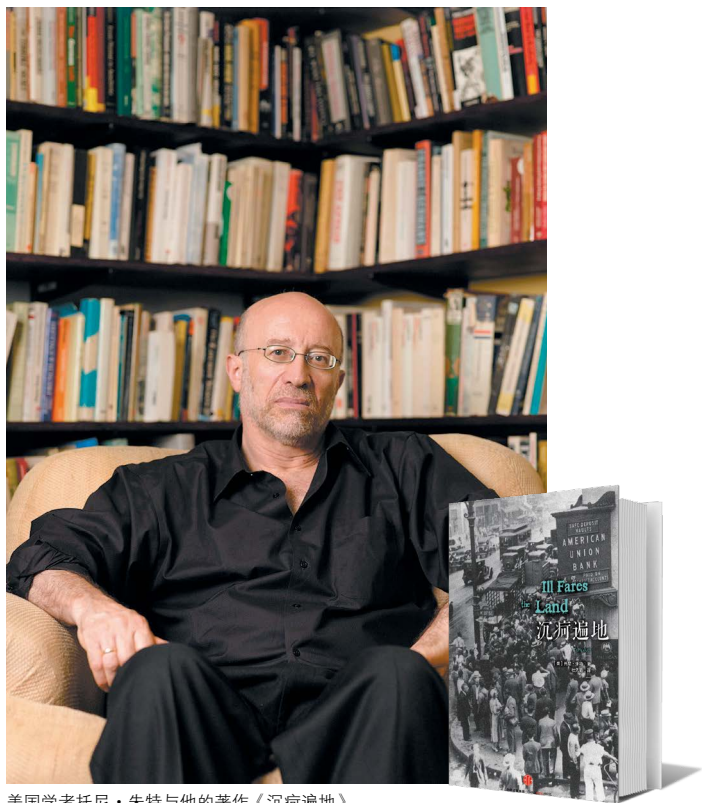
抗那些怯懦的智识旨趣，它们在20世纪非常兴盛，充当了维持社会秩序的工具，如逻辑实证主义、价值中立的科学、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等。批判理论也反抗资本主义的剥削行为——用商品收买我们，使我们忘记其他的生活方式，使我们忽视这一事实：我们因为拜物教式的关注以及对商品上瘾而陷入了体制的圈套。”

法兰克福学派使用了异化和物化这两个相互关联的概念。在60年代，马尔库塞很时髦，是反文化明星，但跟他争夺左派和学生运动的英雄这一称号的萨特对他不感兴趣。上世纪60年代末，当萨特要跟马尔库塞在巴黎的圆顶咖啡馆会面时，萨特有些担心，因为他从没读过马尔库塞的著作。他对他的传记作者约翰·杰拉奇说：“我知道他努力把马克思跟弗洛伊德联系起来。我还知道他支持学生运动。但我没法在一周内读完他的书。此外我也不想停下对福楼拜的研究。所以你跟我一起去见他。如果马尔库塞聊得太哲学，只要他说到物化这个词，你就打断他，说点更刺激的、政治上的事情。”在见面时，吃着豆焖肉的时候，萨特想出了一个聪明的策略来掩盖他的无知。他问一些显得他对马尔库塞的著作很熟悉的问题，每次马尔库塞回答时，他会挑出一些明显的错误接着问。由于错误很明显，马尔库塞能够很满足地回答这些问题。因此他的虚荣心快乐地高涨。

杰弗里斯写道：“异化是人类疏离的普遍境况，物化是异化的一种特殊形式。商品拜物教又是物化的一种特殊形式。”异化是觉得某种属于你的东西并不属于你。比如人和生产对象相分离。物化是把不是独立的物体当作好像是独立存在的。马克思认为物化只发生于一些人身上，如被剥削的工人，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则认为物化是一种无所不在的、无法逃避的社会境况。所有人都被异化了。我们都是自我物化的碎片，而且这种错误的认识是双向的：由于我们把人和性质当作物，我们就倾向于把人的能动性归到物体身上，把我们的希望、恐惧和梦想投身到它们身上。由此，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用了许多时间探讨物体。1952到1953年，阿多诺在美国加州待了10个月，分析报纸上的星座专栏、广播中的肥皂剧和电视，他发现大众文化跟法西斯分子的宣传很像，都是迎合和操纵个人的依赖性需要，推广传统的、守旧和满足的态度。■

何为更好的社会

文 / 维舟



美国学者托尼·朱特与他的著作《沉疴遍地》

最敏锐的历史学家偶尔也可以成为好的预言家，那或许是因为他们可以从一个长时段的发展趋势中，察觉到某些状况是无法持续下去了。在这一意义上，现在似乎可以肯定托尼·朱特的判断已在今年的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中被证实：多年来那种一味追求经济增长的政治模式，造成了对市场机制毫无批判的崇拜和对公共部门的蔑视，导致国家和政府（尤其在英美）忘记了好政治所应有的伦理内涵，即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使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也能得到福利和尊严，而最终，那些不满的人们将用选票来确保他们的声音得到倾听。

在前些年还在为全球化和新经济而欢呼的大合唱中，这样的白乌鸦是不大会受欢迎的。事实上，他在谈论这些议题时，带有某种老派政治理想的味道，更

像一个来自 19 世纪的欧洲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 21 世纪初的美国历史学家。他相信一个好的社会应是道德的——那意思是，它必须是合乎我们对良善、正义、公平的理解，而不能对不平等的状况无动于衷。但近 30 多年来，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形态下，英国人和美国人却普遍相信，不平等乃是生活的自然状态，我们对此也无能为力，那些失败者既不值得同情也不应救济，因为那不仅会削弱竞争力，还会助长懒散和依赖。与之相反，朱特在 2010 年的《沉疴遍地》一书中就已指出：“让社会中的失败者恢复尊严和自尊，是标志着 20 世纪进步的社会改革的中心纲领。今天，我们再次背弃了它们。”那违背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直觉和一个知识分子良心，本能地觉得哪里出了问题，因为正如亚当·斯密早就说过的：“如果大部分成员都贫穷而悲惨，没有一个社会能够繁荣幸福。”

这涉及到一个更为根本的政治问题：何为更好的社会？如果看看当下的世界，你可能会有一种感觉：这个星球上的一个个国家，看起来更像是一家家公司。每个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就是如何在经济上表现得更有竞争力，评级机构像对待一家企业一样给各国的信用进行打分，而政治家们看着也像是竭力挽回困局、推进创新的 CEO，唯一的区别是他无法解雇他的“员工”。在这些“企业化国家”中，政府、商业和公共文化之间似乎不再有清楚的界限，政治是以经济增长而不是再分配为核心的，公共议题被视为低效率、低利润的乏味事务，而在经济竞争中受挫则完全是你个人的错。所谓“社会撕裂”，大概就是这样一种状况：人们彼此缺乏共同感受和公认伦理，又没有机构出面弥合分歧并谋求减少不平等。这是更好的社会吗？对一部分人而言或许如此，但不会是所有人都这么想。

人们可能觉得出了什么问题，但不知道如何谈论它，更别提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了。在《思虑 20 世纪》中，朱特已经为此准备了一副良药：他认为社会民主主义将能使一种“体面的生活”成为可能，那意味着社会的所有成员都能在相对公平正义的条件下有尊严地生活。他强调，这与其说是为了寻找一个“激进的未来”，倒不如说是为了“寻求回归到更好生活方式的价值”。的确，就算是市场和自由竞争也要求信任与合作，而

经济增长也并不是幸福的唯一本源，就像一个各自赚钱、彼此不闻不问的家庭，也违背我们对美好生活的理解与想象。

如此强调政治中的伦理道德和社会的公平正义，固然是基于他对近代欧洲史的深切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恐怕也是他自身的经历使然。作为一个战后出生的东欧犹太裔英国人，他在童年时便深切意识到自己这一家与周围的伦敦社会格格不入，并作为流亡者而怀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念想：为何一个曾经宽容的、世界主义的和生机勃勃的中欧，最终毁灭于一场人类史上最惨烈的战争，而只剩下希特勒遗留下来的一地碎片？对不同的人来说，这一灾难所遗留下来的教训不一样：对政治家而言或许是为了避免再次出现慕尼黑那样的耻辱而必须抢先干预；对哈耶克来说是“不要干预，不要计划”，因为正是计划将主动权交给了那些最终会为了国家利益而毁灭社会的人；至于对朱特，这个自幼受到另眼看待的边缘人来说，他本能地对那些历史胜利者不感兴趣，而着眼于那些对当下的权力结构感到不满的群体。

他成长的年代，是一个一切都还有可能的世界，上世纪 60 年代的欧洲年轻人试图反叛，以他们自身的理想来重塑一个新的世界。这样的乌托邦冲动在欧洲历史上是反复出现的场景，然而这些幻想之所以值得憧憬，是因为它能提供一种令人迷恋的魅力：无论如何，在经历了阵痛之后，一种更好的社会形态将会从中诞生。这是所有革命者和自由主义者的说辞。然而在经历了现实的幻灭和对历史的考察之后，他已看破了这个论调：太多人为了给当前的罪行辩护，而以未来的幻想使自己的行为和眼下的痛苦合理化，就此而言，承诺无限增长的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与之前的革命乌托邦并无两样。但他深知，“在这类论述中，代价总是分给了别人，而且通常在另一时刻、另一地点”。无论是为革命牺牲，还是为效率牺牲，都一样无情，承受的却是他人。

20 世纪是一出宏大的戏剧。在无从预见的冲突中，19 世纪时曾经不言而喻的那些极其理性的道德和政治计算，至此根本不起作用了；目睹了 20 世纪的倒行逆施之后，无人还能再说直线式的进步是人类历史的

默认状态了。在许多人眼里，历史似乎仅在逝去之后提供教训，又或为了当下的目的而有利用价值，却难以指明方向，因为正在发生的一切都没有先例；但对他来说，历史不仅仅只是历史，而与自己的切身经历交织在一起——历史就在自己的生活中。他对历史的兴趣从而也并不仅仅是学术性的，倒不如说是为把握当下的社会问题提供一个具有长远纵深感的背景，使人能够穿透层层迷雾，以更好地理解所有问题的来龙去脉。历史无法让事情变得更好，但它也曾有无数可能性，理解这种丰富性，而非为了当前的错误来操控和滥用过去，才能导向一个更好的未来。那并不意味着前方存在着某种彻底的变革，而是相信事物总有变化的可能。

那个可怕的世纪摧毁了太多的乌托邦，连同它们所根植的政治理想和梦幻，全都一一破灭，再没有什么能激动人心，连“社会”本身都被等同于一个幻想——撒切尔夫人曾宣称，根本就不存在“社会”这回事，而只有家庭和个人。最终，到 20 世纪结束之际，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全球化的胜利，似乎和平已从天而降，每个人都成了“孤独的权利持有人”，忙于赚钱和娱乐，迪士尼可能是唯一能打动他们的梦幻。

在这个时代，政治家们对于什么是“更好的社会”都已久久缺乏想象力，而知识分子们则致力于避免一个更糟的世界——当然，后者也是重要的。一如既往地，朱特着眼的，是如何阻止资本主义创造出一个愤怒、贫穷和怨恨的中下阶层（从美国大选来看，它已经被创造出来，其愤怒也已被释放出来），关注这些人的状况，召唤一种政治理想与行动。他是对的。这不仅是因为知识分子的良心使然，因为“政治必须是道德的”，也因为一个更为现实的因素：一如我们在现实中所看到的那样，如果太多人掉队又被遗弃，那么就像历史上一再重演的那样，他们会踩下刹车。与数学模型不同，一个常常被人忽视的事实是：公平、相对平等和所有人的尊严其实是效率的必要组成部分。一个撕裂的社会不会奔跑得更快更远，它更可能遭遇的，不是减缓速度修理，就是翻车。❏

（《思虑 20 世纪：托尼·朱特思想自传》，Tony Judt, Timothy Snyder 著，中信出版社 2016 年版）



1

什么样的童书才是好的童书

——2016 上海国际童书展侧记

主笔 / 陈赛

阅读，不是从现实中逃避，而是开启一个新的现实。好的童书作家深谙文字和图像所能创造的美，以及这些文字和图像会如何刺激一个孩子的好奇心。最好的作者并不给出答案，而是不断地引导他们去问新的问题，在持续的阅读中，不断有新的发现。

什么样的童书才是好的童书？这是我在这一次的上海国际童书展上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书展很热闹。各大出版社安排了五花八门的签售活动，小孩子兴高采烈的面孔、父母疲惫地大包小包跟在后头……

这个时代，我们虽然爱孩子至深，但成年人与孩子之间仍然有着深深的鸿沟。孩子们生活在心不在焉的大人中间，而大人们时常觉得因为孩子而被困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世界里，所以，童书展上，偶尔有那



(乐乐童书 供图)

2



(少年儿童出版社 供图)

3



(启发童书馆 供图)

1.《绵羊国王路易一世》插图

2.《小象柚子大冒险》插图

3.《星期三书店》插图

么一两个瞬间，你看到一个孩子偎依在一个母亲的怀中，一起翻看一本美妙的童书，彼此似乎都感受到了阅读的乐趣，你几乎能听到空气中某种坚冰松动的美妙声音。

我很想探过头去看一看，他们在读什么？

为什么读？

一本好的童书为什么重要，这很好解释。

因为阅读一本好的童书，不仅是播种一个孩子对文学最初的爱，也是最早的艺术与设计的启蒙。尤其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无信仰的时代，至少阅读能让人的心静下来，慢下来。孩子的成长能够优雅一点，从

容一点。

如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所说：“从最实用的角度来说，阅读好书可以让他们长成对自己对他人而言都更有趣的人。只有通过变成一个对自己对他人而言都更有趣的人，一个人才能真正发展出独立和独特的自我。所以，一个孩子若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个体，看电视、玩游戏、听摇滚，是办不到的；只有在书的陪伴下，在威廉·布莱克或者A.E. 豪斯曼的诗的陪伴下，在北欧神话的陪伴下，在《柳林风声》的陪伴下，他们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个体。”

人生而有限，精力有限，书却太多，哪些值得读，哪些需要放弃，便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哈罗德·布鲁姆终其一生都在试图解答这个问题。他在年近古稀



1



3



(启发图书馆 供图)

法国插画家塔莱克



2



4

塔莱克绘本作品：

1~2.《我是如此爱你》插图

3~4.《走进生命花园》插图

时曾为普罗大众写过一本《如何读，为什么读》，谈论自己从童年到晚年喜爱的诗、小说、戏剧，并为成年人阅读西方经典提供了一些基本法则。

除此之外，他还专门为儿童开过一份书单，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柳林风声》——“一本可以推荐给0岁到100岁之间的所有人的书。”

“我至今记得我的姐姐给我读这个故事，让我心碎了无数次，也让我警醒文学的价值。”他还提到自己32岁的儿子给他打电话诉苦，说一个人住在纽约的公寓楼里，楼很老，天花板很高，“觉得自己就是住在蛤蟆公馆里的癞蛤蟆”。

布鲁姆教授的书单中还包括路易斯·卡罗尔的所有作品（尤其是《镜中奇缘》）、爱德华·李尔的《荒唐书》、罗伯特·史蒂文森的《儿童诗园》（*A Child's Garden of Verses*）与《金银岛》（*Treasure Island*）、露易莎·梅·奥尔柯特的《小妇人》，以及A.A. 米尔恩的《维尼熊》。不难看出，大都是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欧美儿童文学黄金时代的作品。现代作家中，他只推荐了莫里斯·桑达克的《野兽国》，认为其魅力不仅在绘画，在文字风格上也堪称大家。

判断一本童书的价值，最安全的方法也许是相信时间的判断。一本童书经典之所以流传下来，除了偶然的因素之外，必然有某些特别的美好之处，以至于一个人在人到中年之时，突然回忆起童年读过的某一本书（是那只很饿很饿的毛毛虫，还是那座阅尽人世沧桑的小房子，或者是那只想要离家出走的小兔子），想要给自己的孩子也读一读。

但是，当你行走在一个规模庞大的书展之中，面对每年数万种新出版的中外童书和川流不息的人群时，你知道仅仅等待时间的检验是不够的，你仍然需要一个类似坐标的东西，将你框入时代的洪流之中。

什么样的童书才是好的童书？

不久前，《纽约客》杂志发表了一篇类似的文章，探讨什么样的童书才是好的童书？

我们应该相信孩子的判断吗？毕竟，童书是为孩子写，给孩子读的，他们似乎是最有发言权的。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那么目前中国最好的童书就是《查理九世》。《查理九世》是一套国产原创儿童冒险小说，以惊险与恐怖为卖点，目前销量已过千万。没有任何市场宣传或推广能够卖出去这么多书，唯一的可能是成千上万的儿童真心想读这本书。

在消费主义陷阱无处不在的时代里，一本童书的价值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成年人的引导和判断。比如在日本，指导儿童阅读是一门非常专业的学问，日本的书店里你会看到专门给妈妈的书单，给爸爸的书单，给什么年龄段的孩子，都是有很专业的划分。

不过，对于童书的价值，成年人的判断常常落入两个相对对立的阵营：

一种标准是“有趣”。一本好的童书，无论简单、复杂，都必须是一个有趣、令人愉悦的故事。一个能让你孩子捧腹大笑的故事，一定是个好故事。

另一种常见的标准则是追求教化的意义，所谓故事是否有营养，三观是否正确，能否帮助孩子奠定基本的价值观，如善良、尊重、友爱……

在《魅惑的使用》（*The Uses of Enchantment*）中，美国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对一本好的童书提出了更加苛刻的要求。他说，一本好书必须能“促进一个孩子寻找生命意义的能力……它必须能激发他的想象力，增强智力，明辨情感，理解他的焦虑与抱负，充分认可他的困境，并为如何解决那些困扰他的问题提供建议”。

趣味与教化，若能同时符合这两种标准固然很好，但很多时候，二者是矛盾的。杨思帆，一位从业15年的原创童书作家告诉我：“我们最大的问题在出在‘儿童观’上，总是假装自己懂孩子，然后一不小心就露出成年人的尾巴。”

巴西童书作家罗杰·米罗则告诉我：“读书的时候，我最恨别人教我什么东西。我想要的，是愉悦感，是痛，是提问，是置身镜前，看到镜中人不是自己。”

“无论对成年人，还是对孩子而言，与文学、艺术在一起的时间，都是属于疯狂的时间，允许自己疯狂。如果没有这点疯狂，人生在某些节点会变得不堪忍受。”

我向一些资深的童书编辑征求意见，到底怎么判断一本童书的好？我得到的答案几乎是一致的——“动人。”

“虽然童书的主题有涉很多，有趣、好玩儿、鬼马不拘的……但还是能从这所有的里面感受到动人的特质：儿童的世界，向儿童展开的世界。关注和照拂。成人会跌进去，是因为也需要。”

对成年人来说，这也许是一个更诚实的标准。事实上，我对于童年已经没有什么记忆，对于今天孩子的阅读品味更毫无概念，我唯一有把握的，是我自己喜不喜欢这本书。

(少年儿童出版社 供图)



法国插画家本杰明·修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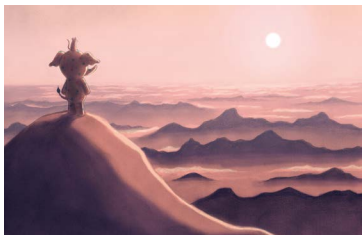
本杰明·修德绘本作品：

《小象柚子长大了》(右)和《小象柚子大冒险》(下)插图



迈克·库拉托绘本作品：

《大城市里的小象》插图



美国绘本作家迈克·库拉托

爱尔兰童书作家克里斯·霍顿曾经跟我分享过一个秘诀：给孩子讲故事，就像给朋友讲笑话。一定要你自己觉得非常好笑的笑话才能讲给朋友听，尤其是你知道笑点马上就要到了，努力强忍着不让自己笑出来，那种喜悦的感觉是很具有传染性的。但如果是一个你自己都不觉得好笑的笑话，就算你讲故事技巧再高也没有用。

绵羊国王路易一世 VS 小象波米诺

按照这个标准，我可以宣布，在这次童书展上，我遇到的最好的一本书叫《绵羊国王路易一世》。

一个狂风大作的日子里，一顶凭空而来的王冠，让一只绵羊在自己狂野的想象中摇身变成国王，在添置权杖、宝座和大床的过程中，他变得越来越傲慢、专制、不可一世。他想象着捕猎狮子，想象着万人朝拜，想象着驱逐异类。然后，在另一个狂风大作的日子里，风吹掉了它的王冠，国王又变回了绵羊。

我觉得，这本书符合一个成年人（至少是我自己）对于一本好童书的所有期待：机智、幽默、天真、敏感、温暖，也有幽微的不安、惊悚和幻灭。

在书展上，我见到了远道而来的作者奥利维耶·塔莱克。塔莱克是法国人，画过 100 多本童书，曾经拿过国际儿童文学的最高荣誉——安徒生插画奖，受上海书展“国际作家节”的邀请来到上海。

塔莱克在中国已经出版的作品，包括《走进生命花园》《星期三书店》《我是如此爱你》《小伤疤》……大部分只是担任插画工作，而且从风格来看，偏向唯美、忧伤、深刻。但他自写自画的几部作品，如《两个小兵》《绵羊国王路易一世》则更偏向于古灵精怪，闪耀着恶作剧的光芒。

我问他，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动机，要给孩子写这么一则关于权力的寓言？

他说，他创作的故事首先是他想对自己讲的故事。他喜欢创作与时事相关的主题，比如权力、战争，因为这就是我们身处其中的世界，是每天要面对的现实。

“面向孩子的时候，我不觉得有任何话题的限制。为什么不能向孩子解释什么是权力？权力不仅是大人的事情，对孩子来说也是生活中的重大主题。观察一群小孩子一起玩，很容易就能看出来谁最强势，掌握领袖的权力。”

他认为，童书应该向孩子讲述关于成人世界的真相，不仅因为我们本来就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而且

他对孩子作为一个思考者的潜能有着足够的尊重和信任。

“有时候，我会在我的书里加入一些只有成人才会理解的东西，但这没有关系。我们并不需要孩子在这个年龄段就明白所有内容。可以先懂一部分，过了两三年，长大以后再明白过来一些。因为这些书并不是即时性的，而是存在于我们整个人生当中。”

“国际作家节”邀请的作者中，还有一位作家让我倍感惊喜——本杰明·修德，因为我3岁的儿子小虫每天晚上都要抱着他创作的《花园小象波米诺》（国内也有版本翻译成《小象柚子》）睡觉。这是一个小孩子可以给予一位创作者的最高赞美。

波米诺是一只生活在花园里的粉红小象，有一根很长很长的鼻子，长到拖到地上，给他带来很多烦恼，比如跳舞时会不小心踩到，疼得直眨眼泪，打蚊子时卡在石头缝里出不来；同时也带来很多乐趣，长鼻子一伸就能够到高处红透的草莓，还能吹出大大的泡泡。

睡前给小虫读一则波米诺的故事，看他学着波米诺把眼睛瞪成斗鸡眼，拿一条长围巾假装是自己的长鼻子，是我迄今为止为人母的生涯中难得的乐趣之一。雷蒙娜·巴蒂斯库的文字优美、精准、充满诗意；本杰明·修德的绘画则拙稚、幽默，充满了视觉上的想象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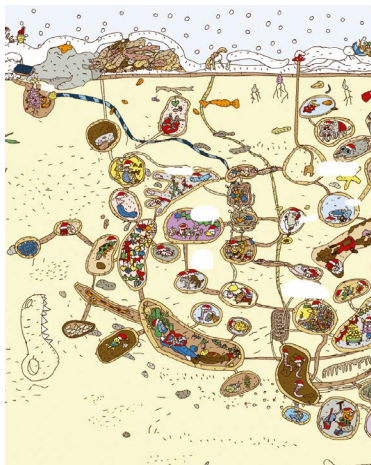
修德告诉我，这个故事源自雷蒙娜·巴蒂斯库的一个梦。有一天晚上，她梦见一只小象，住在蒲公英花下，有很长的鼻子。然后，他们两人开始了长达15年的合作。一个写，一个画，永远都是在同一张桌子上一同创作，有时候是图片启发文字，有时候是文字带动图片。

“我们尝试了故事所有可能的方向。我画了很多东西，她写了很多东西，对我们来说，这与其说是创作，不如说是一场游戏，与文字的游戏，与图像的游戏，与那些小小的蜗牛、土豆、茶壶的游戏。在不断的游戏中，寻找新的可能性，新的解释，新的意义。”

在其中一个故事中，波米诺在人类的家中找到了一个玩具，他怀疑它是活的还是死了？

就这样闲闲的一笔，带出一个孩子关于生与死的疑问。

事实上，连他们自己都是在很久以后才意识到，在他们的游戏中，波米诺在渐渐长大。一开始，他只是一个小宝宝，傻傻地爱着他的蒲公英，喜欢在叶子上玩滑梯，乘着半个核桃壳在露水中航行，穿梭在胡萝卜中间，数数天上到底有多少朵云……



挪威童书作家安娜·菲斯克

安娜·菲斯克绘本作品：
《你好，世界》插图

渐渐地，他恋爱了，有了害怕的事情，陷入了忧伤，开始做奇奇怪怪的梦，开始思考关于这个世界的奇奇怪怪的问题，什么是爱，什么是生命，什么是迷失，成长是什么样的？

我问他，你怎么知道孩子关心这些问题？

他回答说：“我们并不知道孩子怎么想，但我们知道自己怎么想。我们保留着自己作为孩子时的记忆，这些都是我们曾经有过的问题。”

“我们并不想给孩子他们想要的东西，而是给他们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想要的，或者可以想要的东西。”修德告诉我，“你给他们的挑战越多，他们的理解越多。”

一开始，他们为自己的创作游戏设定了严格的规则，每一个故事都是从波米诺在蒲公英花下的画面开始，也在蒲公英花下的画面结束，波米诺没有父母，

也从不离开花园。但后来，他们自己打破了限制，波米诺长大了，他离开了花园，去了海边冒险，旅途中还遇到了自己的父亲，甚至忘记了他的蒲公英……

现在，他们正在创作的一本书是关于波米诺的回忆，回忆他的花园，回忆他的朋友，但这些回忆里充满了盲点，他不记得自己是晚上还是白天离开的；他记得草莓，但画面上却并没有草莓……

修德说，波米诺画了15年，几乎贯穿了他事业的始终，也是离他的心最近的一部作品。他从来没有厌倦过波米诺。

事实上，我也从来没有厌倦过给小虫读《花园小象波米诺》。即使在不断的重复阅读中，它仍然不断地给我惊喜和喜悦。

童书作家：一种特殊的大人

英国童书作家罗尔德·达尔喜欢将大人与孩子之间的关系视为一场战争，而且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他曾经说，大人如果真想了解孩子，最好的办法是跪着生活一个星期，他就会知道生活在一个大人国度里的小孩是什么感觉。小人儿为了在巨人的领地上生存，得需要多大的智慧和勇气。

在大人与孩子之间的战争中，达尔永远选择站在孩子一边。他的主人公们经常是失去双亲的孤儿，或者父母虽在，却是可怕愚蠢的俗物，不惜对孩子施以最严厉的处罚。但孩子们最终会凭借魔法或者聪明的计谋（成年人认为是品行不端）以小搏大，扭转乾坤。

当然，大部分童书作家并不愿意将成人/孩子之间的冲突与对立置于如此决绝的状态，但他们对儿童，确实有一种特殊的理解与同情。这种理解与同情可能来自他们相对纯粹地保留了童年的记忆，也可能是他们在成年之后重新学习如何用一個孩童的眼光来打量世界。

安娜·菲斯克属于前者。她是一位挪威的童书作家，也是“国际作家节”邀请的作家。她耗时9年创作了一套题为《你好，世界》的系列绘本，分别以地球、大海、行星、小镇、地下为背景，描绘了一段无比丰富的旅程。

她告诉我，她几乎保留着所有童年时代的记忆，“闭上眼睛就能想起那些在她眼前走过的大人的腿”。她说自己不仅记性很好，而且对那些记忆无比珍惜。《你好，世界》里的那些故事，基本上都是她的。“小时候躺在床上，觉得有点害怕，周围有点吓人，就开

始想这个世界，全世界的人，他们现在都在做什么，比如美国人可能在睡觉，中国人呢，也许刚起床。就这样，我一边想着全世界的人、地方和时间，觉得自己变成了世界上很小的一个点，然后我就睡着了。”

她告诉我，从小喜欢画画，从来没有停止过画画，只有通过画画，她才能真正捕捉这个世界。比如，对着苹果拍一张照片，就是照片而已，但她拿出画笔，在纸上画了两个歪歪扭扭的苹果，一红一绿，各自从某处钻出一条小虫，彼此打了声招呼，显然陷入了爱河。现在，这张画才是有灵魂的。

她说，孩子天然懂得她的语言。面对她笔下那些庞杂的世界，大人们一脸茫然，不知道该怎么读，但小孩子一拿起来，自自然然津津有味地读下去。

文字从来不是小孩子的疆域，图像才是他们的地盘。对孩子来说，画画是一件如此自然的事情，它与才华、理论、技术、主题无关，绘画的可能性也不局限于可见的世界。对他们来说，坐下来画一张上帝的素描，并不比坐下来画一张土豆来得更不寻常。让他们描绘某个明媚的周日早晨幸福的感觉，也并不比画一张爸爸挂在衣架上的蓝色外套更难。

熊亮，一位国内绘本作家，则自认为属于第二种作家。画绘本，对他而言，是一个“学回去”的过程。

“一个大人得回到儿童认知状态重新开始，这个过程有快有慢，有很自然过渡的，有痛苦转变，不一样，但这是个要求，工作也改变了我们。”

我上一次采访熊亮，已经是10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童书市场刚刚起步，我在做一篇关于国内童书阅读生态的报道，而当时的他还在为生计奔波，住在北京五环路外的亦庄，每次进城都是一番折腾，显得特别疲倦。

这一次见面，他已经是国内童书界最具气象与格局的原创作者之一了。他给我看他最新的一部作品《和风一起散步》，一反之前的《梅雨怪》与《寻暗集》的晦涩与黑暗，讲了一个非常清新活泼的故事：一个小男孩在睡觉，朦胧中感到风邀请他一起出去玩。小男孩跟着风出门，惊扰了一路行人，最后回到家中，重归梦乡。

“任何故事都是启蒙。启蒙是发现，发现某种不同寻常的感受，然后进入世界更深的层面里。这种感觉很奇怪，很多大人忘记了，但小孩子常常处在这种喜悦里。一阵风吹过，对大人来说，就是一阵风吹过，对孩子来说，却是一个神秘的小人在跟他说话，邀请他一起出去玩。”

在他的故事里，风并不是一个孩子在自身之外想象出来的精神玩伴，他认为那是一种典型的西方思维，是自我觉醒后变成主体去观察客体。

“小男孩被风驱动着调皮捣蛋，风可能就是一种力量，小孩的精力，世界的广力，所以每次犯了错误，小男孩都大喊：不是我干的！这很孩子气，这些故事既是玩笑性的，也是启蒙性的，希望孩子认识世界时，与世界是一种共生的关系，而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分离思想。”

我问他，童书创作到底如何改变了他观察世界的方式？

他说：“世界是形而上语言所创造的，她就在那儿，不需要重新观察与发现，规则和词汇罗列，组织严密，大人们的价值观和理想可能就是如何适应她，但孩子的想象力和天然无经验设定性就劈开这一切。我们发现一个事物、一个图形、一个词都是新的，可以藉此走进去，发现更多好玩的东西，也会理解更深更多一些。从这个层面上说，绘本是‘想’的游戏。”

美国绘本作家迈克·库拉托更愿意相信，大人与孩子之间本来就没有明晰的边界。每个成年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孩子，每当遭遇挫折，或者感到无助时，就会冒出头来。

对成年人来说，感到无助是一件挺可怕的事情，因为你不再是一个成熟的、能掌控一切的大人，而重新变回一个孩子。但变回一个孩子其实未必是坏事。事实上，他的《大城市里的小象》就是在一种挫折的心境中，放任内心的孩子跳出来，然后创作的一本童书，以一只斑点小象纯净的目光，映射出大城市里日常的孤独与挫折感。

这本小小的绘本在大人和儿童之间都引发了深刻的共鸣。斑点小象在纸杯蛋糕橱窗前的背影尤其打动我——夜色有一点凄凉，灯光朦胧地洒在华美的蛋糕上，蛋糕店的门却是关着的。橱窗前小小的身影仿佛有无边无际的孤独，微微踮起来的脚尖又含着深深的渴望。如此悲伤，又无比美好。

就像在熹微的晨光中，赫莉小姐穿着考究的纪梵希黑色礼服，啃着廉价面包就着咖啡，凝视蒂凡尼的窗口（《蒂凡尼的早餐》）；像小老鼠雷米卧在窗台上一只烤箱棉布手套中，对着埃菲尔铁塔和巴黎的灯火，叹息着入睡（《老鼠大厨》）。

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大概都有过这样的时刻吧，大大的世界里闪烁着一点小小的、天真的、脆弱的微光，是匮乏，也是梦想。☑



熊亮（上）和他的绘本《和风一起散步》插图



陈村：那就和自己好好玩一场（3）

文 / 朱伟



1984年4月陈村乘军舰去西沙。那时他身体不错，背后隐约可见永兴岛

陈村只写了三部长篇，只有最后一部《鲜花和》篇幅略长。我说，你比安忆懒多了。他说，yes，她专心。三部长篇中，《鲜花和》1997年写完，《住读生》与《从前》都写成于1983年。1983～1985年是他写得最多的两年，像是积压的才华拥挤着要喷涌。《从前》只用两个多月就写完了，当然，篇幅也不长。陈村的小说，纠结也在你不易察觉处，因此好读。他不愿写长，写累，除非被我逼着。那时他的腰还好，急于要四处去跑，他喜欢山水。在我看，他的身体，其实是让自己折腾坏的。

这两个长篇都写得笨，写得实在，还不会用很少的素材繁衍，不会掩藏自己的隐私，写的都似他自己，好像急急忙忙就要将自己的履历先交代一遍。因此，仔细分辨，其中就有窥探他的乐趣。比如，他喜欢《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以克利斯朵夫为路标，为价值观？比如，明白了他答话略迟疑，是因他“习惯了想一想，希望找到更恰当的字眼”。其中很有意思的，如“你坐下来什么都行，站起来没一样是我对手”。这是《住读生》中，“吃巧克力长大”的吉小莉说的。

先写的是《住读生》。写那些各自性格凸显的同学，都带着暖暖的态度。陈村对人是善意的，很少挑剔，

想到的都是他人的好处。除非是令他憎恶，憎恶到要挑他奋起决斗的人物，他才会倾泻所有的恶毒。这是他好战的另一面。青壮时，他是好打架，会打架的。

他的同学们，那个乡下有病妻与三个女儿重负的“老大哥”，那个精打细算为获未婚妻欢心的“老汤”，男友远走他国的祁小妹，隔着年代仍深情注目着怅惘着的“老逻辑”……都染着淡淡的悲凉。陈村自己，就是“木木”吧。不知他为何要用这个伤感的名字。屠格涅夫小说中，它是那个扫地的聋哑人相依为命的精神支柱。聋哑人最后到酒店给它喝了一碗肉汤，然后把船划到湖心，给它脖子上系上砖头，临终了，它还信任地朝主人摇着尾巴。

小说中，感人的就是那种软软的，写同学、老师的态度——“支出之源”仅“几元助学金”的“老大哥”，见到看门老陈的捐助筒，就把兜里能掏的钱，连同饭菜票都捐了进去。“大逻辑”明明已经知道答案，还要淋漓尽致地在试卷上阐述自己真实的、有风险的观点。而老师因恻隐之心，会主动向悲戚的祁小妹漏题，会主动庇护“大逻辑”的政治表白。祁小妹病了，几乎全班人人牵挂；精于算计的“老汤”，也会时时内疚于自己。“大家都不容易”，这是陈村常挂在嘴边的。

他无疑是多情的。他的小说里，写得最好的总是男女关系。他写男女关系，没有轰轰烈烈，要死要活，总是矜持的，暧昧的，欲言又止却又欲罢不能的。在那条医院长凳上，木木和吉小莉共披一件大衣，木木小心翼翼裹住吉小莉的身子，握着她的手。陈村写道：“要是他有权选择的话，他宁愿孤零零的一个人，根本不欠任何人的情。”他怕欠债，我也怕欠债。但男人总免不了要欠的，能意识到情总是要欠的男人，应该都会在自省中折磨自己的。这折磨，陈村是不会让你在小说里找到的。小说中，木木称吉小莉为“小鬼”。陈村有写日记的习惯，我注意到，桂林办班时，他就有“小鬼来信了”的记载。这个“小鬼”大约不会是小说中的吉小莉，他大约都称他真爱的女人为“小鬼”的，他有多少小鬼呢？

《从前》在《住读生》之后前溯，写他的插队，更重要的是写他最亲近的青春朋友。他曾写过一篇

《我们在二十岁左右》，写到他与小真、小松、小华、小朴、黄石，少男少女，一共六个。小真是他同学，小松是小真的哥哥，小华是小松骑车追踪来的朋友，黄石是小华给小真找来的画画老师，小朴是小松朋友“捡到的”。小松写诗，与他讨论诗歌的平韵仄韵，告诉他：你的诗没小说写得好，还不如专心写小说。小真与小朴跟黄石学画。小真与小松，一个住下面亭子间，一个住上面亭子间。

《从前》是以第一人称叙述的，小和是“我”的精神寄托——“有她，这个世界就是充实的。再远再苦都没关系，只要有一个人想着你，什么都可以不在乎。”他下乡后的依靠，也就是对信的盼望了——“有这两页纸，够我过一个愉快的傍晚了。我不认为自己对她有什么权力。我感激她记得我。”这里的“我不认为自己对她有什么权力”特别耐人寻味。

这个长篇里插队生活的叙述，其实未能超越《花狗子嘎哩》。那句“筷子与鸡腿齐飞，嘴巴共猪肝一色”很熟悉，他用过几次的。与小和的关系，其实是这部小说真正的支架，最微妙，也最感人。小说中，陈村写：“我在她身上，发现了自己的温情、自信和怯懦。”在我的想象中，小和大约就是小真吧？但她似乎永远是那个青春群体中的一员，从未独立面对于他。他们一起去苏州，去黄山，这都是真实经历。他与她，我感觉是那种隔着一定距离深情的眺望，就像舞台上的追光。这种延续不灭、穿越时光的追光的感觉，是最美的。陈村的诗写得确实并不好，但在小说中，“我”告别小和，留给她的诗，还是耐读的——

入秋了，入秋是很善于下雨的。

雨声就像深夜传来的叫声。

我不知天有什么为难，

我从窗口伸出盆子去，

我把它接过来，尝尝。

有点苦涩。

《从前》最后写到“我”的一场大病，陈村说，记述基本真实，是他当年自杀的后遗症。1973年，他20岁时曾吃了很多安眠药，终被同学与老乡送到医院，抢救过来。原因呢？他说，“看不到希望”——“农

村多无聊啊。”他说：“但回来看到我妈妈的样子，就知道死不得的。”小说中，他这样描述：“含辛茹苦，担惊受怕，十九年工夫，造成了一个儿子。一夜之间，十九年的心，十九年的血，全被剥夺了。妈妈极度伤心。”

这个长篇的缺憾是写得太匆忙。下乡后第一次回家，当意识到小和不可能单独与自己在一起后，“我”的心境便省略了很多。省略了精神寄托失却后，如何变成精神遥望的，后半部就只剩过程了。

陈村1983年写了一个很优秀的短篇《一个不走运的朋友》，我不知道小说中那个因素素废了自己画画的“大头”，是不是黄石原型的引申？他是时常为黄石的才华未能很好地被大家认识而嗟叹的，他发给我看黄石写他们朋友的《陈泓传》，古文功底真是了得。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我相信高人其实都在民间。但陈村在这篇小说中的价值观其实是矛盾的——他先告诉“大头”的妻子：“一个人尽了本分，就不能叫没出息。”随后却又认为“大头没救了”：“人所需要的东西，他差不多都有了。所以，他差不多什么都失去了。”可见他的价值观，“走运”还是指出人头地。最后，“大头”是“扇动着业已退化的翅膀，踉踉跄跄地飞了”，陈村却让他“死在绝不想死的时候”。可见仍未如他期待，凌空而起。

那篇《我们在二十岁左右》的开头，陈村用的就是黄石的诗——

欺骗土地的人，

他将颗粒无收。

何况，我们在二十岁左右。■（待续）



《住读生》与《从前》
都发表在《百花洲》，
1996年结集于《陈
村文集·长篇小说
卷》，由江苏文艺出
版社出版

游走的钓鱼人

文 / 黄二（北京） 图 / 陈曦



一个住在崇山峻岭中的老人，每日肩上扛着一根比身体长两倍多的钓鱼竹竿，慢慢吞吞地在山道上游荡。

这里的山很高，一座挨一座，挟着西南雪峰山的余势奔涌而来。要在起起伏伏的山脊间找到能钓鱼的山塘是颇费周折的。老头在三八节那天离开了山坡上的那间小瓦屋，三天了，他翻过了三座山头，现在迎着细雨斜风，在山道的拐角处，隐隐约约又能看到自己山坡上掩在绿树丛中的屋了。

老头姓李，是我外祖父的堂弟，跟他堂兄一样，一辈子就好钓鱼。他堂兄去世后，他突然就喜欢这样离家出走钓鱼了。刚开始家里崽女很着急，后来发现他并没走丢，也就放下心思，由着他去。有一次喝多了乡下的苞谷烧，他满脸放着红光说：“我哥回家了，要我领着他四处走走玩玩，他不大识得路呀。”周围的人听着被吓得一个趔趄。

李老头累了，总是歇在临河的那面山坡上，慢慢地看着脚下的这条河。河在大山尽头拐弯处被一座大坝拦住，就是中南地区很有名的柘溪水库。那一大片翠绿的汪洋深不可测。几十年来，水底长成了巨大的鱼。据说有一次大山洪袭来，坝顶溢水，跟人一样大的鱼一条接一条往坝外跳，跳下坝就摔晕在水里。下游河边的人驾着船，可劲地捞。有的时候鱼没晕透，尾脊一扇，连船带人都被掀翻在水里。李老头也去水库碰过一次运气，结果刚把饵扔进水里就被大鱼咬住，连人带竿扯进水里，幸亏揪住岸边一棵横着的树才保得命回来。李老头后来逢人问起就说，那哪是鱼，比犁田的水牛的劲头还大，肯定是精怪了。

李老头肩扛一根竿外，腰边还挂着一个竹鱼篓。出门一月两月的，一分钱不帶，生活就靠这鱼篓。篓里除了钓的鱼之外，还有山上顺道采来的木耳、茶泡之类，走累了，遇到山道边的人家，就迎着犬吠去叫门。山里人大都率真耿直，老人把鱼篓里的把戏统统倒出来，请主人家莫嫌弃收下，主人家于是觉得受之有愧，

3月份还有过年剩下的腊鱼腊肉，赶紧拿出来蒸了待客，没有鱼肉的也一定要煎几个鸡蛋。李老头便有滋有味这么吃下去。有时候喝高兴了，还夹住肥肥的腊肉往空气中一递，叫声哥，主人要问原委，他也只说一句“我吃两人的饭呢”，再不敢拿别的话吓唬人。

李姓在当地是大姓，来来去去得久了，方圆几十里内。谁都认识这个游走钓鱼的李老倌。这么些年下来，李老头的钓技也因此被神化。甚至有人赌咒发誓说亲眼看见李老头隔空抓物施法召鱼，那哪是钓鱼呀，一根竹竿连钓也没有，往水里一圈，鱼就大大小小的跟着上来了。当面追问李老头，他也是笑而不答，因此也就更加闻名乡里。不过李老头的钓技确有些不凡，最妙的是他什么东西都能入饵，一片菜叶、一朵南瓜花、一块红薯、一段肉皮，甚至屋角的蜘蛛网，零七碎八不一而足，竟都能做饵钓鱼。开钓之前，他还有固定的仪式，先要把手伸到水中试试温度，太冷或背阳的凉水里是很难钓上鱼的，然后他就抬起湿漉漉的手，迎风晃动，看看风从何来，要是大西风，就要歇上一天。

李老头有数个子女，多走出这大山在外发达，见老爹酷爱钓鱼，就好说歹说把他诳到城里想尽孝心，安排到城郊的养鱼池过瘾，哪知李老头抄着手绕着鱼池走一圈，连连摇头，说死水死鱼，蠢猪！硬是不肯下钓，连满塘的鱼和岸上的人都被他骂了，弄得大家怒目而视，一家人不欢而散。崽女只好重又把他送回大山深处。

李老头还是这样的，绕着家里的这些山山水水转悠。他从斜风细雨的3月开始出门，估计要到天热起来，黄灿灿的油菜花开满坡才回家。他心里想这次要带着堂兄好好地转个够，好好地过过钓鱼的瘾，连一处山旮旯都不能落下，也许明年他想走也走不动了。他这么想着，拍拍屁股上的土，站起来竟然想唱一支歌，啊啊两声没能唱出口，慢慢地往山脊上的密林深处去了。■